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中国史

1

史前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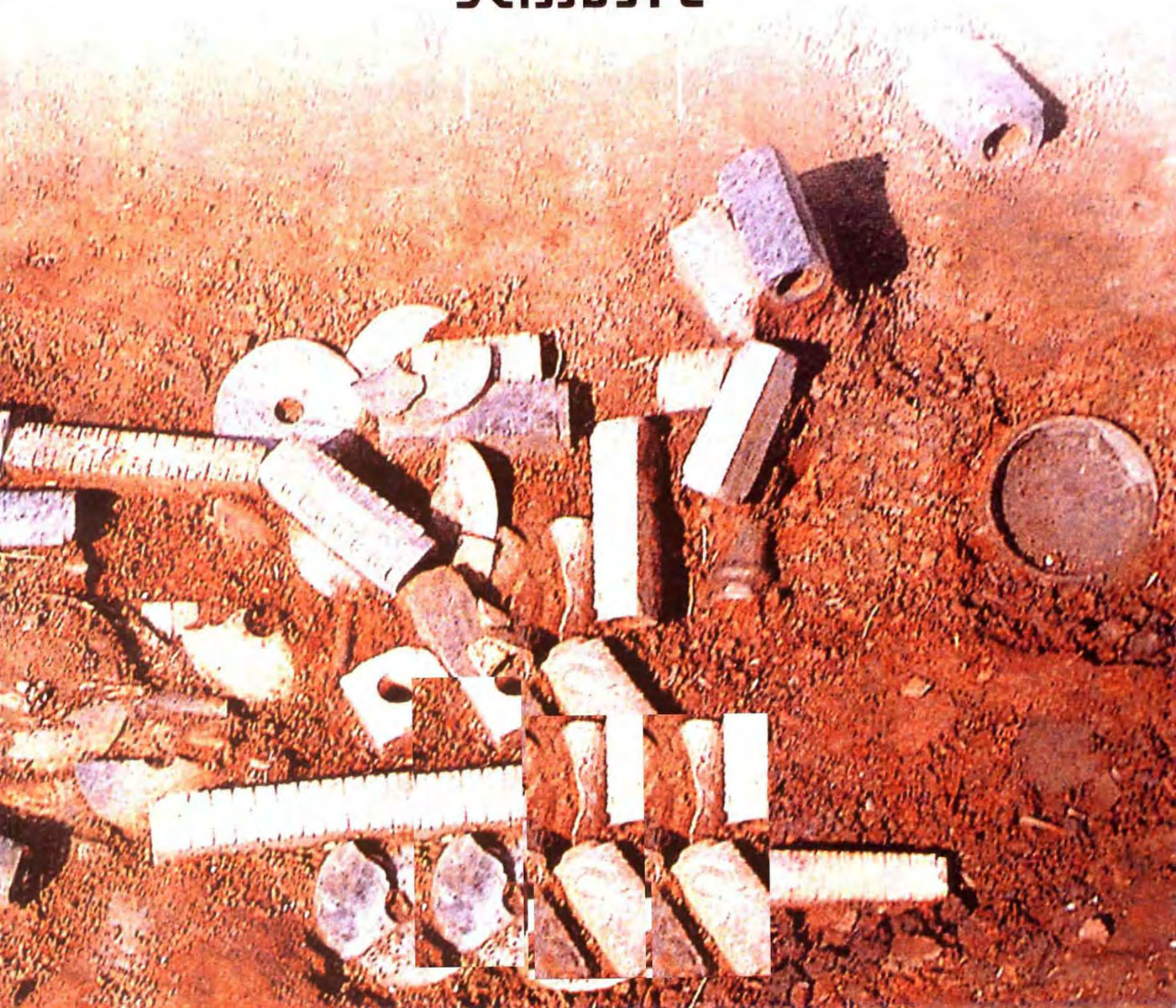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中国史

1

史前时代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中国史·史前时代 /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12

ISBN 7-5440-2647-7

I 文 II 中 III ①文物—中国—原始社会—普及读物
②文物—中国—原始社会—图录 IV ①K209②K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4447号

《文物中国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文物中国史

编 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

出版发行: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2号楼)

总 责 编: 王宇鸿 张金柱

责任编辑: 张大同

助理编辑: 郭志强

复 审: 刘立平

终 审: 张金柱

装帧设计: 孟 孟(香港)

排版制作: 陈先英(香港) 李秋云(香港)

责任印制: 林佳年(香港)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

版 次: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全套定价: 800.00元

前言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

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的科学的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问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分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备；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史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练。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专业知识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能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凤瀚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五日

目 录



第一章 人类起源之谜	2
第一节 腊玛古猿?	3
第二节 南方古猿	3
第三节 能人	4
第四节 直立人	4
第五节 早期智人	5
第六节 晚期智人	5
第七节 人类起源与进化研究的一些新动态	6

第二章 中国境内的直立人	8
第一节 最早的直立人	9
第二节 陈家窝与公王岭	10
第三节 北京人	12
第四节 进步类型的直立人	13
第五节 郧县人	13
第六节 北京人的另一个支系	14
第七节 居住在东北的庙后山人	14
第八节 汤山人	15

第三章 北京人的生活	16
第一节 生态环境	16
第二节 采集和狩猎	19
第三节 洞穴为家	20
第四节 用火和火种的保存	21
第五节 石器加工和使用	23



第四章 不同风格的旧石器文化 26

- 第一节 旧石器的制作与功能 27
- 第二节 手斧 27
- 第三节 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要序列 28
- 第四节 华南的旧石器工业制品 35
- 第五节 西南旧石器的特点 38

第五章 智人的分布 40

- 第一节 中国的早期智人 40
- 第二节 现代人的出现 44

第六章 原始技术与精神活动 48

- 第一节 细石器工艺 48
- 第二节 狩猎工具和方法 54
- 第三节 骨、角器的加工 59
- 第四节 意识、宗教和艺术的初现 63

第七章 新石器时代之初 70

- 第一节 一万年前的陶器 70
- 第二节 站在洞口望平原 74



第八章 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 78

-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78
-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88
- 第三节 边远地区的文化 99

第九章 早期农业的两大系统 106

- 第一节 南方稻作农业 106
- 第二节 北方粟作农业 112

第十章 生产与生活 118

- 第一节 居住和饮食 118
- 第二节 开发型的经济——家畜饲养 121
- 第三节 依赖型的经济——捕鱼、狩猎 124
- 第四节 精美的陶器 127
- 第五节 编织、纺线和织布 135
- 第六节 神奇的玉器 137
- 第七节 古朴的木器 142

第十一章 野性之美 144

- 第一节 国画鼻祖 144
- 第二节 稚拙的雕塑 152
- 第三节 天籁之音与神秘之舞 157



第十二章 天地人神的沟通 164

- 第一节 把世界分成三界 164
- 第二节 人神之间的使者 168
- 第三节 通天地手段的独占 173

第十三章 文明的曙光 178

- 第一节 关于文明社会的标准 178
- 第二节 在中国不同地区出现的文明因素 179
- 第三节 文明在中原地区的突破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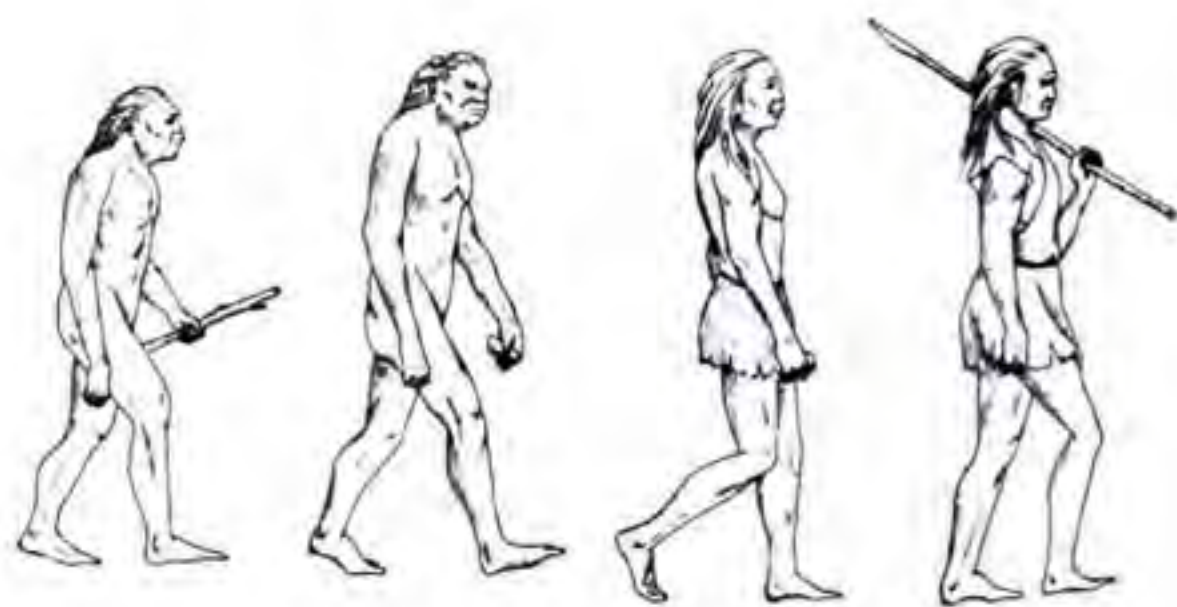
参考书目 196

图片索引 199



文物中国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一章

人类起源之谜

人类的起源同生命的起源、从水到陆地和从陆地到天空的生命演化，被古生物学家们称为生命史中四大未解之谜。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就对自身的起源问题很感兴趣。在许多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流传着神创造人的种种传说。中国有女娲捏泥造人的原始神话传说，说的是远古时代有一位名叫女娲的女神，感觉寂寞，就用黄泥照着自己的形象捏成若干个小人，用嘴向小人吹口气，这些小人就活了起来。女娲让男人和女人结婚，繁衍后代，于是人类就出现了。在西方流传甚广的是基督教《圣经》中所讲的上帝造人的神话传说。《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为：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造出天地万物，在第六天，创造了一切生物后，上帝又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出了人。第二种说法为：上帝最初用尘土创造出一个

男人，名叫亚当，让他生活在伊甸园里。后来上帝发现亚当在那里生活得很孤独，就使亚当熟睡，从亚当的身体里取下一根肋骨，用那根肋骨创造出一个女人，名叫夏娃，作亚当的伴。现代人都是夏娃和亚当的子孙。一百多年前人们对自身的起源还一无所知，多数人相信人是由神创造的，直到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R. Darwin)发表了震撼学术界的著作《物种起源》，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人们才开始科学地对待自身起源问题。1863年英国的进化论学者赫胥黎(T.H. Huxley)发表了名著《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首次科学地论述了人类起源问题。随着古人类化石的不断发现，人们逐渐普遍地承认人是由古猿进化来的这一科学命题。

经过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一百多年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人类起源之谜已初露端倪。

虽说许多问题科学家们还在继续探索、争论，但人类起源的大致轮廓已勾画出来。简而言之，可把人类的起源、演变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 腊玛古猿？（距今约 1200 万年）
- 南方古猿（距今 400 万年—100 万年）
- 能人（距今 200 万年—150 万年）
- 直立人（距今 150 万年—20 万年）
- 早期智人（距今 25 万年—4 万年）
- 晚期智人（距今 5 万年—1 万年）

第一节 腊玛古猿？

人类是由古猿演变而来的，但猿科与人科的分界线在哪里，人类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1932 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刘易斯（G. E. Lewis）带领一个考古队，在印度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西瓦立克山区发现了腊玛古猿的颌骨及牙齿化石，距今约为 1200 万年。刘易斯注意到这个颌骨有一些明显的似人的性状，如齿弓呈抛物线、犬齿小、无齿隙、前部牙齿向前的突出度较小等。因此，1937 年他在博士论文中把腊玛古猿归入了人科。随后在肯尼亚、匈牙利、希腊和中国云南等地陆续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腊玛古猿是人的祖先。1956 年在中国云南开远小龙潭煤矿发现了两件下颌骨，分别被归入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后来又有不少古猿的牙齿被发现。中国人类学家吴汝康先生研究认定，这些标本实际上代表了同一物种的雌雄个体，于是将其修订为禄丰古猿同名种。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古人类学家们逐渐接受了分子生物学方法，把距今 700 万年至 500 万年作为人猿分离的时间。禄丰古猿生

存在大约 800 万年前，且一直没能找到它们能直立行走的证据，故被人类学家排除在人科之外。1986 年在云南元谋发现了许多古猿牙齿、下颌骨和一具面骨。它们从形态上看与禄丰古猿极为相似，因而被定为同属的动物。其年代在距今 500 万年至 400 万年之间，因此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禄丰古猿这一支没有向人的方向发展。总之，人类学家对腊玛古猿的归属问题有过多次争论，直到今日尚无定论。所以我们在腊玛古猿的标题上打了一个问号，一方面它反映出人类认识自身起源的探索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对此问题将继续探索。现在只能笼统地说：中新世即约 2600 万年至 1200 万年前存在着人猿超科的成员，它们是现代人类和猿类的共同祖先，人猿超科的成员有可能是腊玛古猿，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古猿。此外，从腊玛古猿到南方古猿的进化过程中还存在缺环，科学家们还需要寻找新的证据来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期待着进一步的结果出现。

第二节 南方古猿

目前学术界比较肯定的人科成员是南方古猿，其生存的地质年代从上新世到更新世早、中期，距今约 400 万年至 100 万年。南方古猿的化石材料主要发现在非洲，且多集中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两大区域。已发现的化石材料非常丰富，大约可代表 350 多个个体，有在南非阿扎尼亚、汤恩发现的南方古猿颅骨化石，奥杜韦峡谷发现的东非人及阿法地区发现的“露西”等。另外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中国的湖北等地也有零星南方古猿化石发现。南方古猿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脑量较小，平均为 500 毫升，但在结构

上与人相近，能直立行走，会制作简单的砾石工具。直立行走是南方古猿对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种选择。直立行走使他们在开阔的林地寻找广泛的食物资源时，能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走来走去，这种新的行走姿态解放了双手，为狩猎活动准备了条件。人类学家对南方古猿和猿类的牙齿进行分析后认为：南方古猿的臼齿有平的研磨面，而猿类则有尖锐的齿尖，这说明猿类的牙齿较适于吃较软的果子或其他植物，南方古猿则转为吃比较坚硬的水果和硬壳果。

第三节 能人

能人化石是1960年在非洲东部的奥杜韦峡谷首次被发现的，化石材料可复原出一个成型的颅骨，其年代根据同位素钾—氩法测定，为距今210万至150万年。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和南非斯特克方丹和斯瓦也发现了能人化石。能人的脑量比南方古猿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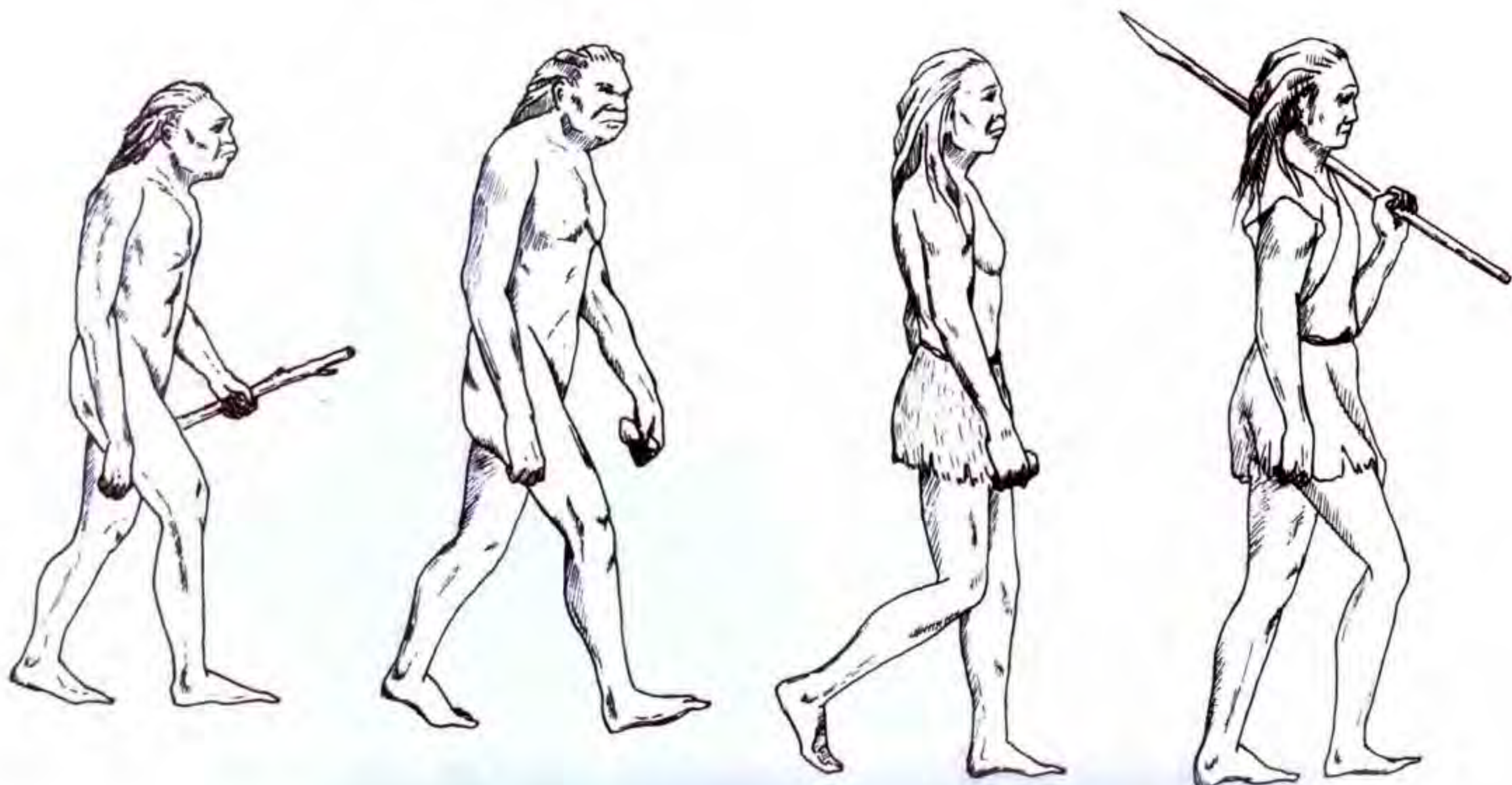
所加大，雄性的脑量为700毫升至800毫升，雌性的脑量为500毫升至600毫升。能人石器加工技术高于南方古猿，除制作大量砍斫器外，还制作盘状器、原型手斧、大型刮削器、小型刮削器等。根据这些石器类型分析，能人可能过着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经济生活，或采集野果、挖掘块茎植物为食，或拣食动物吃剩的肉，偶尔也以群体的力量猎取野兽。

第四节 直立人

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直立人化石，发现者是荷兰年轻的军医杜步瓦(E. Dubois)。他致力于寻找人与猿之间的缺环，经过数年努力，终于找到了直立人的头骨和股骨化石，并于1894年发表学术论文，认为爪哇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由于当时人们缺乏对直立人的认识，他的这一观点遭到权威学者们的反对，他们认

人类演化图

腊玛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



为爪哇人的头骨和股骨分别属于不同种类动物或人的遗骸，头骨属于长臂猿，股骨则属于现代人。教会更是拼命加以反对，指责杜步瓦的文章是异端邪说。在这两股力量的压力下，杜步瓦沉默了，他把爪哇人化石标本封存在保险箱中达二十八年之久。直到后来北京人化石发现，学术界才给爪哇人彻底平反。直立人化石分布于亚洲、非洲和欧洲，著名的直立人有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在中国发现的北京人、蓝田人、元谋人，在非洲发现的图尔卡纳湖人，在德国发现的海德堡人等。

直立人生活在距今150万年至20万年间，在这一阶段直立人的脑量逐渐增大，从800毫升增到1200毫升，学者们由此还推测直立人可能具备了初步的语言能力。1985年，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理查德·利基(R. E. leakey)领导的考古队，在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附近发掘出一具近于完整的十二岁男孩的直立人骨架，他大约是在154万年前夭折的。这个男孩的化石材料留给我们许多信息。科学家从他的第七胸椎看出与现代人有所不同，胸椎上的孔较小，由此推断其脊髓不具有足够的神经组织，他不可能像现代人那样很好地控制呼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发出具有一定含义的各种声音，用简单的哼哈声和各种叫声也能交流很多事情，只不过不能像现代人的语言那样表达很复杂的事物。他的牙齿和上下颌显然小于南方古猿，说明直立人的牙齿已适于食肉，不需要像南方古猿那样因吃粗糙植物和咬碎坚果而需要强大的双颌和粗人的牙齿。根据他的股骨长度推算，这个男孩死时身高为1.7米，成年时可望长到1.8米，也就是说直立人是当时最高的人种。该男孩的骨盆较窄，两条腿走起路来应比现代人要利索一些。从这个男

孩的化石不难看出，直立人身材修长、髌部纤细，适于快速奔跑和追捕猎物。

在全世界直立人遗址中，北京人遗址可以说是最为丰富的。周口店第一地点不仅发现大量直立人化石，还发现了一百多种哺乳动物化石，约十万件石制品和大量用火的遗迹。直立人比能人的生活有显著的提高，他们能够制作较规范的砍斫器、刮削器、手斧等工具，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据遗址中发现的各种大小哺乳动物化石推测，北京人不仅能猎获小动物，而且还能捕获个体较大的动物。

第五节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25万年至4万年前，主要分布在亚洲、欧洲和非洲。比较著名的有在非洲发现的博多人，在希腊发现的佩特拉洛纳人，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昂栋人，在欧洲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在中国发现的大荔人、马坝人、许家窑人等。早期智人的主要体质特征是脑量较大，在1300毫升以上，石器制作技术日趋进步，且明显表现出地域性差异。如尼安德特人创造出以细小尖状器和刮削器为代表的莫斯特文化。中国这一时期的丁村文化则以厚尖状器、砍砸器为主要特征。许多考古学证据表明早期智人能制作骨器，会人工取火，并有了埋葬死者的习俗。

第六节 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5万年至1万年前，他们的足迹已遍及欧洲、非洲、亚洲、澳洲

及美洲，像在非洲发现的佛洛里斯巴人，欧洲发现的克罗马农人、姆拉德克人，在中国发现的柳江人、山顶洞人，在澳大利亚发现的梦戈湖人等。他们在体质上与现代人接近，石器加工技术有较大的发展，广泛使用以窄、长石叶制作的细石器。标枪、投矛器、弓箭、鱼镖等狩猎工具的出现，标志着人们能够更有效地狩猎和捕鱼。晚期智人还能缝制衣服，用兽皮和大动物的骨头建造住所，用穿孔兽牙、砾石、蜗牛壳等制作装饰品，会制作小雕像和在洞穴上绘画，并有一套埋葬死者的习俗。

第七节 人类起源与进化研究的一些新动态

人类究竟起源于何处？这是当前人类学的热点问题，但迄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主要的两种观点为多地区进化假说和单一地理区起源的假说。

多地区进化假说认为现代人的起源地包括了整个旧大陆，凡有直立人化石或遗迹出土的地方都有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例如非洲、亚洲和欧洲。尼安德特人曾被认为是三大洲范围内进化的一个缩影，他们在解剖结构上是介于直立人和晚期智人之间的人类，是今天生活在欧洲、中东和西亚的人群的直接祖先。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似乎对这种多地区进化假说很不利，那就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以色列的一些洞穴中陆续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化石，在另外的一些洞里发现了晚期智人的化石。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和法国一些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一些晚期智人化石的年代居然早于尼安德特人的年代。如果这种结果是正确的话，

尼安德特人就不能作为现代人的祖先。由此进一步类推，在非洲发现的能人和在亚洲、欧洲发现的直立人，包括北京人都不是现代人的祖先，而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绝灭的旁支。事实上，尼人在人类演化中的地位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化石特征显示了其复杂的镶嵌进化证据，即直立人化石中包含着某些智人的特点，智人化石中则有着一些直立人的特点。典型尼人在西欧生存到很晚，有的可晚到3万年前，而在南非有的洞穴中却发现了最早的晚期智人，其年代距今约10万年。在中东地区发现的尼人和晚期智人共生的证据似可说明，在中东尼人和晚期智人有长达5万年的共存期。但是对东亚地区的现代人起源研究表明，无论在化石记录上还是文化特征上，地区连续演化似乎更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在东亚包括中国，现代人是从本地的直立人经早期智人进化到晚期智人的。中国有着丰富的古人类化石材料和相关遗物，表明中国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单一地理区起源假说，具体说来就是指人类起源于非洲，因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发现了最早的智人化石，另外在以色列发现的智人化石也接近10万年前，所以现代人可能最先起源于北非或中东，然后迁徙到其他地方。美国生物化学家艾伦·威尔逊（A. Wilson）根据人类线粒体DNA的证据认为，所有的现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女性远祖，大约生活在距今30万年至15万年间。如果分子生物学计算无误的话，这位人类先祖母应生活在南非。她的后裔逐渐扩散，然后分布到全世界。这个假说被媒体称为“夏娃假说”，流行一时。但他的计算并非完全可靠。一位日本研究人员采用相同的方法比较人类与黑猿的线粒体突变速率，结果却计算出人

与黑猿的分化应在80万年前,如果他的计算是正确的话,就意味着黑猿的祖先是直立人。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也有一些体质人类学家应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认为立足于线粒体DNA的人类进化理论是不准确的。所以这些新的方法并没能解决现代人类起源的问题。但现在不少人类学家全面衡量各种依据,仍倾向于认为现代人起源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总之,人们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常常随着化石材料的新发现而有所修订,对人类起源地的估计总是锁定在旧大陆,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的范围之内。那么中国作为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早期人类是按照怎样的模式发展的呢?从20世纪20年代起,北京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后来又发现了比北京人早的蓝田人和元谋人。1997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找寻200万年前和更早人类的“攀登项目”。1998年和1999年在安徽繁昌发现了一些更新世初期的石器和骨器,为中国有人类生存的最早时间有可能达到200万年前提供了间接证据。中国已发现不少上新世和中新世的古猿。它们所生存的环境也适合于远古的人类,因此完全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找到制造200万年前的石器的那些人的遗骨。随着丰富的直立人化石、智人化石不断地在中国被发现,人类学家通过对这些化石的研究,认为古人类在中国是连续进化的。近年来,中国学者通过对中国境内所有出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进行比较研究,又有新的发现。例如,蓝田人头骨的上颌骨颧突

的形态与中国其他化石不同,但与欧洲早期头骨十分相似,这种情况可能反映出它与欧洲早期头骨有着共同的来源。又如,早期智人的大荔人头骨上梨状孔的外侧处骨面隆起;马坝人头骨眼眶呈圆形,眼眶外下缘较锐,这些特点都与中国境内发现的其他同期的人类头骨化石有所不同,却与欧洲尼安德特人相同。因此人类学家吴新智认为,在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主流过程中,还附带着杂交的模式。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人类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后一阶段中,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和人群的迁徙,人类的繁衍有一定的基因交流,除了中国境内南北间的基因交流外,还有东西方的基因交流。这一理论还可从一些文化现象中得到证实。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从石器工业的角度着手,对中国各个时期、各个地点出土的旧石器进行比较对比,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东西方石器工艺技术的交流是存在的。(考古学术语称这种石器加工的工艺技术为工业。)内蒙清水河工业类型广泛分布于河套地区,清水河工业类型的特点是具有相当成熟的细石器工业制品,故张森水推测:曾有一群拥有莫斯特和奥瑞纳技术的人群在那里生活过。

从上述所讲到的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直立行走和制作工具在从猿向人的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直立行走使人腾出双手,用双手制作工具,促进了大脑和人体其他部位的进化,使人类真正成为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高级动物。

第二章

中国境内的直立人



人们一般将出现文字以前的人类历史称为史前史。考古学家又按照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的性质把史前史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最早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人类，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因为没有文献记载，要追溯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只能根据地下发掘出的古人类化石及其遗物。可以说，古人类化石及其遗物是研究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从人类化石的特点上可看出人类体质上的演化，从文化遗物上则可体验到远古人类是怎样经过艰苦劳动繁衍下来的。

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直立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直立人是猿人的分类学名称，生活的时代代表人类演化中的一个阶段，介于能人与早期智人之间，大约在距今150万年至20万年间。直立人处在旧石器时

代早期，从时间上说，这段历史占迄今人类全部历史的99%以上，在这极其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的演化相当缓慢。直立人在体质特征上保存着亦猿亦人的特点，尤其是头骨的原始特征十分明显。比如头骨呈馒头形，最宽部位在两个外耳门的上方，不像现代人那样头骨呈球形，最宽部位靠上在顶结节处；头骨骨壁约比现代人的厚一倍，脑量也较小，最小的只有780毫升，最大的达1225毫升，而现代人的平均脑量为1400毫升；直立人一般具有粗壮的眉脊、发达的枕圆枕和角圆枕等原始性状；直立人的上下颌骨和牙齿均比现代人的粗壮，还具有多颞孔和白齿咬合面纹理复杂以及无下颞等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门齿化石基本上呈铲形，众所周知铲形门齿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就是说早在直立人阶段，蒙古人种就已经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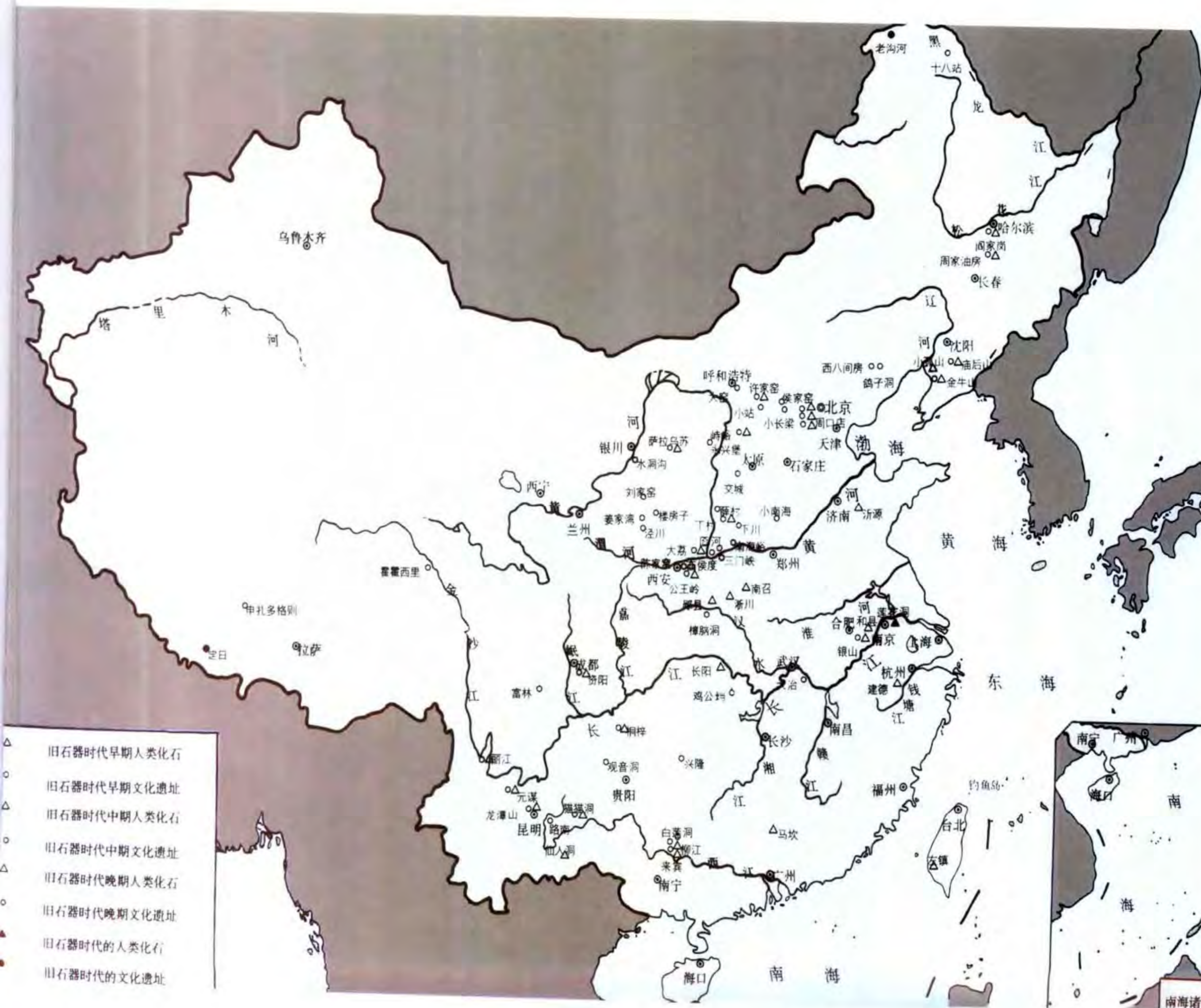
自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第一个直立人化石以来,许多直立人化石地点相继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广大地区被发现。亚洲的直立人化石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主要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沂源人、庙后山人、汤山人等。这些人类化石对研究早期人类的历史、人类本身的发展与进化,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第一节 最早的直立人

元谋人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距今约170万年。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的小丘梁上发现两枚人牙化石,为同一个体的左右上内侧门齿。

元谋人的牙齿粗壮硕大,齿冠切缘的扩

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和主要文化遗址分布图



元谋人上。中门齿

旧石器时代早期

1965年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出土

长1.14厘米, 1.13厘米

元谋人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直立人。这两枚门齿齿冠下部的底结节发达, 指状突粗壮, 是南方古猿向直立人过渡的代表特征。



展指数达141.9毫米, 超过了目前已知早期人类的所有同位牙齿。从舌面观察, 元谋人门齿齿冠下部的底结节发达, 指状突粗壮。从唇面看, 元谋人门齿的唇面较为平坦。元谋人上门齿与南方古猿非洲种的纤细型有一些相似之处, 比如齿冠面隆突不很明显, 齿根侧面没有显著的浅沟等。元谋人上门齿也有与北京人上门齿相近之处, 如牙齿呈铲形, 底结节发育, 指状突明显, 切缘较宽等; 但还存在一些比北京人更加原始的特征, 如齿冠末端扩展, 基部比较收缩等。因此专家们比较一致地认为: 元谋人可能具有从南方古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

元谋人牙齿化石是科学家们在一次地质考察时发现的。后来科研人员对元谋盆地做过多次发掘和采集, 获得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有云南马、山西轴鹿、中国犀、剑齿象、野猪、羚羊等。在元谋人地层中还发现了3件刮削器。仅从这3件石器去判断元谋人的石器加工技术是很困难的, 但据学者的研究, 其中一件标本是用砸击法制成的, 它是世界上较早的砸击标本之一。

关于元谋人的年代判定曾经有过分歧。1976年, 中国学者李普等人对元谋人化石层位做古地磁测试, 结果为距今 $170\text{万} \pm 0.1\text{百万年}$ 。1984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

刘东生从地质学角度, 认为元谋人距今不应超过73万年, 可能为距今60万年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1985年中国学者钱方等再次对元谋组做古地磁采样, 测试结果是年代介于距今187万年至167万年之间。因此目前学术界一般将元谋人的年代定在距今约170万年。

第二节 陈家窝与公王岭

在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和公王岭两处发现的直立人化石被统称为“蓝田人”, 蓝田人是迄今为止亚洲北部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化石。

1963年地质工作者在陕西省蓝田县泄湖镇的陈家窝发现了一具较为完整的直立人下颌骨。这具下颌骨相当粗壮, 无下颏, 多颏孔。牙齿全部保存在原位上, 但左右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牙齿粗大, 臼齿咬合面纹理复杂。从形态上看与北京人的下颌骨有相似性, 但也有一些不同处, 如下颌骨前部倾角较小, 显示出比北京人更为原始。经吴汝康研究, 这件标本属于一老年女性个体。据古地磁测定陈家窝下颌骨的年代距今约65万年。

1964年考古学者又在蓝田县东的公王岭发现了更加丰富的直立人化石, 包括完整的额骨、顶骨, 左鼻骨大部分和右鼻骨的鼻根部分, 右上颌的大部分还附连第二和第三上臼齿, 左上颌的体部和额突等以及左上颌骨的第二臼齿。公王岭蓝田人的头骨明显地向后倾斜, 眶上圆枕向前突出。头盖骨极厚是其主要特征, 与北京人和爪哇人头骨相同部位相比都位于它们测量数字的最高线。这表明公王岭蓝田人比北京人更为原始。根据这

具头骨及上颌骨和牙齿的磨损情况，人类学家将其定为三十多岁的女性个体。公王岭蓝田人化石层位经古地磁测试为距今110万年。

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蓝田人头骨上的不正常现象，如额骨非常低平、头骨极厚、头骨高度及脑量都很小等一系列特征。近年来有学者正式提出：这具头骨是一个患有某种疾病的非正常人的头骨，具体患何种疾病尚需做病理学的研究。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公王岭蓝田人化石伴随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剑齿虎、爪

属南方类型的动物，而陈家窝蓝田人地层出土的动物化石有复齿兔、丁氏麝鼠等，多属北方类型的动物。这大概反映出从公王岭蓝田人生存时期到陈家窝蓝田人生存时期的20万年至30万年间，这里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估计100万年前这里曾经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到65万年前，则变得比较寒冷和干旱了。

在公王岭蓝田人化石层中还发现了一些灰烬和炭屑，有可能是蓝田人用火的痕迹。公王岭和陈家窝地点以及公王岭附近的十几个地点都发现了一些石制品，包括砍斫器、



北京人头盖骨

旧石器时代早期

1966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1地点出土

北京人头盖骨具有与猿相近的特征，如顶骨低平、前额后倾、眉脊粗壮等。

刮削器、大尖状器和石球。总的看来制作上都比较粗糙。大尖状器是其中最富特点的石器类型。

第三节 北京人

北京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直立人之一。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县的周口店。自1927年发现北京人的第一枚牙齿以来,考古学家曾多次发掘这个遗址,获得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1928年,杨钟健、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时,发现了一件直立人的下颌骨。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主持周口店发掘时,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个发现轰动了世界,这一天也成为人类学界、考古学界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之一。1931年至1937年,贾兰坡在周口店主持发掘。至1937年,在北京人遗址共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5个、面骨6件、颅骨碎片15块、下颌骨14块、牙齿147枚、股骨残段7段、肱骨残段2段、锁骨1根、月骨1件。这些化石资料共代表了不同年龄的40多个个体。但这批极为珍贵的资料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丢失,现在只保留下部分标本的模型。

1937年以后,由于战争的原因,此遗址的发掘工作中断了十二年,直到1949年9月贾兰坡等才又主持发掘。此后陆续有所发现。1951年发现肱骨和胫骨残段各1件、单个牙齿2枚。1959年发现了一个下颌骨。1966年发掘猿人洞上部堆积,发现了同一个体的颌骨和枕骨。枕骨部分恰好可与1934年在这个地点附近发现的两块颅骨碎片模型相拼合,复原出一个完好的头盖骨。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对周口店猿人洞和邻近地区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包括用多种方法

测定猿人洞从上到下各层的年代,研究猿人洞的形成过程和北京人的生活环境等。

从化石上得到的信息,我们可了解到北京人的一些体质特征:与现代人相比,头盖骨低平,颅骨的最宽处靠近耳孔上方。如把北京人的头骨与猿类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北京人的颅高、颅长和颅宽的指数都远远超过猿类。北京人眉骨粗壮,眉脊与额鳞之间有一明显的沟槽。北京人的下颌骨比现代人粗大,多颊孔,牙齿咬合面纹理复杂。这些特点既有原始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一面,体现出北京人还处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根据肢骨长度,可推断出北京人的身高大约为157厘米。比较特别的是,北京人的头骨和肢骨相比较,头骨较具原始性,肢骨则较具进步性。因此,国外曾有人认为周口店同时存在两种人,一种是以肢骨为代表的进步人,他们是创造周口店文化的主人;另一种是以头骨为代表的原始人。有人甚至认为北京人头骨是进步的人猎取原始的人为食、吃完脑髓后留下的。其实这种情况反映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身体各个部分发展的不平衡性。直立人首先是直立行走,用手制造和使用工具从事劳动,因此手和脚首先得到进化,然后才是大脑的发展。

北京人遗址堆积物厚达40余米,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为第13层至第8层,时代为距今70万年至40万年;中期为第7层至第6层,时代大约为距今40万年至35万年;晚期为第5层至第1层,时代为距今30多万年至25万年。在堆积中共发现了10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原始麝、麂、德氏水牛、大丁氏鼯鼠、变种狼、中国鬣狗、杨氏虎、剑齿虎、纳玛象、裴氏犀、三门马、肿骨鹿、扁角鹿等。

从文化堆积上看,北京人并不是世代

代连续居住在洞穴内的。一群北京人在这个洞穴居住一段时间后，由于食物匮乏，环境变化，不再适于居住，而搬出洞穴。过一段时间又有另一批北京人住了进来。堆积中还埋藏了几层鬣狗的粪层，说明此洞穴曾多次被鬣狗占据。

第四节 进步类型的 直立人

1980年，中国的科研人员在安徽和县陶店镇南汪家山北坡的龙潭洞中，发现了一个较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部分下左颌骨和9枚单个的牙齿。1981年的继续发掘又获得了人类化石7件，包括额骨眶上部位1块、右侧顶骨1块、右上内侧门齿1枚、左上第一臼齿1枚、右上第二臼齿1枚、左下第二臼齿2枚。

从头盖骨看，和县人颅骨较大且厚重，眉脊和枕骨比较发达，额部向后倾斜，与北京人的头骨特点较接近。古人类学家将和县人的小脑窝与大脑窝面积之比与北京人和现代人的比值相比较，认为和县人比北京人进步，比现代人原始。据研究，这具头骨属一男性青年个体。

和县人下颌骨较粗壮，有多颞孔，显示了其原始的特性。对单个牙齿的研究表明，和县人牙冠大且宽，在数值上超过了北京人、爪哇人和蓝田人。据研究，这个下颌骨代表的是一女性壮年个体。

与和县人化石相伴的动物有剑齿虎、肿骨鹿、大河狸、东方剑齿象、中国獾等50多种哺乳动物，包含了南北混合的动物种类。所以有学者认为和县人刚好处在北方型动物大举向南迁徙的时期。

关于和县人的年代，采用了几种不同的测定方法，结果稍有不同。用热释光测出和县人的年代为距今20万年以内，用铀系法测出的年代则为距今19万至15万年，根据动物群推测和县人的年代大约在距今28万至24万年。

第五节 郧县人

1975年，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个野外小组对湖北省郧县梅铺乡龙骨洞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发现直立人牙齿化石3枚，为左上内侧门齿、左上第二前臼齿和左上第一臼齿。1989年，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支野外小组在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发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直立人颅骨化石。1990年又在此处发掘出土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直立人颅骨化石。

郧县人的左内侧门齿呈铲形，底结节明显，但指状突不显著；上第二臼齿比其他直立人的同类牙齿要大，齿带一直延伸到切缘处；其颅骨最大宽位值较低，枕平面较短，鼓板较低、较长、较厚。这些特征中有比某些其他已发现的直立人进步的一面，但与大荔

郧县人头骨化石

旧石器时代早期

1989年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出土



人、金牛山人、许家窑人相比又有原始的一面。研究者认为郧县人化石属于直立人类型,可能与蓝田人、和县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从动物群的构成来看,主要是华南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也存在一些第三纪的残余种类,如嵌齿象和更新世早期的典型种类如桑氏鬣狗、小猪等,表现出这个动物群的古老性。

根据铀系和古地磁测年的结果,结合动物群的种类,专家判断郧县人生存的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或早更新世晚期,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当。

在人类化石地层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

第六节 北京人的另一个支系

1981年至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省沂源县土门镇芝芳村西北骑子鞍山的一处石灰岩裂隙堆积中发现了一批直立人化石。化石资料为左右顶骨的大部分和额骨、枕骨的小部分,牙齿7枚。根据头骨残片可复原出一个不太完整的头盖骨,被定名为“沂源人”。

这一头盖骨相当厚,前凶点处厚达9毫米,与北京人上限值的7.1毫米十分接近。眉脊粗壮,眉脊与额鳞之间有一明显的沟槽,与北京人的情况很相像,但与和县人有所不同。从牙齿上看,齿面的构造相当复杂,嚼面多褶皱。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性状,与北京人也很相近。

沂源人化石层位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

硕猕猴、大河狸、棕熊、黑熊、鬣狗、变种狼、梅氏犀、三门马、肿骨鹿等。从这些动物群看,沂源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与北京人居住的周口店基本相同。可见沂源人与北京人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可能是北京人的一支迁到了沂源。遗憾的是没有发现人工制品,故很难作进一步的推测。

第七节 居住在东北的庙后山人

1978年至1980年,辽宁本溪山城子村村东的庙后山南坡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化石材料为右上犬齿、右下臼齿各1枚和左股骨残段1段,被称为“庙后山人”。

庙后山人右上犬齿齿冠磨损严重,估计为一老年个体的,齿根长的平均值较现代人的长、大且粗壮。右下臼齿齿冠磨损中等,推测属于一壮年个体。齿根长为11.98毫米,比北京人的臼齿齿根的平均长度14毫米短,牙髓腔较发育。股骨仅存滋养孔以上至小转子以下的一段,为一个大约8岁小孩的左股骨。骨壁较厚,股骨脊相当发育,耻骨线也显著。这些都是较原始的特征。

以上材料出土于不同的层位,时代也有所不同。右侧下臼齿和左股骨同出于一层,伴随的动物化石属华北中更新世的典型动物,也包含了华北早更新世甚至第三纪的残余种,与周口店龙骨山的动物群相近。股骨出于这一层的底部,铀系法测定的年代为距今22.8万年至14.2万年。右下第一臼齿出于这一层的中上部,其年代约距今14.2万年。犬齿出于另一层,铀系法测定年代为24.7万年。人类化石中还出土有石制品、骨制品和用火遗迹。石制品的类型主要有石核、石片、

刮削器、砍砸器和石球。原报告者认为，庙后山人打制石器的技术与匭河一丁村系统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与朝鲜半岛汉城以北50公里处的全谷里遗址出土的石器有许多相似之处。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在地理上山水相连，不排除当时已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

骨制品是用动物肢骨制成的。虽然不如晚期骨器那样精致，但有明显的加工痕迹，可能用于刮削。用火痕迹包括灰烬、炭屑以及被火烧过的碎骨。

第八节 汤山人

1993年，在江苏南京市汤山镇葫芦洞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为两个不完整的直立人头骨。一个是由额骨、左右顶骨的前部、部分枕骨、完整的鼻骨、部分左颧骨和上颌骨左侧小部分组成，我们称其为1号头骨。另一个头骨包括了脑颅骨的大部分，我们称其为2号头骨。

汤山人1号头骨前额低平、后倾，额骨的眶上圆枕发育，两侧眉脊相连，头骨骨壁较厚。从头骨的大小和骨缝的愈合情况看，该头骨代表了一年轻的成年女性个体。汤山人2号头骨可能属一成年男性个体。从汤山人头骨的一些特征上，可看出汤山人与北京人更为相像，而与和县人则不大相像。从两者的地理分布上，这种现象似乎有些解释不



通。另外从汤山人化石层伴生的动物群来看，属于北方型，如棕熊、中国鬣狗、剑齿象、葛氏斑鹿、肿骨鹿、獐等，与周口店动物群成员基本一致。而和县人动物群则是一个南北方型混合的动物群。汤山人头骨化石和动物群与北京人的许多相似性，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根据动物化石组合，专家们推测汤山人生存的年代距今约40万年至12.7万年。最近有人对汤山猿人洞的石笋进行铀系测年，结果为距今42万年，有研究者认为汤山人应早于这个年代。

汤山人1号头骨

旧石器时代早期

1993年江苏南京汤山葫芦洞出土

第三章

北京人的生活



在中国境内的古人类遗址中，材料最丰富、最系统的当属北京人遗址。在这里不仅发现了北京人的牙齿、下颌、肢骨和头骨化石，还发现了丰富的人类文化遗物：10多万件石制品，确切的用火遗迹及10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这些遗迹和遗物恰似一部无字的史书，真实地记录了北京人的生态环境、生产和生活的历史，从北京人的生活可大致看到直立人生活的面貌。

第一节 生态环境

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西南48公里的房山县周口店。在20世纪初，周口店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在其西约1公里处，有两座东西并列的由石灰岩构成的小山，东边的一座就是著名的龙骨山，因盛产动物化石而得

名。龙骨山北坡的大岩洞就是北京人的家。它的西北面是连绵的山脉，东北面有一些孤零零的小山丘，南面和东南面是华北大平原。龙骨山脚下有淙淙的坝儿河流过。

现在周口店附近的地形和北京人居住的时候相比，已经有了一些改变。当时龙骨山西边的小山头与再往西的高山应该是相连的。从坝儿河古老的河床残迹可推知当时的坝儿河要比现在宽得多。

根据龙骨山出土的植物孢粉和动物化石，我们可对北京人生活的环境作一个大致的复原：周口店西北的高山上分布着森林，有油松、柏树、椴树、栎树、榆树以及多种野生的坚果类树木。在离龙骨山不远的地方，有很多长着味甜可食的小球形肉果的朴树和开小紫花的紫荆树。在广大的平原上，遍地生满杂草，适于成群的野马生长。从洞穴中发现的水獭、河狸、龟、水牛之类的动物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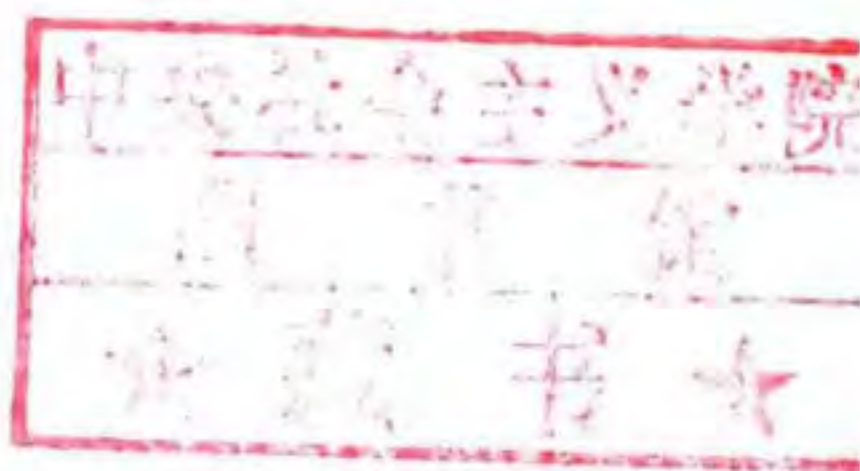
石来看,当时周口店附近可能有湖泊或沼泽地存在。因为这些动物都是一些水栖或者是在水边生活的动物。但在龙骨山还发现过较多的鸵鸟蛋壳碎片和少量的鸵鸟化石,这类动物都是适于在干燥草原或沙漠生活的。所以估计在离周口店不远的地方还可能存在面积相当宽广的干燥的平原或沙漠地带。

龙骨山 40 多米厚的堆积传达出的信息是北京人断断续续在此生活了长达几十万年的时间。总的说来,当时的气温与现在差不多。但在这期间地球上曾发生过大的冰期,这在龙骨山动物群方面也有所反映。中国专家对植物孢粉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北京人生活的第一阶段(11层—10层)和第三阶段(4层—3层),周口店一带的气候偏干凉,因为第一阶段的植物是以草本植物为主。第三阶段草本植物再次增多,木本植物中还出现了冷杉。北京人生活的第二阶段(9层—7层、5层)气候则比较温暖,表现为这个时期乔木大量增多,还伴有大量的温带蕨类出现。各层的动物群情况可以更好地印证这一事实。例如11层至10层草原动物多于森林动物,有凶猛的剑齿虎、豹、猢狲、棕熊和洞熊等肉



北京猿人洞

食及杂食动物,有肿骨鹿、斑鹿、犀牛、三门马、野猪和仓鼠等,这些动物都是适于生活在草原和森林环境的。可见当时的北京人所生活的环境是草原和森林为主的温带气候。北京人的第二阶段(9层至5层)情况稍有变化,那就是森林动物多于草原动物。第7层喜水的动物种类较多,如水獭化石等,反映出这时期是以森林为主的湿润的气候。第4层至第1层,森林动物明显减少,草原动物



周口店龙骨山



北京人背鹿像



增加,食肉动物有狼、熊和棕熊,食草动物有犀牛、纳马象、三门马、肿骨鹿等,还有很多啮齿动物。第3层至第1层喜干燥动物种类多于喜潮湿的动物种类,出现了最后鬣狗这种晚更新世的代表种类。从植被情况看,这一阶段草原类型植物增多,水生植物缺乏,耐旱的中华卷柏增加,表明气候转向干燥少雨,森林减少,更加接近现代植被。

总的来说,周口店的环境是有利于北京人生存的,那里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可供人们狩猎和采集。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人们生存得很容易。当时人们的狩猎技术不高,能够猎取的动物十分有限,像剑齿虎、狼、鬣狗等食肉动物都不可能是北京人狩猎的对象,北京人有时还会受到它们的威胁和疾病的折磨。据魏敦瑞统计:在38个北京人个体中,有16个人无法鉴定死亡时的年龄。其余的22个直立人,死于十四岁以下的少年有15人,死于三十岁以下的成年人有3人,死于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的壮年人3人,死于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年人只有1人。按以上统计,死于十四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竟占到了68.2%,可见当时人类生存之艰难。

第二节 采集和狩猎

采集与狩猎是直立人赖以生存的两项基本手段,北京人也不例外。从北京人地层中发现大量的朴树籽来看,北京人可能采集朴树果为食。朴树果为球形果,味道甘甜,是较为理想的一种食物。对北京人地层中出土的植物孢粉的分析表明:榛、胡桃、松、榆等植物大量存在。因此除朴树果以外,北京人还采集榛子、胡桃、松、榆等果实或种子食用。另外,北京人地层中发现了石球,它



们可作为砸击坚果的工具。这从侧面传达出北京人采集食用坚果的信息。坚果还可贮存作为冬季和打不到猎物时的备用品。估计北京人还挖掘一些禾本科和豆科的茎以及采集其叶和种子充饥。就北京人的生产力水平而言,狩猎不可能是他们的主要经济形态,采集活动才应该是北京人的主要经济活动,也就是说北京人的经济生活不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多方面的。人类学家研究过许多现存的狩猎—采集社会,认为这种社会中,往往有一定的劳动分工,男人负责狩猎,女人担负采集的工作。这种模式也适用于北京人。

剑齿虎头骨、上犬齿化石

旧石器时代早期

北京房山周口店第1地点出土

剑齿虎属古老的第三纪残余种,它的存在可帮助学者推断北京人的年代,并证明北京人遗址周围当时有茂密的森林。作为一种凶猛的肉食类动物,剑齿虎曾威胁着北京人和其他动物的生存。



肿骨鹿下颌骨化石

旧石器时代早期

北京房山周口店第1地点出土

肿骨鹿是中国更新世常见的动物。北京人遗址中出土的草食类动物中,肿骨鹿的化石数量最多。许多肿骨鹿化石有火烧和人工破碎的痕迹,说明这种动物是北京人狩猎的主要对象。

北京人采摘野果图



狩猎在北京人经济活动中虽不占主导地位，但也时常发生。在龙骨山堆积中，存在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凡北京人居住在洞穴的时候，这一层位肉食动物的化石就比较稀少，而食草类动物的化石则占较大的比例。食草类动物中又以肿骨大角鹿和葛氏斑鹿的数量最多。这种现象恰恰反映出北京人是以狩猎食草动物为主。近年来有人研究北京人遗址中出土的这两种鹿类化石，发现肿骨大角鹿的角多为自然脱落，而葛氏斑鹿的角多附在头骨上，故而认为北京人可能在不同季节猎取不同的鹿类，夏末秋初时狩猎斑鹿，

秋末冬初时狩猎肿骨大角鹿。北京人遗址中共出土了代表5万个个体的鹿类化石，这个数字看起来虽很可观，但与北京人生活在这里近30万年的时间相比，就不算什么了。除鹿类外，李氏野猪、德氏水牛和三门马等都可能是北京人狩猎的对象。

可以设想，当时北京人的狩猎是以男子为主，采用群力协作的方式，用木棒、石器 etc 等简陋的猎具，追赶、围攻和利用自然陷阱捕猎等方式狩猎。即使是这样，狩猎对当时的人来说仍然是困难的，不可能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人们不得不捕食一些鸟类、啮齿类的动物，并到河边捕鱼、摸虾、拣螺等，以作为狩猎大型动物的补充，有时还可能靠分食一些刚刚死去的动物的肉来维持生存。

第三节 洞穴为家

龙骨山实际上是一个大的洞穴。它东西长约140米，中部最宽处20米。由中部向西渐渐变窄，上大下小，呈漏斗形。此洞穴从更新世早期开始堆积，大约在更新世早期之末或中期之初，由于山下的坝儿河的侧向侵蚀，在山的东面切开了洞口。洞内逐渐形成了较平坦而宽阔的地面。到了中更新世的中期，由于地壳的间歇性上升，河面下降，洞内地面渐渐干燥。最早是鬣狗发现了这块地方，并以此作为栖身之处。后来这里曾一度被水淹没，不久后再次干涸，又被鬣狗占领。也就在这个时期，北京人来到这里，驱走野兽居住下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北京人文化。

北京人是这个洞穴的主人，但并不意味着北京人世世代代几十万年一直在这里居住。有时这个洞穴被野兽占领，有时这个洞穴被水浸泡。让我们通过北京人遗址每个层

位的包含物来了解一下北京人都是在哪些时候以此为家的。

北京人遗址（亦称周口店第1地点）自上而下编为13层，上部为晚期堆积，下部为早期堆积。

第1层和第2层厚约4米，为含化石的角砾岩层，夹多层钙板，从中出土了少量的石器，说明此堆积形成时期北京人居住在此。

第3层厚约3米，为含化石的粗角砾岩层。发现过北京人化石。大量的石器和用火遗迹表明，在这一时期北京人不仅居住在这里，而且活动频繁。

第4层厚约6米，含丰富的啮齿类和兔的化石、厚灰烬、北京人骨化石、石器，有丰富的用火遗迹，包括烧石、烧骨等。

第5层厚约1米，含动物化石和少量石器。

第6层厚约5米，为角砾岩堆积，含烧骨，丰富的动物化石和石制品。

第7层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指鸽子堂以西由灰色砂组成的堆积物，厚约2米，这里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少量石器和人类化石。另一部分是指鸽子堂II层，厚度为1.45米，与上部分时代相当，但包含物有所不同，由角砾、灰烬和红色土组成，含丰富的石器、用火遗迹、骨制品、人类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有较清楚的人类生活面。

第8层和第9层厚约6米，为角砾岩堆积，含北京人化石、石制品、用火遗迹和哺乳动物化石。

第10层厚约2米，为红土层，含少量石制品、人类化石和薄灰烬层。

第11层厚约2米，为角砾岩堆积，含少量石器和人类化石。

第12层厚约2米，为红色砂土。未发现任何人类活动的遗迹，有砾石和磨圆痕迹的灰白色化石，显示出此时此处有过水的存在。



葛氏斑鹿角、下颌骨化石

旧石器时代早期

北京房山周口店第1地点出土

葛氏斑鹿角是中国更新世常见的动物。大量葛氏斑鹿化石和北京人遗物共存。不少葛氏斑鹿化石留有火烧和人工破碎的痕迹，说明这种动物也曾是北京人的猎物。

第13层厚约2米，为泥沙层，含厚厚的鬣狗粪层和鬣狗化石，只发现两件有争议的石制品标本。

以上堆积情况证明，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越到后来，北京人越成为这个洞穴的主人和长期占领者。这也大体反映出石器、骨器技术和火的使用对北京人相对稳定的洞居生活是何等的重要。

第四节 用火和火种的保存

用火在现代人眼里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件事。但在远古时代，火的使用使人类摆脱了

北京人烧烤兽肉图





烧骨

旧石器时代早期

1966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1地点出土

茹毛饮血的境况，在人类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许多直立人遗址中都发现了用火的遗迹。1988年南非德兰士瓦博物馆和开普敦大

学的考古工作者在南非的斯特克兰斯山洞发现了270块烧焦的羚羊、野猪、斑马和狒狒的骨化石，距今约100万年至150万年。这被认为是人类用火最早的证据之一。中国元谋人、蓝田人等遗址中的相应地层中也发现了灰烬、炭屑，但这些是否为人类用火的遗迹尚存在争议。在世界直立人的遗址中，最被人们肯定的、最丰富的用火遗迹当属北京人的用火遗迹。

1930年在北京人遗址中首先发现被火烧过的鹿角，以后陆续发现了大量用火痕迹。北京人遗址从上至下的13层文化堆积中，共发现了五层面积较大、堆积较厚的灰烬和其他用火的遗迹。灰烬层集中见于第10层底部、第8层至9层、鸽子堂II层、第3层至5层。其中第4层的灰烬最厚，有的厚达6米。灰烬成堆分布，内含烧过的朴树籽、木炭、石块、烧过的鹿角和各种动物骨骼。朴树籽被烧后呈灰白色，石块上有烧烤后的裂纹，烧

灰烬

旧石器时代早期

1966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第1地点出土

在北京人居住过的山洞里，从上到下有四层灰烬层，最厚的可达6米。灰烬常常成堆分布。灰烬中发现过属于紫荆树的木炭、烧过的朴树籽及大量烧过的兽骨，这些是北京人使用和控制火的证据。



过的动物骨头呈黑色、褐色、黑褐色和黑灰色。所有灰烬层的包含物基本一致，均含朴树籽。所以科学家们推测：朴树的树枝可能被北京人用作燃料，甚至食用后的兽骨也常被北京人当作燃料。

北京人用火遗迹中灰烬成堆、成层分布的现象，表明北京人已具备了管理火的能力。估计当时的北京人是利用天然发生的火，如雷电击中树木、大风吹动树枝剧烈摩擦或物质腐败发热引起的火。北京人从这些天然火中获取火种，在洞口或洞内生起篝火，加以保管，不断添加燃料，使之长存不熄。

从北京人遗址各层位发现的用火遗迹来看，越到后来，北京人保存火种的能力越强，时间越久，可见火对北京人来说也越来越重要了。可以想象：北京人在洞穴中点燃篝火，大家围坐在火前烧烤兽肉，分食烧熟了的、香喷喷的兽肉，这是多么有趣的情景啊！有了火，人们才开始熟食。熟食缩短了咀嚼和消化的过程，可吸收更多的营养，有利于人体特别是大脑的进化。不仅如此，火还可以驱除洞内的潮湿、寒冷，给黑暗的洞穴带来光明。火更是北京人与野兽争夺栖息处的有力武器。野兽最惧怕火，北京人掌握了火，便守住了自己的家，也保护了自身的安全。

第五节 石器加工和使用

石制品是北京人留下来的最重要的文化遗物，是研究他们生产水平的主要依据。北京人遗址总共出土了十几万件石制品。经过裴文中、张森水等专家的系统研究，我们对北京人石制品的特点、加工方式等有了比较

清楚的认识。

北京人采用多种原料制作石器，据统计共采用过44种原料，但其中最常用的石料是石英，占石器总数的88.8%；其次是水晶，占4.8%；砂岩居第三位，占2.6%；燧石居第四位，占2.4%；其余40种石料用得很少，合占1.4%。

石器制作一般分为两步加工。第一步是打击石片，其方法又可分为直接打击法和间接打击法。直接打击法就是用石锤直接打击另一块用来做石器的石料，包括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等。北京人的打片技术也主要用这三种方法。锤击法是指双手各持石锤和石料，用石锤锤击石料。砸击法是指先在地上放一块大石砧，将被打石料的一端抵于石砧上，并用一只手捏住，使之垂直于石砧，而后用另一只手握石锤，砸击石料的上端，反复砸击，可产生一定的石片。碰砧法是指先在地上放一块大的石砧，然后手握石料直接用力向石砧上碰，用此方法所产生的石片较大且厚。间接打击法是用木制或角制的短棒做中介物，一端放在石料上，用石锤打另一端，这种方法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加工细石器的一种方法。

第二步加工是指石片的进一步加工，其方法又可分为打击法和压制法两种。打击法是用石锤沿石片的边缘垂直打击，形成深而短的痕迹。压制法是用石制或骨制的压制器，在石片的边缘上加工，形成浅而长的痕迹。由石片的破裂面向背面加工称为单面加工，由两面交互加工称为两面加工，在石片的两缘向不同的方向加工称为错向加工。

北京人在修整工具时同样使用以上三种方法，其中锤击法是最常用的方法，砸击法次之，碰砧法只是偶尔使用。砸击法产生的石片一般都是比较小型的，长度多在20毫米

至40毫米，宽度一般为10毫米至20毫米，厚度一般不到10毫米。据研究统计，北京人的砸击石片数量很多，占石片总数的22.7%。砸击石片亦可分为一端和两端石片。用锤击法打击的石片数量也较多，占石片总数的7.2%。其体积变化较大，最短的不到20毫米，最长者可超过100毫米。用碰砧法产生的石片，多比较粗大，一般是宽度大于长度，其长度多数超过80毫米，另外用这种方法产生的石片角较大，常常超过120度。

北京人制作的石器多种多样，有石砧、石锤、刮削器、尖状器、石锥、雕刻器、砍砸器和石球等。石砧和石锤是用来加工石器的工具。石砧是用作垫在石器下面的砧板。石锤是直接用来加工石器的工具。人们往往选择圆而厚的砾石作为石砧，选择长圆的砾石作为石锤，便于手握。无论是石砧还是石锤，由于砸击和被砸击的结果，表面都留下了许多疤痕或凹坑。在周口店第1地点

的第8层至9层中，发现了一件石锤，其两端的两面均有崩裂碎屑的痕迹，且崩裂的疤痕多集中在左角上。这个证据向后人暗示，当时的北京人已有用右手做事的习惯了。

刮削器是北京人最常用的工具。大小刮削器分别用大小石片加工而成。多数刮削器有锐利的刃口，可用于切割。大刮削器可用来刮削木棒，小刮削器可能是当作刀子用的，比如切割兽肉和刮削兽皮。少数刮削器刃口已相当钝，可能是多次刮削所致。

砍砸器是北京人砍伐木柴和木棒的工具，就像今天人们用的斧子，只不过比较简单、粗糙。有的砍砸器是利用带刃口的大石片制成的，有的砍砸器因多次使用，刃口变钝，又用石锤敲出新的刃口反复使用。

尖状器的使用最能反映出北京人加工石器的技术水平。制作这类石器，首先是从石块上打下石片，然后沿石片两边将它的一头打制成尖。关于尖状器的用途，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有的考古学家认为北京人用尖状器割剥兽皮，有的考古学家推测北京人用尖状器挖取树虫，还有的考古学家认为北京人用尖状器剔挖兽骨的肌头筋腱。这些推测都有一定的道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一器多用的现象肯定是存在的。

石锥、雕刻器的具体用途目前还不清楚。石球可能是用做砸击坚果的工具。

由于北京人遗址出土了大量精致的小型 and 微型石器，研究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出于女人之手。因为女人的手比男人纤细，适于做比较轻巧的活。另外大多数石器发现于洞内，说明石器是在洞内制造的。当时男子主要从事狩猎，女子更多地从事采集，有较多的空余时间呆在洞里，她们可能更多地承担了打制石器的工作。

北京人使用的石锤、石砧
旧石器时代早期
北京房山周口店第1地点出土
石锤为天然砾石，制作石器时用它直接砸击石料，其表面因砸击而形成许多深浅不同的坑疤。石砧为扁平的天然砾石，制作石器时把它垫在石料下面，用石锤敲击石料，所以石砧表面往往也留下一些大小不等的坑疤。



第六节 有关北京人的一些争论

经过对北京人遗址七十多年的发掘与研究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处直立人的居住遗址。但20世纪80年代,赫赫有名的美国人类学家宾福德(L. R. Binford)等,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作了为期四天的考察,而后在美国的《当代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遥远的埋藏学:周口店是北京人之家吗?》的文章。文章认为所谓北京人的用火遗迹可能是矿物污染和鸟粪自燃的结果,还认为北京人是在被猛兽咬死后拖入洞内的,从而否认北京人遗址是一处居住遗址。

宾福德是美国新考古学派的主要代表,他提出“考古学即人类学”,反对传统考古学只见物不见人的研究方法。他曾与爱斯基摩人共同生活,观察他们的生存方式与丢弃遗物的规律,借以解释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他还比较注重埋藏学的研究,在美国考古学界有较高的声望。他有关北京人的文章,自然引起了国际考古学界的注目。不少美国考古学者赞同他的提法,但也有学者表示反对,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奥尔森(Olsen)就对宾福德的文章进行了批评,认为宾福德在处理周口店材料时,没有明确解释他的分析技术,另外他无法阅读大量的中文原始资料,这些都给他的分析带来了困难。

实际上宾福德的观点主要是靠推测得来的,缺乏足够的证据。周口店的用火遗迹,是作过缜密研究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ailhard de Chardin, p.)就将周口店出土的有色碎骨和鹿角带到巴黎,并对其做过两次化学分析,其结果均含

游离碳,而非有色金属的污染。厚灰烬层的颜色有黑紫色、黄灰色和白色等,其中还含有很细的炭粒,粪堆的自然是不会产生这种特征的。另外在此地点出土的十几万件石器,表明这里不仅仅是北京人的石器加工场,而且是北京人居住和从事其他活动的场所。数量相当多的精致的石器发现在洞穴中,这不可能是北京人被猛兽咬死拖入洞内后带进去的,而是北京人长期居住、生活在洞穴里的有力证据。

无独有偶,1998年7月,以色列国威斯曼科学研究所的韦纳(S. Weiner)等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北京人实际上未曾用过火”,“那些烧骨是自然过程以某种方式烧出来的,并可能是在泥流中被带进洞内的”。但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韦纳对周口店第1地点洞内分布的大动物骨骼和小动物骨骼的比例作了统计,认为是12:2.5,也就是说大动物的骨骼远远多于小动物的骨骼。如果按照韦纳的推测,这些动物骨骼是由泥流带进洞内的,那么结果应该是小动物骨骼多于大动物骨骼。因为小动物的骨骼较轻,更易被冲进洞内。不少学者认为韦纳的推测是不可靠的。事实上韦纳等人对周口店第1地点遗址的调查研究是十分有限的,他们只是在第1地点西壁做了一些调查,还远远不能反映全貌。总之,韦纳的这个研究在对前人工作未作认真、仔细和客观了解的情况下,对北京人用火匆匆作出全盘否定的结论是不足取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新的手段被引用到考古学中来,特别是对像周口店这种过去做过许多工作,现在仍保留一定遗迹的著名遗址,运用多学科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做进一步的工作是相当必要的。



第四章

不同风格的旧石器文化

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大致可分为华北、华南和西南三个大的文化区。这三个地区是这样划分的：一般以秦岭及其东延的伏牛山、桐柏山、淮河为界，将中国分为南北两大地理区域。此线以北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华北大平原为华北区，此线以南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云贵高原以东的珠江流域地区为华南区，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为西南区。

华北区的旧石器文化以石片石器为主，但又可分为不同的旧石器文化亚区。华北北部是以小石片石器为特点的，如桑干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的小石器工业传统。华北南部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存在着带有比较强的南方砾石石器工业因素的石片，而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转化为小型石器为主的石片石器工业。如匭河旧石器、蓝田和丁村的旧石器都具有一定的砾石石器风格。

华南区的旧石器早、中期是以砾石石器，即以砍砸器、大型尖状器、刮削器为基本组合的石器为主。其特点是以直接用砾石加工大型砍砸器和大型尖状器为主，小型的刮削器所占的比例较小。华南区的砾石石器工业也可分为南北两个亚区。北区是以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其以北至秦岭东延的广大地区，如汉中盆地、江汉平原、江西、安徽和湖南澧水流域的旧石器为主，其工业是以含砾石三棱尖状器和石球为特点，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向小型化的石片工业转化。南区为南岭南北的相邻地区，主要集中在广西百色地区和湖南的沅水流域，相对北区而言，缺乏砾石三棱尖状器和石球，砾石工业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西南区的旧石器是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但在加工技术上与华北区的石器工业有着明显的差别，如流行锐棱砸击技术，这在

华北地区是很少见到的。另外四川盆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有着较强的砾石石器工业的影响。

以上三个大区的旧石器工业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但相互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交往、融合和渗透,从而使中国旧石器文化分布的格局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下文所列举的石制品遗址或地点均为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可以说这些石制品基本上代表了这个时段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大致面貌。

第一节 旧石器的制作与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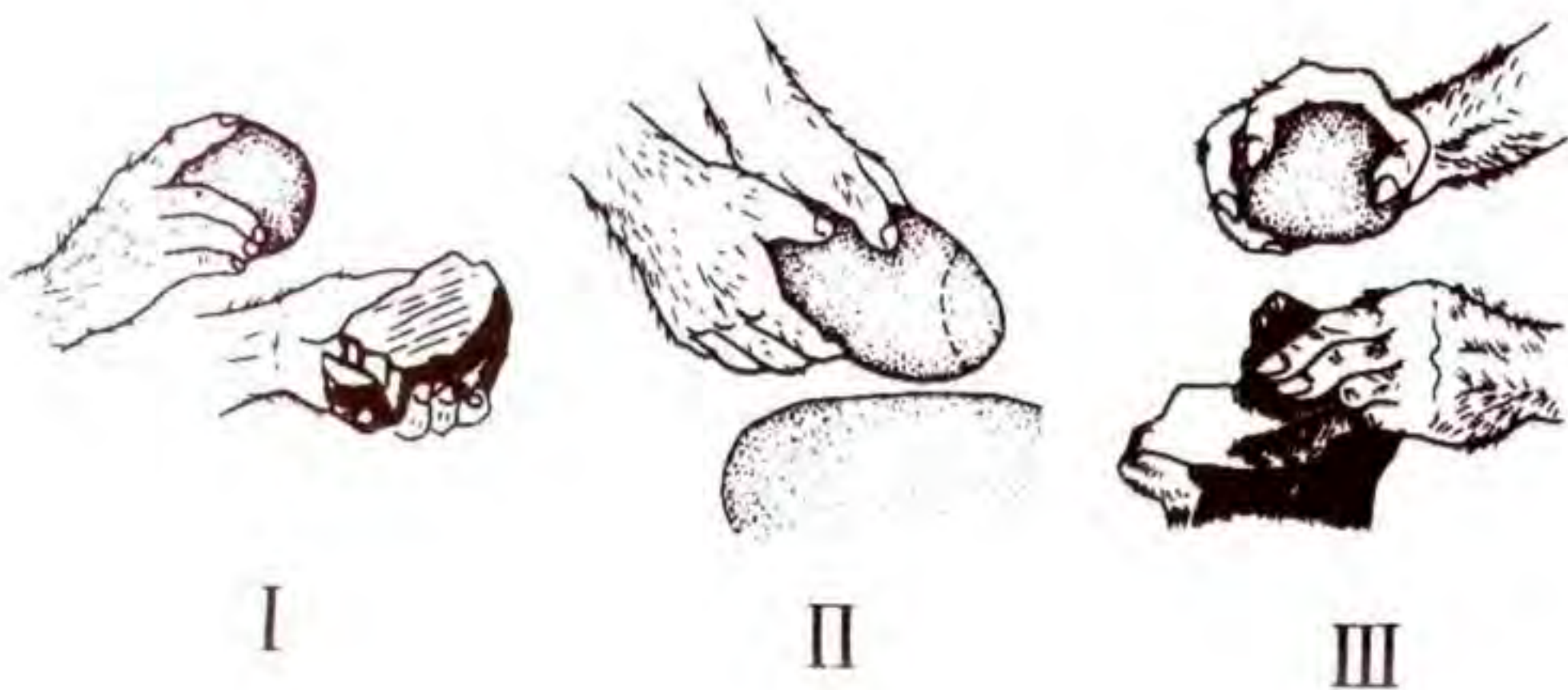
人类脱离动物界的主要标志是能够使用和制造工具。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观点认为,大约300万年前人类便开始打制石器,直到1万年前左右,人类一直运用打制石器的技术。打制石器是以燧石、玛瑙、石英、砂岩、硅质岩、角页岩等为原料,将石片或石核加工制成的工具。

打制石器的主要类型有石锤、石砧、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手斧、雕刻器、石球、石锥等。石锤和石砧是用于加工石器的工具。砍砸器是一种大型工具,一般具有钝厚、曲折的刃口和厚重的器身,可用来砍劈、

锤砸和挖掘,比如砍伐树木做木棒、挖掘植物块茎、砸击坚果等。刮削器是一种小型的工具,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边缘经过修理,形成不同形状的刃口,可用来切割和刮削。尖状器一般为两边加一角,可分大、小型两种,大型的可能作为挖掘的工具。小型的与刮削器有相似的一面,可起切割作用,但也有锥割的作用。手斧的功能与砍砸器基本一致。雕刻器顾名思义是雕刻用具,即制作艺术品的工具,但已知最早的雕刻艺术品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旧石器时代早期尚没有发现雕刻艺术品。北京人遗址中发现了雕刻器,这种雕刻器究竟是做何用途的,现在仍然是个谜。石球的用途大概有两种,一种是用于锤砸、加工食物,特别是用于敲砸坚果类食物,另一种是用于狩猎。

第二节 手斧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初期较具特色的一种工具,主要分布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西部、南部一带,东亚和东南亚仅有少量手斧被发现。手斧作为一种工具,早在120万年前就已出现在非洲的奥杜韦峡谷,在非洲一直延续到6万年前。典型手斧一般是由两面加工成椭圆形或梨形的两面器,周边有曲折的刃



打制石器示意图

打制石器的方法一般可分为直接打法和间接打法两大类。直接打法又分为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图中I代表锤击法,图中II代表碰砧法,图中III代表砸击法。

口，制作规整细致。它可能是一种多用途工具，不但能用来砍伐，还可用来剥皮、屠宰、切割以及挖掘植物的根茎。

中国到底有没有手斧？目前尚存在争议。至少像欧洲、非洲的那种典型手斧，在中国是少见的。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手斧不同于欧洲、非洲和亚洲西、南部的手斧。它们大多是采用砾石和石片制成，不少是单面加工，刃口呈陡坡状，多修成锐利或圆钝的尖。有的器身被修成三棱状，除刃口外绝大部分保留了较多的砾石面。器形较大，一般在15厘米左右，制作简单、粗糙，形态不够规整。像蓝田人的手斧、丁村人的大型尖状器等都可归为这一类。因此在定名上采用了“原手斧”的名称。

就目前已知的材料，中国的原手斧主要分布于以下三个地区：一是以渭河、汾河及黄河的三角地带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包括陕西乾县、蓝田，山西襄汾、芮城和河南三门峡一带。这些地区出土的原手斧虽然数量不多，但器形与华中、华南的比较相似，并普遍伴有石球的存在。二是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华中地区。近年来这一地区发现这类器物极其丰富，在陕南的汉水上游、湖南的澧水流域和安徽的水阳江流域分布相当广泛且集中。出土地点在以上各流域均有十几处，它们在形制上极具相似性，但伴随的石球数量较少。三是以广西的右江流域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发现地点有十几处，文化面貌与华中相近，也缺乏石球共存。

从以上几个地区的分布来看，原手斧的传统可能是以华中和华南为中心。这一结论对研究中国境内旧石器文化系统有一定的意义。早在20世纪70年代，贾兰坡就对华北的旧石器文化提出两个系统的概念：即“匭河—丁村系”和“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

遗址）—峙峪系”，前者以大石片砍砸器和三棱大尖状器为特征，后者以小石片石器为特征。随着近年来大量砾石石器在华中、华南被发现，有的学者对以上两个系统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修正：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属于两个系统，以原手斧为代表的大型砾石石器传统，主要分布在华中、华南一带，华北仅限于局部地区，与以周口店文化为代表的石片石器并存。丁村文化不再使用砾石为原料，原手斧的残存亦将宣告结束，而更晚的许家窑文化，虽有不少的石球残存，但已属于石片石器传统，这表明在华北一带到了晚更新世原手斧已趋于绝迹。以石片石器为主的周口店文化，虽有大型的砍砸器和少量石球共存，但不见原手斧的存在，同时石片石器在发展上有逐渐小型化的趋势，故石片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文化的主流，而砾石石器则属于华中、华南部分地区旧石器文化的主流。

第三节 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要序列

一、西侯度石制品

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的西侯度村。此遗址于1960年发现，1961年至1962年由山西省博物馆进行发掘，共发现了石制品30余件，还发现了带有切割和刮削痕迹的鹿角、烧骨及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西侯度发现的石制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已有多种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等。从石制品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是从石核上剥落石片加工石器，并能遵循一定的方法进行。原研究者研究认为：当时人们常常利用磨圆度很差的砾石和

巨大的石片作为石核，打击石片。有的石片个体很大，边缘上有剥击石片疤痕，可肯定是作为石核使用的。刮削器可分为凹刃刮削器、直刃刮削器和圆刃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虽只有一种，且发现时已脱离了地层，但原研究者认为这件三棱尖状器与其他石器属于同一时代。这件三棱大尖状器原为一个轮廓和断面呈不等三角形的砾石，把尖端修理成锐尖，加工很简单。这种工具传统在中国华北许多遗址中都可见到，例如在蓝田、匭河、丁村等遗址，它们在类型上都很相似，只是加工有的粗糙，有的细致而已。

西侯度遗址是中国境内发现的较古老的石器地点，据古地磁测定其年代距今约180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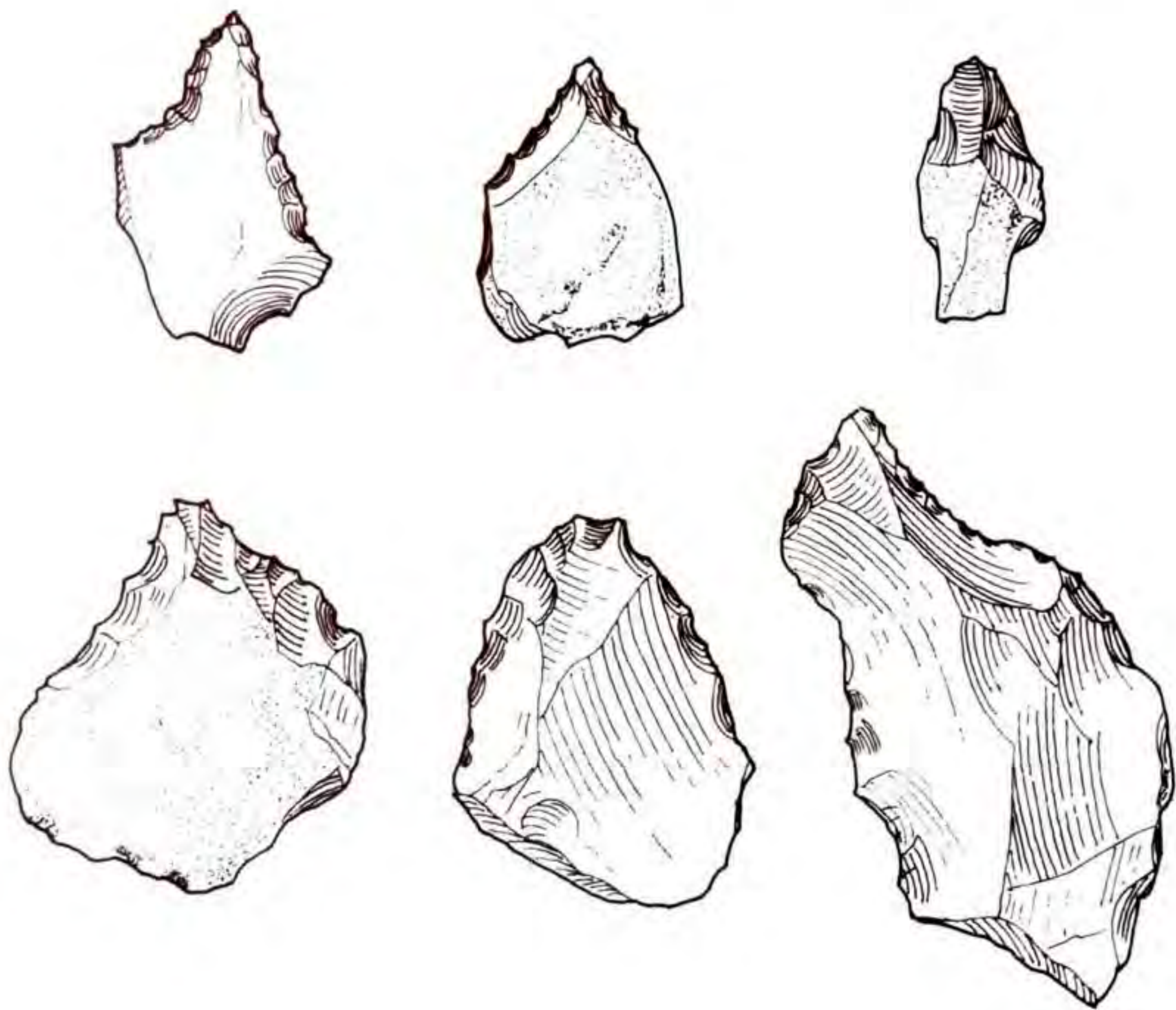
二、东谷坨石制品

东谷坨旧石器地点位于河北省阳原县桑

干河泥河湾村对岸的许家坡。泥河湾一带的湖相沉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受到中外学者的瞩目。那里有很厚的第四纪地层堆积，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学者们坚信那里有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遗物。20世纪80年代，尤玉柱、汤英俊等在小长梁发现了一处早更新世的石器地点，从而对泥河湾层的意义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里的湖相沉积不仅有早更新世的，也有中、晚更新世的地层。其中东谷坨是最重要的文化地点之一。

1981年，卫奇等人对东谷坨地点进行了发掘。此遗址分布面积很广，遗址之大和石制品材料之丰富都是相当罕见的。比如遗址向西、向北延伸到1公里以外，石制品的分布密度远远超过北京人遗址。

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以火山碎屑岩、石髓和燧石为主，也有少量的玛瑙和石灰岩。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以及各种各样的刮削



东谷坨的石器

旧石器时代早期

1981年河北阳原东谷坨出土东谷坨的石器有各种类型的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其中以刮削器为最多。也许由于原料的关系，石器器形个体较小，也比较精致。

器、尖状器和砍砸器。其中刮削器所占比例最大,占石制品的21.4%,砍砸器则最少,仅占0.22%。这个遗址石器的总特点是石器个体较小,加工也比较细致,时代较早,经古地磁法测定此遗址距今约100万年。

东谷坨石制品加工细致,可从刮削器和尖状器的多种类型看出。刮削器分为直刃刮削器、凸刃刮削器、凹刃刮削器、凸凹刃刮削器、多边多刃刮削器、双凹刃刮削器。尖状器分为锐尖宽身尖状器、钝尖宽身尖状器、锐尖长身尖状器、钝尖长身尖状器。

东谷坨石制品从加工方法和类型上看,与北京人的石制品有许多一致性。东谷坨石制品的年代早于北京人,但在一些石器的加工上却比北京人还要细致,这大概是由于这一带有较好的石制品原料。

东谷坨遗址的发现,为北京人文化找到了源头,即北京人有可能是从东谷坨文化发展而来的。而许家窑遗址文化又是北京人文化的继承者。这样就把北京人文化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

三、匭河石制品

1957年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王择义等人组成调查组在山西芮城调查时,发现了匭河等旧石器地点。1957年和1959年对此地点两度进行发掘,发现了一些石制品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石制品以石英岩为主要原料,包括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三棱小尖状器和石球等。从石核和石片的特征上判断,主要是采用锤击法生产石片;也有的石片打击点不集中,石片角度大,可能是采用碰砧法产生的。三棱大尖状器具有三面和三缘,横断面呈不等边三角形,其三个边缘上均有打制痕迹,三个面上也布满疤

痕。石片疤大且深。

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与丁村的这类器物非常接近。无论是从其制造方法上,还是器形和尺寸上,都显示了它们的一致性。因此有专家认为丁村文化是从匭河文化发展、演变来的。

根据石制品地层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如扁角鹿、肿骨鹿、东方剑齿象、纳玛象等,人们把匭河石制品定为中更新世早期,与蓝田人的时代大致相当。

四、蓝田石制品

蓝田公王岭遗址中共发现了26件石制品,其中石核12件、石片7件、刮削器7件。从石核的特征来看,均比较粗大,长度基本上在100毫米以上,宽度则更大。石核均为单自然台面,台面角多数超过80度。由此不难推测,它们是由锤击打法打片后留下来的石核。石片也比较粗大,长度均在60毫米以上,其形态一般较为规整,呈三角形或梯形。其中6件石片为锤击打法产生的,另一件大石片的台面大且倾斜,石片角为115度,可能是由碰砧方法产生的石片。

刮削器的个体均较小,包括单直刃刮削器、单凸刃刮削器和端刃刮削器。全部是由锤击法加工而成,有的是向破裂面加工,有的为交互加工和复向加工,修理工作比较粗糙、简单。刃缘呈多缺口或波纹状,表现出比较多的原始性,这可能与其所处的年代较早有关系。

蓝田陈家窝遗址共发现石制品10件,包括锤击石核2件、石片5件、刮削器2件和砍砸器1件。陈家窝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与公王岭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十分相似。比如陈家窝的石制品也是采用锤击法打片,刮削器是采用向破裂面加工和交互打击的方式,修理工

作比较粗糙。两个地点石制品有所不同的是陈家窝的石片个体比公王岭的小一些。从时间上推断,专家们普遍认为:陈家窝石制品是直接继承公王岭石制品的技术,可视为同一文化的新类型。

在蓝田县红色土层的9个地点中,人们还找到了12件石制品,包括石核3件、石片1件、刮削器2件、砍砸器5件和石球1件。石核、石片多个体粗大,个别较小,从其集中的打击点来看是采用锤击法产生的石片。刮削器个体较小,分为单刃和复刃两种,修理加工较粗糙。石球重490克,器物的大部分有加工痕迹,为多向打击,小部分保留了砾石面。砍砸器分为单刃、复刃和手斧三种,均用粗大砾石做成。单刃砍砸器刃部锐利,可作为很好的砍劈工具。手斧共2件,是用整块石英岩砾石交互打击而成,为三角形,部分保留砾石面,器身布满小石片疤。

蓝田人的石制品从制法和质料看与北京人的石制品有较明显的区别。如北京人普遍使用的砸击法,在蓝田人石制品中相当少见,特别是红色层中发现的砾石制品更是北京人石制品中所没有的。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蓝田地区红色土层中发现的砾石石器与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的网纹红土中发现的砾石石器有一定的共性,由此认为蓝田人文化的这些特征与长江流域分布的砾石石器传统有密切的联系。

五、金牛山石制品

金牛山遗址位于辽宁营口大石桥的西田屯村。20世纪70年代发现并做过多次发掘,主要发掘了A地点和C地点两处。两处均发现了丰富的用火遗迹,以及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和骨制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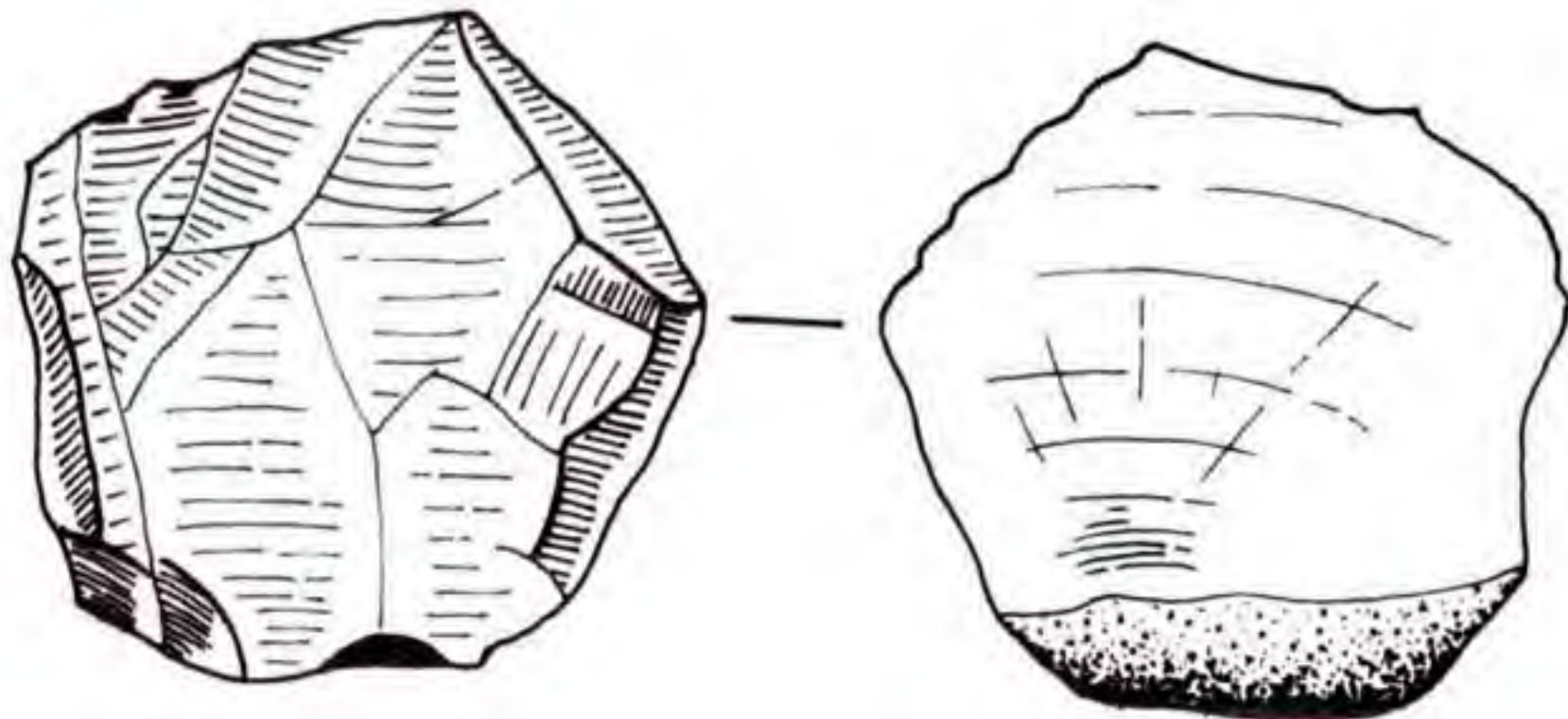
A地点发现石制品22件,C地点发现石

制品15件。石制品原料以脉石英为主,还有石英岩和变质岩等。用锤击法和砸击法两种方法产生石片。用锤击法产生的有石片8件、石核3件。石片的背面多不保留自然面,仅有个别的保留了很少的一部分自然面。台面后缘可见与剥片方向相同的打击痕迹,有较集中的打击点,背面的石片疤比较浅平。石核均为个体较小、不规则的多台面石核。砸击法产生的有石片4件、石核1件。砸击石片为长方形,个体均较小,包括一端石片3件、两端石片1件。其特征为一面较平,另一面较凸。砸击石核形似纺锤,上端尖,向下渐宽,下端为半圆形,两端可见砸痕,周边大部分留有类似石叶的疤,与北京人的砸击石核很相像。

石器类型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刮削器的种类繁多,有单直刃刮削器、单凸刃刮削器、单凹刃刮削器、两刃刮削器和端刃刮削器。第二步加工多采用向背面修理,修理工作比较粗糙,刃缘不平齐,刃口稍钝。端刃刮削器加工比较细致,刃缘平齐,

金牛山石器

旧石器时代早期
辽宁营口金牛山出土
金牛山石器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从其加工的技术和石器的组合来看都与北京人十分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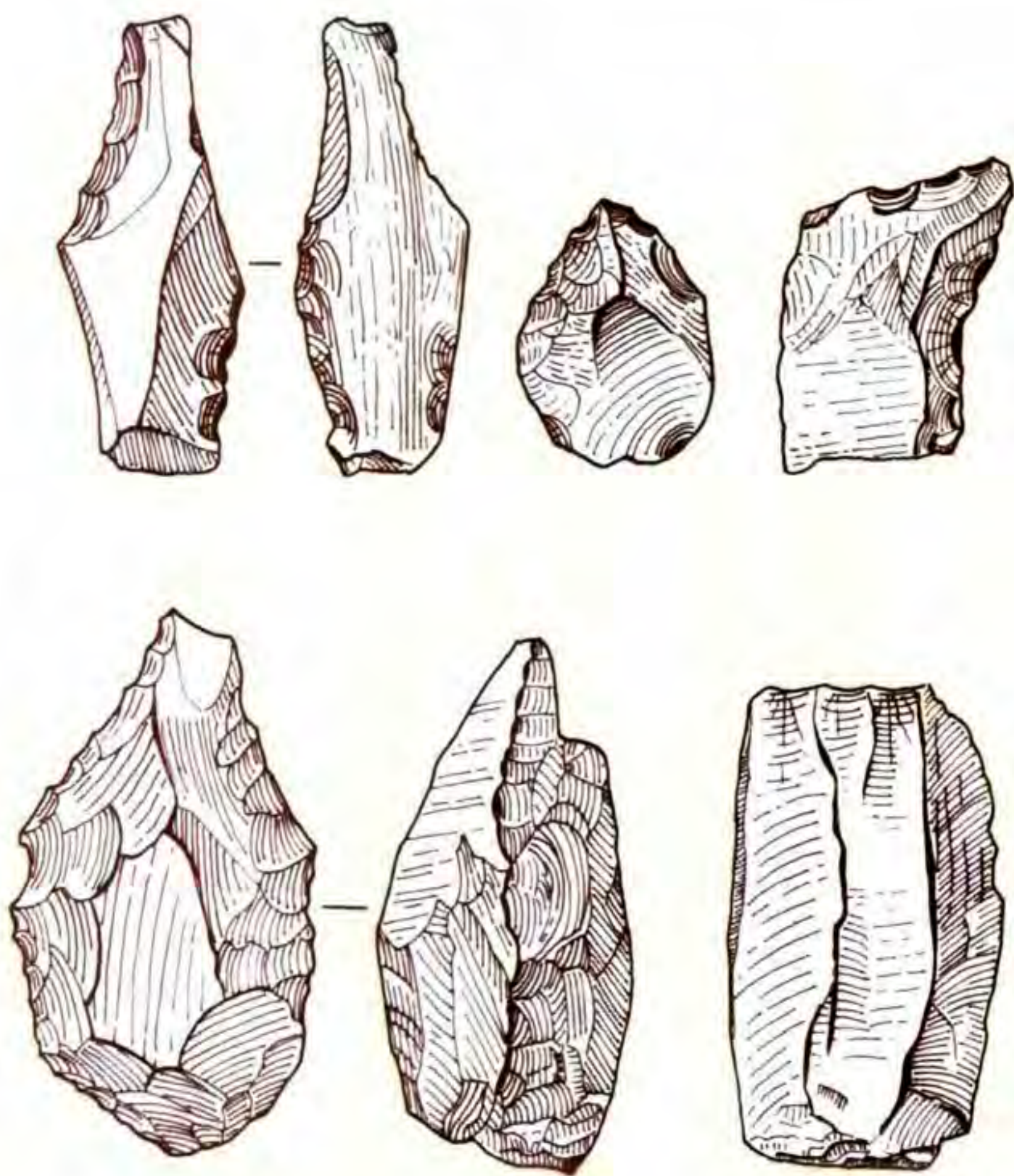
修理疤痕较浅平。尖状器包括正尖尖状器和角尖尖状器两种。第二步加工也比较粗糙，但多向一侧修理，另一侧加工痕迹则只在尖端的近处。这类器物一般不规整，尖刃不够锐利。雕刻器只发现1件，个体很小，一端有凿子形的刃口。

金牛山石制品所处地层的年代，依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和铀系法年代的测定为距今26.3万年至17.5万年，大致与北京人的时代相当。有学者推测，北京人生活在周口店时，其文化也在向外扩散，其中一支可能迁徙到金牛山生息。但从石制品的技术上，金牛山人的石制品远远不能与北京人晚期的石制品相比。故有学者认为这里也许是屠兽场，因为哺乳动物化石很多且很碎，人类的文化遗物却很稀少，真正能代表金牛山文化的石制品可能埋藏在附近的居住遗址中。

北京人石器

旧石器时代早期
北京房山周口店第2地点出土

北京人石器种类丰富，有边刮器、端刮器、凹缺器、尖状器、钻具、雕刻器等，尤其以轻型工具为主。在加工技术上以砸击法和锤击法最为普遍。



六、北京周口店第15地点的石制品

周口店第15地点位于北京人遗址以南约70米处。1932年发现，1934年至1937年进行发掘，获得了许多哺乳动物化石、灰烬层、朴树籽、烧骨和大量的石制品。

石制品总数约有万余件，原料以石英、砂岩、燧石和各种火成岩砾石为主。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雕刻器等。锤击法是此遗址先民们打击石片的主要方法，从一些石片的台面来看，似乎做过修理。尖状器可分为锐尖和钝尖两种，多用长而厚的石片制成，形制较为规整，有的呈三角形，有的呈梭形，还有的近似长菱形，加工方式多为背面加工和错向加工。刮削器一般个体较小，长度在20毫米至40毫米之间，重量多在20克以下。大体可分为单刃组、两刃组和复刃组。单刃组又可分为单凸刃、单凹刃和单直刃。这类刮削器多是用石片向背面修理而成，加工较细致。两刃组的修理比单刃组的稍显粗糙，刃缘较曲折。复刃组一般器形不整，厚薄不等，有的三刃，有的四刃，刃缘曲折，刃口较钝，加工得比较粗糙。砍砸器的数量不多，多用砾石和石核制成，个体有大有小。一般是向背面加工修理，修理较简单。雕刻器可分为笛嘴形雕刻器、角雕刻器和平刃雕刻器。有的雕刻器侧边做过修理，可兼做刮削器使用。

此遗址与北京人遗址相邻。两个地点的文化遗物都相当丰富，从石制品上看第15地点肯定晚于北京人，哺乳动物化石的种类也可支持这一结论。比如赤鹿和普氏羚羊的化石只见于北京人遗址的顶部堆积中，而这两类化石是更新世晚期常见的动物。第15地点有赤鹿和普氏羚羊化石存在，表明其地质年

代大约是在更新世晚期。有学者根据北京人遗址顶部堆积和周口店第15地点堆积之间的关系推断,认为它们在时间上不是紧密相联的,而是存在一个时间间断。依北京人遗址已经测定的年代,其中第3层的年龄为距今23万年前后,依此类推,第15地点应晚于距今20万年,但要早于距今10万年。

七、大荔人石制品

大荔旧石器地点位于陕西省大荔县段家乡解放村的甜水沟。1978年和1980年做过两次发掘。除发现了人的化石和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外,还发现了一些石制品。

石制品共564件,原料以石英岩和燧石为主,也有少数石英。石制品种类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石锥和雕刻器。石核分锤击石核和砸击石核两类,以锤击石核为主。石片也分锤击石片和砸击石片两类,以锤击石片为主。石片的个体较小,常见的长度在20毫米至40毫米,宽度为20毫米至30毫米,厚度为10毫米左右。刮削器种类繁多,可分为单直刃刮削器、单凸刃刮削器、单凹刃刮削器、两刃刮削器、多刃刮削器、圆端刃刮削器和横刃刮削器。这些刮削器均采用锤击法向背面或破裂面复向修理而成。刃缘一般不够平齐,呈波纹状。尖状器是大荔人石制品中较重要的一种类型,多用石片制成,可分为正尖尖状器和角尖尖状器,它们大多是向背面加工的,也有的部分是向破裂面或对向或复向加工的。石锥只有5件,均为断片和砸击石核制成,其锥尖的长度有长有短。雕刻器共8件,分为笛嘴形、平面和角雕刻器三类。

大荔石制品地层的年代,学者们一般将其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早一阶段,即属地质时代的更新世晚期的早期。因为从哺乳动物

化石来看,肿骨大角鹿、普氏羚羊等都是更新世中期向更新世晚期过渡的代表性动物,并且此遗址中还有较多晚更新世常见的种。

大荔人石制品以小型石器为主,其类型和加工方法都与北京人文化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学者认为大荔人的石制品很可能是北京人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结果。由于它们在地点上相距较远,石器的类型和加工技术也都各具特点,因此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

八、许家窑石制品

许家窑地点位于山西省阳高县古城乡许家窑村和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村之间的梨益沟两岸的断崖上。1974年发现,1976年、1977年和1979年发掘。除人类化石、骨、角器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外,还发现万余件石制品。

石制品的原料多以脉石英、火石和火成岩为主,其次是玛瑙、石英岩和变质灰岩,还有少数石制品是以硅质岩为原料的。

万余件石制品中,只有589件被学者们研究过。石制品中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圆头刮削器、雕刻器、石球、石钻、小型砍砸器。石核大小不均,大的重537克,小的只有9克。依其形状可分为原始棱柱状石核和盘状石核两大类,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细石器中常见的棱柱状和锥形石核的祖型。石片个体较小,大多在30克以下,最大的一件为120克,最小的只有1克。刮削器分为直刃刮削器、凹刃刮削器、凸刃刮削器、两刃刮削器、龟背刮削器、复刃刮削器和短身圆头刮削器。其中短身圆头刮削器与后来细石器组合中的拇指盖刮削器非常相似。尖状器的种类较多,可分为椭圆形尖状器、齿状尖状器、鼻形尖状器、喙形尖状器。雕刻器均为小型的,最小的长19毫米,最大

的长30毫米，分为斜边雕刻器和屋脊雕刻器。小石钻的尖端较一般尖状器细长，故区别于尖状器。石球在许家窑石制品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比如在1976年发掘的13650件石制品中，石球就占了1059件。石球个体大小不一，最大的重1284克，最小的只有112克。

许家窑石器既有东谷坨的成分，也有北京人的成分。贾兰坡认为：北京人打制石器的技术来自东谷坨，而许家窑人打制石器的技术则来自北京人。这三个文化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另外许家窑人石器中包含了许多细石器因素。过去人们认为其石器的进步性只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可见到，因此把其时代定得较晚。许家窑人骨化石发现后，人们又对此遗址做了铀系法测定，时代为距今12.5万年至10万年。许家窑文化石器的特点是以细小石器为主，许多刮削器、雕刻器都可在典型的细石器遗址——峙峪遗址中见到，可以说峙峪的细石器是从许家窑的石器技术中

发展来的。

九、丁村人石制品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中，丁村的石制品是最有典型意义的。丁村文化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在10个地点中，共获得了石制品2005件。石核石器中含单边形器、多边形器、三棱厚尖状器、鹤嘴形厚尖状器、厚尖状器、小型尖状器和刮削器。

丁村石制品的特点在于原料以角页岩为主，石制品大多数是用砾石制成，石片和石核居多，真正具有第二步加工的石器较少，仅占总数的1.6%，专家们认为这里可能为当时人们制作石器的场所。丁村石片的打法也很特别，大部分可能是用碰砧法产生的，因为石片大部分是宽大于长，石片角较大，最小的石片角为80度，最大的石片角为148度。石片的打击点多不集中。半锥体较大且圆钝，常见双生半锥体。这些都是碰砧法产生的石片的特征。

丁村的砍砸器都比较粗大，一般采用交互打击的方法，产生出来的刃缘较弯曲且较钝。单边砍砸器又分为直刃和凸刃两个类型。以最大的为例，是用砾石加工的，即先将一块砾石从中间破开，再从破裂平面中较凸的砾石面打击，形成较为平整的一条凸刃，在其末端处保留了较多砾石面。双边砍砸器的器身一般短而宽，较长的两边多加工成较平直的刃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丁村东面的沙女沟地点采集到一件标本，是用角页岩打制而成的两面器。器身窄长，一端较尖，另一端较圆钝。一面的石片疤较大且疏，器身较平；另一面的石片疤较小且密，器身微凸。刃缘较钝，上面保留了密实的细小疤痕。从其器形来看，与欧洲阿舍利文化中的手斧十分相似。因此有学者把它归入手斧

丁村出土的大三棱尖状器

旧石器时代中期

1954年山西襄汾丁村出土大三棱尖状器是丁村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工具。是用巨厚石片制成，从平坦的一面向背面加工，使背部成棱脊或高背状。



类或称似手斧石器。

多边砍砸器的周边均被加工过。有的器物保留有砾石面或加工成厚钝的部分，便于手握。

厚尖状器，或称大三棱尖状器，是丁村文化中颇具特色的器物。其器身较厚，断面呈三角形，背面边缘有连续的石片疤，正面有一条纵脊自器的尖部直通末端，破裂面则较平整，不见石片疤。

刮削器是丁村石制品中数量较多的一类。加工比较细致，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标本没有经过第二步加工。

石球也是丁村石器中较具特色的器物。石球多为灰岩或闪长岩制成，石球体上布满细碎的石片疤，通体为圆球形，不像是打过石片后的石核。专家们比较一致地将之归为石球类。丁村石球是在中国最早被认识的石球类工具。

关于丁村石器的碰砧法技术，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他们通过对丁村石片的仔细观察和研究，认为石片宽大于长的情况的确较多，但丁村石片和前人实验用碰砧法打制出的石片有较大的区别，更接近锤击法产生的。因此锤击法很可能是丁村石制品技术中重要的打片方法，当然，也不排除使用碰砧等方法的可能性。

第四节 华南的旧石器工业制品

一、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的旧石器

人字洞位于安徽繁昌县城西约10公里的孙村镇，1998年5月发现，1998年9月由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的“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背景研究组牵头，组成了野外考察队，对人字洞进行了系统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动物化石达60种，哺乳动物群的成员几乎都是灭绝种，由此推断其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很可能在距今240万年至200万年间。这里发现的石制品可能是东亚地区迄今已知最早出现的人类活动遗迹之一，此遗址也因此轰动一时。

遗址中共出土了50件石制品。石制品是用铁矿石、石英片麻岩、玛瑙、燧石、石英砂岩、硅质灰岩及硅质泥灰岩等原料制成，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中比较肯定的只有刮削类，根据刃缘可分为单直刃、凸刃和凹刃刮削器，此外还有一些端边两刃刮削器。刮削器的刃口修理，以向背面和破裂面加工为主，少数为复向加工。器物加工总的说来相当粗糙，刃缘比较曲折，修疤多为单层。

二、皖南水阳江旧石器地点

1987年10月在安徽省宁国县河沥溪镇英雄岭发现一件打制精细的砍砸器后，考古工作者对水阳江流域进行调查，并在宁国县和宣州市等地发现了五处旧石器地点，共采集旧石器标本150件。

石器标本均出自水阳江中、上游两岸的二级阶地的网纹红土中，学者推测其年代为中更新世，不会晚于距今40万年。石器原料以石英砂岩为主，其次是砂岩，也有少量的石英岩，均为砾石打制而成。石器类型有石片、石核、砍砸器、尖状器、石球、刮削器、石锥。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石核和砍砸器，其次是尖状器。石核有单台面、双台面和多台面之分，三者的比例以单台面最多。台面以

自然台面为主，也有少量打击台面。石核的利用率较高，反映了打片技术比较成熟。砍砸器数量很多，体形变异较大，大至22厘米，小至10厘米，可分为尖状砍砸器和普通砍砸器两大类。尖状砍砸器一般以长条形砾石为材料，用锤击法在砾石的两侧进行单面打击，一侧或两侧刃缘较锋利。普通砍砸器大多是用扁平砾石在一侧打制而成。根据刃缘形状可分为直刃砍砸器、凹刃砍砸器和凸刃砍砸器。

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的石器基本上属于中国华南旧石器主工业的范畴，与湖南澧水、广西百色等地的石器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以砾石石器和砍砸器为主，石片和刮削器所占的比例相对要少。

三、广西百色地区旧石器遗址

自1973年以来，广西百色盆地陆续发现多处旧石器遗址，采集了数千件石器标本。百色盆地位于广西西部，西起百色市，东至思林。

百色石器基本上是用砾石加工而成，一面或两面保留砾石面。石制品类型有石核、厚刮削器、砍砸器、尖状砍砸器、手斧等。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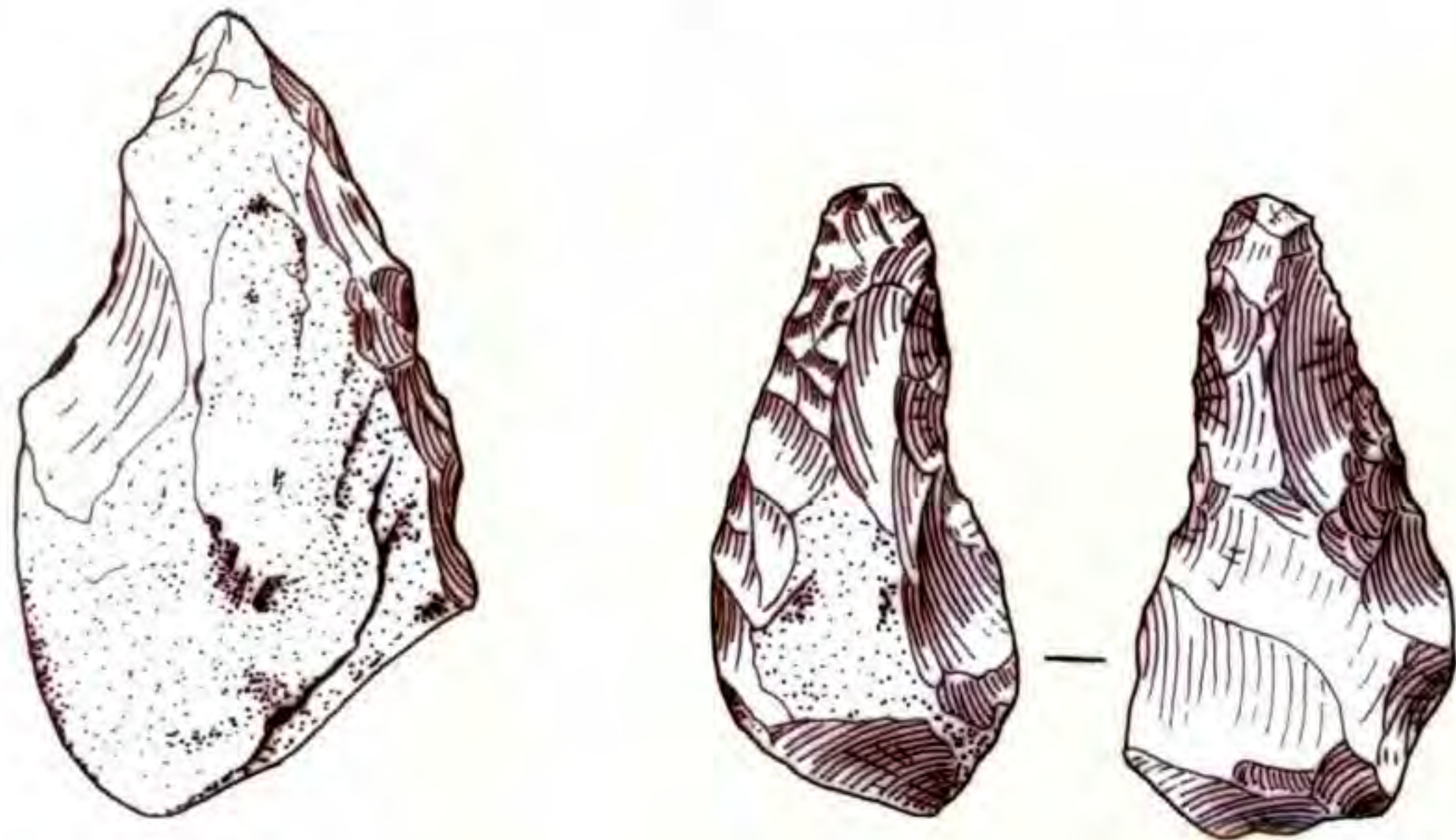
得一提的是尖状砍砸器。比如有一件标本，轮廓近似三角形，沿扁平的砾石的两长边向一面加工而成。右侧边加工较多，石片疤多短而宽；左侧边下端有许多小石片疤，而上端仅有大块的石片疤。两边相交的尖端未作进一步的加工，但有零星剥落碎片的痕迹。这件标本和常见的用石片做的尖状器不同，和用砾石做的砍砸器也不完全相同，与丁村文化中的厚尖状器有某些相似之处。百色手斧的精巧程度足以和欧洲的阿舍利技术相媲美，近年来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

百色石器基本上是以单向加工为主，均为砾石加工而成，而且器形比较大，加工粗糙，属于华南主工业的范畴。关于百色盆地的年代，有学者根据古地磁测定及玻璃陨石年代学的研究，曾估计第IV级阶地属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初，后又有学者用裂变径迹法测定了百色盆地百谷遗址与旧石器共生的玻璃陨石，获得距今73.3万年的地质年龄。

百色手斧的发现使人们重新认识“莫维士线”等理论问题。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士（H. L. Jr Movius）带领考察团赴东南亚考察，在缅甸北部等地区发现了大批仅仅单面打制的石

百色的石器

旧石器时代早期
广西百色盆地出土
百色的石器多半是由粗砾石制成，尺寸一般都在10厘米以上。石器类型有手镐、手斧、砍砸器和粗大刮削器，尤以手镐为最多。



器。根据东亚石器的这一特点,莫维士在欧亚大陆的中部画了一条著名的“莫维士线”,从而将旧石器时代早期一分为二:左边是先进的“手斧文化圈”,包括全非洲、欧洲的南、中、西部以及中东和印度半岛;右边是落后的“砍斫器文化圈”,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印巴次大陆北部。百色手斧的发现意味着“莫维士线”两边的技术文化和认知能力是相似的,它有助于人们摆脱“莫维士线”理论的束缚,进一步研究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及其特点。

四、四川丰都高家镇遗址出土的旧石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受国家文物局之托,于1993年底组建了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察队,从这年年底到1994年6月,对从湖北宜昌三斗坪到重庆市三峡工程淹没区的古人类、旧石器、古脊椎动物化石进行全面考察,发现旧石器遗址或地点、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共68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并进行了一定规模发掘的遗址当属丰都高家镇旧石器时代遗址。

高家镇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城长江下游约18公里处的高家镇桂花村,埋藏面积约2000平方米,堆积厚度较大,石制品埋于地表下约1.2米至6.7米。遗址处在长江第三级阶地上,其地质年代可能为更新世晚期。为配合三峡工程淹没区旧石器遗址的抢救性发掘,1995年10月到12月,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察队在高家镇举办了“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培训班”,并组织培训班学员对此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为64平方米,深度约50厘米,未见底,获得石制品约1500件。石制品原料为石英岩、花岗斑岩、花岗岩等,基本上是以砾石为坯料,以大型

器物居多。这些石制品具备了我国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主工业的鲜明特点。石制品包括石片、石核、刮削器、砍砸器。加工石器的方法,打片以锤击为主,主要以单面加工而成,也有采用交互打击和两面加工而成的。石器总的来说加工粗糙,类型简单。

五、湖南沅水和澧水流域的旧石器

1987年以前,在中国旧石器文化分布图上,湖南还是一个空白地区。1987年首先在新晃侗族自治县大桥溪的网纹红土层中发现了两件旧石器,此后在湖南特别是沅水和澧水流域发现了200多处旧石器地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沅水流域发现的旧石器以灰色、灰黄色的条状变质砂岩为主要原料。打片与加工方法以锤击法为主,有时也采用锐棱砸击法打片和碰砧法加工砾石石器。石制品以大型为主,可分为石片、石核碎片和石器。石器的种类组合以砍砸器为主,刮削器次之,尖状器较少。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器物为宽大的薄石片、侧身长刃砍斫器、短身尖刃砍斫器和双边刃砍斫器。

澧水流域发现的旧石器基本上是以河床砾石为原料,岩性以红色石英岩和石英砂岩为主,少量为燧石和硅质岩。打片与修理方法基本上是采用锤击法,偶尔也用砸击法。石器以大型为主,石器类型较为丰富,可分为砍斫器、大尖状器、似手斧、石球、石锤等。小型石器为刮削器和尖状器,数量较少。从总的情况来看,晚期的石器明显趋于小型化,大型石制品个体逐渐减少。

从以上两个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组合上来看,沅水流域的旧石器与安徽水阳江流域的旧石器有一些相似之处,说明两者之间可能

有某种联系，而澧水流域的旧石器则可能与江西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五节 西南旧石器 的特点

一、观音洞石制品

观音洞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县。1964年发现，1964年至1965年、1972年及1973年共做过四次发掘，获得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大量石制品。

石制品共有3000多件，原料以硅质灰岩为主，也采用脉岩和少量燧石、玉髓、细砂岩等原料。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和雕刻器。

石核和石片的个体差异较大，打片方法采用锤击法为主，偶尔采用碰砧法和砸击法。从各类石器所占的比例来看，刮削器最多，其次是砍砸器、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又可分单边刮削器、双边刮削器、三边刮

削器和复边刮削器、端刃刮削器等，其中又以直刃居多，凸刃次之，凹刃最少。尖状器大小不一，大者可达11厘米，小者仅有2厘米长。大部分尖状器较厚，尖端两侧边以向背面加工为主，但少数也有向破裂面加工或交互加工的。雕刻器只有两件标本，一件为角雕刻器，一件为平面雕刻器。

根据地层、古生物等文化遗物，专家们将观音洞遗址的时代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本身还可分为早、晚两期。观音洞下文化层发现的文化遗物代表了早期观音洞文化，上文化层则代表晚期观音洞文化。早晚两期文化遗物在总的性质上是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的内容上，亦可看出某些差别，反映出它们在发展中的前后变化，比如，晚期石器器形较早期的规则，刃口也较早期的扁平；在类型方面，晚期砍砸器明显减少，尖状器则相对增多；晚期大于10厘米的标本减少，而小于3厘米的标本增多了。总的说来，上文化层的石器修整得较为细致，下文化层的石器显得较为粗糙、简单。

总之，观音洞石制品技术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的这一时期是较具代表性的。

二、盘县大洞石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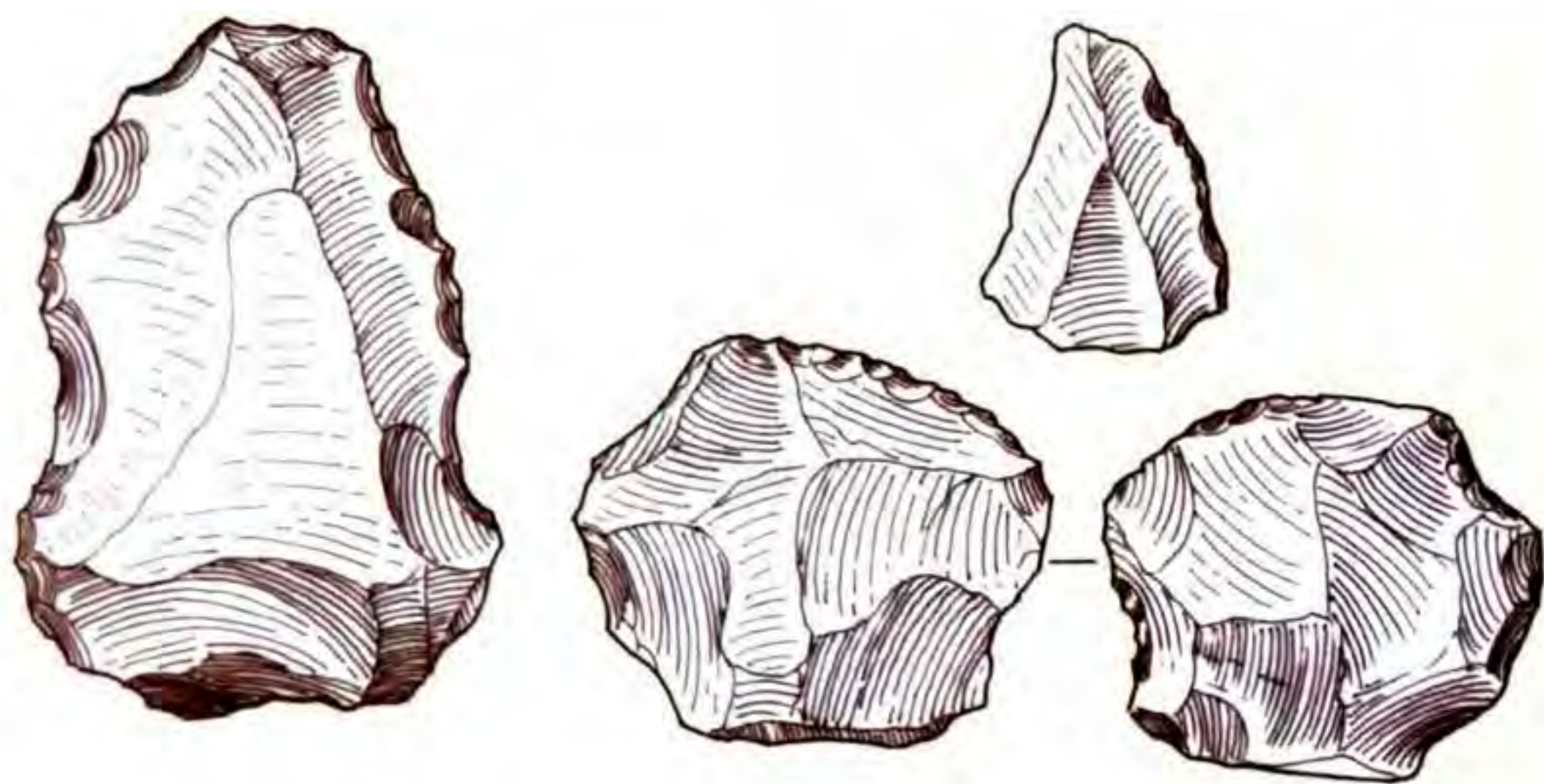
此遗址位于贵州省盘县珠东乡十里坪村。1992年和1993年发掘，共发现了约2000件石制品。

石制品的原料大多为燧石、玄武岩、石灰岩等。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边刮器、钻具、凹缺器、锯齿刃器、端刮器、雕刻器、手斧、手镐、砍砸器等。从工具种类所占的比重来看，以边刮器和钻具为主，其次是凹缺器、锯齿刃器和端刮器，雕刻器、手斧和手镐所占的比重极小。对大洞石制品的观察表

观音洞出土的砍砸器

旧石器时代早期
贵州黔西观音洞出土
砍砸器是旧石器时代的一种形体较大的工具，这两件石器器身厚重、有钝厚曲折的刃口。可起到砍劈、锤砸和挖掘等多种作用。





盘县大洞的石器

旧石器时代中期

1992年贵州六盘水盘县大洞出土

大洞的石器有钻具、边刮器、凹缺器、锯齿刃器、端刮器、雕刻器、砍斫器和手斧等类型。其中钻具和凹缺器的数量较多，器形也较规范，是较具代表性的工具。

明：锤击打法是产生石片的主要方法。边刮器、凹缺器和端刮器的刃口加工不够精细，刃口平齐的边刮器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也有加工比较精致的端刮器。此遗址还存在一些进步的技术因素，即拥有一定比例的带脊台面和修理台面的石核和石片。发掘和研究人员认为大洞遗址中已存在勒瓦娄哇技术。勒瓦娄哇技术是一种预制石核的技术，是指石片从燧石石核上剥离下来以前，先将石核加以修理，经修理的石核像个倒置的龟甲，打下的石片一面平整，另一面凸起，石片的台面可见修理过的痕迹。这种技术流行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典型的勒瓦娄哇石核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很少见，大洞是否存在勒瓦娄哇技术亦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根据大洞遗址的哺乳动物化石和铀系法的测定，石制品文化层的年代大致在距今30万年至20万年间。大洞遗址时代上与观音洞遗址基本相当，地理位置也相距不远。这两个遗址的石制品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打片和修理均使用锤击法，刃口平齐的工具较少，两个遗址的石制品均以轻型工具为特

色，工具类型的组合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两者仍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观音洞的刮削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相当丰富，这是大洞石制品所不及的。另外，观音洞又缺少大洞那样的砍砸器。两个文化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各成体系。

三、桐梓人石制品

桐梓人地点位于贵州桐梓县西北15公里处的一个山洞内。1971年发现，1971年至1972年进行了两次发掘。除石制品外，还发现了人类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等。

此遗址共发现石器12件，只有刮削器和尖状器两个种类。刮削器加工得比较粗糙，侧刃相当钝，刃口接近直角。尖状器中有一件修理得较为细致，是单向加工而成的，两刃相交部位经过精细加工，尖刃更薄更锐，并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桐梓人地点发现的石器虽然不多，但根据研究可知，他们是用锤击法打片和修理工具，并采用错向加工和背面加工的方式。石器的特征与观音洞文化比较接近，其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



第五章

智人的分布

在人类演化的历史上，继直立人之后，智人出现了。智人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在旧石器文化发展阶段中，前者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后者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25万年至4万年前，目前已发现的早期智人遗址已近百处，分布于亚洲、欧洲和非洲。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约5万年至1万年，晚期智人在世界上的分布范围更大，足迹已遍及欧洲、非洲、亚洲、澳洲和美洲。

第一节 中国的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的主要体质特征是脑量较大，在1300毫升以上，但早期智人的眉脊发达，前额较倾斜，枕部突出，鼻骨扁宽，颌部前

突，显示出不少的原始特征。

早期智人在文化上起承前启后的作用。从各个地点的石核和石片的打制技术看，锤击法是普遍采用的石器加工技术，其次是碰砧法，砸击法只在个别地点出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人们已采取了用木棒或骨棒打片的技术。从整体上来讲，早期智人在石器加工技术上基本上是继承直立人的，只是类型上有所变化，技术上有所进步，但变化和进步都是相当缓慢的。

一、大荔人

大荔人1978年发现于陕西省大荔县段家公社解放村甜水沟黄土壁上的砂砾层中。化石材料为一较完整的颅骨，仅缺失脑颅的右侧后上部及左侧颧弓。

颅骨相当粗大，颅顶低矮，额部向后倾斜。整个颅穹比一般早期智人低，接近于北

京人，但眶后缩窄明显，其指数值高于北京人的此项数值，表明大荔人的大脑额叶较发达。脑量为1120毫升。颅骨骨壁较厚，眉脊粗壮，两侧向后外方向延伸。顶骨中央有矢状脊，枕骨的枕平面与顶平面呈较明显的角状转折。枕脊明显且厚，呈菱形，而非北京人那样呈圆枕状。鼻骨窄长，位置垂直。

根据颅骨粗大和颅内外骨缝清晰可见，人类学家推测大荔人的头颅应属于一小于三十岁的男性个体。他生活的年代大约在距今23万年至18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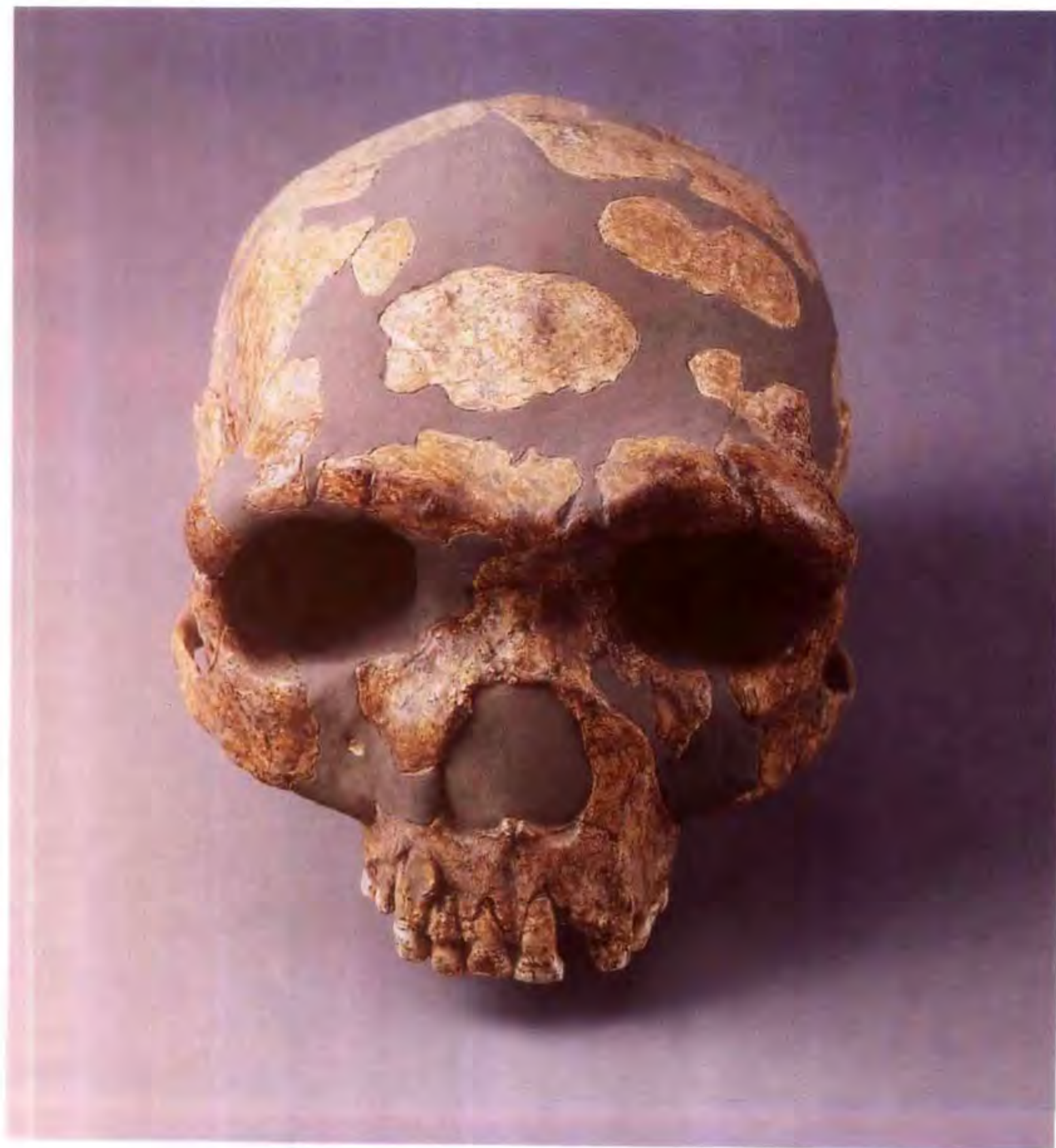
大荔人颅骨有些特征明显地与北京猿人相近，显得较为原始，但也具备了一些较进步的性状，与现代人相似。另外从大荔人颅

骨的部分特征还可看到与现代蒙古人种的某些内在联系。

二、金牛山人

金牛山人1984年发现于辽宁省营口市金牛山A地点。化石材料非常丰富，包括1个完整的颅骨及脊椎骨5件，肋骨2根，左侧尺骨1根，腕骨8块，第三掌骨和右侧第二掌骨各1根，指骨7节，左侧髌骨、髌骨各1件，跗骨13件。这些化石全部属于同一三十多岁的中年男性个体。

金牛山人颅骨低矮，颅骨的最宽处高于北京猿人，脑量约为1390毫升，也比北京猿人的脑量大。额部明显向后倾斜，眉骨发育，



金牛山人头骨化石

旧石器时代早期

1984年辽宁营口金牛山出土

有明显的眉脊上沟，眶后缩窄也较明显。金牛山人的颅骨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既保留有猿人类型的原始性状，又有智人类型的进步特征。对于金牛山人的分类地位，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金牛山人属于直立人，称为金牛山猿人；另一种意见则更多地从其进步性状考虑，认为金牛山人属早期智人，认为它至少代表的是由猿人到智人的一种过渡类型。金牛山人颅骨从整个形态上来说，与北京猿人有明显区别，而与较晚的和县猿人更为接近。到目前为止，较多的学者主张把金牛山人归入早期智人的范畴。铀系测年表明，金牛山人距今约为28万年。

三、许家窑人

1974年发现于山西省阳高县古城乡许家窑村。化石材料为儿童上颌骨1块，不同年龄的顶骨12件、枕骨2件、颞骨1件、下颌骨1件、单个牙齿3枚。

顶骨骨壁很厚是许家窑人的主要特点，如14号顶骨最厚处达14毫米，对另外4件标本的测量也表明顶骨骨壁相当厚。但从其弦

长和弧长的数值来看，许家窑人顶骨明显要比北京人的顶骨大。另外许家窑人顶骨的矢状缘和枕缘均较北京猿人的顶骨曲度大，这也表明许家窑人顶骨明显地较北京人隆起。下颌骨的下颌支较低且宽，外侧面可见外冠脊，但不如北京人的显著，内侧面的内冠脊则比北京人的显著，具有较发达的三角圆枕和翼肌粗隆。牙齿粗大，嚼面呈方形，结构较复杂。

从颅骨、颌骨及牙齿特点来看，许家窑人具有不少原始特征，也具有一些进步特征，处在原始与进步的中间阶段，应归于早期智人阶段。1982年用铀系法测定许家窑人的年龄距今约10万年。

四、丁村人

1954年在山西省襄汾县汾河东岸发现了3枚人牙化石，1976年秋又在该地点正式发掘获得人类的右侧顶骨化石1块。

人牙化石为右上内侧门齿、右上外侧门齿和右下第二臼齿各1枚。这3枚牙齿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个体。内侧门齿呈铲

丁村人遗址



形，齿冠基部有明显隆起的底结节，有指状突。外侧门齿亦呈铲形，底结节不甚显著。第二臼齿为正在生长过程中的恒齿，嚼面呈椭圆形，有明显的五个齿尖。

丁村人的牙齿与北京人相比较，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显得细小，原始特性不如北京人明显，形状和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表明丁村人比北京人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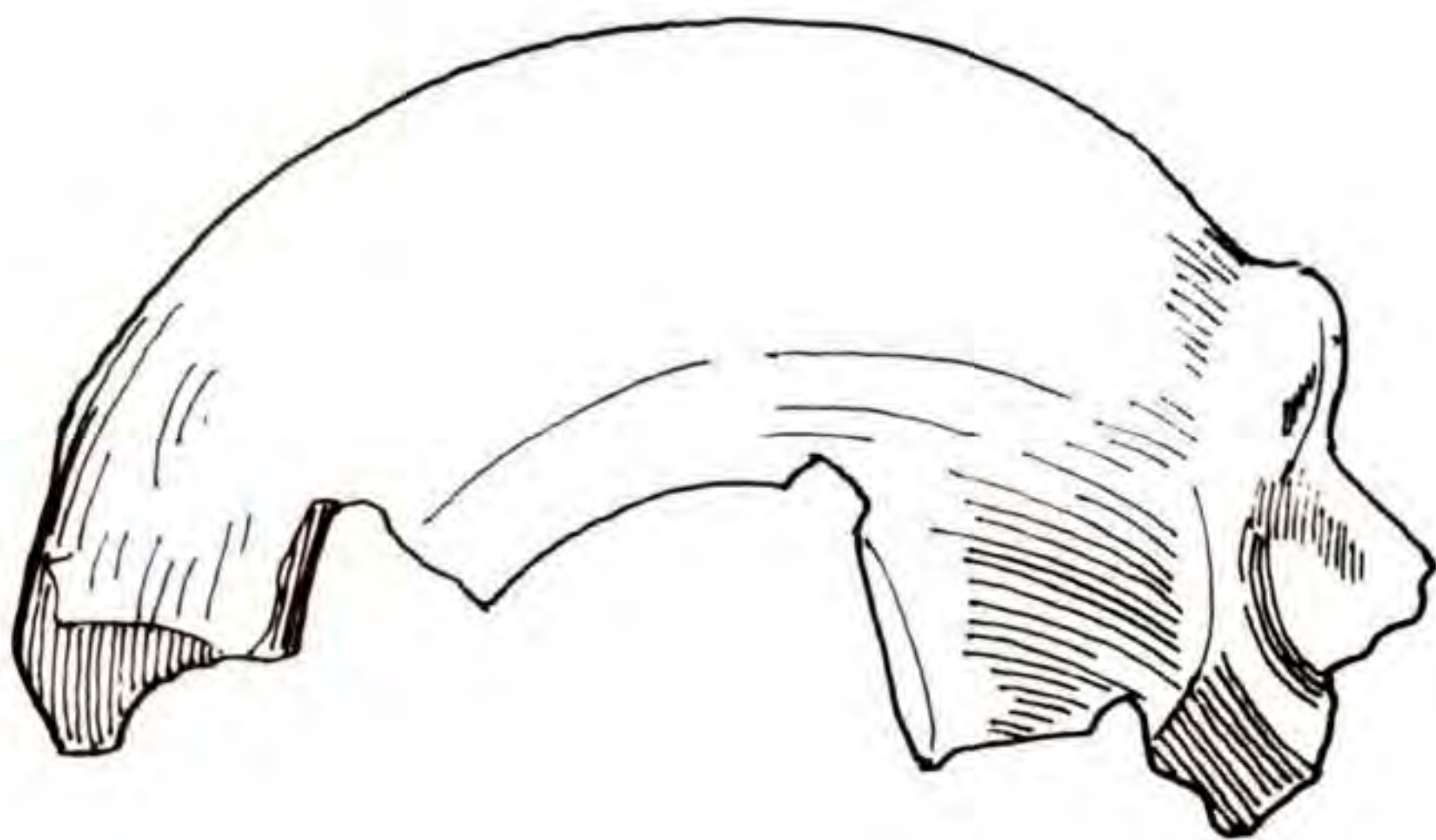
丁村人顶骨残片后缘和上缘有明显的锯齿状，骨壁较薄，因此推断其为一儿童个体。

从与丁村人伴生的动物种类来看，其地质时代是处在晚更新世中期，大约距今10万年。

五、马坝人

马坝人1958年6月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岩的一个石灰岩洞穴中，材料为一块人类的残破颅骨，包括眼眶的内侧、外侧和眶上缘部分，右侧蝶骨大翼和部分颞鳞。颅内骨缝已经完全愈合，颅骨的额结节不明显，颞线很发达；因此人类学家判断马坝人为一中年男性个体。马坝人头骨的特征为眉脊内侧部分较厚，为15毫米；中外侧部分最薄，为11毫米；最外侧端又稍厚，为12毫米，均比北京人的同等部位薄，估计脑量也比北京人大。马坝人眉脊表面粗糙，从顶面看，两侧眉脊合成八字形，即内侧在前、外侧在后。额中缝愈合的痕迹在眉间区前面，且向后凹，这点又与大荔人相似。在人类学上可归于早期智人，代表了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转变的一个环节。马坝人化石发现的意义还在于它扩大了中国远古人类分布的范围。

与马坝人一起还发现了属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动物，如鬣狗、大熊猫、貉、剑齿象等。从动物化石来看，其时代为更新世的中期或晚期，从人的化石形态判断为晚



更新世前期。铀系测定马坝人的绝对年代大约距今14万年。

六、长阳人

长阳人1956年发现于湖北省长阳县赵家堰区黄家塘乡下钟家湾龙洞中，材料为一件人类上颌骨和一枚左下第二前臼齿。上颌骨附连有第一前臼齿和第一臼齿，保存了上颌体的大部分。

长阳人的鼻腔低前部保存较好，颌的倾斜度不明显，门齿孔和上颌间下端的距离很近，腭面凹凸不平，这些性质与现代人较接近。但长阳人的梨状孔的下部较宽，鼻腔底部无明显的弯曲；犬齿隆凸明显，上端超过鼻腔底部，显示出其犬齿根较发达，这些都是较原始的性状。另外长阳人牙齿粗壮硕大，嚼面构造复杂，也是较原始的特征。贾兰坡认为，长阳人化石就整体来说，所存在的现代人的性质比原始性质为多，因此把长阳人定为早期智人。

与长阳人化石一起还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但未见其他遗物。

马坝人头骨化石

旧石器时代中期

1958年广东曲江马坝狮子岩出土

马坝人的眉脊表面粗糙，从顶面看两侧眉脊合成八字形，即内侧在前外侧在后。额中缝愈合的痕迹在眉间区前面，且向后凹，这点与大荔人很相似。

七、桐梓人

1972年在贵州桐梓西北15公里处的一石灰岩洞内,发掘出1枚人类的上右内侧门齿,后来在整理动物化石时还发现1枚前臼齿。1983年4月,考古工作者又在此洞找到4枚人牙化石,1枚为左上犬齿,1枚为左侧上第一前臼齿,另两枚为右上第一或第二上臼齿和左上臼齿的胚牙。

门齿呈铲形,齿冠磨损相当严重,尤以外侧为甚,齿冠舌面底部中间可见底结节,齿冠保存部的近中远中径和唇舌径分别为9.2毫米和8.6毫米,原研究者估计其齿冠高应为10.3毫米。尺寸上与许家窑人的相近。臼齿齿冠长宽各为11.4和13.3毫米,比北京人的同类标本平均值略大,比许家窑人的同类标本稍小。显然桐梓人是从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人类。

第二节 现代人的出现

从总体特征上看,晚期智人已与现代人接近,与早期智人相比,主要的不同点是其前部牙齿和面部减小,眉脊减弱,颅高增大。晚期智人形态上已经基本上与现代人一致,所以常被称为形态学上或解剖学上的现代人。有人断言,如果给晚期智人穿上现代人的衣服,将很难分辨他们是现代人还是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处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许多新的技术和发明出现在这一时期。首先是石器加工技术有了重大突破,开始生产细石器,还出现了磨制钻孔技术,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用骨、角原料制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鱼镖和弓箭等新型狩猎

工具的出现,标志着狩猎活动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人类已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和原始艺术。山顶洞人懂得埋葬死者,并形成了一套习俗。他们在死者周围撒上赤铁矿粉,还用石器和装饰品随葬,这大概是当时人们对灵魂信仰的一种方式。

山顶洞和小孤山等遗址发现了一些用野兽牙齿或贝类穿孔制成的装饰品,有的装饰品出土时5枚排列在一起呈半圆形,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佩戴在人颈部的项链。这些装饰品标志着人类审美意识和原始艺术的出现,更标志着人类智慧的大发展。

一、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同北京猿人一样,具有很高的知名度。1930年,在清理北京猿人堆积物边界时,在龙骨山顶部发现了一个新的洞口,故称之为山顶洞。1933年、1934年对山顶洞进行了系统发掘。

从山顶洞发掘出来的人类化石相当丰富,包括完整的颅骨3件、残颅骨片3块、下颌骨4件、下颌残片3块、零星牙齿数十枚、脊椎骨若干件、桡骨1段、股骨1段、髌骨1段、跖骨1根。这些化石材料与北京人材料一起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丢失了。后来人们对山顶洞人的研究只能根据当时发掘的记录和失落前制作的化石模型。研究表明:这批化石材料共代表了不同性别和年龄的10个个体,其中男性3人,包括老年1人(101号颅骨)、中年或壮年1人(108号下颌骨)、壮年1人;女性4人,包括中年3人、青壮年1人(102号颅骨);性别不明的青少年1人(106号标本);5岁幼儿和初生婴儿各1人。

1939年,魏敦瑞(F. Weidenreich)研究了山顶洞人头骨,认为男性老年头骨与日



山顶洞人头骨化石

旧石器时代晚期

1933年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出土

山顶洞人头骨已具有现代人的形状，脑量约1300毫升—1500毫升，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之内。

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接近，中年女人头骨似爱斯基摩人，青年女性头骨则似美拉尼西亚人。1960年吴新智重新研究这些头骨后认为，山顶洞人代表了原始的黄种人，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的印第安人特别接近。

山顶洞人共有3件完整的头骨化石，颅骨的形态特征为：101号和102号颅骨呈卵圆形，103号颅骨呈椭圆形，颅骨最宽处均在后三分之一的位置上，额结节和顶结节不明显。101号、102号颅骨较为低平，103号颅骨则较为丰满。眉弓发达，尤其是101号颅骨眉弓明显，形成了眉脊。眼眶呈四边形，低眶，眶间距较大，鼻阔。有人对山顶洞人颅骨进行测量，并计算出各项指数，三个头骨

的长宽指数分别为70.1、69.4和71.2，基本上属于长颅型。另外不少项目的数值均在现代人的变异范围内。阔鼻和低眼眶是中国境内晚期智人的普遍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近似，可能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

山顶洞共发现4件比较完整的下颌骨，其特点是颏孔的位置较低，以颏孔高度指数来表示，男性平均值为44.2，女性平均值为44.9，而现代人男性平均为50.8，女性平均为51.4，北京猿人的颏孔位置平均为46.6，这表明山顶洞人的颏孔位置低于现代人，稍高于北京猿人。另外有两个下颌骨标本保存了下颌角，其角度分别是117度和120度。人类学家的研究认为，不同阶段的人类下颌角是有变化的，在平均值上有比较明显的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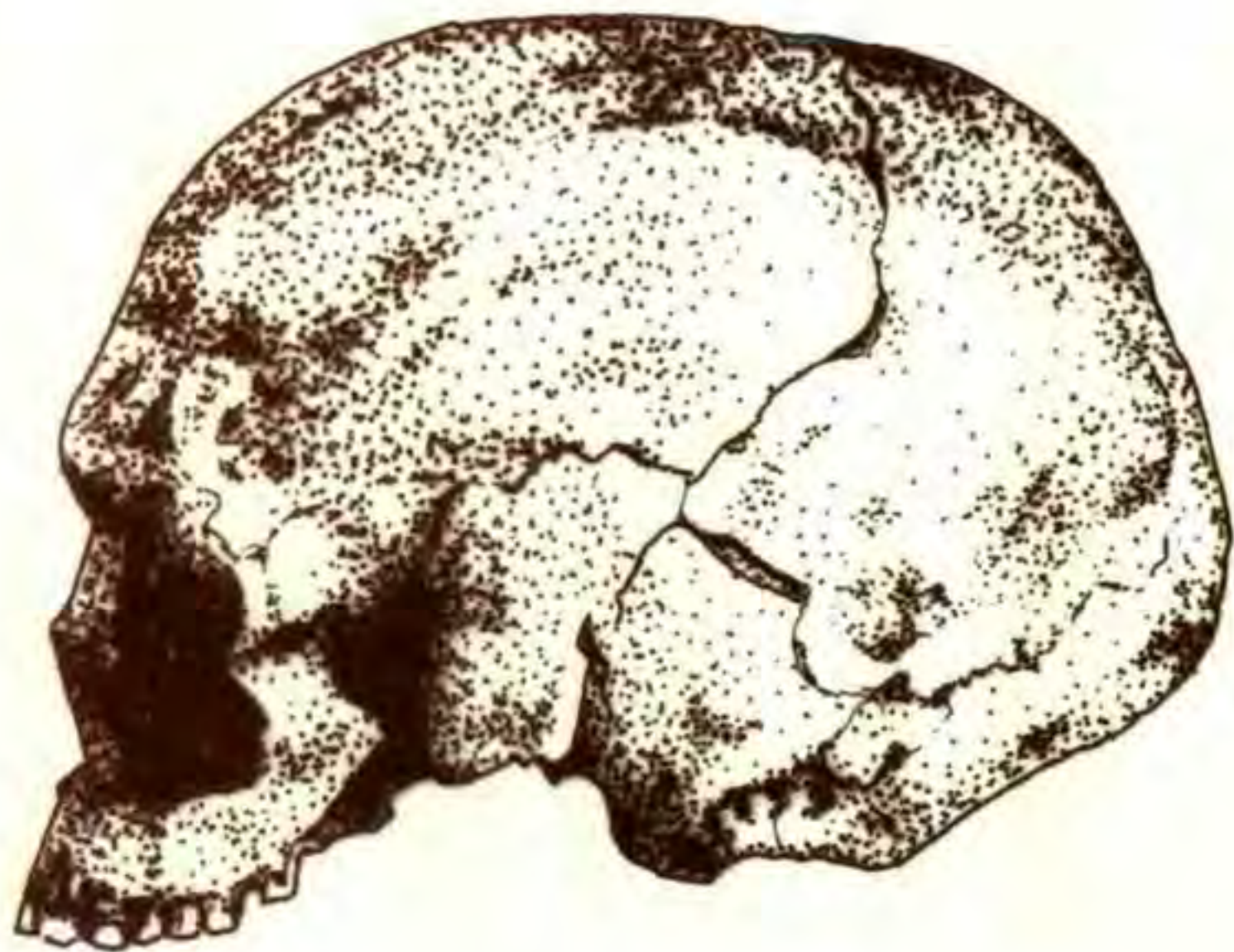
别。一般直立人下颌角平均约102.5度，早期智人下颌角平均约110度，晚期智人下颌角平均约118度，现代人下颌角平均约123度。可见山顶洞人与晚期智人的平均值最接近。

山顶洞人肢骨的各项指标与现代人、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人的同类指标相近。与山顶洞人化石一起，还发现了47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最后鬣狗、洞熊等绝灭种类的存在证明山顶洞文化的时代不会晚于更新世晚期。人们取山顶洞动物化石为样品做碳-14测年，得到两个数据，一为 107701 ± 360 年，一为 18870 ± 420 年，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数据可作为山顶洞人生活年代的上下限。1989年陈铁梅等又公布了一批数据，他们从5件山顶洞动物化石中抽取样品，用加速器质谱法测定碳-14年龄，其最大数据为距今 32600 ± 2000 年，最小数据为距今 13200 ± 160 年，其余三个数据均为距今2万年以上。因此，陈铁梅等认为山顶洞文化属晚更新世的晚期，上限定在3万多年，下限定为2万年左右比较合适。

柳江人头骨化石

旧石器时代中期

1958年广西柳江通天岩出土



二、柳江人

柳江人1958年9月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旁的一个岩洞中。化石材料为1个完整的人类颅骨化石（缺失下颌骨）、4个完整的胸椎、5个腰椎及骶骨、1件右侧髌骨及左右股骨各1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地点没有发现重份的人类骨骼，所以全部人骨化石可能同属于一个中年男性个体。

柳江人的颅骨呈卵圆形，最宽处在三分之一处，额结节和顶结节不明显。眉脊外侧端较厚，向内侧逐渐变得细弱。眼眶位置较低，颧骨较大，略向前突，鼻骨宽大，门齿呈铲形，显示出一定的原始性状和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的特点。

有人对柳江人的股骨转子下方进行测量，其指数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华北人之间。从股骨的长度推断，柳江人的身高约为156.69厘米。在人类学上柳江人属于晚期智人类型，是中国也是东亚地区时代较早的晚期智人化石。

三、资阳人

资阳人1951年发现于四川省资阳县城西500米处的黄鳊溪。人类化石材料为1个头盖骨和1块完整骨性硬腭。两件化石虽不能拼接，但颜色和石化程度相似，估计它们属于同一个体。

资阳人头骨呈卵圆形，最宽处在两侧的顶结节突出处。有明显的矢状脊。头骨比现代人低平，额骨倾斜。眶上缘较为平直，曲度较小。鼻骨仅残留根部一小片，鼻根部高而窄。前囟点的位置较靠后。有人对资阳人额骨长进行测量，其中矢面弦长为109毫米，弦弧指数为86.5毫米，比北京猿人的89.9毫

米要小,但大于现代人的平均值 85.7 毫米。颅骨枕部圆钝,人字点与枕外隆凸点约在同一垂直线上,与现代人很相似。硬腭较宽大,齿弓呈 U 字形。

根据有关指数分析,资阳人颅骨属中颅型。从颅盖高、前囟位、前囟角、额角等指数可看出,资阳人要比山顶洞人原始,属于比较早的晚期智人类型。

四、河套人

192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的萨拉乌苏河岸发现了1枚人类儿童的外侧门齿。1956年又在此处发现了顶骨及股骨化石,但以上的材料发现时均脱离了原生地层。1963年至1964年、1978年至1980年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此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原生地层中发现了不少人类化石及大量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

河套人化石材料有额骨、顶骨、枕骨、下颌骨、椎骨、肩胛骨、肱骨、胫骨、腓骨和单个牙齿等,共计26件。

河套人额骨眉骨显著,顶骨骨壁较厚,前囟部位厚度为6.5毫米,顶结节处厚度为6毫米,与许家窑人顶骨的数值接近。顶骨的内外板均较厚,体现出一定的原始性,但前囟位的厚度大于顶结节处,与现代人的特征一致。门齿呈铲形,齿冠基部有底结节。

股骨与现代人相比较,没有大的差异,肱骨属左侧,保存完好,全长278毫米,与现代人相比只是骨面较粗糙,肌腱附着处较明显。

对几处河套人地点和旧石器遗物层位做铀系法测年,其结果为距今5万年至3.5万年。与河套人化石及文化遗物一起,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如最后鬣狗、古菱齿象、普氏野马、野驴、披毛犀、王氏水牛、原始牛及一些现生动物,均属于更新世晚期常见的动物。由此推断河套人的时代当属更新世晚期的中、晚阶段,这与铀系法测定的结果基本上吻合。

五、左镇人

1970年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在台湾省台南县左镇菜寮溪采集到1件人骨化石,1974年台湾省立博物馆在菜寮溪臭屈河段地层采集到2件,1977年又在此采集到1枚人牙化石。

1970年采集的人骨化石为右侧顶骨残片,顶骨上保留了没有愈合的矢状缝,骨壁厚4.1毫米至5.6毫米,可能属一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个体。1974年采集到的2件人骨化石为左右侧顶骨,左侧顶骨保留了后半部分中间的一小块,骨片外面比较粗糙,内面可见清楚的脑膜中动脉的压迹,可能属一中年个体。右侧顶骨属于另一中年个体。1977年收集到的人牙化石为右上第一或第二臼齿,嚼面齿尖已磨平,从其石化程度分析,年代与“左镇人”相近。

中国东南地区发现的人类化石虽然不多,但已有的材料足以反映出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足迹已到达这个地区。



第六章

原始技术与精神活动

第一节 细石器工艺

细石器是指采用间接打法制成的小型细石核、细石叶和细石叶加工而成的石器。它们通常是作为装备骨、木等复合工具的石刃而专门制作的。从更新世晚期以来，欧、亚和北非等旧大陆的广大地区，随着石器小型化的发展趋势，奠定了细石器的基础。细石器的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基本可分为几何形细石器和细石叶细石器两大类。几何形细石器主要分布于欧洲、北非、西亚和澳洲一带。其特点是利用从圆体石核剥离的窄长石叶，截断加工成规整的三角形、梯形、菱形的石刃，作为装备复合工具的备件。这类细石器大约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而盛行于中石器时代，下限直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细石叶细石器主要分布在亚洲东北部和

美洲西北部。它们的特点是：从扁体或圆体的细石核上剥离窄长的细石叶，多用在复合工具之上，所以石刃上一般都遗有加工或使用痕迹。这类细石器同样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某些地区甚至延续到金属器出现后。

我们在这里主要涉及中国细石器工艺传统的早期遗存即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说到细石器，人们通常把它与中石器时代与中石器文化联系起来，因为细石器盛行于中石器时代，又是中石器文化中的重要因素。中石器时代，顾名思义，是指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中石器时代一词是由法国学者威斯特洛普(H·Westropp)于1866年首先提出的，1874年另一名法国学者吐尔(O·Torell)在斯德哥尔摩的国际考古学会议上又重复了这一名词。但由于19世纪中叶还比较

缺乏典型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中石器时代这一名词在国际上未被广泛运用。直到1895年阿齐利文化被发现，人们才逐渐承认以细石器工艺为特征的早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为中石器时代文化。到20世纪，不仅在欧亚大陆，而且在非洲、大洋洲、美洲也普遍发现了这一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中石器时代才最后得到确认。关于中国的中石器时代的定名，尚存在一些分歧，但中石器时代作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在中国应该是存在的，因为从中国这一阶段许多遗存的内涵来看，的确具备了中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其时间大约在距今12000年至7000年之间。

过去中国学者一般把细石器视为北方草原、荒漠地区的一种游牧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截然不同。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更新，人们已经认识到细石器遗存不限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在黄河流域以及远到青藏高原都有细石器存在。细石器在华北一带有着广泛的分布，据不完全统计，在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五省就发现了三十余处地点，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以及渤海湾的沿岸地带。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有典型的细石器，如扁体和圆体的细石器共存，特别是多具有船底形细石核和细石叶等，一般不见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少数地点有少量动物化石，经过测定的数据多在距今1万年以上。下面对中国几个典型的含细石器传统的遗址加以介绍。

一、小南海遗址

小南海遗址是一处洞穴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南约30公里的小南海附近。1960年发现，并于当年进行第一次发掘。1978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此遗址共分上、下两部分，从3米至4米的堆积物中发现了丰富

的石制品、动物化石和用火痕迹。动物化石属于更新世晚期，上、下部两个碳-14测定数据，分别为距今11000年和24100年，这表明此遗址从早期到晚期曾延续了达万年以上，但从石器上看不出什么变化，故将它们作为同一时代和同一种文化。

第一次发掘获得了大约7000余件石制品，原料以燧石为主，有使用痕迹的不多，经过第二步加工的也极少，只有约100件。石器最大的特点是以中小型的石片石器为主，长度多在40毫米以下。石核可分为柱状石核、锥状石核、方块状石核和长方块石核，石片可分为不规则石片、长条形石片和窄长小石片，石器类型可分为椭圆形尖状器、菱形尖状器、三角形尖状器、不规则形尖状器、椭圆形齐刃尖状器、圆刃刮削器、长刃刮削器、弧背长刮削器、复刃刮削器，双刃刮削器等。其中柱状石核和锥状石核与细石核相类似，窄长的小石片与细石叶相接近，但片身较厚，横断面一般呈三角形，估计是用纯熟的直接打法打成，与间接打法的细石器稍有差别。有学者认为它们代表了细石器的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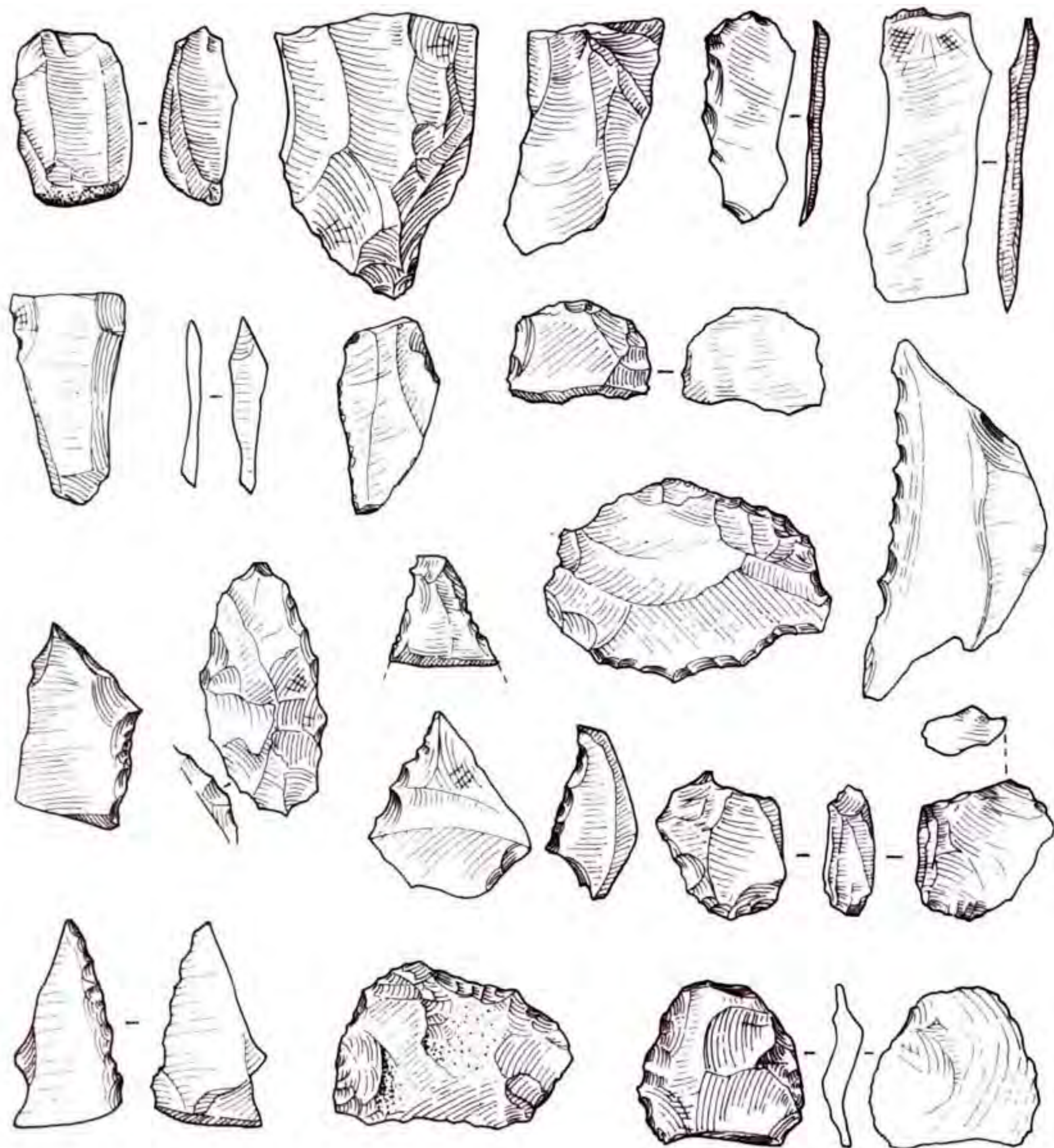
二、峙峪遗址

峙峪遗址也是一处典型的细石器遗址，1963年发现于山西省朔州市峙峪村。峙峪村坐落在桑干河的发源地黑驼山的东麓，在朔州市西北15公里。此遗址在发现的同年进行了发掘，共发现人类枕骨1块，烧石、烧骨多块，各类动物牙齿化石5000余枚，装饰品1件及15000多件石制品。从动物化石来看，主要为更新世晚期的种类。用碳-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28945年，石制品以小型为主。石核可分为两极石核和多面石核，石片可分为一般石片和小长石片。一般石片有的有修理台面的疤痕，即石片的一端有与石片劈裂面

峙峪出土的细石器

旧石器时代晚期

1963年山西朔州峙峪出土



相垂直的小疤痕，这是在石核上已打出的平面上再次加以修制的结果。小长石片的打击点不清楚，台面非常小，有些小石片的断面呈三角形或梯形。石器类型包括小型砍砸器、凿型尖状器、菱形尖状器、双边刮削器、单边刮削器、圆头刮削器、圆盘状刮削器、屋脊形雕刻器、斜边雕刻器、凿状雕刻器、扇形石核石器、斧形小石刀和石镞。其中的扇形石核、多面体石核和窄长石片都具有细石器的特点，虽然它们还不如后来的细石器规范，但可视为细石器的先声。

峙峪遗址和小南海遗址一样，它们被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寻找细石器的起源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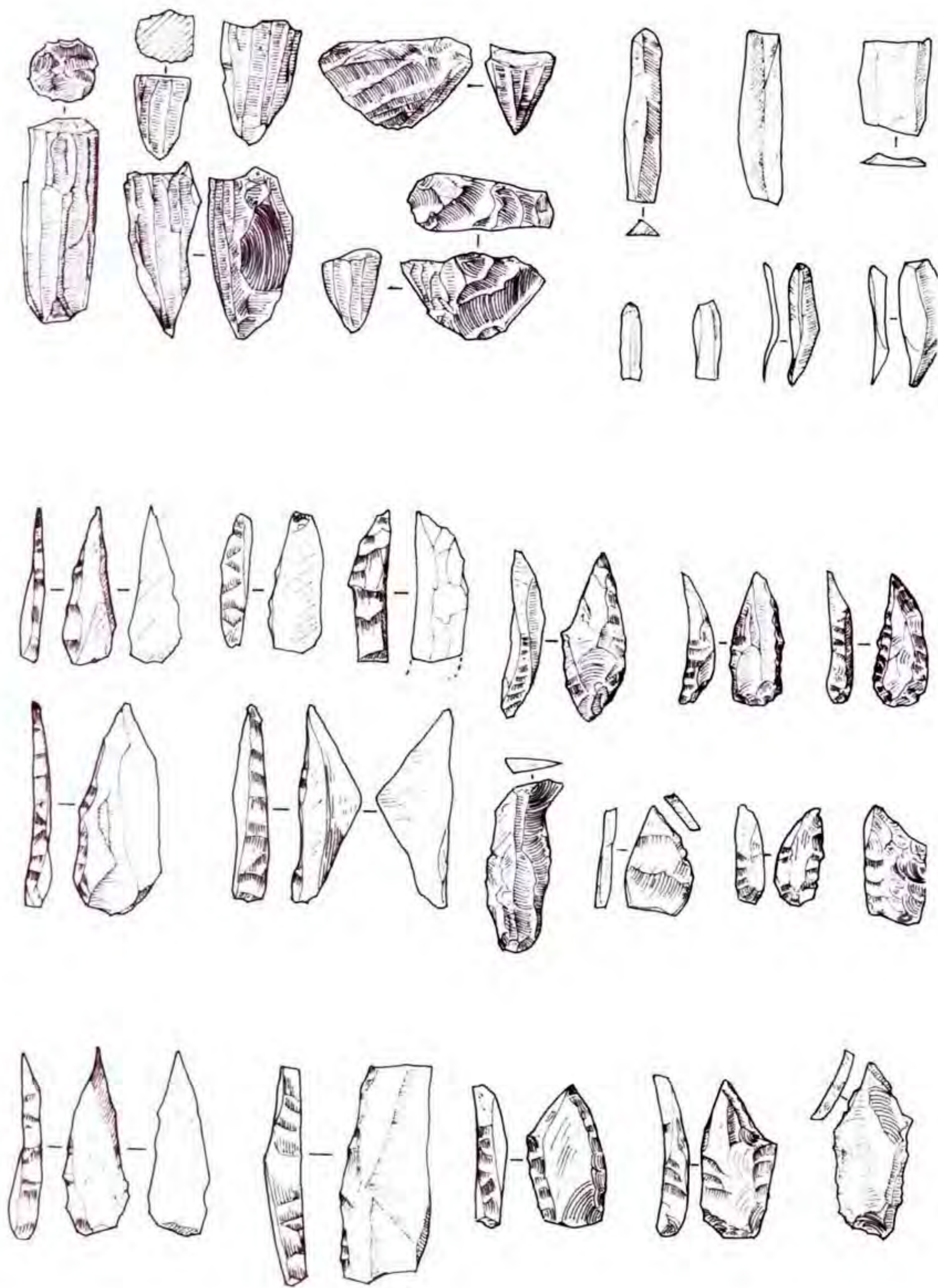
了根据。

三、下川遗址

下川遗址位于山西省中条山的东端，地跨垣曲、沁水和阳城三县，于1970年发现，1972年调查，1973年至1974年正式发掘。发掘者以石器遗存丰富、地层保存较好的沁水县下川为重点进行发掘和研究。下川遗址发现大量的石制品，但没有动物化石伴出。年代的碳-14测定数据为前21950年至前14450年，由于此遗址的地层被搬运过，可能会有较早的炭屑混入，加上石器技术的进步性，估计所测的年代偏早。

从研究者对此遗址的1800件石器标本的分析来看,石器是以燧石、玛瑙、玉髓、黑曜石等硅质石料制成,细小石器占绝大多数,类型有锥状石核、楔状石核、柱状石核、漏斗状石核、三角形薄长石片、琢背小刀、雕刻器、尖状器、锥钻、石镞、刮削器、石锯、似石斧、砍斫器、研磨器、镑状器等。有的

器物还可细分,比如鸟喙状琢背小刀、有肩斜刃琢背小刀等。以上细小石器基本上均用石叶以压制法修整而成,多数细小石器器身上分布着平行排列的窄长片疤,刃缘平齐,形状规范,是典型的细石器。它们无论从类型、工艺还是风格上都可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文化相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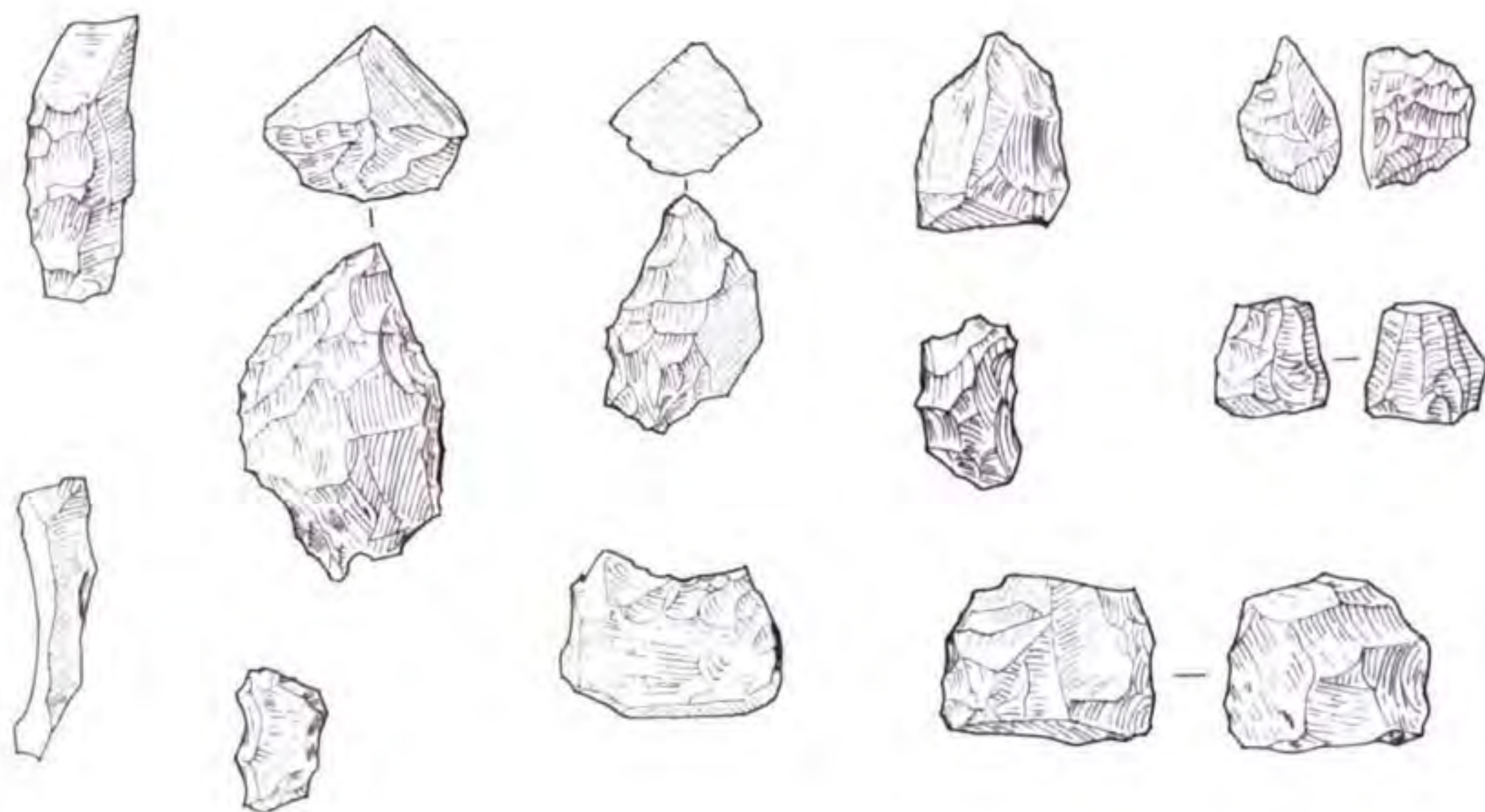


下川细石器

旧石器时代晚期
山西沁水下川出土

萨拉乌苏细石器

旧石器时代晚期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乌审旗萨拉
乌苏出土



四、萨拉乌苏遗址

萨拉乌苏遗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角,1923年首先在这里发现了晚期智人门齿、动物化石、200多件石制品和一些骨制品。后来又在此做过多次发掘。其中1980年在距第一次发掘地点约600米处发现一新的地点,从相同的地层中获得约200件石制品、一些骨器和炭屑。根据遗物层位的铀系法测年,时代距今约5万年至3.5万年。

萨拉乌苏石制品原料以黑色或灰黑色硅质岩砾石为主,细小石器是这个遗址文化遗物的重要特点,在此遗址中几乎未发现粗大石器。石器类型有钻具、边刃刮削器、吻状

端刮削器、拇指盖状端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边刃刮削器又可分为单刃、聚刃和双边刃刮削器。以上石器大多是用石片制成,石器的修整痕迹细小,故推测为压制技术的结果。

萨拉乌苏石器工业在技术、类型和风格上明显地继承了周口店第1地点、第15地点和许家窑的小石器传统,对研究中国细石器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五、虎头梁遗址

虎头梁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虎头梁村,1972年至1974年进行发掘,发现了丰富的动物化石以及石制品和装饰品等遗物。根据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来推测,此遗址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之末,比山顶洞人遗址稍晚。石制品的原料以石英岩为主,也有少数是采用燧石和流纹岩制成。石制品类型包括龟背状石核、楔状石核、柱状石核、窄薄片、大型和小型砍砸器、尖状器(底部各不相同,可分为底端圆钝、底端平、底端凹入和底端尖锐)、长形圆头刮削器、短形圆头刮削器、半月形刮削器、盘状刮削器、双边刃刮削器、三角形刮削器等。其中楔状石核

虎头梁出土的细石器

旧石器时代晚期
河北阳原虎头梁出土



和尖状器是此遗址最具代表性的石器，也是典型的细石器。

六、沙苑遗址

沙苑遗址位于陕西省朝邑南部的沙丘地带，1955年发现并采集，1956年又做了复查和采集。这里共有15处地点发现了石器，全部为地面采集，经挑选的标本有519件，主要为一些打制的石片或石器，磨制石器仅2件，另外还采集到骨珠、蛤饰和石饰各1件。估计此遗址包括了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存。石制品类型有圆锥形石核、圆柱形石核、扁锥形石核、细长石片、叶状石片、三角形尖状器、椭圆形尖状器、斜刃尖状器、长条尖状器、两面尖状器、三角形镞、短刮器、长刮器、圆刮器、复刃刮器等。其中大部分器物都是细石器中的典型器物，特别是尖状器与欧洲的莫斯特文化十分相似。

七、海拉尔遗址

海拉尔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的松山，早在1928年这里就有8个地点被发现，采集了一批石器和陶片，20

世纪40年代以后人们陆续在这里调查。1962年有学者在此发现16个地点，采集到相当数量的石制品。这些石制品的原料包括火石、燧石、凝灰岩、碧玉和玉髓等，类型有船底形石核、扁锥形石核、圆柱形石核、圆锥形石核、长条形石叶、尖端形石叶、细石叶尖状器、细石核石片、加工细石叶、长条形石片、长刮器、短刮器、圆头刮器、弧刃刮器、复刃刮器、双边刮器、多边刮器、雕刻器矛、镞、砍砸器、斧形器等。其中典型的遗物是细石核和细石叶，不少细石叶是剥片后直接使用，缘上遗有使用痕迹。时代属于中石器时代。从海拉尔石器的总体特征来看，属于成熟的细石器工艺传统范畴，当然也不排除少数标本具有早期特征。

八、凤凰岭遗址

凤凰岭遗址位于山东省临沂市，1982年发现并发掘，获得石制品700余件，其中大部分为细石器，少部分为较大的打制石器，还有4件磨制石器。细石器的类型有船底形石核、锥形石核、棱柱状石核、楔状石核、漏斗状石核、双台面石核、拇指盖状小刮削器、



海拉尔和昂昂溪细石器

中旧石器时代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出土
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出土

龟背状圆头刮削器、小长石片、斧状刮削器、斜刃刮削器、尖状器、凿形器、雕刻器、短身半柱状器、舌形器和半舌形器等。这些细石器制作精致，造型多样，具有典型的细石器工艺特点，基本上都经过第二步的加工与修理，多采用成熟的压制技术。从这个遗址细石器的数量和较多的石片和石屑来看，这里可能是一处石器加工场所。时代大约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或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

九、西藏苏热地点

自1956年以来先后在西藏各地发现旧石器地点约18处，大多数地点的石制品均采于地面。其中有一些是属于细石器地点，苏热地点就是一例。苏热地点位于西藏自治区定日县东南10公里的苏热山南坡，发现者共采集到40件标本。这些标本的主要原料是片麻岩、石英岩和石英砂岩。石制品类型比较简单，大部分为石片，少部分是经修理的工具。石片都比较小，常见的为30毫米至50毫米，石片一般长度大于宽度。工具类型为单刃刮器、双刃刮器和尖状器。

关于细石器的起源有许多说法，诸如欧洲说、西伯利亚说、蒙古说、华北说等。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华北说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华北一带旧石器晚期石器已逐渐向小型化发展，特别是峙峪和小南海的一些石器已具有细石器的雏形。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末一阶段，细石器分布更加广泛，所以应该说细石器的起源是以黄河中下游的华北为中心，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的北方草原以及蒙古、西伯利亚、朝鲜半岛、日本和北美洲一带都有典型的细石器分布，中国华南一带也有所分布。这些地区的细石器在形态和制作方法上都有不少相似之处，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细石

器从产生到发展跨越了不同的时代，但它毕竟是在一定石器技术和复合工具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更是适应于采集和渔猎经济的需要而存在的，随着农业的出现它也就慢慢地消失了。

第二节 狩猎工具和方法

采集和狩猎是旧石器时代人类赖以生存的两种基本方式。据人类学家研究，早期人类至少在南方古猿阶段，主要吃富含非碳水化合物类的食物，即以植物为主，食物中少量的蛋白质是靠捕捉一些小型动物如鱼类、鸟类、啮齿类等，有时也可能靠分食那些刚刚死去的动物的肉来获得。随着对动物习性的了解以及木器、石器、骨器加工技术的不断完善，人们开始狩猎并逐渐变换狩猎方法，改进狩猎工具，使狩猎活动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人类自身与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于工具和智慧的限制，人类最初的狩猎对象是老、弱、幼的兽类，靠天然的本棒、石头，通过集体协作来获取猎物。旧石器时代早期直立人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这些动物往往与人的个体大小相当，多为成年个体，能快速奔跑，不易捕获。对付这些兽类，天然石头和本棒是很难奏效的，估计这时期人们除依靠砍砸器和尖状器狩猎外，主要使用竹、木等有机物制成的工具，把砍断的竹棍、本棒，用石器稍加修理、弄尖，便可用作狩猎。欧洲克拉克当文化中曾发现一件紫杉制成的木矛，勒瓦娄瓦文化也发现过一件紫杉做的矛头，尖部经火烧变得坚硬。非洲也有少数类似的木器被

发现。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使用木器狩猎的记载，如《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云：“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至今没有发现木器，在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狩猎工具当属石球。

一、石球

石球是旧石器时代遗址常见的石器类型，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的分布。石球在中国南北方均有分布，但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许家窑遗址发现了多达1000余件的石球。有人对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球进行统计后称，石球分布在中国的11个省市，旧石器时代早期有7处，发现36件；旧石器时代中期9处，共发现1180余件；旧石器时代晚期15处，共发现64件。从石球数量来看，旧石器时代中期最多，从地理分布的情况来看，旧石器时代晚期较为广泛。

根据目前研究的结果，石球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些遗址，如蓝田人遗址、北京人遗址等。这一阶段的石球还不太成熟，加工十分粗糙，一件石球往往有一小半保留了砾石面，因此学者通常称这一时期的石球为“球形石”，但它们的确是后来石球的雏



许家窑出土的石球

旧石器时代中期

1976年山西阳高许家窑出土石球是许家窑文化中最富特色的器物，仅在1976年的发掘中，就发现了1059件，大小不等。大型的可直接用来投掷野兽，中小型的可用作飞石索，是有效的狩猎工具。

形。在这一时期，石球可能主要是作为砸击坚果的工具。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石球大量出现，制作也比较规整、精致，在形态上由大变小，在功能上可能更主要是用于狩猎。1976年和1977年在许家窑遗址发现了大量马的化石材料，仅上下颊齿就有4300多枚，大约代表了300匹野马的个体。同时在这个遗址还发现了1000余件石球。这些石球根据重量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型的重1501克至2500克，中型的为501克至1500克，小型的只有50克至500克。大量石球和野马化石的集中发现，使考古学家们坚信许家窑人是用石球捕获野马的。

石球作为投掷用的狩猎工具，除了用手



使用石球图

直接投掷外，据民族学资料分析，还有两种使用方法。一是作为绊兽索，将一长木杆的一端用绳拴系石球，另一端拴系一段绳索。用时把这一复合工具向野兽猛甩过去，杆与球在一起合成巨大的冲力，打中野兽的要害，野兽自然倒下，即使未击中要害也可将兽足绊住。二是作为飞石索，即用兽皮或植物纤维做一兜，兜的两头各拴一根绳子，兜里放石球。使用时同时将两根绳子用力甩起，使石球抡起来，而后松开一根绳索，使兜中的石球飞出，其有效射程有时可达50米至60米。小型石球可能更适于用作飞石索。

二、标枪

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人类还采用多种狩猎方法，包括集体围攻野兽，用火炬、叫喊声恐吓、追赶动物，并利用自然陷阱捕获动物。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人类狩猎技术大发展的时期，人类以从未有过的高度智慧及多种手段进行狩猎。标枪、投矛器、弓箭、鱼镖等一系列狩猎工具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狩猎技术的提高。

标枪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常见，中国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也出土了一件标枪。标枪多为骨制，尖部锋利，绑缚在木柄上作为一种投掷工具。投矛器又称投枪器，多见于欧洲马格德林文化遗址，一般是

用鹿骨和木头制成，是一种很富创造性的工具。这种工具一端有横档，在它光滑的面上放置矛，把矛粗的一端支撑在横档上，使用时用力一推把矛推向目标，投矛器延长了手臂这一杠杆，从而使矛投出时的速度加大，提高了杀伤力。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就常用这种投矛器狩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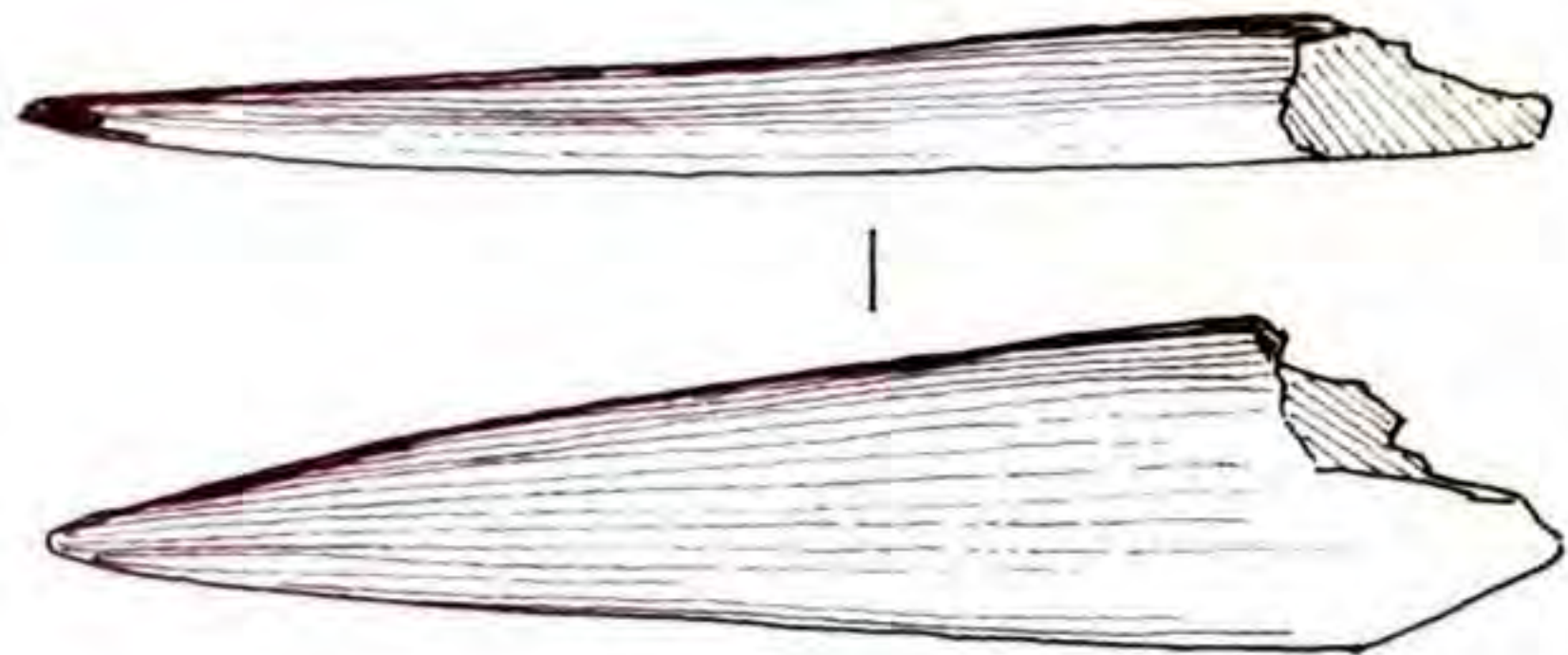
三、弓箭

弓箭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复合工具，是狩猎经济发展的产物，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有实物证据。著名的法国阿里埃叶洞穴壁画“着箭的野牛”，西班牙一些洞穴壁画中的弓箭狩猎图等，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逼真的弓箭形态资料。弓一般为木质，不易保存，个别保留下来的材料极为有限，比如德国的什列斯唯希·霍尔斯坦遗址出土的前8800年至前8300年的木制长弓和在丹麦发现的中石器时代榆木制成的弓把。弓箭的使用，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中，在峙峪和下川遗址中均出土有镞，中石器时代的小南海遗址发现了更为定型的镞。峙峪石镞可能是中国的第一件石镞，距今约2.8万年。但与其同期或稍晚的其他遗址中再也没有见到类似的石镞，所以就目前的材料而言，它还是个孤证。关于下川的石镞，张森水曾表示过怀疑，认为它们与尖状器难以区分。弓箭是一种复合工具，一般是把镞附在箭杆上，使用时利用弓的弹力将镞与箭杆一起射向远方。作为镞，除去适当的尺寸、锋利的尖之外，最重要的是它的底部设计必须符合安装箭杆的要求，或有铤，或镞底扁薄，或呈凹状，便于直接插入木箭杆的夹缝中。下川石镞的底部不够扁薄，仅从形状上判断它们为石镞的确值得怀疑。与国外同期的镞相比，下川石镞与之差异较大，比如，阿替

标枪

旧石器时代晚期

1983年辽宁海城小孤山出土标枪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常见，但在中国同期遗址中却很少见。这件标枪是目前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惟一一件骨标枪。其尖部锋利，可绑缚在木柄上作为一种投掷工具。



林文化的镞，虽然也是呈三角形，但它有铤，两翼的下缘基本上是平的，还往往在铤翼相间的两侧，特意再打几下，使其微凹，表现出倒刺的先声。梭鲁特文化有一种柳叶形石镞，两面经过精细加工，器身极薄。西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纳吐夫文化中的石镞，有两种特别的类型，一种是亚腰型石镞，镞身近底部双侧内凹，无铤；另一种有铤，镞身中部双侧凹进。印度尼西亚南苏拉维斯尤鲁里哥1号洞穴中发现的石镞，形制也很特别，为凹底三角形，双侧刃部均带有5到8个锯齿状的刺。从国内外已有的资料看，可以肯定弓箭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目前中国的资料而言，石器是从中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定型化的。

弓箭的发明是与狩猎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的，是古人对以往工具技术的发展，也是原始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古气候变化可能是一种促进因素，旧石器时代晚期是最后冰期逐渐走向盛期并最终消失的时期，古气候虽有温湿、干冷的变化，但在距今4万年至1.5万年的时间里总趋势是变得干冷，捕获猎物日趋困难。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先民们创造了比投石索更有效的狩猎工具，如投矛器、脱柄骨鱼镖等投掷工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明了弓箭。弓箭优于以往任何投掷工具，它可以通过瞄准提高命中率，弓箭的射程也远远超过一般的投掷工具，可达80米至100米，是猎获善于奔跑的动物如鹿、野羊、野牛、羚羊的有效工具。

弓箭的使用可能经历了从单射到束射、集射的过程。从欧洲中石器时代一些壁画中可得到启示：有的壁画中一只猎物身上往往中许多箭头，有的壁画则表现了众多的猎手各持一箭集中射击一只野兽。这在当时大概是最有效的方法了，因为一支镞不足以使一



石镞

旧石器时代晚期

山西朔州峙峪出土

峙峪石镞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件石镞，距今约2.8万年，与其同期或稍晚的其他遗址中再也没有见到类似的石镞，所以就目前的材料而言，它还只是一个孤证。

只大型的野兽倒下，众箭齐发情景就大不相同了。弓箭的发明和使用，给史前人的狩猎经济带来了新的生机。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弓箭的发明：“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弓箭的使用方法

弓箭优于以往任何投掷工具，它可通过瞄准，提高命中率，弓箭的射程远远超过一般的投掷工具，可达80米至100米，是猎获善于奔跑的动物如鹿、野羊、野牛、羚羊的有力工具。



四、骨鱼镖

骨鱼镖是一种捕鱼工具，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马格德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骨鱼镖，被学者们称为最具特色的工具。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不少骨鱼镖，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未发现这类工具。1983年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出土了国内这个时期第一件较完整的骨鱼镖，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捕鱼技术的改进和骨鱼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可贵的资料。这件骨鱼镖保存基本完好，从整体结构上可分为头部、主干部和根部，头部尖端及根部末端虽有部分残缺，但不影响对其整体形态的辨认。头部为扁锥体状；主干为棱柱体，断面呈不等边五角形，一侧有一个倒钩，另侧有两个倒钩，上下排列，两

侧倒钩不对称；主干中部一侧有一凸缓突起，其中间有一小切口，根部与主干连接部位有一与倒钩相对的叉；根部削薄，纵剖面呈楔状。鱼镖残长18.01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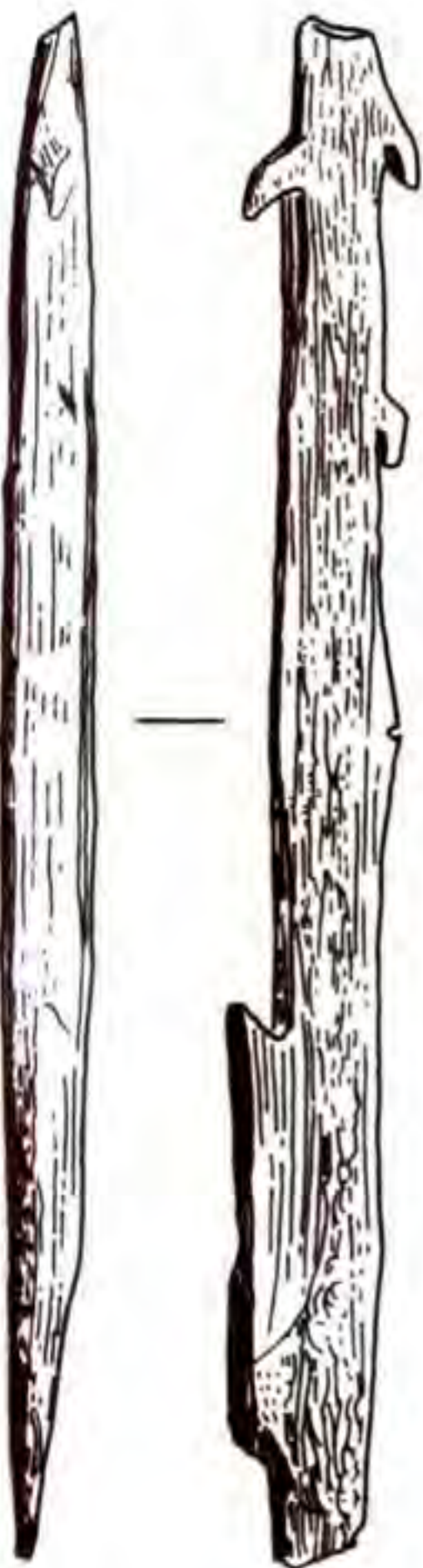
骨鱼镖分为死柄鱼镖和脱柄鱼镖两种。根据民族学资料分析，死柄鱼镖是将鱼镖固定在木柄上使用；脱柄鱼镖一般是将鱼镖插在木柄或竹柄的夹套中，用时将镖刺入动物体内，猎物的挣扎导致镖与柄分离，猎物越挣扎，倒钩刺得越深，使猎物难以挣脱。有人观察小孤山的鱼镖，发现其根部的磨光与倒钩的磨光程度相当，认为这种痕迹是在使用时经常摩擦所致，故这件鱼镖应该是脱柄鱼镖，因为死柄鱼镖的根部是固定在木柄上使用的，根部不可能受到摩擦；脱柄鱼镖则不同，使用时是将镖头插在木柄的夹套中，刺中鱼后，由于鱼的挣扎，镖头与木柄很快脱开，在反复使用中，骨鱼镖的铤部与柄部不断发生摩擦，自然会在这部分留下磨光的痕迹。另外，根部与主干连接部位有一与倒钩相对的叉，这一构造可能是为拴系绳子时防止滑脱而设置的，这也进一步说明它是脱柄鱼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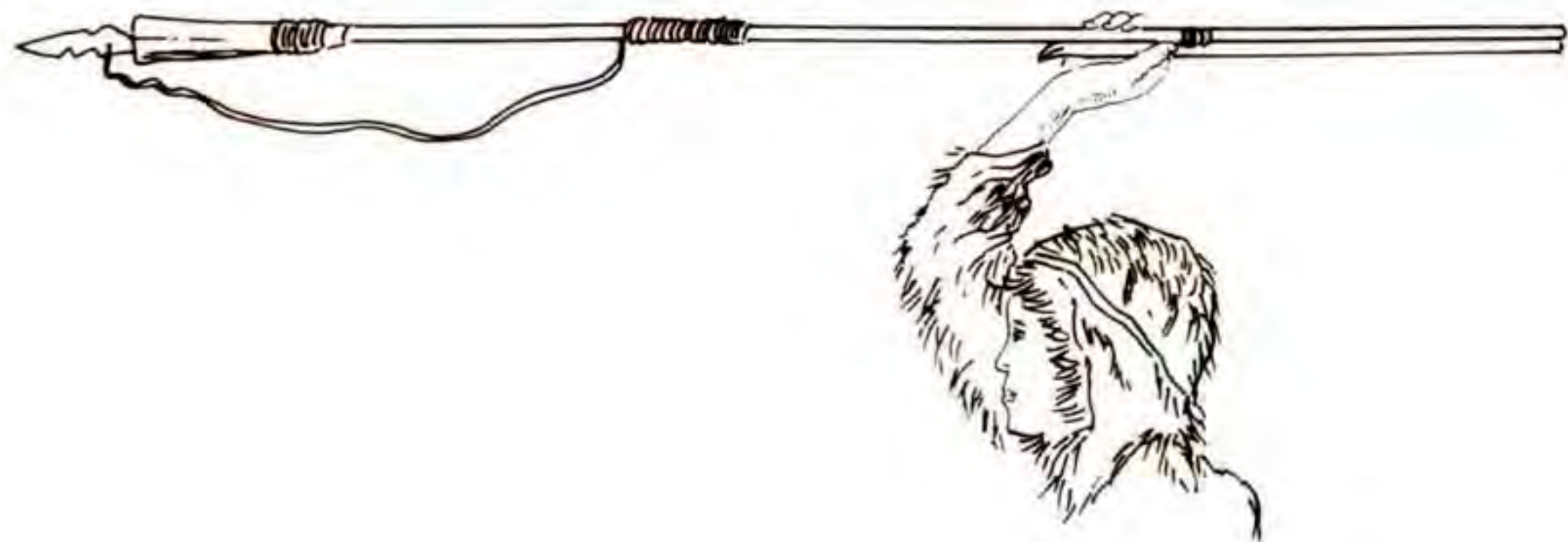
脱柄鱼镖曾被世界上许多民族使用，特别是环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如中国、日本、菲律宾、马来半岛、安达曼群岛的居民，南美的火地人，北美的因纽特人，都使用过与脱柄鱼镖相类似的工具，只是它们的名称、形制、用途不尽相同而已。中国赫哲族居民使用的一种鱼叉，有两至三个有倒钩的叉头，形状有些像北方的一种农具——三股叉。三个叉头在根部合为一体，活插在木柄上，叉头与木柄有绳索相连。用这种鱼叉可以捕获比较大的鱼类。台湾阿美族用以打猎的脱头枪，枪头上有倒钩，枪头插入枪杆内，有绳索将枪头与枪杆相连。猎人把枪射到野兽身

小孤山骨鱼镖

旧石器时代晚期

1983年辽宁海城小孤山出土





脱柄鱼镖使用示意图

上，野兽通常负枪而跑，枪头受震动与枪杆分离，但枪杆与枪头有索相系，杆就被拖在后面，又因所用的枪头具有倒钩，不易从兽体中拔出，所以野兽奔跑时，枪杆就成为绊脚石。北美因纽特人使用的投矛器，矛头有倒钩，根部有一穿孔，矛插在木柄中，矛头根部穿孔系绳与木柄相连。因纽特人常用这种工具猎取海豹、海象等。以上资料说明脱柄鱼镖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捕鱼工具，还可作为一种锋利的狩猎工具。推测小孤山出土的骨鱼镖很可能也是两种功能兼而有之的工具。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无论在狩猎工具还是狩猎方法上都强于以往。成功的狩猎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促进了人类体质尤其是智力的快速发展。狩猎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群体协作，人们彼此需要配合和交流，所以狩猎对人类语言的产生和社会组织的形成，都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狩猎对工具的改善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在野兽面前，人类的体力十分有限，要战胜比自己强大的野兽，就必须在改善狩猎工具和方法上下功夫。我们不难看出，整个旧石器时代，凡是具有代表性的石器、骨器，大多都与狩猎相关。

第三节 骨、角器的加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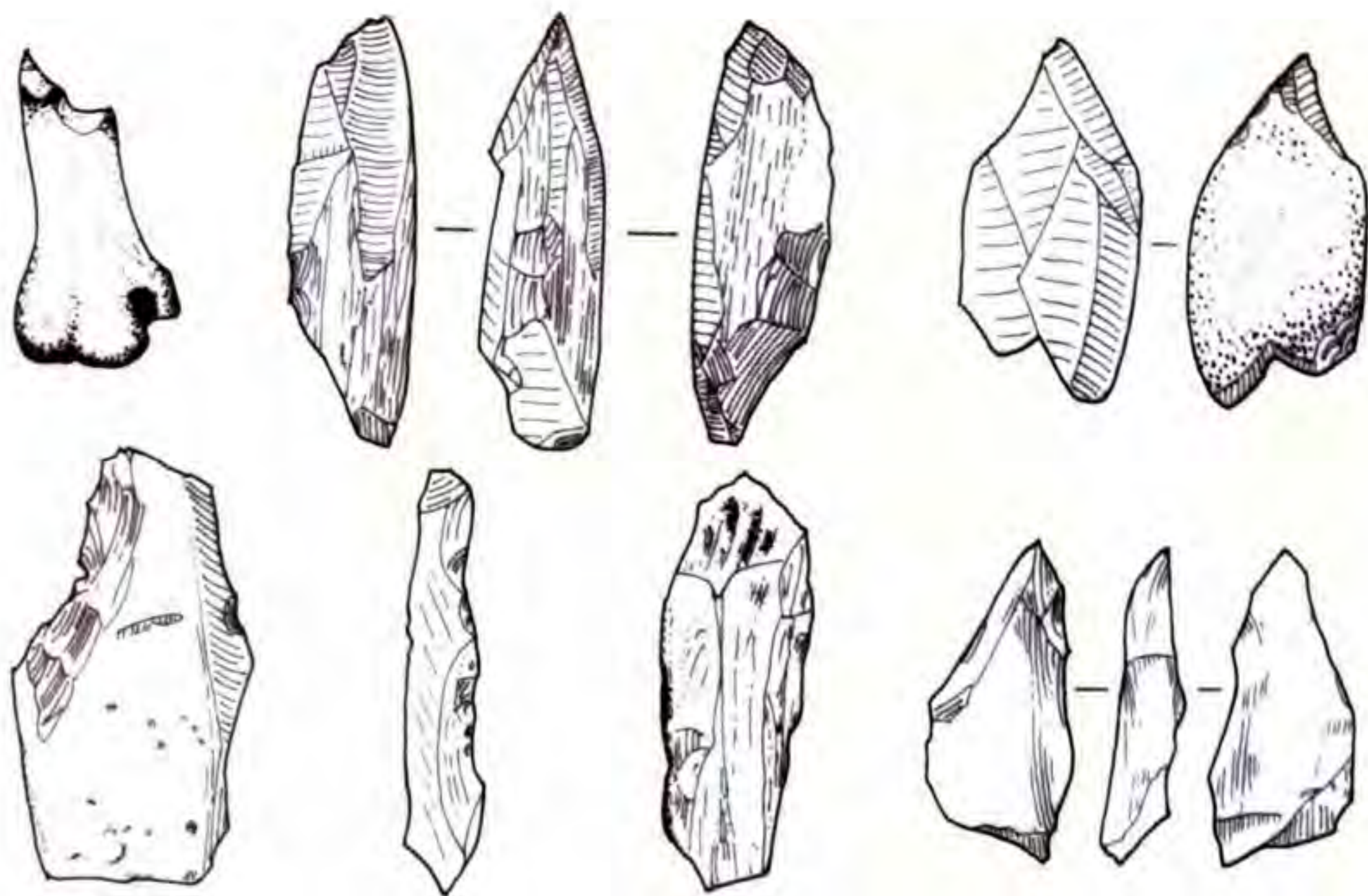
石头、木头和动物的骨头，都曾远古人类用来制作工具的原料。木制工具易腐烂，很少被保存下来，而骨器和石器则较多地保存下来，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现有的资料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就已经利用和加工骨头。到旧石器时代中期，骨角制品的制作已初具规模，器形规范，加工精细。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器的制作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骨制矛头、鱼镖、标枪、锥、针、装饰品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加工骨、角制品的技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旧石器时代的骨、角器包括打击骨器和磨制骨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人工打击骨片与为敲骨取髓打破的骨片及自然破裂骨片的区分上没有严格标准。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骨器，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法国学者步日耶（H·Breuil）最早提出的，此后他撰有专著，描述了北京人遗址出土的一些有人工痕迹的碎骨和鹿角。北京人是否使用骨器，在中国学术界进行过多次讨论，看法不一。一种意见认为：有些碎骨经过带刃石器的砍砸，是由于北京人敲骨吸髓所致，但也有许多是北京人制作的骨器，截断

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出土的各类打制骨器

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出土

各类的打制骨器有尖状器、雕刻器、双刃刮削器、单刃刮削器、圆刃刮削器、三棱尖状器等，与石器类型十分相似。



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硬，可作锤子使用，带尖的鹿角可作挖掘工具用。另一种意见认为：有的骨骼是被动物咬碎的，虽然有一部分骨骼经人工打碎，但打碎的目的不是为了制作骨器，而是为了吸食骨髓。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一些学者通过长期观察自然状态下动物骨头破碎和埋藏的方式，考察了一些原始部落对动物屠宰和骨骼的利用，逐渐建立了鉴别人工与非人工破碎骨骼的标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吕遵谔、黄蕴平通过实验，总结出区分人工打击骨片和动物啃咬骨片的规律。张俊山通过几十例敲骨吸髓和制作骨器的实验，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遗址出土的碎骨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区分人工与非人工破碎骨骼、敲骨取髓与打击骨器的标准。张俊山把碎骨标本一侧边或近尖端一侧均有两个以上的连续打击疤、各疤之间有部分叠压、疤缘平整的器物称为骨器，并认为只有这样的器物才可与敲骨取髓产生的碎骨相区分。至此，人们对旧石器时代骨制品的定义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也大体上确立了区分骨制品和非骨制品

的一些原则。

骨、角器的制作方法一般是将动物肢骨、角骨砸碎，选取一定长度或宽度的骨、角片，将其打琢成所制器的雏形，然后再加以刮制，有的还经过磨光、钻孔等程序。砸碎肢、角骨属于第一步加工，其余过程均属于第二步加工。

中国华北、华南和西南旧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都有骨制品出土。在南方大约有8个地点发现了磨制的或刮制的骨、角器，有几个地点只发现一件标本，但个别地点出土的骨、角器多达数百件。已知的骨器类型有骨锥、骨铲、骨刀、骨针、扁平无刃骨器、尾部带叉的骨器和多尖刃带关节的骨器，角器只有一种角铲。华北地区的骨器可谓丰富多彩，有人对中国华北地区2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骨制品进行研究，并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

一、打击骨器的主要特点、类型和加工方式

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打击骨器的主要特

点是以大、中型哺乳动物的管状骨或骨片为原料，用锤击法，偶尔也用砸击法直接打制和修理而成。打制骨器的类型包括尖状器、三棱尖状器、双刃刮削器、单刃刮削器、圆刃刮削器、多边刮削器、雕刻器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骨、角器无论从分布的地点，还是从器物的类型来看，都未超过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些早期遗址的骨器类型，在中期遗址中则没有发现，如双刃刮削器。旧石器时代晚期打制骨器仍是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骨角器的分布空间和数量都比前期大大扩大和增加了。打击骨器的类型相对固定，有尖状器、双刃刮削器、单刃刮削器、圆刃刮削器、雕刻器等。这表明，在磨制骨器出现以后，打制骨器仍大量存在。若与同时代的欧洲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工具组合相比，似可看作是华北特殊的文化现象之一。为何造成如此情况，值得深入探讨。

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打击骨器的加工方法随时代的不同有所变化。旧石器时代早期骨器制作总的看来比较简单、粗糙，往往是在锤击或砸击后的管状骨上利用尖端的一侧或两侧稍稍加工修理成器。修理方法基本上采用锤击法，有向骨壁内加工的，向骨壁外加工的、复向加工的，也有采用交互打击的。所产生的修疤不固定，有的呈微凹状，有的刃缘呈锯齿状，有的刃缘形成多个细小的疤痕，有的标本修疤短宽，可见清晰的打击点和放射线。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骨器加工技术比早期的有所进步，表现在修理工作上比较细致，刃缘多做反复的修理，不少标本器形规整，两侧对称。许家窑遗址出土的一件双刃尖状器，器身下部左右各打出一个缺口，有学者认为是为捆绑木柄而特设的。这一推论有待更多的标本和新的手段来验证。但为便于手握而对打击骨器的下部作特殊处理的

现象，从标本上看，早期罕见，此时有明显增加。旧石器时代晚期打击骨器的加工技术高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例如骨器中多见连续和多次修理的层叠细疤，细疤浅平呈长条形或宽口形比较常见。由此不难看出华北地区的打击骨器，无论从类型上，还是打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并可见到其发展脉络。

二、打击骨器的功能

各类打击骨尖状器、刮削器和雕刻器均与相应的石器类型非常相似，应该说它们在功能上是基本相近的，但也可能略有不同。比如石尖状器主要是用其尖部，起锥割作用，用时将尖部刺入加工物体，然后将物体切割碎，既可以用于切割肉类，也可用于切割植物的块茎。骨尖状器大体上能适应上述用途，但因其硬度不如石尖状器，割有密集纤维的植物或动物筋腱时不如石尖状器有效。从华北旧石器来看，尖状器基本上是小形的，做挖掘工具会显得力不从心，而骨尖状器则优于石尖状器。在华北旧石器时代，骨尖状器的大量存在，或许说明采集经济在原始人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骨刮削器和石刮削器一样，主要是用于切割和刮削的工具，有刀的某些功能。骨雕刻器的功能尚不明确，可能是一种与刮削器用途相仿的工具。另外，打击骨器的加工技术受石器类型的影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丁村遗址出土的6件三棱尖状骨器，均在长轴一端修制出一个三棱状的锐尖，有的是将一厚骨片沿长轴两侧，作单向修理制成典型的三棱锐尖；有的是沿骨片长轴两侧，由内壁向外壁分别击出一条骨片，形成一棱状锐尖。这些骨器的器形和加工，都与丁村遗址出土的中小三棱尖状石器很相似，可见骨器的制作与石器的制作在方法上

山顶洞骨针

旧石器时代晚期

1933年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出土

残长8.2厘米,孔径0.31厘米—0.33厘米

针身保存完好,针孔处破裂。表面有刮磨痕迹。



有时是相通的。石制三棱尖状器是丁村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骨制三棱尖状器也可代表丁村文化骨制品加工的地方特点。

三、刮制、磨制骨器的技术

旧石器时代晚期是骨、角器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表现在锯割、刮制、磨制和钻孔等新的骨、角加工技术已见于华北地区这个时代的文化中。一些特殊用途的骨、角器,诸如骨鱼镖、骨锥、骨标枪、骨针、骨矛头等,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所发现,已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重要标志。

锯割技术在有关中国旧石器考古文献中讨论不多,实际上这种技术曾被华北原始居民所应用。例如,阎家岗出土的三件用野牛角尖端制成的角器,截面整齐,截面与角心长轴垂直。再如,辽宁海城仙人洞发现的骨针,若不是用槽割技术制坯,很难想象能制作得如此精致。学者们一般认为当时锯割骨角器的工具为锋利的石片,但饶有趣味的是,与阎家岗出土的三件牛角器相伴出土了三件牛下齿列。它们均为单侧齿列,臼齿齿尖可见少许磨损折断现象,非自然力所能形成,因此原研究者认为阎家岗古猎人是用这

些牛下齿列锯割牛角的。从牙齿硬度上考虑,尖而锋利的动物牙齿是有可能用作锯割骨角器的工具的。

骨针是集锯割、刮、磨和钻孔等技术于一身的器物,较好地反映出这一时期骨角器制作的水平。有人对小孤山出土骨针的制作与使用加以研究,认为小孤山骨针经过选材、截料、刮磨成型和加工针眼四道工序,并经过实验证明,小孤山的骨针可能采取了从选出的骨片上以锯切开槽的方法截取窄长的骨料,然后用刮和磨的方法将长条形骨料加工成圆柱状针身,最后对针的尾部细磨,使之扁薄,再用对钻方法制成针眼。山顶洞出土骨针的针眼是采用刮挖方法制成的,实验者认为刮挖较之对钻费时,效率较低。但山顶洞遗址出土的一件钻孔鱼骨是采用两面对钻的方法制成的,可见不同的钻孔技术共存于一个遗址的情况也是有的。

由于骨头具有一定的韧度和锐度,更适于制作锥、针、鱼镖等细小的工具,这是石器所无法代替的,值得注意的是磨制、刮制骨器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其数量与打击骨器相比并不多,也就是说磨制、刮制骨器出现以后,打制骨器仍占有相当的比例,这种现象似乎反映出磨制、刮制骨器是从华北以外地区交流或传播过来的。这与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此时期人类头骨和石器的分析、推测有共同之处。

四、关于骨器起源的探索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华北地区骨器出现在早更新世的泥河湾遗址。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些遗址中,骨器的制作和使用可能比较普遍,例如北京人遗址、庙后山遗址和金牛山遗址都出土了比较典型的打击骨器。估计骨器的出现会稍稍晚于石器的出现,因为



骨角铲

旧石器时代晚期

1975年贵州兴义猫猫洞出土这件骨角铲是截断鹿角制成的，先在一端刮出一个约45度的刃口，而后再加磨制，反映出当时的人已经熟练地掌握磨制骨器的技术。

制作打击骨器需要有比骨器更坚硬的锤，尽管可以以骨打骨，但效果远没有以石击骨好。有学者推测打击骨器的出现与早期人类敲骨取髓行为密切相关。人们用石器或石块敲碎含有髓的动物长骨时，可同时得到有尖、有刃的碎骨。因为兽骨的肢骨含纵向纹理，被击碎时很容易产生带尖刃的长碎骨。这种碎骨的尖刃即使不作修理也可使用，稍作修理便是一件可使用的骨器，这大概也是尖状器在早期遗址中较多出现的缘故之一。骨头和石头均为旧石器时代人类较易获得的工具原料。骨头虽不如石头坚硬，但却比石头更具韧性和弹性。骨头经敲砸容易碎裂，裂边常有锋刃状，较易加工。另外，生产打击骨器需要有比骨骼更硬的加工物体，石器应是理想的加工骨器工具，由此看来，似应相信骨器的出现略晚于石器。

泥河湾早更新世地层采集的十余件标本是目前所知华北地区最早的打击骨器，它们

大部分是用哺乳动物的肢骨、桡骨、尺骨、肩胛骨作原料，仅在一端加工，另一端保持原料的原状。加工方法比较简单，比如采用交互打击的方法，仅在尖部的一端或两端稍加修理，比起北京人、庙后山人及金牛山人遗址出土的骨器，显示出一定的原始性。泥河湾早更新世地层主要出土小型石器，这种骨器具有较长的力臂，可作为小型石器的辅助工具，或弥补小型石器工具的不足。泥河湾早更新世地层采集的骨器似乎并不是最早的骨器。应该说在这以前可能存在一个长期使用带尖碎骨的阶段。

第四节 意识、宗教 和艺术的初现

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人类体质的进化已接近于现

穿孔獸牙

舊石器時代晚期

1933年至1934年北京房山周口店龍骨山山頂洞出土洞中所出穿孔獸牙共125枚，以獾的犬齒為最多，狐狸犬齒次之。每枚獸牙的牙根均有一穿孔，是用尖狀器刮削而成的，出土時有5枚排列成半圓形，有的孔眼邊緣留有紅色的赤鐵礦痕跡，可能是被紅色繫繩所染。



代人，且基本上具備了幾大人種的若干特徵，製作工具的技術不斷進步，能用直接打擊法、間接打擊法和壓製法生產長石片和細石葉，廣泛生產和使用複合工具。弓箭、魚鏢的出現，反映出人類智慧的高度發展。也是在這個時期，首次出現確定無疑的人類構築的居住遺址，比如在俄羅斯發現了最早的人類建築遺跡，包括柱洞、排列有序的石塊、猛獁象和其他大型哺乳動物的骨骼、工具和用具，以及火塘等。中國的閻家崗遺址發現了擋風牆一類的建築遺跡。正是在這種條件下，人類的意識、宗教和藝術開始萌芽。

意識更多的是指人對自我的認識，用儀式處理死者，表達了對死者的意識，從而也表達了對自我的認識和對死亡的觀念。人類早期的墓葬反映出人類意識到死亡的不可逆轉，並試圖加以改變的一種願望。這也是在考古遺址中可能找到的一種意識痕跡。現有的研究表明，人類原始宗教的出現，主要體現在人類懂得將死者按一定的葬俗進行埋葬。有人認為尼安德特人已懂得埋葬，但比較有說服力的是在伊拉克北部紮格羅斯山

區發現大約6萬年前的埋葬遺跡。一個成年男子被埋葬在洞口，根據在骨骼化石周圍土壤中發現的花粉判斷，他的身體顯然是放在一層可能具有醫藥價值的花上。有的人類學家推測他是個巫師。類似的情況在歐洲和亞洲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常見，比如俄羅斯莫斯科附近桑給的奧瑞納文化墓葬中發現一死者的頭部、胸部、臂部綴滿了象牙珠、環和穿孔獸牙；在中國山頂洞人遺址中發現了埋葬習俗，死者周圍撒有赤鐵礦粉，死者的頸部還佩戴獸牙穿孔製成的裝飾品。顯然這都是經過人們精心安排的埋葬。在原始人的眼中，紅色象徵着生命，用赤鐵礦粉埋葬死者可能代表着讓死者死而復生的理念。像這種明確屬於個人的隨葬品在墓葬中出現，還說明此時人類對個人物品擁有的意識和後世的概念增強了。

人類最早的藝術品當屬歐洲奧瑞納文化和馬格德林文化洞穴中出土的雕刻品、雕塑品、裝飾品和充滿神秘色彩的洞穴壁畫。中國這個時期的藝術品主要是一些裝飾品和少部分雕刻品。在華北地區一系列的遺址中有

这方面的材料出土。已发现的时代较早、材料较丰富的是山顶洞遗址出土的材料，包括穿孔兽牙、海蚶壳、青鱼眶上骨、骨管和石珠。穿孔兽牙共 125 枚，均在靠近牙齿的根部穿孔。研究人员认为：所有的穿孔都是由两面刮挖而成，不规则，形状也不同。穿孔的最大径从 1 毫米到 4 毫米不等。有的标本穿孔处呈圆形，有光亮，似为系绳长期佩戴所致，其中 5 枚是作半圆形排列。穿孔的海蚶壳共有 3 枚，有的发现在墓葬中老年人头骨的左侧。在海蚶壳基部均有一个略呈方形或圆形的孔，最大的直径约 9 毫米。裴文中先生认为这些孔不是钻出来的，而是放在石头上磨出来的，磨面清晰可见。有孔的青鱼眶上骨 1 件，在其右外侧有一小圆孔，孔径约 2 毫米，孔壁圆滑，鱼骨表面被赤铁矿粉染成红色。骨管表面光滑，可见摩擦的痕迹，表面有刻痕 1 道至 3 道，长度为 18 毫米至 38 毫米，两侧浅，中间深。有孔石珠共 7 件，发现于青年女性头骨外的土中，石珠的大小基

本相等，直径为 6 毫米至 7 毫米，全部石珠都用赤铁矿粉染成红色。穿孔小砾石 1 件，由天然的蛋圆形砾石制成，两面扁平，长 39.6 毫米，宽 28.3 毫米，厚 11.8 毫米；砾石中央有一粗孔，一侧最大径为 8.4 毫米，另一侧的最大径为 8.8 毫米，孔是由尖状器对钻而成，穿孔处微显红色。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也出土了类似的装饰品，材料包括 3 枚穿孔兽牙，分别由貉的上犬齿、小野猫的上犬齿、肉食类动物犬齿制成，后者只利用了齿根部分，并精心磨制成近端粗、远端渐薄的笛嘴形，器身中部穿椭圆形的孔，孔壁内参差不齐。穿孔蚌壳只有 1 件，残，直径约 25 毫米，厚 2 毫米，两面磨光，一面稍凸，呈乳白色；另一面微凹，有红色浸染。凸面边缘布一圈放射状的刻沟，沟内残留红色染料，中心为一圆孔。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出土了为数可观的装饰品，材料包括 3 件穿孔的贝壳、8 件鸵鸟蛋皮制成的扁珠、1 件鸟的管状骨制成的骨珠。扁珠直径为 6 毫米、孔径为 4 毫米。骨



饰珠和赤铁矿

旧石器时代晚期

1972 年至 1974 年河北阳原虎头梁出土

这些饰珠是用鸟的腿骨骨管制成，其一端被仔细磨过，另一端则粗粗一磨，可能是作为一种穿绳的佩饰。赤铁矿是原始人用作染色的一种原料，在山顶洞人墓葬周围就曾发现撒有一圈赤铁矿的现象，这大概是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有关。

管的一端被精心磨过，另一端只是粗粗地磨过。还有1件钻孔石珠，是用板状小石块制成，一面磨过，另一面粗糙，石珠不甚圆，呈多角形。其他还有四个遗址发现了零星的装饰品材料。宁夏灵武水洞沟出土1件鸵鸟蛋壳制成的扁珠，圆形，直径约18.5毫米，中间穿孔，孔径约2.5毫米，系刮制而成，孔的周围残留有红的颜色。扁珠的周围稍加打磨，圆钝、光滑。山西朔州峙峪遗址出土了1件钻孔石墨具，残，仅保留原物的一半，长28毫米，一面和边缘光滑，经过磨制，另一面粗糙。属中石器时代的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出土了1件有孔石珠，呈扁平椭圆形，长26毫米，宽11毫米，中间竖穿一孔，直径为2毫米，发现时已折断为两半。在河北兴隆采集到1件已经石化的赤鹿右角眉枝的残段，上含有刻纹，是将鹿角磨制后再刻画而成的，刻纹后又染成红色。图案由三组阴刻的线条组成，第一组由直线、斜线和连弧纹组成；第二组由互相平行的密集的曲线构成，呈“S”字形状；第三组由四组密集的曲线构

成，形成对称性颇强的图案。比起欧洲同期的原始艺术品，无论在种类还是在数量上中国都显得比较贫乏，但这些艺术品反映出很多重要的信息。

装饰品无疑代表了原始人的一种审美观念，我们可以视之作为一种艺术品。而实际上用贝壳、兽牙等物制作的装饰品，在许多原始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在举行仪式或祭祀时，人们常常要在身上涂上颜色，再挂上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奥塞阿尼阿首领和祭司在举行仪式时，身上都要佩戴象征权威和财富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的材料除贝壳外，还有极乐鸟的羽毛，袋类动物的毛皮，海豚、鲸鱼及狗的牙齿，植物的纤维、花朵以及各种各样的染料。由此可见，早期装饰品与宗教活动密不可分。除了艺术品之外，它们还有多种用途，代表了多种意识和含义。

一、狩猎巫术用具

原始的装饰品，特别是那些佩戴在人身

山顶洞人埋葬死者图



上的装饰品,代表的是人们当时某种精神活动,因此应该从原始人的思维入手去推测其用途。按照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L. Levy-Bruhl)的理论,原始人的思维是以“原逻辑、互渗律”的形式出现。所谓的原逻辑、互渗律是指在逻辑上把一些不甚相关的东西或物质联系在一起,比如用某种动物的某个部位的骨头代表某种动物。一些民族志的资料可对这一推测加以印证。西非的土著人为了在狩猎、捕鱼、战争、贸易、恋爱等事情中获得成功,往往求助于自己的灵物。一个猎人或一些猎人各自带上一个灵物出发,这个灵物挂在腰上或者肩上,如果有几个人参加有组织的狩猎,猎人们还要念临时咒语。北美的因纽特人为了迫使鹿在他们需要的地点出现,巫师要在一根立于适当位置的杆子上升起某位著名猎人或巫师的画像,画像具有这个人的力量,而系在画像上的各种饰物必须有助于控制猎物的行动。法国学者安德列·勒鲁伊-古昂(A. Leroi-Gaurhan)等曾对西班牙、法国、德国、摩拉维亚等地此时期出土的300枚用于佩戴的兽齿进行统计,其结果为,狐狸的犬齿占31%,雄鹿的犬齿占25%,反刍动物的门齿占16%,食肉动物的门齿占14%,马的门齿占6%,食肉动物的臼齿占2%,熊的犬齿占1.5%,狼的犬齿占1.5%,鬣狗的犬齿占0.7%,旱獭的门齿占0.7%。贾兰坡曾对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125枚穿孔兽牙作分类统计,其结果为:獾的上下犬齿占48%,狐的上下犬齿占23.2%,鹿的上下犬齿占13.6%,野狸的上下犬齿占7.2%,黄鼬的下犬齿占1.6%,狼的犬齿占1.6%,虎的下门齿占0.8%,小食肉类动物的犬齿占4%。以上两个统计数字表明,鹿的犬齿在整个穿孔兽牙中所占比例较高,而鹿类恰恰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狩猎的主要对象之一。

二、避邪、驱病防病的巫术用具

原始人“互渗律”的思维,表现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比如在北美印第安人看来,人能够在梦境或幻像中得到超自然力,生活中的成功是由于个人与超自然的接触。而且在一些部落中,认为通过进一步寻求幻像人能够时时更新自身与神灵的关系,因此无论他们见到一种动物、一种植物、一颗星星或一种超自然物,都把它作为个人的保护伞加以接受,并且需要时就能立即召唤它。所以这些佩戴在人身上的装饰品在当时除做狩猎巫术用具外,可能还有辟邪、驱病、防病等像护身符那样的功能。岑家梧依据民族志的资料对原始人颈部所戴的装饰物加以研究,认为这些装饰物具有保护性命的含义。在原始人看来,颈部连接头部和躯干,为性命的关键所在,所以喜欢在上面套以咒物。另外,一些信仰图腾的民族,如布须曼人往往把动物的牙齿、角或贝壳、龟壳等悬于颈间,澳洲土著人围袋鼠毛或将袋鼠的牙齿穿成V字形佩戴在胸上,这些都具有借助动物的神灵保佑人体康健之意。也有的民族把石珠作为陪葬或辟邪的物品,如台湾的卑南族在为死者举行的葬仪中,常由巫师把数颗珠子掷在地上,以驱逐恶灵。宋兆麟在对中国黎族人用各种野兽牙齿制成的成串项饰加以考察后,认为其含义为一是美观,二是具有辟邪的作用,并引《海南岛志·民俗》中“中部黎妇亦喜以绳系兽骨为颈饰,恒十人而八九。或云是骨为病时祭见所用之兽,可以辟邪”、“所杀牛骨之角或齿骨,必悬挂屋中,小者或系于病人颈下,永不取去”为证。现在佩戴项饰的黎族妇女和小孩已不多,仅占十分之三四,项饰的原料主要有猪牙、狗颌骨等。

三、诱鱼上钩的捕鱼具

在沿海地区,所谓用于佩戴的装饰品可能还曾是一种特殊的捕鱼工具,这可从民族志的材料中得到证实。澳洲沿海居民中流行一种卡拉卡拉绳圈捕鱼法,即将10个到20个半圆形的穿孔小贝壳用一根木棍穿起来,或者用绳子将三个大贝壳穿在一起,把这种捕具放到水面上摇晃发出声音,可将鲨鱼引诱到它的附近,再用很粗的绳圈将鲨鱼绑住。小鱼和海鸟都是鲨鱼的食物,成群的小鱼聚

集到一起时发出的声音或海鸟在觅食时发出的声音与卡拉卡拉这种声音很像,因此澳洲的居民利用这种器具发出声音来引诱鲨鱼靠近。

四、交换物品或礼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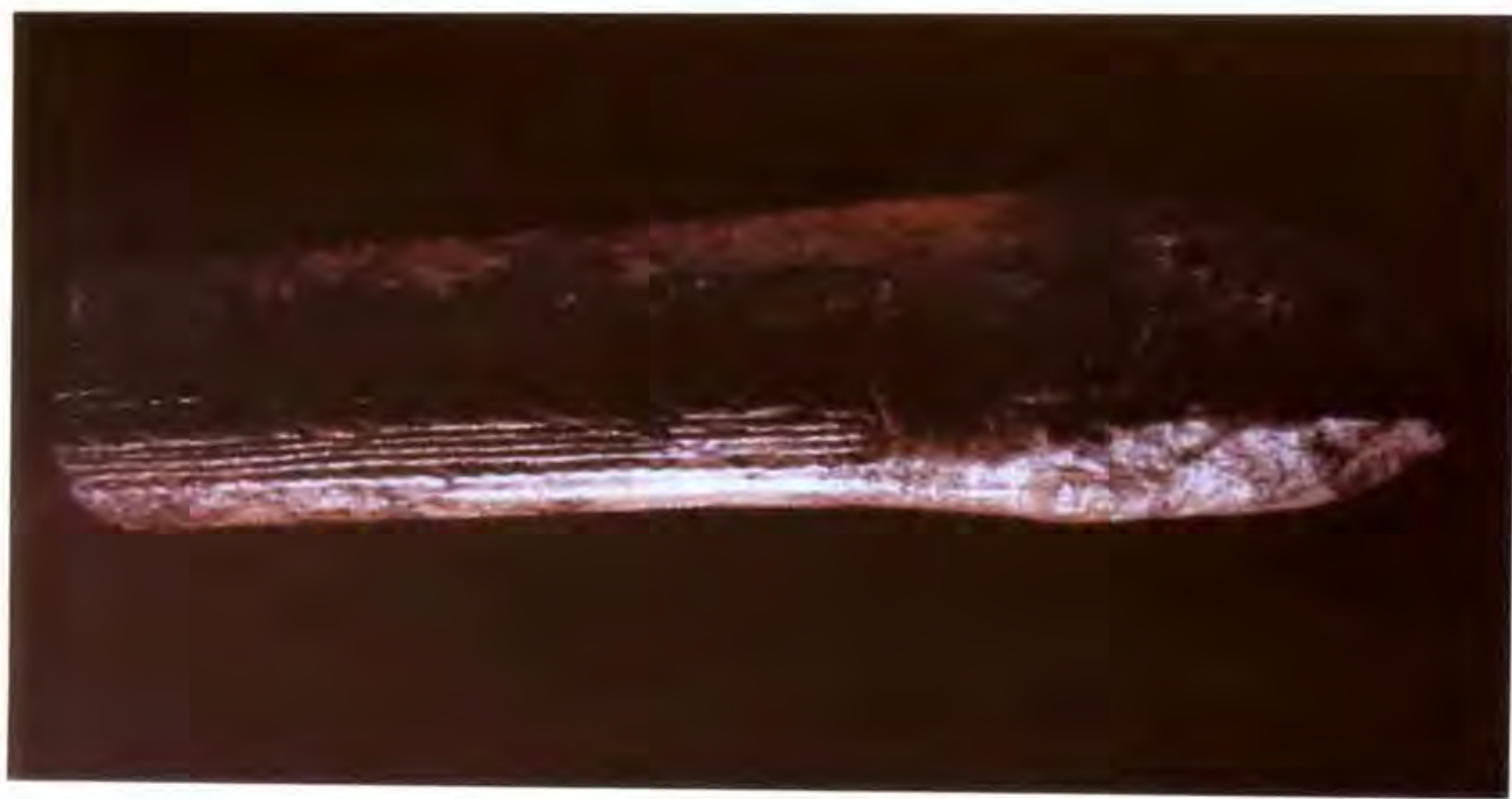
贝作为最原始的货币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曾流行过,追根溯源,这种货币形式是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贝类装饰品。因为这类装饰品具有小巧和便于携带的特点,即使是在古代贸易中,玛瑙珠、贝饰也常被作为贵重的财富在商人中间进行交换。日本学者秋道智弥在对所罗门群岛做民族调查时,岛上居民把用狗牙和贝壳碎片制作的头饰作为礼物赠与他,在密克罗尼西亚,当地的首领也送给他贝壳装饰物作为礼品。山顶洞出土的穿孔海蚶壳产于中国东南沿海,从东南沿海到山顶洞最直线的距离也有2000公里,显然这些海蚶壳不可能是山顶洞人直接从海边采来的,而可能是他们与海滨居民交换得到的。因此可以说,穿孔的装饰品,特别是穿孔的贝类在此时期还是一种交换物或礼品。

佩戴项链的山顶洞人



纹饰鹿角 1





纹饰鹿角 2

旧石器时代晚期

河北兴隆采集

这件器物是将鹿角磨制后再刻画而成的，图案由三组阴刻的线条组成，第一组由直线、斜线和连弧纹组成；第二组由互相平行的密集的曲线构成，呈“S”字形状；第三组由四组密集的曲线构成，形成对称性颇强的图案。刻纹以后，又染成红色。

五、计数用具

裴文中推测，山顶洞人的穿孔兽牙可能有表示狩猎某种动物数目的含义。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的狩猎活动和氏族成员中对食物的分配都需要一些简单的计数，从当时人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来看，人们可能已具备计数的能力了。山顶洞人的骨管装饰品表面刻有1道至3道不等的凹道，其记数的用意似乎更加明确，说明当时的人有可能是把这类装饰品作为一种计数用具。由于此阶段原始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还十分有限，他们必须借助具体事物才能计算或运算。当然他们计数的用具不止是这些装饰品，像石块、手指、脚趾、绳子等，凡是他们认为是方便的东西都可能用来计算。

六、装饰品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这类器具大多具有实用功能，其中大多数与巫术等精神活动有

关。比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常用一种包贝或珍珠蚌壳做装饰品，并在上面雕刻精美的花纹，其大如盘，可挂在胸部。据说它们具有巫术力量，求爱者佩戴它，可取悦姑娘，使恋爱获得成功。

正是因为这些装饰品与狩猎巫术、辟邪巫术、恋爱巫术等精神活动相关联，它们才是勇敢、智慧、财富和权威的象征，由此进而上升到具有审美的含义，成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品，并受到人们的珍爱。正如普列汉诺夫论证装饰品起源时所说的，野兽的皮、爪和牙齿“这些东西最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所以开始引起审美的感觉归入装饰品的范围”。

用贝壳、兽牙等物制作的装饰品，在许多原始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在举行仪式或祭祀时，人们常常要把身体涂上颜色，再挂上各种各样的装饰品。由此可见，早期用于佩戴的物品在作为装饰品时也是与宗教活动密不可分的。

第七章

新石器时代之初



所谓新石器时代，是指旧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叫法是相对旧石器时代而言的。考古学家把农业、畜牧业和制陶、纺织等生产的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的标志和基本特征。

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中国境内各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不平衡，在黄河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大致起源于距今1万多年以前，终结于约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

第一节 一万年前的陶器

一个修修补补的陶罐，一半是拼接的碎陶片，一半是石膏，残破不堪，勉强复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中居于一隅，满目疮痍，凄凄惨惨。然而就是这件陶罐，被学术

权威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定为一级品。也许好奇的读者会问：“考古发掘的陶罐成千上万，何以把这件破破烂烂的陶罐奉为国宝？”这还得从陶罐的出土地点——江西万年仙人洞说起。

仙人洞是一座原始人居住过的洞穴。1962年和1964年，考古学家先后三次对仙人洞进行了小规模发掘。洞内的文化堆积分上下两层，前面提到的陶罐出土于下层。仙人洞下层存在相当数量的打制石器，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等，打制手法简单，仅打出刃部即行使用，很少进行第二步加工修整，有的还保留砾石面，很显然这些打制石器保留了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特点。另有少量磨制石器，器形有石凿、锥形器、扁圆形穿孔石器、两端尖的梭状器等。磨制石器大多比较粗糙，有的只是利用砾石自然形状稍做加工，器形简单，看来当时磨制石器

在生产中尚未起主导作用。用骨、角制作的生产工具则较为丰富,有针、锥、刀、凿、镞、鱼叉、矛形器等,其中鱼叉带有两排倒刺,加工得很精细。仙人洞下文化层还出土了不少陶片,特征鲜明,全部为夹粗砂红陶,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陶色不纯,火候低,制陶技术相当原始。陶片饰绳纹,不仅外壁有绳纹,而且内壁也印绳纹,根据陶片判断,器形单一,都是直口或微侈口的圜底罐。文首所述的陶罐是其中惟一可以复原的圜底罐。

有关仙人洞下文化层的年代,发掘者采集1964年4月第二次发掘的兽骨标本,于1975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之进行了碳-14年代测定,测定结果为距今 8575 ± 235 年(前 6625 ± 235 年),如按碳-14半衰期 5730 ± 40 年计,则为距今 8825 ± 240 年(前 6875 ± 240 年)。

碳-14年代测定又称放射性碳素断代,是利用死亡后的生物体内碳-14不断衰变的原理进行断代的技术。简单地说,宇宙中的射线同地球上的大气发生作用,产生出中子,中子又与大气中的氮(氮-14)发生核

反应,产生出放射性同位素碳-14。碳-14与氧结合,形成 $^{14}\text{CO}_2$,混入大气二氧化碳中,通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成为养料。动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植物生存,所有的生物体内都含有碳-14。而碳-14又不断地衰变为非放射性的氮-14,其半衰期为 5730 ± 40 年。生物在死亡之前,身体中碳-14的成分与大气中碳-14的成分保持着平衡。一旦生物死亡,这些含碳物质即停止与大气交换,碳-14就只能按照衰变规律减少。原则上,只要能测出标本中碳-14减少的程度,也就可以推算出它死亡的年代,因此在考古工作中广泛应用碳-14来测定年代。

长期以来,考古学界的许多学者一直对仙人洞下文化层的年代表示怀疑甚至否定,觉得所测的年代偏早,坚持认为仙人洞下文化层只能在前5000年以前。这种怀疑和否定是有理由的。因为对仙人洞上文化层贝壳标本的碳-14测定的结果为距今 10870 ± 240 年(前 8920 ± 240 年)。考古地层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当若干地层叠压时,下层的年代一定早于上层的年代。换句话说就是晚期的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外景





陶罐

距今1万年前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
口径20厘米，高18厘米

地层一定叠压在早期的地层之上。而仙人洞遗址上，下文化层的碳-14测定年代出现了颠倒，居然上层的年代早于下层，违背了考古地层学常理，因此学者们对所测仙人洞年代不信任是很自然的。

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利贝(W. F. Libby)教授首先把碳-14测定年代方法应用于考古与地质断代，并获得成功。中国于1965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成第一所碳-14实验室。1964年4月在仙人洞进行第二次发掘时，虽然有了采集标本以待将来测定年代的想法，但缺乏采集标本的经验，标本很可能受到了污染，另外标本放置了十年之久才测定年代，再加上测定技术还不成熟，年代数据出现偏差、错误是毫不奇怪的。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安志敏先生为代表的意见认为仙人洞下文化层年代的碳-14数据偏早，主要原因可能是仙

人洞是石灰岩的山洞附近流水中含有大量由石灰岩溶化而来的几乎不含放射性碳素的古老碳酸盐，标本中的碳酸盐主要来源就是这种古老的碳酸盐，导致碳-14年代测定偏高。他们认为仙人洞下层的年代大概在前5000年左右。

石灰岩地区碳-14标本的年代测定是否可靠，是考古学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年代测定专家们对石灰岩地区的碳-14年代测定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和研究，在采集和测定大量标本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石灰岩地区的陆生动、植物标本的碳-14年代不受石灰岩特殊环境的影响。水下生长的动、植物样品的碳-14年代显然偏早1000年至2000年。因此仙人洞遗址兽骨标本的碳-14年代数据距今 8825 ± 240 年是可靠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意这个观点，俞伟超馆长通过制陶术的研究，认为仙人洞下文化层的年代应在距今1万年左右。1990年9月“中国通史陈列”修改版正式展出时，在仙人洞陶罐的说明牌上，明确地写明距今1万年左右。

在20世纪90年代，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发现不少，如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舞阳贾湖，陕西华县老官台、西乡李家村、宝鸡北首岭（下层），甘肃秦安大地湾（下层），浙江余姚河姆渡，湖南澧县彭头山等等，这些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所反映的文化丰富多彩，显然这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远远脱离了起源阶段。

中国新石器时代到底起源于何时，成为考古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寻找新石器时代的起源，最关键的是要发掘出最早的陶器，因为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并且陶器也是考古发掘中肉眼容易识

别的史前遗留物。在发掘史前遗址时，只出土石器而没有陶器，我们不能说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果出土了陶片，哪怕只是一块陶片，我们就可以肯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果仙人洞下文化层的陶罐年代果真在距今1万年前，无疑就给寻找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起源提供了线索。

1993年和1995年，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江西万年仙人洞进行了新的发掘。1995年的发掘把仙人洞的整个地层分为4层，其中2、3、4层为原始文化层，2、3层之间是洞顶塌落的石块层，这样很明显地从地层成因上区分出两个大时期的不同文化堆积，即第2层为上层文化堆积，第3、4层为下层文化堆积。上下文化层出土遗物差别明显，上文化层出土有夹粗砂陶片、磨制石器；下文化层不见陶片，只出土打制石器，并且多为用石英岩或石英打制成的小石器，还有些类似细石器的燧石片。中美联合考古队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还邀请一些古动物学家、古植物学家、地质学家等在工地实验室从事多学科综合研究，采集了一批用于植硅石、孢粉分析和碳-14年代测定的样品。一系列的碳-14测量数据表明了可靠的年代：仙人洞上文化层距今0.9万年至1.4万年左右；下文化层距今1.5万年至2万年左右。下文化层属旧石器时代末期，上文化层属新石器时代初期，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最清晰的地层关系。至此，有关仙人洞遗址的年代问题，有了定论。

现在我们回头检讨20世纪60年代发掘仙人洞的考古材料，会悟出一些道理。20世纪90年代的发掘以洞顶塌落的石块层为基准，可以明显地把石块层以上的文化堆积作

为上文化层（即第2层），把石块层以下的堆积作为下文化层（即3、4层）。据发掘简报可知，20世纪60年代的发掘未见洞顶塌落的石块层，也就是说没有发掘到石块层以下。另外，20世纪90年代的发掘只在上文化层发现陶片和磨制石器共存，而下文化层不见陶片，只有打制石器。20世纪60年代的发掘则是上、下文化层都出土有陶片，并且上、下文化层都是既有打制石器，也有磨制石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上、下层实际上都是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上文化层，整个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的第2层。1975年对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下文化层标本的年代测定虽然偏晚，但对上文化层标本的年代测定却是基本正确的。当时由于所测的上下层年代颠倒，因此没人敢认定所测上层的年代是正确的。

20世纪90年代的重新发掘，使考古界

陶罐

距今1万年前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

高29厘米，口径31.5厘米



公认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片年代距今约1万年。

在中国大陆,出土1万年以前的陶片,仙人洞遗址并不是孤例。在考古学家锲而不舍的寻找下,又有几处出土陶片距今约1万年的遗址被发现。

1993年和1995年,考古学家两次发掘了1万年前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玉蟾岩位于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当地俗称蛤蟆洞,洞口距地面5米高,洞口朝东南,洞厅宽敞,阳光充足,遗址的文化堆积物主要分布在洞厅内。文化堆积有石、骨、牙、角、蚌制成的工具以及20多种哺乳动物的化石,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农作物的遗迹和陶片。1993年发现3块较大的陶片,1995年又发现一堆陶片。陶片呈黑褐色,质地疏松,胎厚约2厘米,夹粗砂,火候很低。整理拼接陶片时,复原出一件陶罐,1999年国家文物局举办“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1949-1999)”特展时,特意将这件距今1万年的陶罐调到北京展出,其用意就是告诉海内外的观众,中国陶器起源于1万年以前。

1973年,考古学家对广西桂林独山甌皮岩洞穴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了一些火候很低、烧成温度在680℃左右的陶片。对甌皮岩遗址所测的一些年代数据出入较大,早在距今1万年左右,晚的在距今6000年左右,因此考古学界对甌皮岩遗址的年代认识一直是含糊的,只有少数学者认为在1万年以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在1989年征调了四片甌皮岩遗址出土的陶片,展出时明确标明为距今1万年。现在根据仙人洞和玉蟾岩的资料看,当初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约1万年前出现在中国的陶器呢?因为陶器在史前考古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用化学

方法改变天然物性质的开端。陶器的出现与农业、畜牧业、纺织等生产的出现一样,标志着人类已从攫取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开始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如果在一个史前遗址中出土了陶片,我们就可以据此确定这个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遗址。陶器是区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西亚的陶器出现在距今1万年以前,是国际考古学界公认的,长期以来考古学界一直认为西亚是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考古学家于1964年调查并于1965年发掘了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叙利亚的穆赖拜特遗址(Tell Mureybet),该遗址有17个文化层,可分为三个时期,最引起学术界注目的是在穆赖拜特第三期(10层至17层)出土了5件低温烧制的陶器,其中4件属于穆赖拜特第三期的最初阶段,据碳-14断代,年代约在前第八千年初。这些陶器火候很低,陶胎没有完全烧透,气孔尚存,十分原始,但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世界考古学界公认的年代最早的陶器。

中国考古工作者最早发掘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是在1962年至1964年,并不晚于穆赖拜特遗址的发掘,但中国考古学家对中国境内1万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陶器的最终认定却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家谨慎探索、认真求证的学风。

中国发现了1万年前的陶器,表明中国大陆的陶器起源是与西亚同时的,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新石器文化的地区之一。

第二节 站在洞口望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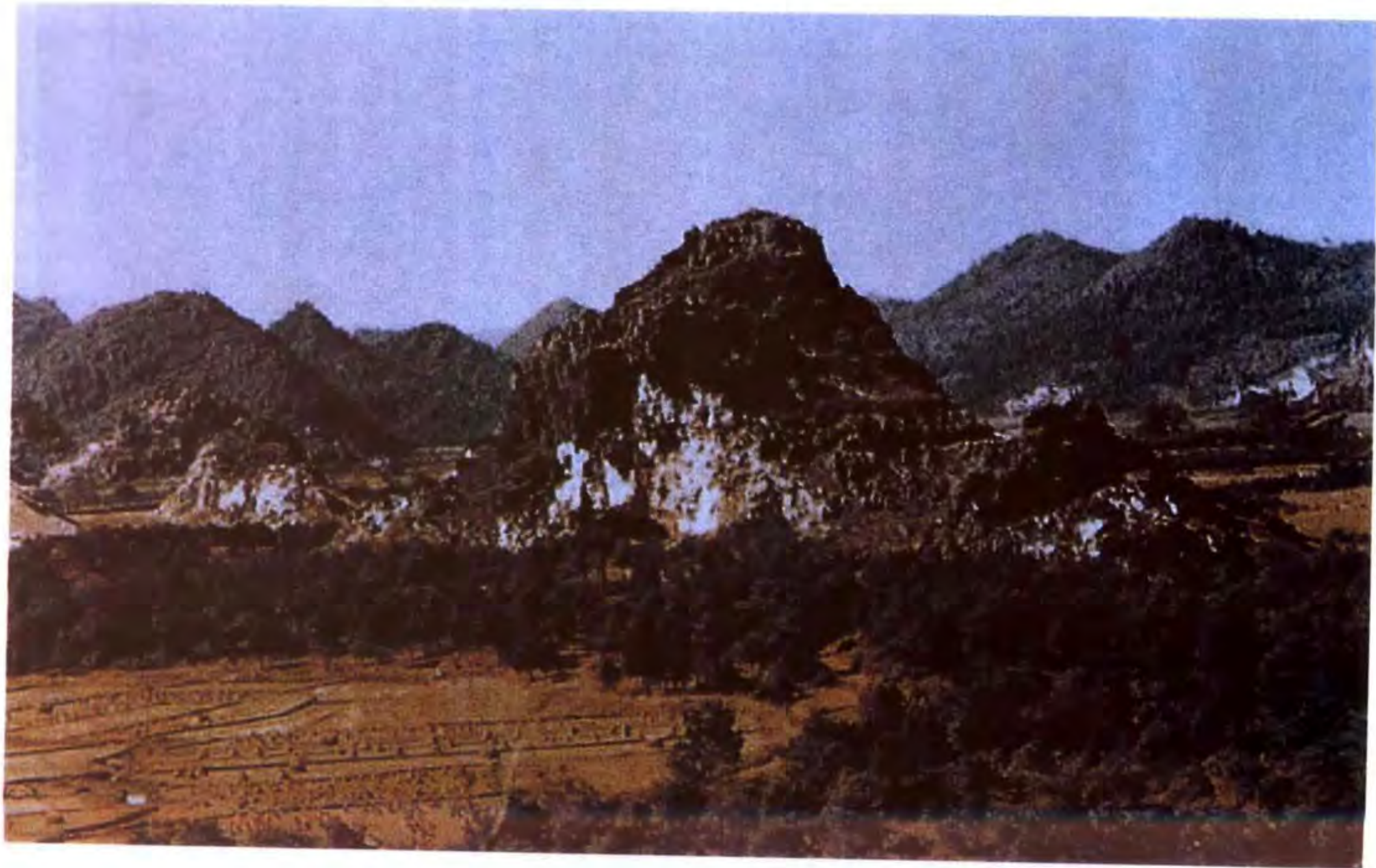
在中国发现的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

址大多是洞穴遗址。这些洞穴遗址的洞口大多离地面不高，如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洞口仅高出现代地面5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这些洞穴洞口下面的地势平坦开阔，1万年前的原始人可以方便地走出洞口，到洞口前植物茂盛的平川上采集果腹的食物。蕴藏有丰富植物食品资源的平原沃野，对居住在洞内的原始人充满着诱惑，他们吃着采集来的食物，站在洞口望平原，多么想离开山洞，定居平原！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不是什么幻想，因为他们已在洞口外的开阔沃野上采集了上百年乃至上千年，对沃野上的可食性植物有了相当多的了解，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对某些可食性植物进行有意识的培育，现代的考古学家把他们的这种活动叫做植物的驯化，或谓农业的起源。既然他们已经从采集植物过渡到了培育植物，下一步他们定居在培育植物的土地上就是很自然的事。

1995年在发掘江西万年仙人洞的同时，考古学家还发掘了距仙人洞仅800米的吊桶环遗址。吊桶环是一处岩棚遗址，可分上下两大文化层，上层出土有大量的兽骨、局部磨制的石器、骨器、穿孔蚌器和夹粗砂陶片等，下层出土遗物与仙人洞下层一致。从碳-14测量数据来看，吊桶环与仙人洞两处遗址的上下层年代一致，即上层距今约0.9万年至1.4万年，下层距今约1.5万年至2万年。从吊桶环遗址所处位置、地形地貌和出土遗物分析，其文化内涵与仙人洞遗址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吊桶环岩棚遗址应是栖息于仙人洞的原始居民劳作后的临时宿营地。对吊桶环遗址进行孢粉采样分析表明，上层禾本科植物陡然增加，花粉粒度较大，接近于水稻花粉。植硅石分析表明，上层有类似水稻的扇形体。

对吊桶环遗址的孢粉分析和植硅石分析，只是表示1万年前有出现水稻的可能性，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外景



证据尚不充分。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考古学家找到了距今1万年前出现水稻的确凿证据。

1995年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玉蟾岩洞穴遗址时,在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找到了水稻谷壳。出土时,稻壳呈灰黄色,只有一枚形态完整,另外筛选出一枚只剩四分之一的稻壳残片。其实早在1993年就在玉蟾岩遗址发掘出了稻壳,并且发掘的三个层位均有稻属的硅质体,但一直没有作出结论。1995年发现的稻壳在文化层的层位上要晚于1993年出土稻壳的层位。对先后两次发掘出土的稻壳一起做电镜分析,鉴定结果是:1993年出土的稻谷为普通野生稻,但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的痕迹;1995年出土的稻谷为栽培稻,但兼备野、粳、籼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类型。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的距今约7000年前的水稻曾被认为是最早的栽培水稻。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出的距今约8000年前的水稻又被认为是最早的栽培水稻。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新的科技手段的采用,中国考古学家又一次改写了栽培稻起源的记录,把栽培稻起源的历史上溯到了1万年前。

现代农业专家实验表明,由野生水稻到栽培水稻的驯化过程仅需一二百年即可完成,因此寻找考古证据是异常困难的。在玉蟾岩遗址能够找到野生稻驯化成栽培稻的证据确实非常幸运。

过去我们只知道西亚地区在1万年前栽培了大麦和小麦,经过中国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在1万年前也栽培了水稻,中国和西亚地区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谷物起源地之一。

约1万年前,中国南方地区的原始居民,虽已在平原地带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但仍居住在山洞之中,此时北方地区的一些原始居民已经走出山洞,定居于平原。

1986年在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一处史前遗址,并在长8米、宽2米的小范围内进行了试掘,出土了不少木炭、兽禽骨及骨、角、石器,另有少量陶片。对朽木和木炭所作的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 9875 ± 160 年和距今 9690 ± 95 年。鉴于遗址年代在1万年前,是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新石器时代之初的遗址,所以1987年考古学家又对南庄头遗址进行了一次试掘,以期获得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测年标本。

南庄头遗址地处太行山东麓前沿,华北冲积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坐落于萍河和鸡爪河之间,海拔21.4米。1987年的发掘共出土15块陶片,4件石、骨、角器,以及大量的兽禽骨,并获取了大量的植物孢粉标本。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连续对南庄头遗址的诸多标本进行了测定,结果所测年代都在距今1万年左右,具体说在距今9700年至10500年之间。因此可以肯定南庄头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之初的平原遗址。

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陶片胎壁厚约1厘米,火候低,质地疏松,与南方新石器时代之初洞穴遗址出土的陶片差不多。南庄头遗址已有一些农业出现的迹象。从孢粉分析看,禾本科花粉较多,但目前尚未有驯化谷物出现的鉴定报告。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南庄头遗址出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距今七八千年的分布在冀、豫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存在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磁山—裴李岗文化的粟作经济已相当发达,石磨盘和石磨棒便是配套使用的加工粟的农业生产工具。南庄头遗址的石磨盘和石磨棒也

应是加工谷物的生产工具，并有可能是磁山—裴李岗文化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祖型。

南庄头遗址的先民们能够走出山洞，定居于太行山前的平原上，与当时的气候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经历的是严酷的晚更新世冰期，而南庄头的先民们生活于全新世初期，孢粉分析表明，当时的气候逐渐好转，特别是在第5至第6文化堆积层，亦即南庄头遗址的中期，针叶树与阔叶树乔木花粉形成小的峰值，气候环境相对更好一些。从耐旱的半灌木麻黄、菊科、蒿属、禾本科花粉同时出现较多看，距今1万年左右的南庄头一带气候环境总体上较凉并且偏干燥，这有利于原始人摆脱阴冷潮湿的洞穴，走出山洞，到山前的平原地区活动、生产、定居。

其实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一些原始人就利用间冰期从山洞走到平原上进行短暂的活动。1982年至1983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南郊松花江的二级阶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该遗址有用动物骨骼垒成的营地遗迹，是原始人狩猎、采集时的临时栖身之所。1996年在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工地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有石、骨制品，并发现用火遗迹和哺乳动物化石。今天的王府井一带在当时属于永定河冲积扇构成的前倾斜平原，王府井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是原始人营建的一

处临时活动营地。过去，一提到北京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著名的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人。现在我们知道，与山顶洞人同时代，还有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原始人走出山洞，远离大山，在缺乏庇护的平原上勇敢地闯荡。

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这一特定的时期，原始人已不满足于蜗居山洞之中。虽然栖身山洞可以躲避野兽的袭击，可以遮风避雨，但也限制了原始人的活动范围和扩大生产的能力。走出山洞，生活于平原，已成为这时期原始人的渴望和冲动。我们的祖先曾在山洞中居住了上百万年，上百万年来，他们在山洞周围狩猎、采集、制造生产工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到了距今1万年左右，他们的生产经验和知识已经达到了摆脱纯粹的攫取经济，开始从事生产经济的程度，而平原则为从事生产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当我们的祖先最终走出山洞，走出大山，定居于平原，建造房屋、培育谷物、饲养家畜、烧陶纺织时，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伟大的壮举。万余年后的考古学家这样评价他们：从此人类由单纯地依赖自然转为有意识地改造自然，人类从攫取经济发展到了生产经济，开始了新石器时代革命。



第八章

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

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大约起源于距今1万年前，终结于前21世纪夏朝的建立，其间有大约6000余年漫长的发展过程。

考古学家一般把从新石器文化出现至距今约7000年这一阶段史前人类创造的文化归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南方地区1万年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湖南道县玉蟾岩等洞穴遗址和距今8000多年的以湖南澧县彭头山为代表的彭头山文化等，北方地区1万年前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和距今7000多年的以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为代表的大地湾一期文化、以陕西宝鸡北首岭下层为代表的北首岭下层文化、以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为代表的磁山文化、以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等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之初”和“早期农业的两大系统”这两章中，我们已经或将要着重叙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这里不

多赘言。本章主要叙述距今7000年以后的中国境内新石器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 中期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是指从距今7000年前后至距今约5000年前中国境内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于各地文化的发展不平衡，有的文化延续的时间稍长些，个别的可延续到距今4500年前后。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已经十分发达，遗址数不胜数，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中国大地上，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也非常丰富。

一、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在中国境内最早被确认的新

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家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重点普查和发掘，五十多年来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已有1000多处，基本上明确了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仰韶文化的分布西迄甘青交界处，东至河北，北抵河套地区，南达湖北西北部，其中心区域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以及山西南部、河北南部。

由于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大，考古学家把仰韶文化分为若干个类型，如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后岗类型、大司空类型等。根据对各类型所作的大量碳-14年代数据，可知仰韶文化开始于距今7000年左右，结束于距今5000年左右，大概经历了2000多

年的发展，然后过渡为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

仰韶文化的典型陶器主要有小口尖底瓶、直口圜底钵、卷沿圜底盆、深腹瓮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存在大量红陶黑彩的彩陶，彩绘纹样主要为鱼纹、鹿纹、鸟纹、蛙纹、人面鱼纹、变体鱼纹、弧线三角纹、圆点纹等。另外在一些陶器和许多陶片上还发现了不下20种的刻画符号，引起了考古学家的种种猜测，其意至今不详。

仰韶文化居民从事粟作农业，饲养猪、狗、鸡等家畜家禽。渔猎经济较为发达，出土了大量的渔猎工具，如骨镞、骨鱼镖、骨鱼钩等，有的骨鱼钩还带倒刺，形制与现在的鱼钩相同。

仰韶文化的房屋基址发现很多，已发掘



尖底彩陶罐
仰韶文化
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高15.6厘米



彩陶盘

仰韶文化

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

高22.6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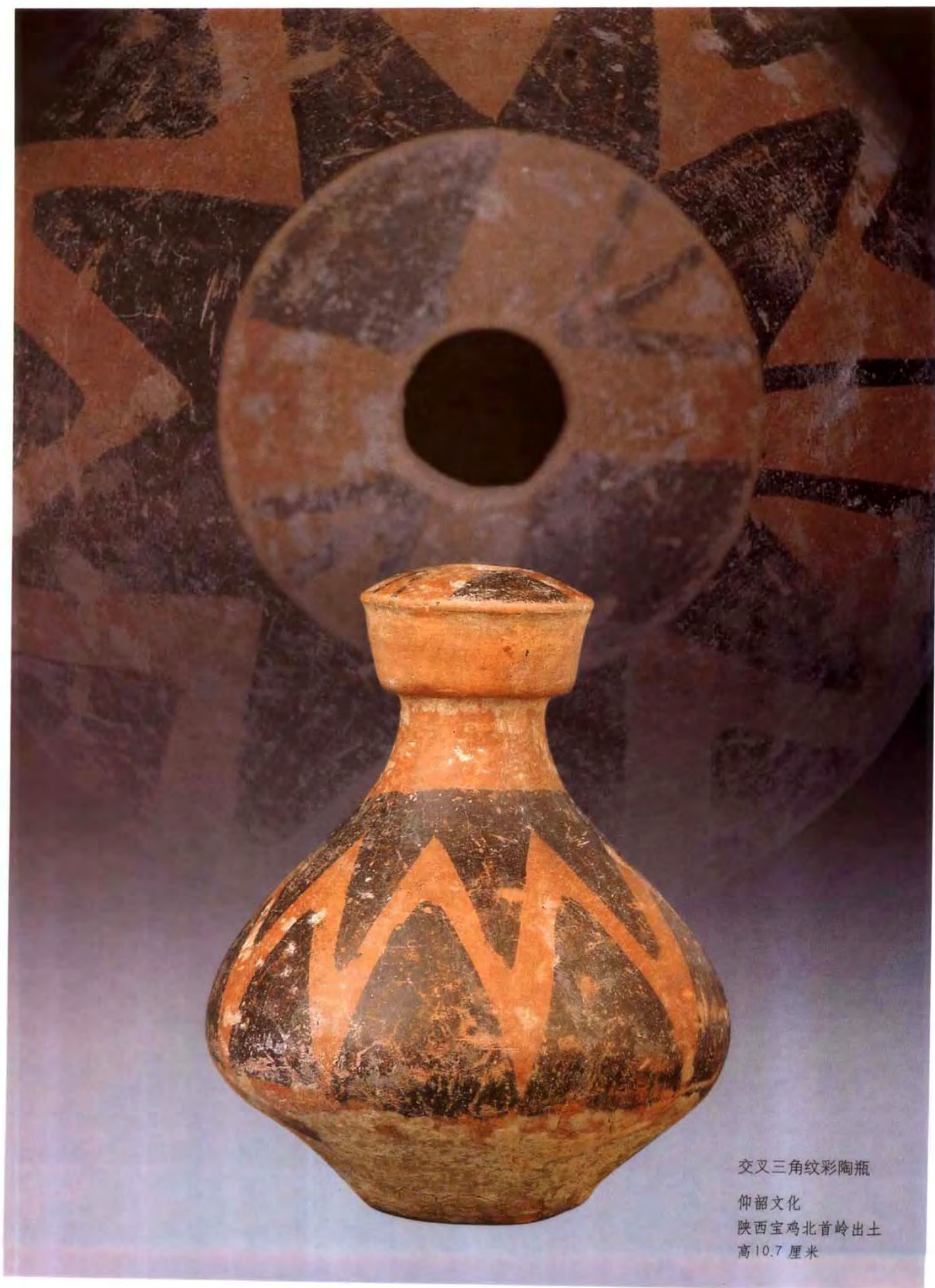
的不下400座，其形制有圆形半地穴式、方形半地穴式、圆形地面式、方形地面式、方形地面连间式等。

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也发现多处，其中以陕西临潼姜寨和西安半坡的村落布局最清楚。

姜寨遗址的面积约5.5万平方米，发掘了1.6万平方米，揭露出一处较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村落的中心为一大广场，广场周围有五组建筑群环绕，每组建筑群均以一个大房屋为主体建筑，大型房屋附近分布着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整个村落共有上百座房屋，所有房屋的门都朝向中心

广场，体现了氏族部落的向心力。有些房屋附近分布有窖穴和幼儿瓮棺葬。村落周围有宽、深各2米的护村壕沟，东部留有通道。壕沟以外的东北和东南部有三片墓地，共有170多座成人墓葬。烧造陶器的窑址群也在村外，位于西南方向。推测在村外烧窑是出于安全考虑，以免村落因烧窑而失火。

半坡史前村落的面积约3万平方米。村落的中心为一座方形大型房屋，在这所大型房屋的北面发掘出了45座中、小型房址，门大体都朝南，形成面向大型房屋的半月形。村落内有200多个窖穴和70多个幼儿瓮棺葬，并有两处营造简陋的栏圈，当为牲畜夜



交叉三角纹彩陶瓶

仰韶文化
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高10.7厘米

宿场所。村落外围挖有深、宽各5米至6米的壕沟，壕沟的北面为公共墓地，共有170多座成人墓葬，壕沟的东面是烧窑区。

仰韶文化的墓葬有两大类，一类是儿童葬，一类是成人葬。

仰韶文化的居民对夭折的儿童实行瓮棺葬，把死去的儿童放进瓮棺内。瓮棺都埋在村落内的房屋附近，用作瓮棺之盖的盆、钵等均在底部正中有意凿出一个小孔，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供夭折的儿童灵魂出入所用。

成人死后埋在公共墓地，墓地在村落的外面，墓坑排列整齐，纵横成行。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遗址的墓地多是单人竖穴土坑墓，葬式以仰身直肢最多。

有些遗址盛行集体合葬，例如华阴横阵遗址的1号大墓坑长10.4米、宽2.8米，内套5个方形小坑，小坑内放置人骨架，少的放4具，最多的放12具，总共放置了44具人骨架。横阵2号大墓坑内套7个小坑，共放置了42具人骨架，人骨分二至三层叠压。这些集体合葬的人骨架多为二次葬。在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的墓葬中还存在成人瓮棺葬之俗，洛阳王湾一期发现了43座成人瓮棺葬。1980年临汝阎村出土了一个成年瓮棺葬，葬具为一个大陶缸。陶缸外壁绘有鸛鱼石斧图。

二、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因1959年发掘山东泰安大

白陶鬶

大汶口文化
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高14.8厘米



汶口遗址而得名。之后经过四十多年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基本上明确了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该文化北抵渤海南岸，东达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南至江苏、安徽淮北一带，另外在河南东部地区也有零星发现。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点非常鲜明。陶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和少量的硬质白陶。典型器物有鼎、觚形器、镂空圈足豆、双鼻壶、背壶、鬻、高柄杯等，圈足器和三足器发达。白陶是用一种新的制陶原料——坭子土经1200℃窑温烧制而成的，质地细腻，胎薄，质硬，色泽明丽。薄胎磨光黑陶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它为以后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柄杯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大汶口文化的陶塑艺术品较多，兽形提梁壶、猪鬻、狗鬻等仿动物造型的陶制容器反映出了陶塑艺术的纯熟。山东莒县陵阳河、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了一些带刻画符号的大口尊，可能是祭祀用品。

大汶口文化的原始居民主要从事粟作农业经济，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了水稻。农具有石斧、石铲、鹿角锄及加工谷物的石杵和石磨棒等。家畜饲养较为发达，饲养有猪、狗、牛、鸡等，其中以养猪最为突出，在江苏邳县刘林遗址的一条沟中堆放了26个猪牙床，在文化层中出土的猪牙床多达170多个。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盛行用猪殉葬的习俗，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的一座墓中随葬的猪下颌骨多达32个，说明当时饲养猪的数量已相当多。

渔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遗址中有大量的獐、斑鹿、麋等动物的骨骸。大汶口文化的渔猎工具不但数量多，而且形制也较先进，出土了双翼起脊带长铤的骨镞、牙质鱼钩、石匕首、骨匕首以及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



象牙梳

大汶口文化
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长16.2厘米

大汶口文化制骨、制牙工艺水平较高。早期流行精致的小型骨雕工艺品，如雕花骨珠，骨珠上皆钻孔。到中、晚期，剔地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已成熟，泰安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透雕十七孔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雕花骨匕及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制牙工艺的最高水平。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遗址较多，已清理出的墓葬达2000多座，多为土坑墓，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早期多无葬具，中、晚期结构复杂，有的有呈“井”字形的木椁。在山东兖州王因墓地存在多人一次合葬墓和多人二次合葬墓，多为同性合葬，少的葬2人，多的葬20人。在中期的山东诸城呈子墓地，既有同性合葬墓，也有男女合葬墓，中、晚期

锥形玉饰

大汶口文化

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长3.3厘米—9.5厘米



出现了明显的夫妻合葬墓。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的随葬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差别不大。到中、晚期，在墓的规模和随葬品方面显示出贫富差别，有的墓狭小简陋，随葬品很少，甚至空无一物；而有的墓却十分宽大，如大汶口墓地10号墓，有“井”字形木椁，死者头颈部佩戴三串玉石装饰品，还另佩玉臂环、玉指环，随葬有玉铲、象牙雕筒、象牙梳、骨雕筒及90多件精美的彩陶、白陶、黑陶。大墓和小墓已形成强烈的贫富对照。

大汶口文化居民盛行佩戴饰物，如男女均佩戴由成对猪獠牙制成的束发器；在兖州王因墓地，有的墓主人双臂佩戴着十余对陶镯；大汶口墓地130多座墓中，半数以上的墓主人随葬饰物，饰物有臂环、指环、成串的管珠项饰和玉笄、骨笄、象牙梳等头饰。大汶口文化居民还有一种特殊的佩戴物——龟

甲，有的背、腹甲成对，有的穿孔，有的内置石子或骨针，这实际上是佩在腰上的甲囊，具有灵龟崇拜的宗教意义。在一些墓主人的手骨旁，还发现有獠牙和獠牙勾形器，当时手持獠牙和獠牙勾形器也是一种具有宗教含义的习俗。根据对墓葬人骨鉴定发现，大汶口文化居民流行头部枕骨人工变形和在青春期拔除上侧门齿的奇特习俗。《淮南子·地形篇》记载：“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南至东南方，……（有）凿齿民。”大汶口文化居民拔除上侧门齿的习俗印证了远古确有凿齿之民，但传说中的凿齿民是不是就是指大汶口文化居民尚不得而知。另外，在兖州王因、邳县大墩子墓地中，还发现有些死者齿弓严重变形，并且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可知变形是由于死者生前长期口含小球所致，说明当时还存在一种口含石球或陶

球的习俗。

根据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可知大汶口文化始于前4300年前,经过近2000年的发展,约在前2400年前后过渡为山东龙山文化。

三、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有前后直接继承关系的两个文化。大溪文化的年代约在前4400年至前3300年,之后发展为屈家岭文化,约在前26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又过渡为青龙泉三期文化,即湖北龙山文化。

(一) 大溪文化

大溪文化因发掘四川巫山大溪遗址而得名。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北达汉水中游沿岸,南抵洞庭湖北岸,其中心区域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均为手制,陶胎多用稻壳作麇和料,陶器表面多素面磨光,纹饰以戳印纹最具特色,成组地饰于陶器圈足部位,主要器形有筒形瓶、圈足盘、曲腹杯、小口直领罐等等。

大溪文化居民从事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在许多遗址中都出土了稻壳,经鉴定为粳稻。大溪文化居民饲养的家畜有猪和狗。

大溪文化的房屋基址有圆形半地穴和圆形、方形、长方形地面建筑几种。室内有柱洞,围筑灶坑和火塘,居住面下部用红烧土块铺成厚实的垫层,表面敷涂细泥并经火烧烤。房子的四周墙壁一般是在立柱之间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抹泥,成为编竹夹泥墙。有的房屋还有撑檐柱洞或专门的檐廊,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渣地面,形成原始的散水。

大溪文化的墓葬遗址发现多处,仅巫山大溪墓地就有200多座墓葬。绝大多数为竖

穴单人葬,死者头朝南,葬式为仰身直肢或屈肢葬,屈肢葬死者的下肢弯曲程度很大,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所罕见,特点十分鲜明。这些下肢弯曲程度很大的屈肢葬,是将死者捆绑后埋葬的。大溪文化还存在一种用鱼随葬的习俗,有的把鱼放在死者身上,有的把鱼放在死者口边,还有的把两条大鱼分别垫压在死者两臂下,这种葬俗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是罕见的。

(二) 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因发掘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达豫西南,南抵洞庭湖



黑陶高柄杯

大汶口文化
山东安邱县出土
高19.5厘米

北岸，其中心区域在汉江平原。屈家岭文化是继承大溪文化发展而来的，其分布范围也与大溪文化差不多，但向北稍有扩展。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多为黑陶或灰陶，圈足器和凹底器较发达，多饰弦纹和镂孔，主要器形有鸭嘴形足小鼎、双腹圈足碗、圈足杯、圈足壶、双腹豆等。晕染彩陶是屈家岭文化独具特色的彩陶。

屈家岭文化居民种植的水稻，经鉴定属于粳稻，并且是颗粒较大的粳稻品种，与近代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水稻品种相近。

屈家岭文化房屋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以隔墙分间的大房子，多为横列双间式房子，有的两间分别向外开门，有的是里外间共走一个门的套间房子。这反映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屈家岭文化存在口径达86厘米的大陶锅，这显然是适应人口较多的大家庭所需而制作的。

屈家岭文化的墓葬随葬品数量不等，大

多数墓的随葬品贫乏，少数墓的随葬品丰富，出现贫富分化。

四、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指长江以南的苏南、浙江、上海等地，其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主要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

（一）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因发掘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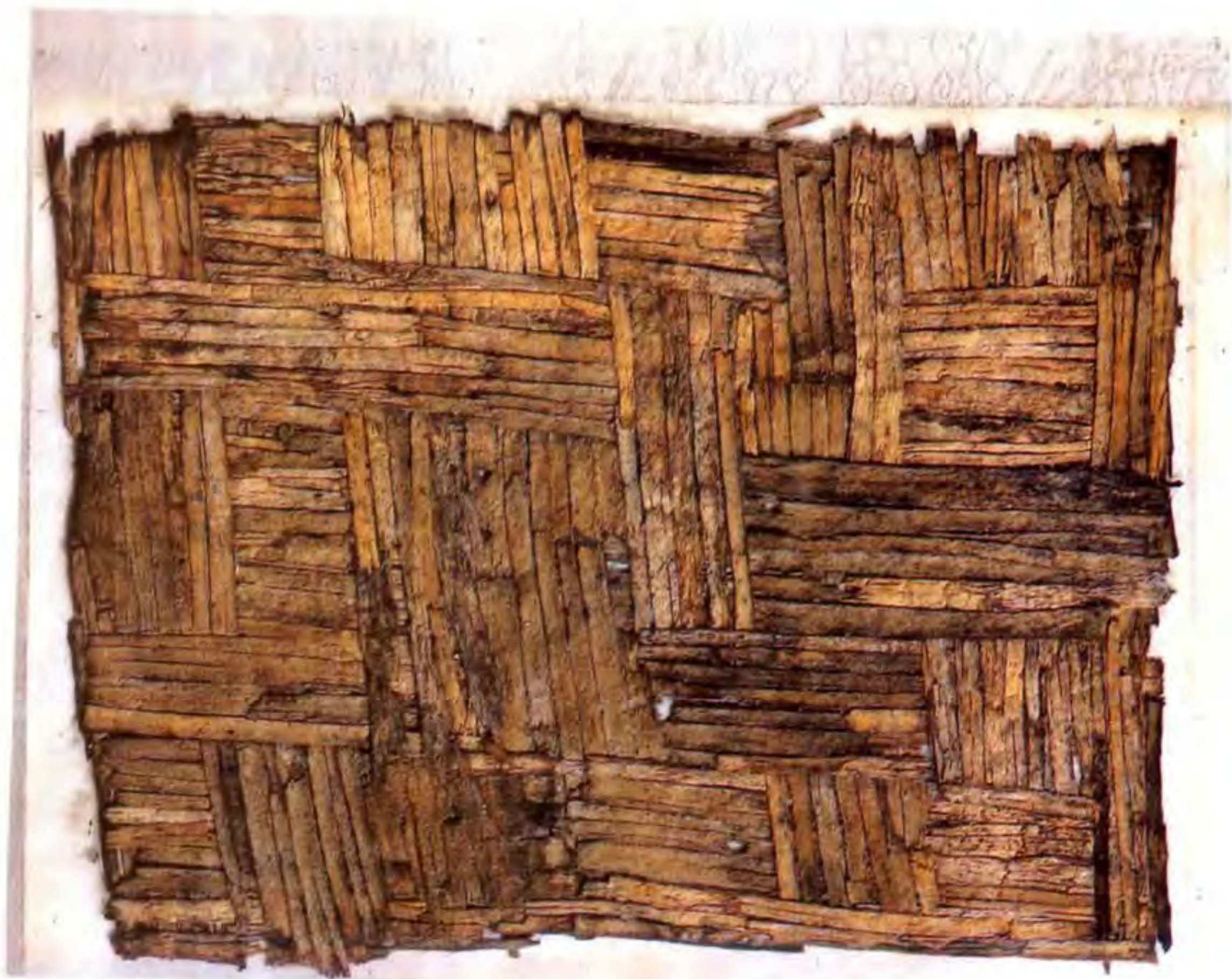
河姆渡遗址共有四个文化层，我们所说的河姆渡文化是指第三、四层遗存，即早期遗存，其年代约在前5000年至前4000年。

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纹饰多绳纹，刻画的几何形图案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釜、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大圈足豆、支座等等。

苇编

河姆渡文化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长22厘米，宽16厘米





鸟形象牙圆雕

河姆渡文化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

长15.8厘米

河姆渡文化稻作经济发达。木作水平较高，出土有多种形制的石斧、石锛、石凿等木工工具和大量带榫卯结构的木建筑构件。河姆渡文化的房屋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式是先打桩木作为基础，然后其上架龙骨承托楼板，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上边再立柱，架梁、盖顶。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有一座干栏式长屋，相互平行地排列4行桩木，长约23米，进深约7米，总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面向东北的一边还设有宽约1.3米的前廊过道，在长屋遗迹的范围内，散落有芦苇残片、陶片和人们食用后丢弃的植物果实皮壳、动物碎骨等。从远古至近代，干栏式建筑一直是长江以南地区一种重要的建筑形式，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文化的艺术品较为发达，尤以雕刻和雕塑艺术品最令人瞩目。圆雕木鱼、双头连体鸟纹骨匕、编织纹骨匕、陶塑鱼、陶

塑猪、陶塑人头像等工艺品丰富多彩。引人注目的是河姆渡文化已出现象牙雕刻工艺，鸟形象牙圆雕、双鸟朝阳象牙雕刻等象牙工艺品制作精美，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牙雕工艺品。另外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也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漆器。

（二）马家浜文化

马家浜文化因发掘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而得名。该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平原，南至钱塘江北岸，西北抵常州一带。马家浜文化的年代在前5000年至前4000年之间，之后发展为崧泽文化。

马家浜遗址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制红陶为主，陶器外表大多抹红色陶衣，纹饰有弦纹、堆纹、小镂孔等。典型陶器有腰沿釜、牛鼻形器耳的罐、喇叭形圈足豆、圆锥足鼎等。

马家浜文化居民从事稻作农业生产，饲养猪、狗和水牛。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下层发现了3块6000多年前的残布片，经鉴定，

黑陶壶

崧泽文化

上海青浦崧泽出土

高19.5厘米



原料为野生葛。3块布片均为纬线提花的罗纹织物，并有山形和菱形花纹，织造工艺较为进步。

马家浜文化盛行俯身葬，存在一种特殊的葬俗，用陶器覆盖死者的头部，或者把死者的头骨放在陶器内。

（三）崧泽文化

崧泽文化是由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的，因发掘上海青浦崧泽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大体与马家浜文化的分布范围一致。

崧泽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居多，也有一些泥质红陶和泥质黑皮陶，陶质细腻，火候较高。主要纹饰有堆纹、弦纹、划纹、镂孔、绳纹、彩绘等。

在崧泽遗址中层发现90多座墓葬，平地覆土掩埋死者，随葬品多为鼎、豆、壶、罐

等陶器，也有少量的生产工具和玉石装饰品。

崧泽文化居民种植水稻，石质生产工具制作精细，通体磨光，其中以穿孔石铲和长条形石镑最具特色。

崧泽文化的年代约在前3900年至前3300年。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 晚期文化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指约前3000年至前2000年之间各地氏族部落创造的文化。因各地文化发展不太平衡，起始年代有的略晚些。

这一时期的文化是向文明时代过渡时期

的文化，大体相当于西方史学家所说的英雄时代或军事民主制时代。这时期已形成几大集团，如中原龙山文化集团、山东龙山文化集团、良渚文化集团、红山文化集团等。这时期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城堡，出现了集军权、神权于一身的显贵，出现了礼制。因此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的一些文化因素称之为“文明的曙光”。

一、山东龙山文化

1928年，考古学家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下层发现了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并命名为龙山文化。后来在河南、陕西、湖北等地也发现了与龙山

文化同时代的新石器文化，为突出时代特点，分别命名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为了与其他地区后来发现的龙山文化相区别，考古学家又把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下层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命名为典型龙山文化或山东龙山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是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其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大体一致，已发现的遗址超过200处。

山东龙山文化居民从事粟作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工具有用于翻地的穿孔石铲、蚌铲、骨铲和用于收割的双孔半月形石刀、蚌刀、石镰、带齿蚌镰等。饲养的家畜为猪、狗、牛、羊，从遗骸数量上看，比大汶口文化有



薄胎高柄陶杯

山东龙山文化
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高13厘米

明显的发展。

山东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较为突出。在众多的遗址中普遍出有精致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和其他薄胎磨光黑陶器。黑色陶器群成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显著特征。黑陶的制作方法大致是：用快轮拉坯成型，并把陶坯磨光，磨光后的陶坯放入陶窑中用木柴烧，使窑温达1000℃，陶坯烧透后，减火降温，当窑内温度降至500℃左右时，往火门里加湿木，由此产生的浓烟经火膛弥漫窑室，浓烟中的碳元素便渗入窑室内的陶器器体中，待撤火窑凉时，陶器器体遇冷紧缩，便把碳元素密封于器壁中，形成通体漆黑光亮的黑陶。这种烧制黑陶的方法叫渗碳法。用渗碳法烧制的蛋壳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山东龙山文化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蛋壳磨光黑陶高柄杯的器壁仅厚0.5毫米，薄如鸡蛋壳，并且还在柄上刻出镂孔和装饰纤

细的花纹。最让人惊奇的是，有的蛋壳磨光黑陶高柄杯的高柄和深腹盘形口的杯身分别制作，然后深腹杯身套入空心的高柄中，可从外部又看不出是套接。这种套接稍不合适，就会把薄如蛋壳的器壁硌碎。除黑陶外，山东龙山文化也有一些精美的白陶，白陶的代表性器物是鬲。白陶鬲多为粗颈冲天流式，高颈顶端的流昂起，犹如雄鸡引颈高歌。

山东龙山文化的制玉工艺也很有特点，胶县三里河墓地出有成组的玉器，如扁平穿孔玉铲、三牙璧以及鸟形、鸟头形等各种玉饰。日照两城镇出土一件玉铙，铙身上部两面均刻有纤细的兽面纹。

在山东龙山文化的许多墓地中可以看出明显的贫富差别。半数以上的墓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墓一般数量也不多，仅随葬三五件而已。但少数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1989年考古学家在山东临朐朱封发掘出两座龙山

黑陶盒、双耳杯、单耳杯

山东龙山文化

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文化的大墓，其中 202 号墓有二层台，一棺一槨，有边箱，随葬陶器可复原的有 19 件，种类有鼎、鬲、甗、罐、盆、单耳杯等，还有许多蛋壳黑陶的碎片，尚无法修复。该墓还随葬了不少玉器，计 2 件玉钺、1 件玉刀、1 件玉簪、4 件玉坠饰、18 件玉串饰、1 套玉冠饰。玉冠饰通长 23 厘米，由竹节状玉笋和镶绿松石的透雕玉牌插嵌组合而成。202 号墓的墓主人无疑是地位高高在上的显贵人物。

山东龙山文化已能建筑城堡。在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寿光边线王、临淄田旺、邹平丁公等遗址都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城堡。在丁公遗址出土一片刻有几行文字的陶片。这些文字现在尚无法识读，它们与商周文字不是一个系统，可能是早已消失的远古东夷系统的文字。

根据碳-14 年代测定，山东龙山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前 2500 年至前 2000 年之间。

二、中原龙山文化

所谓中原，是指包括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在内的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中原龙山文化的分布地域较广，发展时间也较长，考古学家一般把中原龙山文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后一阶段主要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和山西陶寺类型。根据碳-14 年代测定，中原龙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前 2900 年至前 2000 年之间。

（一）庙底沟二期文化

庙底沟二期文化因 1956 年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主要在陕、晋、豫三省的交界地区和洛阳、郑州地区。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小口尖底瓶、小口广肩深腹罐、直筒形罐、甗、鼎等，其中前两种器物有仰韶文化的遗风，彩陶很少，纹饰盛行篮纹、



瓜棱灰陶杯

河南龙山文化
河南省郑州市出土
高 13.9 厘米

绳纹、附加堆纹。

庙底沟二期文化反映的是粟作农业经济。石斧较为厚重。在一些窖穴的壁上发现有木耒痕迹，耒痕为双齿。木耒的出现对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到商周时期，木耒仍然是中原地区主要的挖土工具之一。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家畜饲养有很大发展，饲养的家畜家禽为猪、狗、牛、羊、鸡。庙底沟遗址仅26个灰坑出土的家畜骨骼，就大大超过了同地仰韶文化168个灰坑出土的家畜骨骼的总和，说明饲养家畜的数量较仰韶文化时期明显增多。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年代约在前2900年至前2800年。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葬俗与仰韶文化的合葬墓大不相同：均为单人竖穴墓，头向南，排列整齐，这种葬俗应是社会变革的反应。

(二) 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和山

西陶寺类型

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地域比较广，在伊洛流域有王湾类型，在豫北晋南有后冈二期类型，在豫东有王油坊类型，在陕晋豫交界处有三里桥类型，在豫西南丹江流域有下王岗类型。河南龙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前2600年至前2000年。

河南龙山文化的几个地方类型既有共同的文化因素，也有一定的差别。王湾类型的上层是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二者的陶器有演进关系，因此王湾类型应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河南龙山文化分别受到了周边地区山东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的影响。

陕西龙山文化因发掘陕西长安客省庄而最早被考古学家所认识，因此有的学者也把陕西龙山文化称之为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的陶器以灰陶为主，主要器形有单把鬲、绳纹罐、甗、鬲，纹饰篮纹、绳纹为主。

鹿角鹤嘴锄

陕西龙山文化
陕西长安客省庄出土
长25厘米



陕西龙山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存在较多的文化联系。其年代约在前2300年至前2000年。

山西的陶寺类型因发掘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而得名。陶寺类型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纹饰多为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器形主要有扁足鼎、盆形和罐形甗及独具特色的釜、灶套接成一体炊器。陶寺类型的年代约在前2300年至前2000年。

中原龙山文化的社会经济比仰韶文化有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出现了新的种类,如三角形犁形器、有肩石铲等,这些新的农具无疑提高了翻耕土地的能力。家畜饲养的种类和数量也有所增加。

中原龙山文化的居民普遍挖掘水井。当时的建筑技术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了一座长达100多米的长形连间大房子,共有32个单间,每个单间内均设火塘。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的房屋均为圆形地面建筑,建房时先在地面垫土,筑成稍高于地面的台基,再在台基上挖槽,槽内起墙,有土墙、木骨泥墙和土坯墙,土坯墙采用错缝叠砌法,并以细黄泥为黏合料;室内地面的垫土经夯打,夯实后再抹一层草拌泥,草拌泥上再涂一层白灰面,经拍打平整成为硬地面。让人惊奇的是,有一间房址的地面铺一层木条,木条紧密排列,最后铺成呈放射状的地板,这是目前中国境内所见最早的铺地板房屋。另外在山西石楼岔沟遗址还发现了一些窑洞建筑。在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均发现了龙山时代的城堡。

中原龙山文化的居民已能生产简单的铜器。在临汝煤山遗址发现了炼铜用的坩埚残片。在登封王城岗城堡出土了一块铜片。在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铜铃,呈中空的棱柱形,是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铜器中最接

近于铜容器的一件,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中原龙山文化中,流行用卜骨占卜的习俗。卜骨以猪、牛、羊、鹿的肩胛骨为材料,当时依据对卜骨进行烧灼后产生的兆纹来占卜吉凶。卜骨的存在,说明已出现专职的巫师。巫师用卜骨占卜的习俗对后来的商周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原龙山文化的礼器较为发达。陕西神木石卯遗址出有大批玉器,其中有牙璋、钺、戚、戈、圭、璧等。在襄汾陶寺遗址的大型墓中,出土了成套的彩绘陶礼器、彩绘木礼器和磬、钺等玉石礼器。掌握这些礼器的是拥有特殊权力的显贵人物。

三、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因发掘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而得名。该文化主要分布在甘青地区,从早到晚又可分为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三个连续发展阶段。马家窑文化以丰富的彩陶著称于世。

马家窑类型的年代约在前3100年至前2700年。该类型的彩陶器主要有盆、壶、罐、尖底瓶等,多为橙黄地黑彩,盛行涡旋纹、水波纹、垂幛纹、圆圈纹等几何形花纹及鸟纹、鱼纹、蛙纹和蝌蚪纹等动物花纹。

半山类型的年代约在前2600年至前2300年。该类型的彩陶器主要有双耳罐、单把壶、小口鼓腹瓮等,花纹由黑红两种颜色相间组成,由红色居中、两边黑色锯齿纹合镶组成的各种图案是半山类型彩绘最突出的特点。彩绘图案多为涡旋纹、水波纹、菱形纹、平行带纹和棋盘格纹。

马厂类型的年代约在前2200年至前2000年。该类型的彩陶器主要有双耳罐、单把筒形杯、壶等,陶器涂红衣,彩绘主要用黑彩,最常见的图案是变体蛙纹、几何形花纹、圆圈

纹、波折纹、菱形纹、折线三角纹等。

马家窑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粟和黍，饲养猪、狗、羊、鸡等家畜家禽。在一些遗址中发现有石、陶纺轮等纺织工具和石铤、凿等木作工具。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马家窑类型的小铜刀，经鉴定是青铜，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

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发达。在兰州白道沟坪遗址发现一个面积很大的马厂类型的窑场，共有5组12座陶窑。窑场还出有彩绘用的工具，如石研磨盘、双格调色陶碟等。

从埋葬习俗可以看出马家窑文化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马家窑类型的墓葬没有合葬墓，各墓的随葬品数量都差不多。半

山类型的墓葬有成年男女合葬墓。马厂类型的墓葬既有成年男女合葬墓，也有成年人和小孩的合葬墓、不同性别年龄的集体合葬墓、奴婢对主人的殉葬墓，并且各墓的规模有大小之别，随葬品的数量相差悬殊。在马厂类型的墓葬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石斧、石铤、石凿等多作为男性的随葬品，而纺轮则多作为女性的随葬品，表明当时已出现明显的男女分工。

反映马家窑文化意识形态的遗物很值得关注。马厂类型的彩陶器下腹部常绘有符号，仅在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就发现130多种符号。另外在柳湾的一座墓中出土了49片带缺口的骨片，每片有一个、三个或五个缺口不等，学者一般认为这些骨

涡纹双耳彩陶罐

马家窑文化
高30.8厘米



片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记数工具，最起码当时已有了奇数的概念。在马家窑文化的遗址中还出有舞蹈纹彩陶盆、彩陶鼓等反映当时音乐、舞蹈方面的器物。

四、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因发掘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而得名。该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至杭州湾一带，考古学家一般认为良渚文化是承袭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其年代约在前3100年形前2200年。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灰黑陶和黑皮陶为主，广泛采用轮制技术，器壁较薄，器表磨光，有的陶器刻有精细的刻画花纹和镂孔。流行圈足器和三足器，主要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贯耳壶、竹节

形把的豆、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

良渚文化的生产较为繁荣，农业、渔猎、竹编纺织、木作、玉器加工等各具特色。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良渚文化的生产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

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畝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水稻遗存。钱山漾遗址中稻谷成堆，分布范围很广。经鉴定可知良渚文化居民种植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在钱山漾、水田畝遗址中与水稻共存的植物种子有很多，已鉴别出的有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籽、毛核桃、酸枣核、葫芦籽等，这些当是良渚文化居民采集的植物，反映出当时对可食植物的利用已较为广泛，为后来人工选择和栽培提供了便利条件。良渚文化的农业



黑陶尊

良渚文化
浙江杭州出土
高12.3厘米

玉璧

良渚文化
直径17厘米



石镞

良渚文化
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
长11.8厘米至14厘米



生产工具在当时较为先进。农具制作精细，种类较多，主要有三角形犁形器、破土器、耘田器等。三角形犁形器的器体扁薄，有的学者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良渚文化居民在农业生产中重视翻地和中耕，开始走向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钱山漾遗址出有木桨，当时人们已使用船进行水上交通和捕鱼作业。钱山漾遗址还出有捕鱼用的竹编倒梢和鱼篓。

良渚文化的竹编技术发达，仅钱山漾遗址就出土有200多件竹编器物，有竹篓、竹篮、算子、谷箩、簸箕、倒梢、竹席、篷盖、门扉、竹绳等，这些竹编器物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



良渚文化纺织成就突出表现在丝织品上。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有绢片、丝带、丝线等，经鉴定原料是家蚕丝。绢片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蚕丝纤度偏细，是纴而后织的。在饲养家蚕和生产丝织品方面，良渚文化居民对中国纺织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良渚文化的玉器加工技术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在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江苏武进寺墩、吴县张陵山和草鞋山，上海福泉山等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计有礼器琮、璧、钺等，装饰品玉冠状器、山形器、璜、块、瑗、管、坠、镯、带钩等，肖形玉器蝉、鸟、蛙、鱼、龟等。良渚文化的玉器运用了

圆雕、浮雕、透雕、线刻等多种技法，线刻图案的线条细如发丝，并且十分流畅。良渚文化的玉器无论在数量上、种类上，还是制作工艺上，都非其他同时期的文化所能比拟。

良渚文化的权贵人物有用上百件玉器覆身、环身随葬的习俗，考古学家把这种丧葬习俗称为“玉敛葬”。权贵人物也往往葬在人工堆砌的祭台上，并随葬大量的玉礼器和玉装饰品。这些权贵阶层掌握着财富、宗教权力乃至军事权力。

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晚期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存在一定的文化联系。良渚文化在达到当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最高水平的时候突

山形玉饰

良渚文化

浙江余杭瑶山出土

高4.8厘米，宽8.5厘米

然衰落，是一个难解之谜。有的考古学家认为处于巅峰状态的良渚文化可能毁于突发的大洪水。

五、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发掘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以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为中心，北起昭乌达盟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抵朝阳、凌源、河北北部，东至哲里木盟、锦州地区。红山文化大约起始于前3500年左右，终止于前2000年以前。

红山文化的陶器有泥制陶和夹砂陶。泥制陶呈红色，多为容器，器形主要有红顶钵、小口双耳罐、盆、瓮等，器物上多绘黑色和紫色的彩绘，花纹有平行线纹、三角形纹、菱形纹、涡纹、鳞形纹等。夹砂陶呈褐色，多为炊煮器，表面有烟炱，器形有大口深腹罐、折口深腹罐、斜口罐等，这些夹砂陶罐的共同特点是大口、深腹、小平底。夹砂陶的纹

饰有压纹、划纹、附加堆纹等。

红山文化居民从事农业生产，所用农具有掘土用的呈烟叶形和鞋底形的石耜，收割用的桂叶形双孔石刀，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和磨棒等。他们饲养猪、牛、羊等家畜。

最能体现红山文化手工艺水平的是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玉器有玉龙、玉猪龙、勾云形玉饰、马蹄形玉发箍、玉鸟、玉蝉、玉龟、玉鱼等。

在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发现了大型石砌建筑群，墙基用加工整齐的砂岩长条石砌成，其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房基，房基的前面还有石圈形台址。东山嘴的石砌建筑群，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讲究布局，考古学家认为是原始祭坛。在祭坛中出土有小型裸体孕妇陶塑像，当时红山文化居民可能在这里祈求生育、氏族繁衍和庄稼丰产。

在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发现一座“女神庙”建筑遗迹，有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

彩陶碗

红山文化

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小河沿出土





玉猪龙

红山文化

辽宁建平牛河梁出土

高7.2厘米

构成。女神庙内出土了许多头、肩、臂、手、乳房等泥塑人像残块。这里也是红山文化居民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

红山文化在埋葬习俗上盛行积石冢，每处积石冢内都分布着许多墓葬，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墓内垒砌大石板。墓葬有大、小之分，大墓的墓室砌造规整，随葬较多的精美玉器；小墓墓室简陋，没有随葬品或仅有几件简单的随葬品。在红山文化的氏族部落中已存在明显的贫富和等级分化。

东山嘴的祭坛、牛河梁的女神庙和积石冢，反映出红山文化已出现坛、庙、冢有机结合的高层次的宗教信仰。营建坛、庙、冢

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只有在集权制的条件下才能调动如此多的劳动力。显然这种集权是利用宗教统治、号召民众的。红山文化时期无疑已出现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权力机构。

第三节 边远地区的文化

一、兴凯湖畔的新开流文化

在黑龙江省东南与俄罗斯交界处，有一

个面积约4380平方公里的著名湖泊,名叫兴凯湖。在兴凯湖北畔,具体说是在兴凯湖和其北约1公里的小兴凯湖之间,即黑龙江省密山县名叫新开流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于1972年进行了发掘,获取了较为丰富的资料,考古学家将该遗址所代表的考古文化命名为新开流文化。据碳-14年代测定,新开流文化的年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

新开流遗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80米,面积约24000平方米。遗址出土的陶器很有特色。其器形十分简单,仅有罐和钵,陶质多为夹砂灰褐陶,最具特征的是在器物表面装饰鱼鳞纹。鱼鳞纹具有写实风格,系模仿鱼鳞的形状,或半圆,或椭圆,密密麻麻,遍施器表。另外有的器物表面也饰模仿鱼网的网状堆纹。

在新开流遗址发现了10座鱼窖。鱼窖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圆形鱼窖的直径和窖深都在0.6米左右;椭圆形鱼窖长径约1米,短径约0.85米,窖深约0.6米。鱼窖内堆满鱼骨,鱼骨保存完整,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一层一层地叠压放置,排列规整有序,鱼窖上部填盖有生黄土或黄砂土。新开流文化的原始居民当时是把鲜鱼码入鱼窖后,又覆土掩埋贮藏。除鱼窖外,考古学家在遗址的文化层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鱼骨和其他动物的骨骸。在鱼窖和文化层中出土的鱼骨经鉴定,种类有鲑鱼、鲟鱼、鲤鱼、青鱼等,这些鱼类在今天的兴凯湖和黑龙江水系中,仍是主要的鱼类资源。

在新开流遗址中没有发现农业生产迹象,未出土农业生产工具,而渔猎工具则十分丰富,有石矛、石网坠、各种石骨箭镞、骨鱼镖、鱼叉、鱼卡、鱼钩等。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骸除鱼骨外,兽类的骨骸经鉴定有马

鹿、狍等鹿科动物和野猪、狗獾、狼等,未见家畜骨骸。

新开流遗址还出土了几件与捕鱼生活有关的骨雕艺术品,如鱼形角雕、骨雕鱼鹰首等。骨雕鱼鹰首的出土,说明新开流文化的原始居民已经驯化鱼鹰来捕鱼。

新开流文化的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特别是渔业经济相当发达。驯化鱼鹰捕鱼、挖鱼窖贮藏鱼,目前所知,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仅见于新开流文化。以鱼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是新开流文化有别于其他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一大特色。

二、西藏高原的卡若文化

在澜沧江上游、海拔3100米的西藏自治区昌都县的卡若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于1978年至1979年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据碳-14年代测定,卡若文化的年代约为在距今5300年至4100年。

卡若文化是西藏高原上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原始文化。在卡若遗址中出土了粟和猪、牛等家畜的骨骸。粟起源于黄土高原,在中原地区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中,粟作经济十分发达,卡若文化的粟作农业显然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也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就已向西藏高原渗透。

在卡若文化中,大型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共存。打制石器最多,有大大小小的刮削器和敲砸器。磨制石器以各式穿孔石刀为主,也有少量的斧、镑、刀、凿、镞等。细石器有小石核和细石叶,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华北地区的中国细石器传统。

卡若遗址还出土了磨制精细的骨针、骨锥和纺轮,表明当时存在纺织生产。在一件陶器底部发现有布纹痕迹,可观察到织物粗糙,纺织技术水平还较低。



骨锥、骨针、骨坠

卡若文化
西藏昌都卡若出土

狩猎经济在卡若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狩猎工具主要有石镞、石矛和石球，猎获的动物有狐、獐、鹿、孢、黄羊等。虽然卡若遗址紧邻澜沧江及其支流，鱼类资源丰富，但遗址中未出土鱼骨和捕鱼工具，可能当时卡若文化的居民有不食鱼的禁忌风俗。

卡若文化的陶器呈灰色或红色，以夹砂陶为主，器形有罐、盆、钵等，多饰刻画纹，个别器物上有彩绘。发现一件特殊陶器，器表饰划纹，一口双身，形体似双兽对立，考古学家将其称为“双体兽形罐”。

与农业生产相适应，卡若文化居民过着定居的生活。卡若遗址共发现 28 座房屋基址，有方形或长方形草拌泥墙的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式房屋，也有半地穴式的石墙建筑房屋。半地穴式的石墙建筑房屋是卡若文化独具特色的房屋，这种房屋在半地穴的穴壁四周用天然卵石垒砌石墙，黄泥抹缝，石墙周围及屋内有柱洞。发现有三座半地穴石墙房屋连成一组的建筑，为上下两层结构，这是在中国发现最早的石墙复式结构房屋，是

卡若文化原始居民对建筑形式的一种创建，这种房屋对后来的藏族、羌族等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远离大海的西藏高原的卡若遗址还出土了交换来的稀有之物——海贝，这反映出卡若文化原始居民直接或间接的商品交换已经达到很远的距离。

三、岭南的石峡文化

目前为止，石峡文化是岭南地区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石峡文化因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的石峡遗址而得名。石峡遗址的面积约 3 万平方米，1973 年至 1976 年发掘了 1660 平方米，收获颇丰，使考古学家对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石峡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

石峡文化原始居民从事稻作农业生产，遗址中出土许多已炭化的米粒、稻谷、稻壳等，经鉴定属于人工栽培稻，并有籼稻和粳

红陶罐

卡若文化

西藏昌都卡若出土



稻两个品种。出土的农具有石铲和石耨，石耨长身，弓背，上宽下窄，两头有刃。这种石耨适于在岭南的红土地带掘土，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石峡文化的陶器呈灰褐色或灰黄色，陶质有夹砂陶和泥制陶，流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器，主要器形有鼎、釜、甑、盘、豆、壶、罐等。

石峡文化最突出的手工业是木作。木作工具主要是石斧和石凿。石斧有长身斧、梯形斧、有段斧和有肩斧等多种。在石峡遗址47号墓中，随葬有大小成套的七种形式的卷刃凹口斧和凿，这些斧和凿可以凿出圆槽圆孔，是较为进步的木作工具。墓主人用这些工具随葬，反映出当时木工工具的专门化，出现了掌握木工专门技术的人。

石峡遗址还出土了不少玉器，既有琮、璧、钺等礼器，也有瑗、环、璜、玦、坠等装饰品。玉礼器的出现表明当时已有掌握这些贵重礼器的专职巫师。

石峡文化的兵器引人注目，除礼仪性兵器玉钺外，还有实战兵器石钺和大量的石镞。石钺是从石斧演化而来的专用兵器，器身变薄，刃部变长，绑缚木柄，利用石钺的薄体利刃进行砍劈。出土的石峡文化石钺有长肩亚腰石钺、斜刃石钺和双肩石钺。仅在石峡遗址的23座墓中就出土了500多件石镞，出土情况较为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向文明和国家迈进的阶段，兼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地处边远的岭南地区，石峡氏族部落也被卷进了残酷的兼并战争之中。

在石峡遗址共发掘了64座属于石峡文



石钺

石峡文化

广东曲江石峡出土

化的墓葬，反映出当时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大型墓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多达60件到100多件，包括玉礼器等贵重物品，而中、小型墓的随葬品只有4件到6件，仅为简单的陶器或工具。

石峡文化虽然僻居岭南，但五岭并没能阻止石峡文化与其他地区同时代文化的联系和交流。石峡文化与江南地区的同时代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存在有段石锛和扁平穿孔石铲；陶器的形制虽然各具特点，但盛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器以及镂孔装饰风格则是相同的；石峡文化的玉璧、玉琮、玉璜、玉笄等玉器与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玉器大同小异，石峡105号墓出土的大玉琮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大玉琮从玉料、内圆孔的对钻到浅雕花纹几乎一模一样，充分说明

石峡文化的对外联系已经达到1000多公里之外的长江下游地区。

四、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

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位于闽江下游冲积区的一座独立小山岗上，1954年至1974年，考古学家对该遗址进行过七次发掘，比较清楚地认识了该遗址的文化面貌，并把该遗址所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文化命名为昙石山文化。

昙石山遗址是典型的贝丘文化遗址。所谓贝丘遗址，是以包含大量古代人群食后抛弃的贝壳为特征的遗址。昙石山遗址可分三个文化层，上层为青铜时代文化，我们所说的昙石山文化是指遗址的中、下层。下层堆积以黄褐色沙土为主，混杂一些腐烂的蛤蜊

壳。中层堆积则以大量的海生蚬类介壳为主，间有少量灰褐土，代表了发达的贝丘文化遗存。下层和中层的堆积表明，下层文化时期，人口较少，食用贝类有限；中层文化时期，人口骤然增多，食用贝壳量很大，以至丢弃的贝壳形成了文化地层堆积。

昙石山下层的陶器以红陶居多，仅有少量的灰陶，纹饰主要有绳纹、篮纹、镂孔等，只有极少的灰色几何印纹硬陶。中层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几何印纹硬陶增加，出现了斜方格纹、叶脉纹。昙石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釜、鼎、壶、豆、簋等。

昙石山文化有一种石锄，器身厚重，横剖面为三角形，一面扁平，一面有条人字形纵

脊。这种特殊的石锄是闽南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垦植工具。昙石山文化原始居民从事一定的农业生产，除使用石镰等农具外，也使用大量的蚌制工具，如用长牡蛎壳加工成的双孔刀、铲等。当时还饲养了猪、狗等家畜。

昙石山文化原始居民一方面采集海生贝类作为经常性的食物来源，一方面也从事渔猎经济，在昙石山遗址中出土了一些陶网坠、石镞、骨镞等渔猎工具。

昙石山遗址出土的石质工具以木作平木工具——石铤为最多。石铤大多粗磨器身和刃部，有的呈扁平长方形，有的呈梯形，有的呈弧背形，另外还有少量的起脊有段石铤。

在昙石山遗址的下层发掘出15座墓葬，

网纹灰陶釜

昙石山文化
福建闽侯昙石山出土
高9.4厘米



中层发掘出20座墓葬，均为单人葬，儿童墓单独挖穴，与成人同埋一个墓地。

经过考古学家的努力工作，我们了解到，福建闽侯溪头遗址、庄边山贝丘遗址下层，福清东张遗址下层也属于昙石山文化。昙石山文化与台湾高雄凤鼻头第3、4层贝丘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当时福建地区的原始文化与台湾岛的原始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

五、台湾岛的新石器文化

台湾的考古学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工作，在台湾岛也找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由于台湾岛与大陆隔着台湾海峡，其古代文化的发展进程相对大陆来说有些滞后，进入青铜时代比大陆要晚，因此新石器时代文化延续的时间比大陆也要长一些。

对台北县大坌坑遗址的发掘使考古学家认识了大坌坑文化。属于该文化的遗址还有台北市圆山贝丘下层、台南县八甲村、高雄县凤鼻头贝丘下层等。大坌坑文化主要分布于台湾岛北部的淡水河下游地区和西海岸一带，经碳-14测定年代，约在前4400年前后。该文化的渔猎经济比较发达，出土一些石器，陶器一般为红褐色的砂陶。

以台北市圆山遗址上层为代表的文化被命名为圆山文化，台北县大坌坑贝丘遗址上层、土地公山遗址等属于圆山文化。该文化主要分布在台北盆地，并延伸到北部沿海一带，其年代约在前2400年至前1100年。圆山文化的陶器多为棕灰色的细砂陶，农业生产工具有石锄、石铲、有段石斧、双肩石斧等，渔猎工具有石镞、骨镞、骨鱼镖等。圆山文化晚期已出现小件青铜器，大坌坑遗址上层出土的两翼式青铜镞与中原地区商周时



期的同类铜镞一模一样。

大约在前2500年前后，以台湾西海岸中南部地区为中心的凤鼻头文化取代了大坌坑文化。凤鼻头文化延续的时间很长，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红陶文化类型阶段，其起讫年代约为前2500年至前1500年，主要遗址有高雄县凤鼻头中层、屏东县垦丁寮和鹅銮鼻、台中县牛骂头下层等；出土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其上印有绳纹、席纹，器型有鼎、罐、豆、瓶、盆、碗等；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农具有石锄、穿孔石刀、石磨盘等，在台南市牛稠子遗址还出土有粟粒。其次是素面和刻画黑陶文化类型阶段，起讫年代约在前1500年至公元初年，主要遗址有高雄县凤鼻头上层、台中县营埔等，此阶段已从事稻作农业生产，在营埔出土的陶片上发现有稻壳印痕。最后是印纹和刻画纹灰黑陶文化类型阶段，此时已进入铁器时代。

石斧

昙石山文化
福建闽侯昙石山出土



第九章

早期农业的两大系统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大陆在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栽培谷物，出现原始农业。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到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原始农业已经出现较为繁荣的景象，并明显分化出两大农业系统，即南方的稻作农业和北方的粟作农业。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不仅仅是种植的谷物不同，其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也不尽相同，各有自己的经济特点和模式。

第一节 南方稻作农业

距今七八千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普遍种植水稻，考古发现的此时期种植水稻的遗址层出不穷，令考古学家大为吃惊。

20世纪7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

的水稻遗存，在当时这已是世界上所见最早的栽培水稻，故而中国考古学界已可以宣称中国是水稻的起源地。

20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又在距今约8000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了栽培稻遗存，再一次无可争议地确认中国是水稻的起源地，并且把水稻的起源提前了1000年。

没想到，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又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年的水稻，并找到了从野生稻驯化成栽培稻的证据，这着实让考古学家和农学家兴奋不已。考古发掘就是这样，不断找出新的证据，又不断修改证据，使证据更加确凿，从而解决重大学术问题。这不断让考古学家兴奋的过程，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还是让我们看看从最初驯化水稻的1万年前经过二三千年的发展，到距今七八千年

前的时候，原始居民把稻作农业生产提高到了什么程度。

1988年11月，考古学家正式发掘了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遗址地处澧水北岸的澧阳平原。澧阳平原属河湖冲积平原，介于武陵山脉与洞庭湖盆地之间，海拔36米至40米。经对发掘所获的木炭和竹炭标本进行测定，可知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8200年至7800年间。在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陶片中，夹杂大量的稻壳和稻谷。彭头山遗址的陶器胎壁较厚，是采用泥片贴筑法一层一层地贴筑成的，从胎壁断面可以看到贴筑泥片形成的分层现象。因陶器火候较低，质地较酥，外层多自然剥落，夹在胎壁内的稻壳和稻谷清晰可见，稻壳和稻谷均炭化。彭头山的水稻花粉为卵圆形，个体37.5微米至40微米，萌

发孔连边缘加厚10微米至11微米，花粉轮廓线较清晰，表面光滑，与现代水稻接近。根据彭头山遗址的孢粉组合分析可知，在有人类活动以前，当地是以杉木林为主组成的暖性暗针叶林环境，人类在此居住后，原生的杉木林遭到破坏，自然植被由森林演变为森林—草原，人类在水系边缘开荒，种植水稻。种植水稻的彭头山文化先民已经建筑房屋定居，遗址出土的房址有大型地面建筑和小型半地穴建筑两种。农业生产工具发现很少，主要是开荒用的石斧。做饭用的炊器和食器发现较多，主要有深腹陶罐、陶釜、陶支座、陶碗、陶盆等。

另外，在属于彭头山文化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也出土了水稻遗存，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



夹稻壳和稻谷的陶片

彭头山文化
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



水稻

河姆渡文化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是反映早期稻作经济材料较多的一处遗址。该遗址于1973年至1974年、1977年至1978年两次发掘，发掘面积2630平方米。据碳-14所测的一个标本，年代为前 5005 ± 130 年。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稻作遗存丰富，在居住区内发现了米粒，且普遍存在稻谷、稻壳、稻秆和稻叶的堆积，一般厚20厘米至50厘米，最厚处超过1米。虽然稻谷已经炭化，但许多谷壳和秆叶还保持原来的外形，有的颖壳上稃毛尚清晰可辨，有的叶脉和根须还很清楚。河姆渡遗址的水稻遗存，无论是数量上，还是保存的完整程度上，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是罕见的。经鉴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有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在河姆渡遗址文化层中还发现有水生草本植物孢粉，并出土许多菱角、葫芦、藻类的遗存。喜水的动物遗骸也出土较多，如亚洲象、犀牛、水牛、水鸟、龟、鳖、鱼等的骨骸，淡水鱼骨在遗址

中随处可见，还可以见到不少滨海河口的鲇鱼骨。在遗址附近的耕土层下还存在着泥炭层，表明在当时遗址周围是大片的湖泊沼泽地带，气候温热湿润，雨量充沛，这种地理环境为大规模种植水稻提供了有利条件。

河姆渡原始居民生活的湖沼地带土质较松软，因此他们大量使用骨、木制作的农业生产工具。虽然骨、木工具不耐磨损，但比石质工具制作容易。从出土情况看，骨、木工具损坏的多，制作的也多。河姆渡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稻作生产工具是骨耜，仅第4层就出土170余件。骨耜采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加工而成，长20厘米左右，肩臼处横凿方孔，骨板正面中部琢磨出浅平的竖槽，浅槽下部两侧各凿一孔。有的骨耜尚带残断的木柄，木柄竖贴着骨板浅槽安装，方孔里穿藤条捆绑木柄前端。由于长期翻地，骨耜刃缘磨蚀得很厉害。翻地除以骨耜做工具外，也使用木耜。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给稻谷脱壳的工具——木杵，这种简单而有效的稻谷脱壳工具至今还在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使用。

从事稻作生产的河姆渡先民已饲养猪、狗和水牛。他们在湖沼地带因地制宜地建造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是把房屋建造在木（竹）桩之上，房屋架空，地板与地面隔离，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潮湿，有利于居民的健康。他们使用的炊器主要是陶釜，陶釜是一种煮食炊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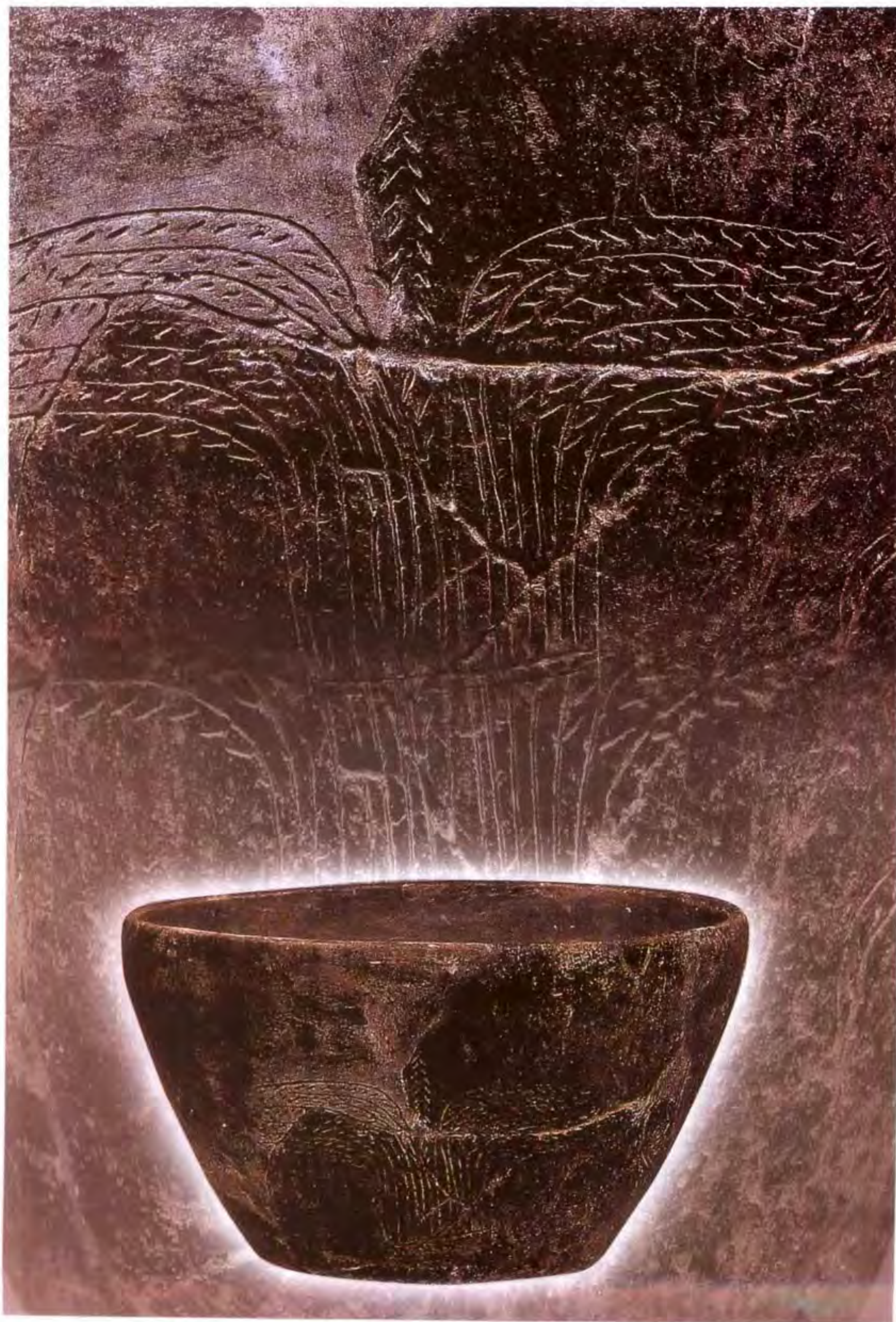
中国考古学家一直把寻找和研究稻作文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不仅找到了1万年前栽培水稻的证据，还发现了6500年前的稻田遗迹。

1996年，考古学家在发掘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时，在第一期的东城墙和最早的文化层之下、生土之上，发现了青灰色纯净的静

水沉淀，并有很强的黏性，参与发掘的当地村民认为这是稻田土。考古队员将这层土的表面整平后，显现出因为一干一湿而形成的清晰的龟裂纹。从部分土样中拣选出的稻梗和根须，与现在农田中拔取的相比较，几乎没有区别。从局部的剖面观察，可以看出一

根根往下伸展的根须或根须的痕迹，并可辨认出当时采用的播种方法是撒播。另外从土样中还拣选出炭化稻谷和蓼科、竹叶、田螺等动植物的标本。

为更多地认识古稻田的原貌，1997至1998年，考古队又在东城墙及城内揭露了



刻有水稻纹饰的陶盆

河姆渡文化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高15.9厘米，口径30.3厘米

336平方米的面积。这次清理出了三条田埂，还发现了与水稻田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用于灌溉的水坑和水沟均高出稻田，位于稻田的西部。清理水坑三个，其中1号水坑直径1.2米，深1.3米，呈锅底形，底部有很浅的一层淤泥。水沟早在1992年就已经显露，但当时认为是居住区的分界。1997年清理1号水坑时，发现由西南向东北注入1号水坑的两条小沟，这才认识到是灌溉用的水沟。水沟内出土有汤家岗文化的陶片，可知水稻田的下限不会晚于汤家岗文化时期，相对年代在距今6500年至6300年左右。香港大学对水稻田下层泥土用热释光方法测年，得出的绝对年代为距今 6629 ± 896 年，与汤家岗文化的年代相符。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可以

说，彭头山古稻田是已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古稻田，并且这块古稻田已经有了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

另外中、日两国的考古学家还在位于江苏省苏州市郊唯亭镇陵南村的草鞋山遗址找到了马家浜文化的古稻田。稻田有浅坑、水沟、水口和蓄水井组成的遗存。其中在一处被揭露的长20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呈两行排列、南北走向、相互连接的浅坑约20个，浅坑面积多在3至5平方米左右，个别小的1平方米，大的9平方米，坑的形状呈椭圆形或长方圆角形。浅坑沿一低洼地带分布，其四周有土岗，东部和北部边缘有水沟和水口相通，水沟尾部有蓄水井。显然这组遗存是古稻田的灌溉设施。

陶釜

河姆渡文化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高25.5厘米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已知选育优化水稻。考古工作者在1994年对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进行发掘时，在遗址的第8层至第4层均发现了炭化稻米。第8层至第7层的年代为距今7000年至6300年，第6层至第4层的年代为距今6300年至5500年。对遗址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文化遗物进行的研究表明，其文化是连续发展的，文化特征稳定，文化序列完整，因此其稻作农业也是连续发展的。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对龙虬庄遗址出土的稻米进行研究，从各层出土的稻米形态观察，稻壳保存完好的颖尖无芒，有的连有枝梗，而颖尖无芒和落粒性降低正是人工栽培稻的特征。对出土水稻作植物蛋白分析，每一层的水稻植物蛋白均属 β 型，都是粳型稻。农学家还对出土水稻的粒长、粒宽、粒厚进行了测量。出土水稻的平均粒长是：第8层的 4.84 ± 0.47 毫米，第7层的 4.72 ± 0.56 毫米，第6层的 4.85 ± 0.51 毫米，第4层的 5.80 ± 0.69 毫米。平均粒宽是：第8层的 2.24 ± 0.23 毫米，第7层的 2.31 ± 0.31 毫米，第6层的 2.28 ± 0.30 毫米，第4层的 2.57 ± 0.45 毫米。平均粒厚是：第8层的 1.65 ± 0.12 毫米，第7层的 1.64 ± 0.23 毫米，第6层的 1.65 ± 0.29 毫米，第4层的 1.78 ± 0.41 毫米。稻粒在长、厚、宽的分布范围和标准差以第8层的最小，第6和第7层的居中，第4层的最大，第4层的稻粒在1%水平上明显地大于第8、7、6层的稻粒。龙虬庄遗址栽培水稻的发展序列，反映了距今7000年至5500年之间原始先民对稻种品质从野生稻到栽培稻的驯化过程。第8层到第6层，栽培水稻尚处于初级阶段；而第6层到第4层，原始先民开始有意识地选育优良种子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第4层的稻粒已呈大粒化，并且达到了和现代品种近似的水平。

以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为依据，考古学家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兴起后，不断地向周边地区传播，向南传至云南、广东，在云南元谋大墩子、昌宁营盘山，广东曲江石峡、曲江泥岭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发现了栽培稻的遗迹；向北传到河南、陕西、山东、辽宁等地，在距今约8000年至7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稻谷实物，经鉴定为栽培稻，以粳稻居多，也有少量的籼稻。贾湖遗址的稻作可能受到了彭头山稻作文化的影响。贾湖遗址是目前所知北方地区种植稻最早的史前遗址，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至迟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稻作农业已经从长江流域向北推移了500多公里，到达了淮河流域。

在北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一些遗址中也发现过稻作遗存，但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水稻始终没能替代耐旱的杂谷作物，只起辅助作用，北方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农作物一直是粟、黍。

骨耜

河姆渡文化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长约20厘米



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和青铜时代早期的辽宁大连大嘴子遗址都发现过稻作遗存。以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严文明先生为代表的学术观点认为：根据时间顺序，可以看出这样一条稻作传播线路：长江流域——淮河以北——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由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的稻作传播是以庙岛群岛为跳板的跳蛙式跨海传播。这条线路的稻作传播并未停止在辽东半岛，而是又继续传到朝鲜半岛，最后传到日本。水稻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的时间大约在前10世纪前后，位于大同江流域的平壤南京遗址、位于南汉江上游的汉城欣岩里遗址都出土了距今约3000年的炭化稻米，稻米与粟、黍、稷、豆等谷物共存。到距今2500年前后，朝鲜半岛的稻作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代表性的遗址是位于锦江流域的扶余松菊里遗址，该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均为粳稻。以锦江流域为中心的松菊里稻作文化由中西部地区扩展到南部地区，又由朝鲜半岛跨过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传播到日本九州。日本是水稻向东传播的终点站。

上述水稻向日本传播的路线并不是惟一的路线，应该还有一条，安志敏先生认为是从长江下游地区以海路直接传播到日本。这条稻作传播路线最早登陆于日本的地点也是九州岛。九州岛的绳文文化时代晚期（距今约3000年至2300年）遗址，如菜畑、有田、板付等都有稻作遗存，意味着当时稻作及其生产技术已经输入，但尚处于稻作生产的萌芽阶段。进入弥生文化时代（距今约2300年至1700年）之后，稻作农业日益普及，从九州岛直达本州岛的北部。

澳大利亚学者彼得·贝尔伍德在研究了中国、印度、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

的史前水稻后，提出了这样一种水稻向南传播的假说：水稻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后，大约在前6000年至前3000年扩展到中国南方和台湾以及越南北部，在前2500年之后远播至印度北部和泰国中部，以及赤道以北的东南亚岛屿。不过，水稻的传播在印度尼西亚的东部赤道地区遭遇到文化和环境的双重障碍，因而没有作为栽培植物传播到太平洋诸岛。

第二节 北方粟作农业

在距今1万年左右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总体来讲，北方气候环境较南方地区偏旱、偏冷，适于种植耐旱、耐寒的农作物。从考古发现看，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地区种植最广泛的农作物是粟，因此可以把北方的史前农业称为粟作农业。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们只知道仰韶文化的先民种植粟。70年代，考古学家在北方地区又发现了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一期文化等在年代上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这些前仰韶文化中，也发现了粟的遗存。

1973年考古学家发现了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并于1976年至1978年发掘，揭露面积2579平方米，清理了470多座窖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80多座窖穴中发现有粮食堆积，堆积一般厚0.3米至2米，有10座窖穴内的粮食堆积在2米以上。具体情况可用346号窖穴作一说明。346号窖穴的坑口距地表0.85米，坑口长1.1米，宽0.9米，深3.65米，坑内上部堆积为灰土，包含较多陶片，距坑口深1.65米处为一层黄色硬土，厚0.4米至0.6米，其下为粮食堆积，由于粮食腐烂下沉，



粟

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

黄色硬土与粮食之间形成高0.6米的空隙,在粮食堆积中除有少量淤土外,未发现别的文化遗物。在这些贮存粮食的窖穴内,部分粮食的颗粒出土时清晰可见,但不久便风化成灰。根据灰相分析,磁山遗址窖穴出土的粮食是粟。

为测定磁山遗址的年代,发掘者采集了145号和48号窖穴内的两件木炭标本,经碳-14测定,为距今 7355 ± 100 年和距今 7235 ± 105 年。

1978年、1979年,考古学家还对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进行了发掘,也有粟属的炭化谷物出土。对裴李岗遗址的六个标本进行了碳-14年代测定,最早的数据为距今 7445 ± 200 年,最晚的数据为距今 7145 ± 300 年。裴李岗文化的年代与磁山文化大体相当。距今7000多年前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先民

已种植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表明中国北方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地区。

粟是由狗尾草驯化而来的。狗尾草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野草,在《诗经》、《吕氏春秋》等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记载,又被称为莠、绿毛莠、狐尾草。粟和狗尾草无论从植株形态还是从籽粒观察,都十分相似。农学家曾做过试验,把野生狗尾草和栽培粟杂交,获得了近似双亲的杂交种,由此可见两者的亲缘关系是非常近的。

以磁山遗址为代表的磁山文化分布在河北省的中南部,地处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在豫中地区,也是位于华北平原的西部边缘。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这两个从事粟作经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地理位置上处于黄河流域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结

石镰

裴李岗文化
河南郟县水泉遗址出土
长20.6厘米



合地带。

中国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带是在干旱条件下形成的，其环境以干燥为主，而这一趋于干旱性的气候特点很适于粟类生存。另外，黄土土质由于结构疏松，具有垂直的纹理，有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可以把下层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黄土特有的自肥现象，这种特点既便于原始先民开垦土地，又便于农作物的浅种直播。粟在新石器时代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粟能够适应黄土地带的生态环境。粟是特别耐旱的作物，它叶面蒸发量小，所需水量比其他作物要少得多。粟在幼苗期如遇严重干旱，可以呈假死状态，叶子纵卷以减少水分蒸发，根部却往下深扎，一旦遇水则迅速恢复生长能力，已经纵卷的叶子遇水后仅一至三个小时就可以完全展开，恢复生长，

这样可以使产量不受影响。农学家做实验发现，粟在幼苗阶段的干旱不但不影响最后的收成，反而能促使茎向粗的方向发展，对后期生长有利。粟在幼苗期虽然极度耐旱，但在后期生长阶段却需要较多的水分供给。黄河流域的气候特点是冬春干旱，夏季多雨，这就决定了驯化的作物必须是属于春种秋收、喜温性的一年生品种。粟在春季幼苗期耐旱，在夏季后期生长期需要较多水分，正适应了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特点，是黄河流域理想的农作物。

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早已超越了由狗尾草驯化成栽培粟的粟作农业最初阶段，其原始粟作农业已经较为发达。从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看，当时已经有了从开垦土地、中耕翻地到收割、脱粒的系统配套的农具。两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器类上有共同的特

点，都有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等。石斧用于开垦荒地，石铲用于翻地，收割用石镰，脱粒用石磨盘和石磨棒。

裴李岗文化的石镰比磁山文化的石镰要精致工整，通体呈拱背长条形，刃部做成细密的锯齿状，后部较宽且上翘，后部下端有一小缺口，用于拴绳捆绑木柄。石镰复原后的外观与现代农村广泛使用的铁镰近似，只不过现代铁镰把捆绑式的装柄方式变成了插釜式的装柄方式。收割粟的石镰为什么刃部做成锯齿形呢？这是受到了石料本身的限制。如果石镰的镰身磨制得过薄，镰刃虽锋利，但在石质较脆的情况下，使用时石镰容易折断；而石镰如磨制得过厚，则无法割断粟秸。石镰磨制得既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但这样石镰的刃部就无法锋利得割断粟秸。因此只能变通一下，把石镰的刃部加工成锯齿状，增加其割锯的能力。裴李岗文化的石镰出土很多，这些石镰曾承载着先民们丰收的喜悦。

收割后的粟需要脱粒。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先民用石磨盘和石磨棒给粟脱粒。石磨盘多呈前宽后窄的鞋底形，底部有四个短足，盘面平滑，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石磨盘与石磨棒配套使用，脱粒时把带壳粟放在石磨盘的盘面上，然后双手握住石磨棒的两端，在盘面上来回搓磨，使粟壳和粟粒分离。磁山文化的粟作加工已成一定规模，在磁山遗址的三个发掘区发现了由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和陶孟、陶罐、陶三足器、陶支架等组成成组器物的出土点45处。石磨盘大多平放，陶孟、陶支架分散放置，有的陶孟置于支架上，其他石、陶器均在石磨盘附近。这些组合物的出土点呈聚合状，少则三五组聚合，多则十余组聚合，各组的距离都很近。组合物中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粮食加

工工具，石斧和石铲是修整场地的工具。组合物的出土点实际上是粮食加工的劳动场所。

当时粮食已经出现了剩余，在磁山文化中存在大量储藏粟的窖穴，在窖穴的粮食堆积中，常有用来盛取粮食的完整的陶器，如63号窖穴出土两件陶孟，242号和123号窖穴各出土一件陶孟。

根据碳-14测定的综合数据，可知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年代在前6000年至前5600年之间。此时的粟作农业已经较为发达，早已超越了粟作农业的起源阶段。寻找粟作农业的起源，仍是中国考古学家的一项艰巨任务。

到约前5000年至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粟作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此时粟的产量已有很大提高，所发掘的仰韶文化较大的遗址，均有许多内储大量粟粒的窖穴，并且这些储存粮食的窖穴大多经过细致的加工修整，其坑壁及底部平整，甚至打磨光滑，涂以草泥土或用火焙烧。仰韶文化储存粟的窖穴，主要有口大底小的袋形穴、长方形圆角穴、椭圆形穴、圆形直壁穴等几种类型。小的窖穴容积在2立方米左右，大的窖穴容积在5立方米左右。另外，仰韶文化先民也用瓮、罐之类的陶器储藏粟。

仰韶文化先民收割粟的工具主要是两侧带缺口的打制石刀和陶刀，仅西安半坡遗址就出土了150多件这类石刀和陶刀。这种收割用的刀，使用时利用两侧的缺口系绳套在手上，刃部朝下，以拇指和刀刃相错把穗秆切断。这种收割方式在近代仍可见到遗风，如河北的爪镰、东北的捏刀、黎族的手捻刀、侗族的摘刀都是类似仰韶文化两侧带缺口石刀和陶刀的收割工具。仰韶文化两侧带缺口石刀和陶刀制作简单，而且其实际效用不比



石磨盘、石磨棒

裴李岗文化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
石磨盘长63.5厘米，宽28厘米，
石磨棒长47.8厘米

制作复杂的石镰差，因此成为当时的主要收割工具。

考古发掘出土的仰韶文化磨制石斧数不胜数，仅西安半坡遗址就出土了300多件，这些石斧通体厚重，断面多呈椭圆形，有些石斧明显带有装置木柄所需的榫面。这些石斧是仰韶文化先民砍伐林木、开垦耕地的重要工具。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尚处于生荒轮作制阶段，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不停地开垦一片一片的耕地，丢弃肥力已耗尽的耕地。开垦耕地所砍伐的大量树木，等干枯时即用火焚烧，烧过的草木形成松软的灰肥，有利于种植谷物。由于仰韶文化时期的农耕方式比较

粗放，缺乏中耕翻地，耕地上的灰肥会大量流失。通过对近代西南地区尚保留刀耕火种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调查得知，火耕地的肥力减退很快，土壤容易板结，一般耕种一两年就要丢荒。一个仰韶文化的人群可能同时有三块耕地，即一块已丢荒的耕地，一块正在耕种的耕地，一块正在开垦的耕地。不停地丢荒，不停地开垦，不停地轮作，会使播种的耕地离居所越来越远，为了耕种方便，这个人群就会舍去原来的居所，在新的耕地附近建造新的居所。民国时期学者陶运涛在西南作民族调查时，记载当地人“其所居之地力竭，乃迁居他处，再辟若干，另筑新屋”。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一些河岸台地上,会沿河分布着密集的仰韶文化遗址。古代牧民逐水草而居,从事原始农业生产的仰韶文化先民则逐耕地而居。

北方地区的中耕农业大约出现在中原龙山文化的早期。至迟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关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只测了庙底沟遗址的一个标本,经树轮校正为前 2780 ± 145 年),已使用挖土工具——木耒。这是一种双齿木叉形的工具,齿长20厘米,齿间距约4厘米,齿径约4厘米,在庙底沟遗址的灰坑壁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木耒留下的痕迹。中原龙山文化时期,中耕农具的使用越来越普及。洛阳王湾遗址和郑州大河村遗址都出有一种扁平长方形的平头石铲,便是一种捆绑木柄的挖土工具。邯郸涧沟遗址出土了不少当锄用的扁平长方形石铲和方形厚壳蚌器。长安客省庄遗址出土有一种用大型家畜下颚骨制作的骨锄。使用耒、铲、锄等中耕农具进行人工深翻地和锄草,可以增加

地力,延长土地使用年限。这种农业生产方式,我们称之为熟荒耕作制。

新石器时代,粟在北方地区被广泛种植,除黄河中游地区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的原始居民种植粟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居民也种植粟。根据中国考古学家半个多世纪的发掘所获取的资料,我们可以这样说,粟是在中国黄河流域首先被驯化、种植的,黄河流域的农业起源是以粟的驯化为主体的。

粟起源于华北地区后,有一个不断地向四周传播的过程:向东传到东北地区,沈阳新乐、赤峰蜘蛛山、大连郭家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出土过粟;向西南传到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粟;向南传到台湾,凤鼻头文化的牛稠子遗址、牛骂头遗址出土有粟。从考古发现看,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粟的种植远远晚于黄河流域。

第十章

生产与生活



第一节 居住和饮食

在新石器时代，农业和定居是同时出现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定居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建造相对稳定的房屋。考古发掘表明新石器时代的房屋有穴居式、半地穴式、干栏式、地面式和窑洞式几种形式，多种多样的居住方式是由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穴居式是较早的建筑形式，通常是挖地为穴，穴壁上挖有供人上下的脚坑或阶梯，穴口盖有遮蔽风雨的棚盖。这种房屋保暖性较好，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常见。半地穴式也是新石器时代较早出现的房屋形式，这种房屋是先在地上挖一方形或圆形浅穴，穴壁作为房屋的墙壁，再在其上加盖房顶，房屋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大量这类的房屋。干栏式

房屋是以高出地面的桩柱为底架，上铺木板，再建长脊短檐式的屋顶。这类房屋可较好地防潮，适于沼泽地区的居民居住，主要出现在中国南方地区。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这类房屋遗迹和构件。窑洞式房屋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较具特色的建筑形式，是一种在生土上挖成凸字形穹窿顶的洞穴建筑，窑洞内用石灰涂抹地面的墙裙，有的窑洞还有院落。窑洞冬暖夏凉，在陕西、内蒙古的龙山文化中常见这类房屋。地面房屋是指平地起墙架屋的建筑，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最常见的房屋形式，可用木、泥、草等多种材料建造。

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半地穴房屋最具有代表性。通过半坡遗址，我们可窥视到当时人们居住和生活的一些片段。半坡遗址是一个聚落遗址，占地面积约5万多平方米。整个村落呈不规则圆形，居住的房

屋、烧陶的窑场和埋葬的墓地，都有一定的分布区。房屋在村落的中心，有半地穴式圆形和方形的房屋、储藏东西的窖穴和饲养牲畜的圈栏。居住区内又分为两个部分，中间有小的沟道为界。每个部分都有一个公共活动的大房子，大房子周围分布着氏族成员居住的小房子。考古学家一般认为：这是由两个母系大家族组成的氏族。姜寨聚落遗址的布局更加清楚，这里居住着由五个母系大家族组合起来的一个氏族，整个居住区也是作圆形排列，分成五组居住，属于同一时期的房屋有60多座，每个群落有十四五间小房子，中间是一个大的广场，房屋的门都朝向广场。储存东西的窖穴往往散落在各个房屋之间。墓葬区在居住区的南边。居住区外面有一道壕沟将村落围起来。

到龙山文化时期，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功能上，房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映父系氏族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结构的房屋增多了。如大何村遗址晚期开始出现单元式住房，可分为四间，每间居住面积都不大，有

的房间在居住一段时间后，可能由于人口增多或子女长大，又在墙外扩建两个小房子。在这种单元房址中，一般都有整套的生活用具，如炊具、盛贮器、石斧、纺轮等，有的房屋里还发现了整瓮已炭化的粮食。

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饲养家畜，从茹毛饮血到蒸煮熟食，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中国北方的居民就普遍种植粟，磁山、裴李岗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更加普遍，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很多窖藏储存大量的小米，说明当时的农业已有相当的规模，且有剩余可供存储。小米无疑是新石器时代北方居民主要的食物。有学者曾经对仰韶文化时期的人骨进行碳-13测定，发现半坡人食谱中有近一半的 C_4 植物成分。小米是 C_4 成分，说明小米在半坡人食谱中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以种植水稻为主，湖南彭头山遗址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炭化稻，河姆渡遗址也发现不少炭化稻。

姜寨母系氏族村落复原图

位于陕西临潼姜寨的母系氏族村落遗址，面积为55000平方米，在这里共发现房屋遗址百余座。村落中心是广场，四周有五组建筑群，每组都以一座大型房屋为主体，附近拥有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所有房屋的门都朝向广场，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凝聚力。



小口尖底瓶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高46.2厘米





红陶釜。灶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

1957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
釜高10.9厘米,灶高15.8厘米

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驯化了狗、猪、牛和羊,尤其是猪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成为主要的肉食来源。当然人们还狩猎鹿、獐、狍子、兔子、野猪等野生动物,作为家畜不足的补充,另外,还在河边捕鱼,拣拾螺蛳和贝类,采集野果等等。

从考古发现的一些炊具种类来看,当时人们可能是用陶罐、陶鼎煮饭、煮肉,用陶甑蒸饭,用陶钵或陶碗吃饭。陶豆可能是用来盛放菜蔬和肉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出土一种内壁带有刻槽纹的陶器,被称为“擂钵”,据考证,这种器物是用来加工块茎或根茎类植物的一种用具。例如加工芋头或藕一类的块茎时,人们可一手扶住器物,另一手持块茎在器物的周壁或底部的凹槽上磨搓,使之呈糊状,再进一步加工成适当的食物。从剩余粮食和出土的陶杯等酒器推测,当时的人们已经有酿酒和喝酒的习惯。总

之,新石器时代人们的食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第二节 开发型的经济——家畜饲养

随着农业的发展,对动物的驯化也开始了。有学者把新石器时代人类获得肉食资源的方式归纳为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三个阶段。依赖型是指人类通过狩猎或捕捞的方式获取野生动物。初级开发型是指人类开始饲养动物,开发某些野生的动物资源。开发型是指以饲养活动为主。整个新石器时代人们对动物的饲养就经历了从初步开发型到开发型的过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狗是最早被驯化的家畜。在西亚,最早的家狗大约出现在12000

扁足陶鼎

新石器时代 良渚文化

1955年浙江吴兴钱三漾出土

高31.6厘米



年以前。中国是狗的起源地之一。根据有关专家研究，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狗的证据见于距今约9000年的贾湖遗址，在此遗址中有11条狗被分别埋葬在居住地和墓葬中，这应该是当时人对家养动物的一种有意识的处理。之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普遍含有狗的骨殖，可见狗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中有多么重要。

一般说来，一种动物能被成功地驯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必须是人类的基本食物，而且有饲料供给，使之能转变为肉类。就这一点而言，狗又是一个例外，因为它们虽是食肉类动物，但其食料很庞杂，它们消费人类大量的废弃物，如垃圾和粪便，可使得居住地保持清洁，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狗成为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另外，狗具有易驯化、灵敏和快速的特点，是人类狩猎的好帮手，这也是狗之所以被人类最早驯化的重要原因。

比狗稍晚一点被驯化的动物是猪。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中国最早的家猪骨骼出自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约8000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期也出现了家猪骨骼，年代距今约7800年。实际上最早的家猪和野猪是很难区分的，动物考古学家对家猪的判定，主要是通过将一些遗址中出土猪的上、下颌第3后臼齿测量数据和现代家猪的相同部位的测量数据相比较来确定的。另外遗址中出土的猪骨以存活12个月到24个月的占大多数，这种存活结构绝非狩猎可以达到，



陶猪

新石器时代 河姆渡文化
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长6.7 厘米

因此研究者以为距今约8000年的磁山遗址已存在家猪。

家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家畜。近年来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动物种类的统计及对动物骨骼的定性定量分析，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含家猪骨骼的遗址比例相当高。学者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各遗址出土的动物种类、数量加以统计的结果表明，在43个遗址中，含家养猪骨骼的遗址为38个，只有5个遗址中不见家猪骨骼。各个遗址不同时期家猪骨骼所占比例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猪占越来越大的比例，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的主流，这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的一个特点。以河南浍池班村遗址为例，其文化层自下而上分别为裴李岗文化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层、庙底沟二期文化层、战国时代文化层等。研究者运用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对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统计，结果表明，裴李岗文化层里家猪19头、

狗2只，以家养猪为主体的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59%，鹿科等野生动物占41%；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层里家猪27头、狗1只、鸡2只，以家养猪为主体的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84%，鹿科等野生动物占16%；庙底沟二期文化层里家猪31头、狗5只，以

家猪骨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
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家养猪为主体的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83%，鹿科等野生动物占17%。这有力地说明，随着农业和定居的发展，家猪越来越成为当时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

牛和羊作为家畜在中国出现的时代并不算早，比较确切的较早的家养牛和羊的骨骼均出自甘肃大何庄遗址和相邻的秦魏家遗址，距今约4000多年。这两个遗址分别出土了50多块羊的下颌骨，羊的肩胛骨还被用作卜骨使用。秦魏家遗址还出土了38块牛的下颌骨，并在石头堆成的祭祀坑边发现了一具被砍头的母牛骨架，母牛的腹中还怀有一头小牛。根据这些文化现象，可以认定4000多年前牛和羊都已经成为家畜，并已在人们生活中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中，家养的牛和羊渐渐地多了起来，与家狗和家猪一起成为主要的家畜。家畜饲养与农

业便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生产活动了。

第三节 依赖型的经济——捕鱼、狩猎

新石器时代，农业与家畜饲养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但捕鱼和狩猎作为农业和家畜饲养的一种补充和辅助性生产一直是存在的，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除发现有作为家畜饲养的猪、狗、牛、羊以外，还发现不少作为狩猎获得的动物，如梅花鹿、麋鹿、獐、麂、马鹿、狍子、虎、狼、熊、獾、猴、兔、中华竹鼠以及鱼、蚌、龟等。随着动物考古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展，考古学家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种属鉴

船形彩陶壶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高24.8厘米



定,及运用最小个体数等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统计,我们对古代人类利用的动物种类和数量都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

据有关学者研究,中国黄河中上游地区绝大多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的家养动物百分比的逐渐递增和野生动物百分比的不断减少,是与古代人类定居、农耕并存的饲养活动的逐步发展相关联的。值得注意的是,狩猎动物的减少可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的减少有关。狩猎有一定偶然性和危险性,但就偶然性而言,如果当时居住地周围的野生动物数量相当多,古代人捕获它们的概率就比较高,可以将这些动物作为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比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黄淮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遗址中仍能看到野生动物占相当大比例的情况。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多数野生动物都不属于猛兽,这样的狩猎活动对人身所构成的危险并不严重。有学者对河南浍池班村遗址出土的骨骼所属动物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各个文化层出土的动物比例有所不同。以鹿科动物为例,在裴李岗文化层中,鹿科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0%,而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层中鹿科动物仅占动物总数的10%不到。这种情况暗示了在某些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狩猎活动的频繁,鹿科动物这种个体较大、不易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动物首先被捕获殆尽。狩猎对象越来越少,人们就不得不去发展家畜驯养。依赖型经济主要是依靠狩猎和捕捞,要了解当时人们狩猎和捕捞的情况主要是通过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和狩猎工具。至于推测当时人们狩猎的方式方法则需要借助民族学的资料。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即已知道选择离河流、湖泊较近的地方定居,这是为了便于获取水资源中的鱼、蚌等。大多数新石



骨鱼镖

新石器时代
1985年吉林农安左家山出土
长12.6厘米

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各类鱼骨,尤其在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发现了大量鱼骨,还发现有圆形或椭圆形窖穴十个,其中排列着一层一层的鱼骨,可能是贮存鲜鱼的鱼窖,遗址中还发现了镞、投枪头、鱼镖、鱼叉、鱼卡等捕鱼工具。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的网坠、箭头、鱼钩、鱼镖等就有644件,由此可以判断,半坡人是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的生活。另外在江西万年仙人洞,浙江余姚河姆渡,陕西西安半坡,江苏邳县刘林、吴江梅堰、海安青墩,山东临沂援驾墩,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等遗址都出土有脱柄鱼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用脱柄鱼镖捕鱼在新石器时代是相当流行的。新石器时代的

骨哨

新石器时代 河姆渡文化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长6厘米至10厘米



螺蛳壳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
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脱柄鱼镖多用动物骨骼制成，形状各种各样，一般都有一排或两排倒刺，铤部有穿孔或挖槽供穿系绳索。使用时将镖插入木柄前端，在镖铤上系一长绳索，另一端握在手中或拴在木柄上。刺中鱼后，鱼的挣扎和水的阻力使镖与木柄脱落，镖头牢牢钩住鱼身，捕者可挽绳取鱼。除了脱柄鱼镖，其他捕鱼工具也有发现，比如在半坡、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有骨鱼钩，其形状与现代的鱼钩相似，制作精良，分为有倒刺和无倒刺两种。还有一种有趣的捕鱼工具叫骨鱼卡，曾于1972年在辽宁大连于家村遗址发现。这种骨鱼卡长2.4厘米至4厘米，中间粗，两头尖。据民族学家考证，使用时在捕鱼卡中间拴上鱼线，插进诱饵内，鱼吞食后即卡住两鳃，捕鱼者可挽线取鱼。在新石器时代也已知道用鱼网进行较大面积的捕鱼。网用麻绳制成，易腐烂，没有实物保存下来，但陶网坠和石网坠的大量发现，似可证明撒

网捕鱼方法的存在，撒网捕鱼或下网捕鱼比起用鱼镖、鱼钩逐个捕鱼的方法要进步许多，一网下去，可能捞到几十条上百条鱼，大大地提高了捕鱼的效率。

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狩猎工具是弓箭，几乎所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能发现石镞、骨镞或蚌镞，说明弓箭在新石器时代被普遍地运用。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弓箭就已经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弓箭仍然是一种先进的狩猎工具。弓箭可以通过瞄准，提高命中率。狩猎者躲在隐蔽处，可以远距离射杀野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一些考古遗址中的间接材料和民族学的材料中可以推测，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有可能已经使用毒箭。山东烟台白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河豚鱼骨。河豚的肝脏、卵巢和皮肤含剧毒物质，对其内脏和鱼液做特殊的处理后人才能食用。河豚鱼骨在遗址中的出现，证明当时的人已掌握了食用有毒鱼的知识 and 处理剧

毒物的方法。由此也可以推测，他们有可能将这类毒汁用于制造毒箭，以便狩猎。

新石器时代还有一种独特的狩猎工具骨哨，猎人利用骨哨模拟动物鸣叫，吸引动物，等候时机捕获猎物。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许多骨哨，长6厘米至10厘米，均为禽类的骨管制成，一侧刻孔，有的骨管内还插一根可以移动的肢骨，用于调节声音。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中以鹿科动物居多，仅鹿角就有400多件，可见当时人类狩猎的主要对象是鹿类，骨哨可能就是被用来捕获鹿类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许多沿海或沿河遗址属贝丘堆积，其中含有大量贝壳和鱼骨，这些动物硬壳大部分发现于地层和灰坑中，显然是人们食用后的废弃物。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报道的软体动物中有中华圆田螺、圆顶珠蚌、丽蚌、楔蚌、尖脊蚌、河篮蚬、矛蚌、毛蚶、文蛤、螺蛳、无齿蚌、青蛤等，可谓品种繁多。不同的软体动物分布于不同的地区或地域，中华圆田螺主要分布在华北和黄河流域的遗址中；沿海遗址中发现的种类则比较杂乱，往往既有淡水动物又有海生动

物，像山东广饶王村遗址，离海较近，地层中既有丽蚌、楔蚌、尖脊蚌，也有生息于河流入海口处的毛蚶、文蛤、牡蛎等浅海软体动物。蚌类的肉可食，壳可用来制作工具和装饰品，蚌类的捕捞也相对容易，是新石器时代沿海或沿河居住的先民经常食用的食物。

第四节 精美的陶器

陶器是指以黏土为原料，经成型、干燥、焙烧制成的器皿。它出现并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生活用具，也是新石器时代主要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传奇性的记载，如《列仙传》中有“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陶说》中有“神农耕而作陶”的记载，这些都反映出古代人搞不清究竟是谁发明了制陶，就把它归功于某些理想中的人物。应该说制陶是古代先民们长期生产劳动的结晶。在生产劳动中，人们对泥土的黏性、可塑性有所认识，知道泥土加水调和后



泥条盘筑法示意图

泥条盘筑法是仰韶文化时期广泛使用的一种制陶方法。这种方法是先将陶泥搓成条状，再把泥条盘圈叠筑至一定高度成为器壁，最后利用慢轮修整即可做成某种形状的器坯。

可以捏塑成各种形状，人类还可能发现黏土泥坯经过日晒与火烧而变硬，从中受到启发。这些都是陶器发明的先决条件。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过上了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对煮熟和储存食物的用具有强烈需求，陶器便应运而生了。在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已普遍使用陶器。

早期制陶主要采用手制和模制的方法。手制就是直接用手捏成型，或用泥条盘筑法、泥条分段接法和泥片贴塑等方法对陶坯加工成型，然后再经火烧。泥条盘筑法是较常用的制陶方法，其做法是先用泥料做成一个圆饼状的器底，再搓成若干泥条，将这些

泥条围绕圆饼底的边缘筑成器壁。模制法是用编织容器或葫芦等作为模具，把黏土涂在容器上，经过火烧而成。

早期的陶器胎壁厚薄不匀，粗糙，火候也较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的距今约1万年的陶罐和陶片，均为夹粗砂红陶，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显然是用手捏制成器，制陶技术相当原始。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陶器。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制陶技术在不断提高。距今约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盛行红陶和彩陶。彩陶是指用不同颜色绘出各种图案

鱼鸟纹彩陶壶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高21厘米



的陶器，具有突出的时代和地域特点，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彩陶所用的彩料颜色有黑、红、棕、白四种，以黑彩为主，红彩次之。据研究，黑彩和棕彩的着色剂是氧化铁和氧化锰，黑彩氧化锰的含量高于棕彩；红色的着色剂是氧化铁。这些颜料都取自于矿物质，如赤铁矿、赭石、锰铁矿、铁锰结核等。白色颜料主要取自高岭土。当时人们使用专门的工具研磨颜料。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了红颜料锭、研磨盘和研磨棒，有的研磨盘分为两格，可以分别研磨不同颜色的颜料，多数研磨棒上粘附着红色颜料粉末。由此推测是先将颜料砸碎，再研磨成粉

末装在陶容器中或团成小块做成锭条备用。据观察，北首岭的红颜料锭质地细腻，推测曾用淘洗法除去粗颗粒。有人进行过实验，用赤铁矿粉末制成的红颜料锭，使用时加水研磨成颜料浆，十分方便。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技术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就是普遍运用陶轮制陶。陶轮是一个装有直立转轴的圆盘，把和好的陶土或粗坯放在陶轮的中央，使陶轮转动，同时用手捏陶土或用工具使陶土成型，并使坯面光洁。用陶轮制成的陶器胎壁均匀，外形美观，还可大大提高生产率。这时期陶窑的结构有所改善，烧陶温度提高，可达1000℃。



黑陶罐

新石器时代 龙山文化
1974年至1975年山东胶县
三里河出土
高24.5厘米

涡纹双耳四系彩陶罐

新石器时代 马家窑文化
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出土
高50厘米



距今约4000年前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用陶轮制出的单色无彩陶器，以黑色为主，胎极薄，有的仅厚0.5毫米，素有“蛋壳陶”之称，相当精美，代表了这一时期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制陶的最后一个工序是把成型的器物放在陶窑中烧制，陶窑所达到的温度往往决定陶器的质量。估计在陶窑产生以前，曾有过在平地堆烧的阶段，但这只能从民族学资料中加以印证。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窑址，窑址的大致结构可分为横穴和竖

穴两种。横穴窑的结构比较原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盛行于仰韶文化。这种陶窑在圆形窑室前面有较长的穹形筒状火膛，最初窑室和火膛处于同一水平面上，燃烧时火焰由火膛进入窑室。后来窑室升高，火焰通过倾斜的火道和窑算的火眼进入窑室。竖穴窑出现于仰韶文化，盛行于龙山文化，其结构早晚有所不同。早期窑室位于火膛之上，火膛为口小底大的袋形坑，有许多垂直的火道与窑室相通。晚期的火膛逐渐移至窑室的下前方，火焰沿倾斜的火道进

入窑室，窑室的底部有数股沟状火道，上面有多个火眼的窑算，可起均匀火力的作用，但也有的窑室底部只有平行的或呈“北”字形的沟状火道，不见窑算。无论横穴、竖穴的陶窑，上部一般都呈弧形往里收缩，以便封窑。陶器烧制的温度有地区和时间差异，黄河流域一般为 900°C — 1050°C ，长江中下游一般为 800°C — 950°C ，华南早期陶器为 680°C ，而晚期陶器则为 900°C — 1100°C 。这些差别主要与陶窑的结构和制陶工艺的发展水平有关。

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已广泛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炊器、食器，还是水器和储存器，无处不见陶器的影子。

炊器有陶灶、陶支子、陶釜、陶鼎、陶甑等。陶灶在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均可见到，一般有火门、火膛和灶口，使用时在灶口架置炊煮食物的釜、罐。陶支子也是一种灶具，可作为垫在陶釜、陶罐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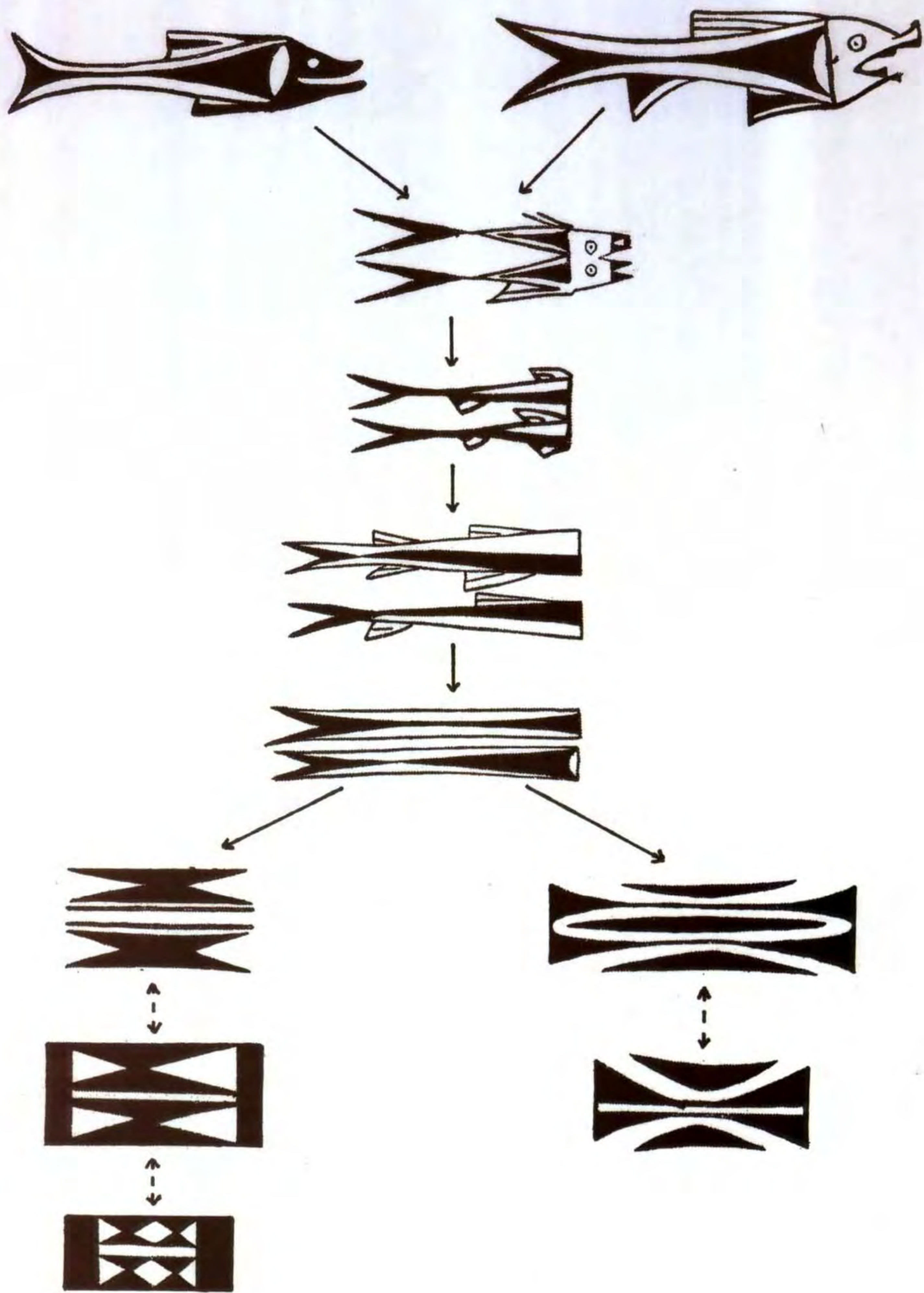
下的支撑物，形体较小，形制多样，有圆柱形、方柱形、倒靴形等，使用时三个为一组，把炊器垫起来，使炊器底部形成一定的空间，以利于烧火炊煮。陶釜有点像现在使用的锅，多见于长江流域的遗址中，通常为圆口、圜底、深腹，可放在陶支子或陶灶上架火烧煮。陶鼎是这个时期最常见的炊具，其形制各种各样，有大有小，有敛口的，有深腹的，也有浅腹的；鼎腿有扁的，有圆柱形的，也有尖锥形的，但其共同特点是均有三条腿或称三足，可在三足下直接架火烧煮食物，是集炊具和灶具为一体的烹饪器。陶甑的形状像罐，但底部往往有若干个小孔，有点像今天蒸锅的算子，主要是用于蒸食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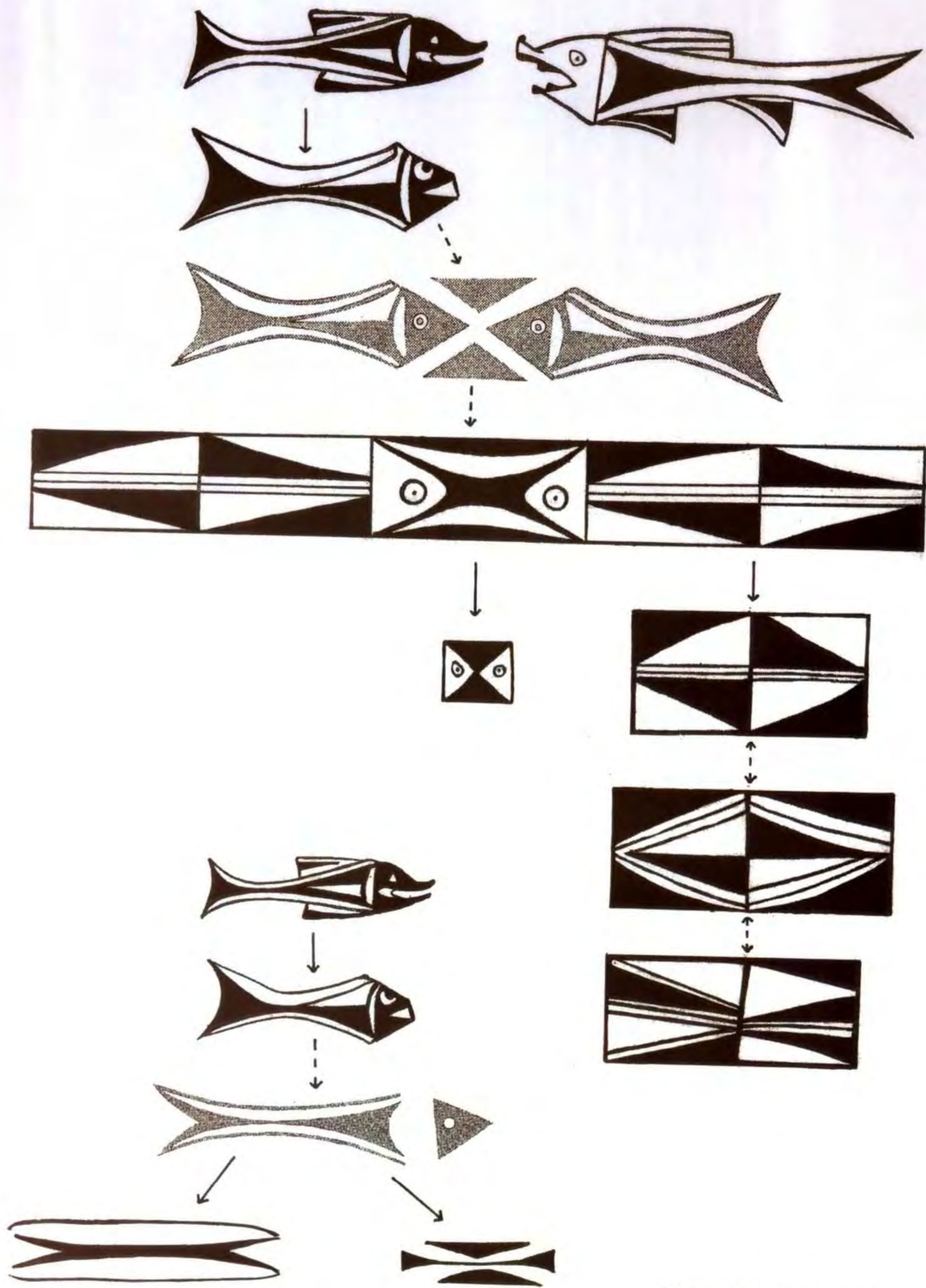
食器有陶钵、陶碗、陶杯、陶豆、陶盘。陶豆是一种比较独特的食用器，它是由圈足碗发展来的，分为盘、柄和座三个部分，盘可用来盛菜，柄便于手握，座可平稳地放置

鱼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
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口径28厘米







半坡遗址彩陶上的鱼纹演变关系图

陶拍子

新石器时代 龙山文化
1955年陕西西安客省庄出土



于地上。在桌、椅还没有的情况下，人们席地而坐，用陶豆装满烹饪好的菜、肉，食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水器主要是指取水、盛水的器物，如裴李岗文化中的小口、平底或圈底双耳壶，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大汶口文化的背水壶等。背水壶制作得都很精致，在肩部和腹部往往绘有精美的图案。小口尖底瓶是一种有效的汲水工具，其腹部两边的环耳处可系绳，汲水时手提绳子将瓶置于水中，因瓶腹是空的，重心在瓶的中上部，瓶就倒置于水

中；当注满水后，重心就移到瓶的中下部，瓶口就朝上直立起来。

储存器的种类很多，有陶盆、陶壶、陶罐、陶缸和陶瓮等。它们大多数是用来存水和储物的，有些也有特别的用途，比如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一个小口罐中存有菜籽。大陶瓮有两种用途，一是用来储存粮食，二是用来盛放小孩的尸骨。

新石器时代日常生活所用的陶器中不乏艺术珍品。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有宽带纹、竖条纹、三角纹、斜线纹、圆点纹、波折纹和月牙状花纹，这些纹饰常常相互搭配，组合出数十种图案，十分美观。有些彩陶上画有鱼纹、鹿纹、鸟纹、人面鱼纹等，栩栩如生，生动可爱。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则是以线条纹、涡旋纹、圆点纹和蛙纹为主，主要表现河流、水及与水相关联的事物，传达出一种动态的美。山东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是一种别具风格的艺术品，以黑陶杯为例，除去胎壁薄、器壁内外黝黑、表面有光泽外，腹下多有细弦纹，中空的柄部有多种纹样的镂

袋足内模

新石器时代 陕西龙山文化
陕西西安斗门镇出土



孔，高柄又多饰以竹节纹、波纹和弦纹，刻画花纹组成的图案有复线交错的方格、菱形、水波形等，显得高雅而别致。

除去日用的陶制品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不少陶塑艺术品，这类艺术品以动物题材居多，像猫头鹰、猪、狗、羊、鸡、鸟、象、熊、豹、猴、鼠、鳖、鱼、蛇、蛙、蟾蜍、蜥蜴、壁虎等，其中猫头鹰、猪、狗、羊、鸡、鸟等最为常见。陕西华县太平庄遗址出土的猫头鹰器盖，造型奇特，采用陶土捏塑成圆饼形，再在正面雕刻出鹰嘴及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眼、嘴周围又锥刺出有毛感质的羽毛，基本显现出猫头鹰的特点。在同一遗址还发现了一件陶鸮鼎。整个器形为一鸮形，鸮双眼凝视前方，造型浑厚、质朴。双足加尾部形成非常稳固的三个支点。类似的器物不仅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曾有学者认为，这类器物一般不是作为日常的生活用品，而是当时人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器具。

且还开始编织席子。由于编织物易腐烂，不易保存，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实物并不多。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块芦苇席残片，长22厘米，宽16厘米，是采用两经两纬的编织法编成的。估计当时河姆渡居民是把苇席铺在干栏式建筑的房屋地面上。河姆渡居民居住在温暖多水的沼泽地带，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藻类、菱角、葫芦等水生植物遗存，当时此地也生长着茂密的芦苇，为当地居民编织苇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另外在吴兴钱山漾遗址中还发现了篮筐、竹席、鱼篓和簸箕等，编织出的纹饰有一经一纬的人字纹、菱形花格、梅花眼、十字纹等。

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底部留有编织席纹印痕，这证明当时是用编织的席子作为烧制陶器的衬垫。根据这些编织印痕，学者们把这一时期的编织技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斜纹编织法。这种编织法是纬带和经带垂直相交，纬带下穿两根或数根经带而成，所织成的纹样成斜交状。其中最精致的纹样是人字纹，经带和纬带都是

原始腰机使用示意图

第五节 编织、纺线和织布

编织作为一种原始的手工艺，可以追溯到中石器时代。欧洲中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中可见篮、筐的形象资料。据推测，编织技术的发明与采集经济有关。当人们采集到野果或植物根茎时，需要尽可能多地把它们带回居住地，给老、弱、病者食用。大概是受了鸟筑巢穴的启示，人们开始编织篮筐，以满足采集和携带采集物的需要。到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和制陶的出现，各种各样的篮筐也出现了，人们不仅编织和使用篮筐，而





布纹陶钵底部印痕（左）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
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口径14.7厘米
这件陶钵的底部印有布纹印痕。是制陶时把未干陶坯放在麻布上衬垫所致。



席纹陶钵底部印痕（右）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
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口径17.4厘米
这件陶钵底部印有席纹印痕。是烧制陶钵之前用席子衬垫未干的陶坯所致。

扁条状，宽窄相同，彼此穿过压下两条或三条，依次推移织成。这种纹样即使是在现在的苇席中也是常见的。第二种是缠结编织法。纬带穿过经带一根，即压两根，并缠绕后面一根，后一条则缠压前一条所压后面的一根，编出的纹样成斜交人字纹。第三种是间格纹编织法。经纬两带垂直相交，互相相间压穿而成。应当说以上编法不仅限于仰韶文化中，在这一时期其他文化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新石器时代初期，人们可能先学会用葛、麻等具有韧性纤维的植物像编筐篮那样织成土布，后来发明了纺轮，可纺出细软的纱线。位于土耳其西南部距今9000年至8000年的哈吉拉尔遗址中曾出土过世界上较早的石纺轮。中国南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大量的陶纺轮或石纺轮出土。纺轮是用来捻绳和捻线的一种工具，以圆形居多，中央有孔，纺纱时安有纺杆，以手捻动纺轮，利用圆盘转动时产生的力，使纤维捻合与续接，进行纺纱。

原始的织布方法是把一根根纱线依次系在一根木棍上，另一端也以同样的方法系在

另一根木棍上，并把这两根木棍固定了的纱线绷紧，这样就可像编席子一样有条不紊地编结了。通常人们把一根根的纵向纱称为“经纱”，依次横向织入的纱称为“纬纱”，当经纱组成的经面被纬纱交织完毕，织物就编成了。这种织布方法效率较低，后来人们在此基础上发明了原始织布机，其原理是用木棍把经纱单、复分开，只要提起一根木棍，所有的经线单数都可抬起来，纬线可一下子穿过，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为了使经纬交织紧密，再用一把扁平的木刀把纬线打紧。腰机便是这种原始织机的一种。其结构简单，织者席地而坐，脚蹬经轴，腰系布轴，将经线拉直，利用分经棍将经线挑出梭口。穿纬后，再用纬刀将纬线打齐。如此交替操作，循环织造。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很多大小不一的木棍和扁刀，有学者根据民族学资料推断它们很可能就是腰机的部件。

织物的原料，开始人们主要利用植物中的天然纤维，如麻、葛等。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底部即有麻织品印痕，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出土了以野生葛为原料织成的葛布，在吴兴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了麻布，据研

究这两类布均是运用原始织机织成。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开始知道利用蚕丝。早在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的仰韶文化遗址时，即曾出土过人工割裂的蚕茧，但当时有不少考古学家认为这只是个孤证。到了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绢片、丝线、丝带等，经鉴定它们为家蚕丝织物，织物密度约为每厘米47根。这使人们对新石器时代已知利用家蚕丝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从丝织物的密度，不难看出当时的纺织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第六节 神奇的玉器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产玉，并有加工玉器的传统，但玉器加工在中国有着最悠

久的历史和最独特的工艺。何为玉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玉，石之美者。”玉色彩鲜丽，质地坚韧，细腻匀润，化学性能稳定。按照近代矿物学的分类，玉还可分成软玉和硬玉两大类，它们在成分上有所区别。软玉属于钙、镁的硅酸盐，硬玉属于钠、铝的硅酸盐。但钙、镁的硅酸盐并非都是软玉，软玉是指含有束状纤维结构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这类矿物有极大的坚韧性，在天然矿物里，仅次于黑金刚石，硬度在莫氏硬度6度至7度之间。钠、铝的硅酸盐也不全是硬玉，而只指硅酸盐中含隐性结晶结构的单斜辉石系列，其硬度在莫氏硬度7度以上。无论软玉还是硬玉，它们的颜色都应该是无色或白色的，但往往由于结构中含有其他物质或后期发生沁染等，使它们在颜色上发生变化。软玉常见的颜色有黄褐色、灰色



玉龙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
1973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
他拉出土
高26厘米

锥形玉饰

新石器时代 良渚文化
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7号墓
出土
长3.3厘米至12厘米



和青绿色，硬玉则以翠绿和苹果绿最为常见。用肉眼识别，硬玉一般表面光润；软玉的光泽似乎带油性，但不像滑石那样看起来黏乎乎的。中国史前的玉器几乎全部为软玉。

中国人自古就对玉石有着特殊的偏爱，把玉石作为纯洁、美好的象征。玉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姆渡遗址中曾出土过玉管、玉珠、耳坠等小型玉饰。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能制出精美的玉琮、玉铲、玉镯、玉璧等，很多玉器上刻有细密的弦纹和兽面纹，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在缺乏金属工具的史前时期，能制出如此精致的玉器，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玉器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许多遗址中都可见到，迄今为止，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广东、西起甘肃、东到浙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玉器出土。有代表性的玉器主要分布于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中。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要数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

红山文化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是1973年在内蒙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的玉龙。这

件玉龙用墨绿色玉制成，琢磨相当精细，是中国已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部突出，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两个并排的鼻孔，似有猪首的特征。红山文化中有代表性的玉器还有在牛河梁遗址第2地点1号冢4号墓出土的玉箍形器，为碧绿色，长扁圆筒形，内侧有明显线割痕。在牛河梁第2地点还发现一件勾云形大玉佩，是迄今为止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器是用含黄斑点的深绿色玉制成，器物长而薄，有正反面之分，反面稍内弧，正反面均饰瓦沟纹，正面纹饰比较规整，纹饰间透雕小圆孔和窄条形镂孔，外形对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发现大量的玉钺、玉琮、玉璧、玉冠饰、玉端饰、玉管串、玉环、锥形饰等。从数量来看相当可观，据统计，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达1100多件，瑶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也有700多件。仅以玉钺为例，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江苏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等遗址均有出土。有的玉钺除钺体外，还在钺柄的顶端和尾端装有玉质的冠饰和端饰。反山墓地12号墓中出土了1件柄端饰有白玉冠饰与端饰的青玉钺，钺的弧刃的上下两角处都雕有线刻图像，上角雕有“神徽”，刻的是一神人的形象，巨目阔嘴，头戴饰有羽毛的冠饰；与“神徽”相对应的下角，雕有一只神鸟。有一件被称为琮王的玉琮，器表纹饰繁缛，每组兽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是一个倒梯形人面，环眼，扁鼻，阔脸，头戴放射状羽冠，人面下方两臂平端下折，双手扶下部兽面的眼睛；下部为一巨形兽面，环形重圈眼，两眼间以短脊相连，阔鼻，扁嘴。其中人头部和兽面部都以浮雕手法刻出，使之凸浮于器



山形玉饰

新石器时代 良渚文化
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7号墓
出土
高4.5厘米，宽8.5厘米

玉发箍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
高14.8厘米

这类器物曾在红山文化墓葬主人的头骨旁发现，故推测它是用于固定法式的发箍。



表，人的两臂及兽身则以细密的阴刻线纹装饰。

在加工方法上，红山文化的玉器往往在表面磨出一种浅浅的瓦沟状纹饰，这种瓦沟纹主要出现在一些薄板状玉器中，如勾云形

玉铲

新石器时代 大汶口文化
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长19.1厘米



玉佩的佩体，或有弯度的部件如玉臂饰上。瓦沟纹深浅起伏有所变化，宽窄和深浅度均匀规矩，这在制作中会有一些的难度。另外，在红山文化的动物形玉器中，除对动物的头部和鸟类的羽翅做必要的雕刻外，一般都采用通体抛光，不做额外装饰，显得简约、大方。良渚玉器在加工制作技术中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如阴刻、浮雕、透雕。琢纹一般宽0.2毫米至0.9毫米，刻纹一般宽0.1毫米至0.2毫米，在不到1毫米的宽度内，有时竟刻有四五条细线。在缺乏金属工具的时代，人们如何能够制出如此纹饰细密、图案精美的玉器，至今是个难解的谜团。因为遗址中没有明确发现制作玉器的工具，现代人研究当时玉器加工的方法，更多的是根据玉器上遗留下来的各种加工痕迹和弃料及古文献中的关于玉器加工的一些记载加以推测。

玉是具有相当硬度的一种石料，一般的金属物，如青铜或铸铁的硬度较之为低。因此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并非用金属器制成。《诗经·小雅·鹤鸣》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诗句启示我们，有些石头也可以作为制玉的工具。石英石、金刚石、水晶石、玛瑙石、黑曜石、火燧石等的硬度均超过玉石。人类自旧石器时代就开始制作石器，经过几十万年的摸索和实践，到新石器时代已对各种石料的性质有所认识，这是制作玉器的基本条件。《诗经》中又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句子，这大概是古人对制玉工艺需经历切锯、磋磨、碾琢几个阶段的概括性描述。从良渚文化的玉器来看，制玉还应有磨光、穿孔、刻纹和雕刻几个阶段。

有学者对良渚文化先民切割玉料的方法进行研究后认为：当时的人是采用了以片状硬性物件的直线运动为特征的锯切割和以

筋、弦等柔性物体作弧形运动为特征的线切割两种方法。后一种方法，可能是用动物的筋条或兽皮条等编织成的绳子粘上解玉砂加水反复拉动，以此将玉料剖开。用此方法剖玉，往往会在玉器表面留下近似同心抛物线形的线切割痕迹。用高硬度石片切割玉，操作时可能是把薄而直的木或竹质板条嵌上石英石等高硬度的石锯，加水反复切割。用这种方法制作的玉器，会在器物上留下水平切割的痕迹。至于玉器的钻孔方法，学术界中普遍认为是采用竹管或骨管加上解玉砂反复磨钻而成的。也有人认为是在竹管或骨管下端嵌上若干高硬度的细小石刀刀片，加水逐渐钻制而成；有些细小的孔则是用高硬度的石锥、石钻直接琢制或对钻而成。阴线刻、雕刻和透雕等可能是徒手用高硬度石片一点一点地刻出来的。最近有人对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环砥石加以研究认为：这类器物的形体一般为椭圆形，两端或一端有“螺蛳状”的头，且常与砺石、玉石芯及一些半成品一起出土，因此它很可能是一种石钻。另外，也有人用磨盘墩遗址出土的两件短身燧石石钻做实验，结果可在玉石片上刻画出十分清晰的线条，也可用它在玉石上钻出锥形的孔，和新石器时代一些玉石制品上的小型穿孔的特征相似，说明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一些小型穿孔是由钻头钻成。

无论是红山文化还是良渚文化，大部分玉器都发现于祭坛中，其作为祭祀和礼仪之器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先民就把农业视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安居乐业。靠天吃饭是农业社会的特征，但天有不测风云，久旱无雨和水灾之患都足以引起人们生存的危机和恐慌感。因此，祭天理所当然就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



玉琮

新石器时代 良渚文化
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7号墓
出土
高49.7厘米

的大事。红山文化积石冢中似乎更注重用玉器作为埋葬物品，骨、陶等随葬品却少见或不见。玉器非一般的生活用具，显然它们是与祭祀礼仪有关的专用器，反映出红山人对玉器的崇拜和信仰。良渚文化的玉器，根据《周礼》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

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很可能是作为祭祀天地的器具。另外，由于在良渚文化墓地中，大批玉琮是围绕墓主人成圈排列，玉璧置于中间，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玉器与原始宗教的巫术有关，意在保佑死者的灵魂不受鬼魂侵扰，起辟邪的作用。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良渚文化的玉器是作为通天的法器，把玉璧平置在玉琮之上，用木棍贯穿玉璧和玉琮的中孔，组合成一套通天的法器。信仰原始宗教的先民通常是以通天法器来祭祀他们想象中的神祇，以达到被祭者和祭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法器成为他们之间最好的媒介物。

第七节 古朴的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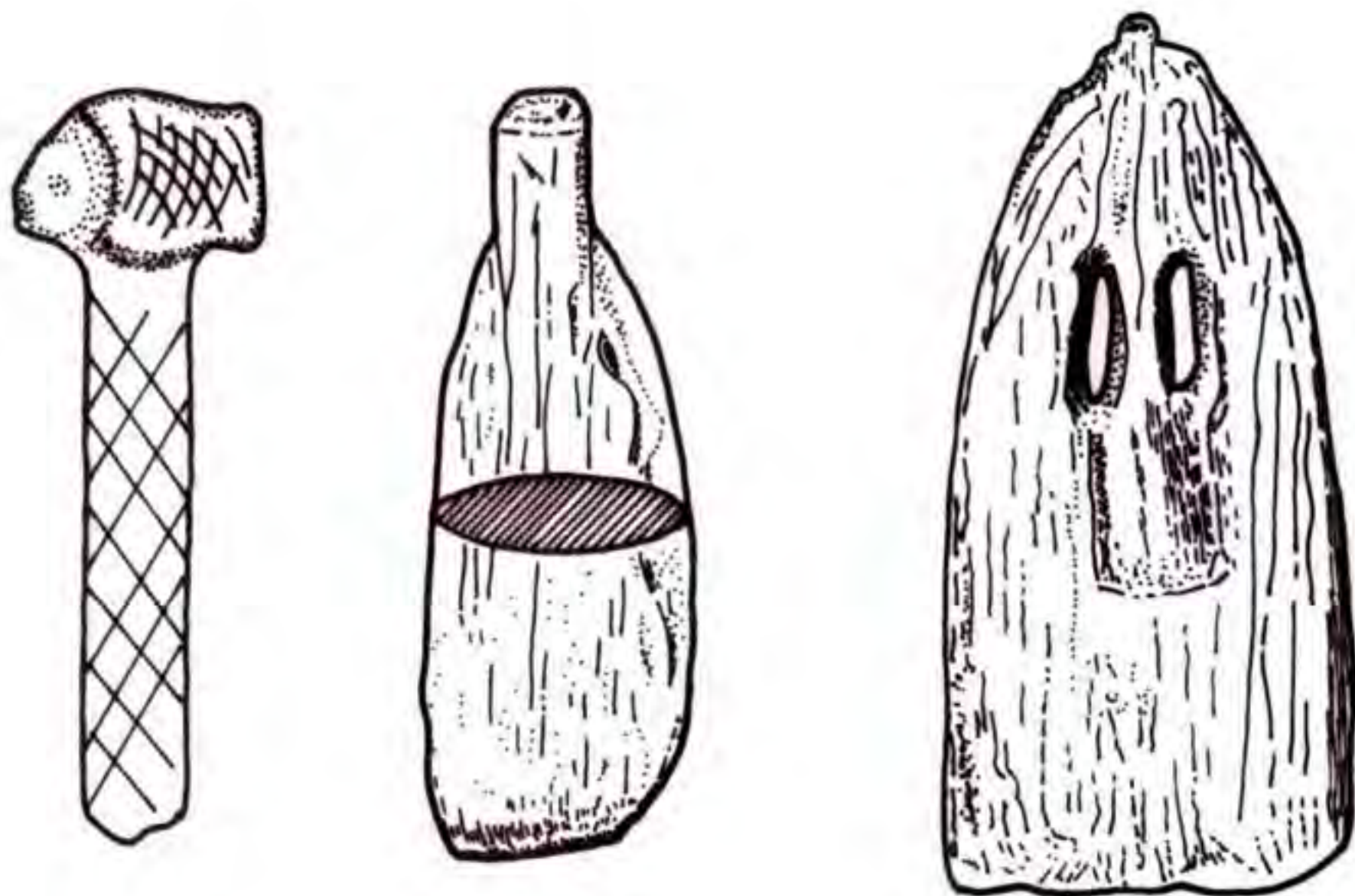
木头和石头、骨头一样，是史前时期较易得到的原料之一。木器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广泛使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木器的起源当远在旧石器时代。人类最早可能曾利用未经有意加工的木棒追赶猎物，后来开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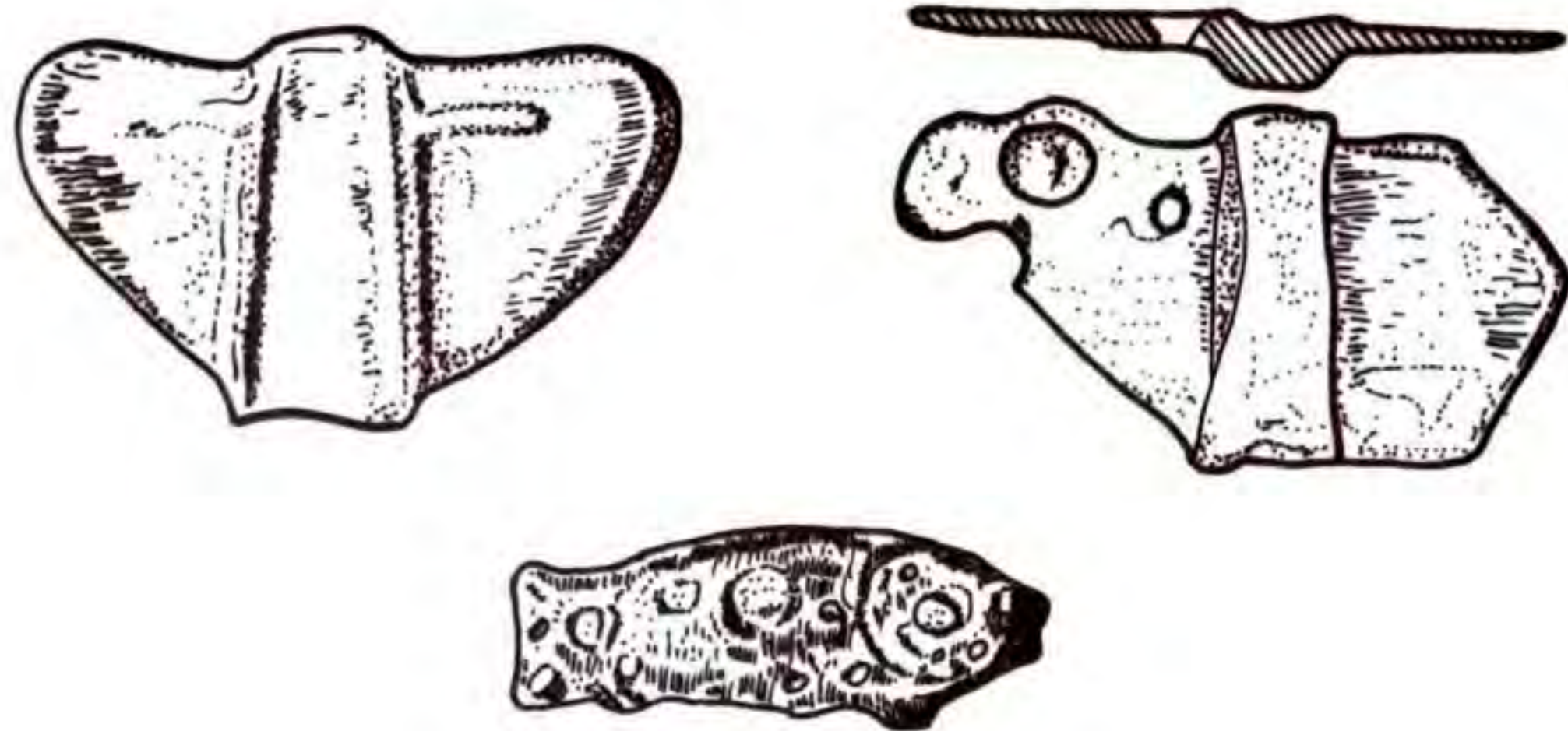
砍砸器和刮削器把木棍的一端削尖，作为采集、挖掘植物块茎的工具。可惜这类木器相对石器、骨器来说不易保留，遗留下来的资料十分有限。在中国虽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木棒，但是很多遗址都出土了刮削器，其中有的可能就是用来加工木器的。到新石器时代，木器的使用和加工技术都在不断地发展，有一些木器被保留下来，根据其功能加以分类可分为近30种，各式各样的器物都出现了，特别是一些容器、彩绘木器和漆绘工艺品的出现，标志着木器制作技术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的木制工具有耜、耒、铤、锥、矛头、镞、凿、刀、杵、榔头、锤、橹、桨、纺轮、梭、匕、齿状梳纱器、卷布棍、木经轴、木筒、木饼梳、筭、木屐、蝶形器、陀螺、圆雕木鱼、棺槨等。木料还被作为石斧、石钺、石铤、石锥、石耜等许多工具的器柄。在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中，常发现有玉钺，钺身上部的小孔上方有捆扎和摩擦的痕迹。这些玉钺还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都附带有钺冠饰和钺端

各种木制工具

新石器时代 河姆渡文化
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蝶形器和圆雕木鱼

新石器时代 河姆渡文化
20 世纪 70 年代浙江余姚河
姆渡出土

饰，并且在墓中的安放方式也大体一样，钺身和钺冠饰在头端，钺端饰在手端，如浙江余杭反山第14号墓出土的玉钺，从钺端饰至钺冠饰全长70余厘米，左手部位为钺端饰，左肩上方为钺身和钺冠饰，已腐朽的木柄位置上有朱砂涂痕并错落镶嵌着96颗小玉粒，小玉粒一面平整，适于镶嵌或粘贴在木柄上。

从木器的加工技术来看，木蝶形器可代表当时木器加工的技术。木制蝶形器在河姆渡遗址中共发现6件，其形似蝴蝶，两翼展开，上端较平，下缘圆弧，正面微凸，错磨平整光滑，背面中部有两道平行的纵向突脊，两脊之间形成一道上下不通的凹槽，脊上部往往有钻孔，两翼上端亦有横脊或钻孔。

河姆渡遗址出土过1件木碗，其表面涂一层天然漆，显得光滑明亮，既可保护木胎又富有美感，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漆木器皿。瑶山遗址出土过嵌玉漆器。在中国北方的陶寺遗址也出土了一批彩绘木器皿，但木器皿的木胎已腐朽成灰，只保留彩皮，根据木灰痕迹和彩皮形状可辨认的器形有圈足盘、长方平盘、豆、勺等。各类器物的器表多以红彩为底，用白彩描绘各种图案，小

部分只绘单色红彩。这些木器均代表了当时木器加工技术发展的较高水平。

一般来说，木器的制作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取材、制坯、成型。取材也可以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砍伐树木，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是安柄的石斧；第二步是用石斧在砍倒的树上截下合适的一段；第三步是加工成板材。木材准备好了之后，便要进行初步的加工，这便是制坯阶段了。在制坯过程中，加工者使用斧、镑等工具砍、劈、削，做出器物的雏形，如需钻孔，则用凿或锥钻孔。雏形做好之后，便进入成型阶段了，在这一阶段，加工者要用镑等工具对器物进行细致的加工，主要是让器物规整、实用而且美观。有的器物如锥、笄、梭等，可能还要用砾石来摩擦，以求表面光亮，使用起来顺手，并达到美观的效果。如果是漆器或彩绘木器，最后还要涂漆或绘彩。有的器物更复杂，需要进行刻画花纹的工序，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圆雕木鱼、木雕鱼形器柄等。

以上所述是制作比较复杂的器物的过程。而实际上，相当数量的木器制作是很简单的，并不需要经过这么复杂的程序，如制作耒，就只需要砍下一根适中的树枝，把一端削尖，用火烧烤一下即可。

第十一章

野性之美

从世界考古材料看，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有了审美观念，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就出土了用穿孔兽牙组成的项链。原始人用美好的东西装扮自己，既使自己感到身心愉快，也可取悦异性。自远古至今，美与爱密不可分。另外，原始人的审美观念与原始宗教信仰也有联系。在原始宗教仪式中，原始人把美好的东西奉献给神，希望神灵高兴，赐福于人。奉献给神灵的美好东西，是原始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创造出来的，因为只有自己喜欢才能让神喜欢，所以美好的东西在娱神的同时也在娱人。原始人出于娱人和娱神目的对美好的东西的创造，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创作，其作品便是原始艺术。



第一节 国画鼻祖

人类的绘画艺术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家在法国的拉斯科洞穴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发现了令现代人惊叹不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动物为题材的洞穴壁画。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在中国境内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绘画作品。从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在生产力水平上基本一致，由此推断其心智也相差无几，也应该有绘画的意识和表现。目前在中国境内已经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岩画，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仍在寻找之中。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难以找到，可能与原始人大多居住在岩溶洞穴中有关。岩溶洞穴的一个重要

特点是存在可溶性的岩石，如石灰岩、白云岩、石膏、岩盐等，洞中的岩溶水对可溶性岩石起溶解作用，在这种溶解作用下，洞中可形成石笋等地质景观，但也能覆盖住几万年人类所绘的洞穴壁面。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极有可能是由于岩石的溶解而被覆盖住了。每一代的考古学家都有他们那一代的发现，正是这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发现才使我们对人类前进的足迹认识得逐渐清晰。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壁画虽然没有被发现，但给下一代的考古学家留下了一个梦想。

我们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绘画艺术了解得比较多，因为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了不少当时的绘画作品。目前发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绘画作品，大多是绘在陶器上的画，因为陶器比木器、麻布等有机物容易存留，即

使碎了，考古学家也可以拼接起来。陶器上的绘画的颜色主要有红色、黑色、白色、黄色等，对彩陶上的颜料化验后得知，红彩中的着色剂主要是铁，黑彩中的着色剂主要是铁和锰，白彩中除了有微量的铁以外，几乎没有着色剂。彩色颜料都是取自天然的矿物质，红色彩料取自赭石，黑色彩料取自一种含铁量很高的红土，白色彩料取自配入溶剂的高岭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工具也多有发现。至迟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已出现专业的原始画师，他们死后，往往用生前使用的绘画工具随葬。1972年，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84号墓出土了一套原始绘画工具，这套绘画工具包括石砚、研棒、颜料和陶杯。石砚呈方形，砚面中部有一个直径7.1厘米、深2厘米的圆形研磨窝，研磨窝内残存有红色颜料痕迹。研棒残长5.1



双格石研磨盘

仰韶文化
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
长17.5厘米

石研磨盘和研磨块

仰韶文化

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



厘米，棒头已研磨成斜面。出土时，研棒置于石砚的研磨窝内。研磨块出土于石砚旁边，形状不规则，呈黑红色，经化验属三氧化二铁。陶杯长身，小平底，大敞口，高12.4厘米，口径14.8厘米，状似漏斗，是用于调色的工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三件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工具。一件是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双格石研磨盘，系用一块厚石板磨制而成，略呈圆角长方形，长17.5厘米，一头稍大，一头稍窄，平底，朝上的一面制出两个内凹的研磨格，这样可以利用一个器物研磨两种颜料。北首岭遗址同时出土有紫、红两种颜色的颜料，颜料均做成彩锭。这件石研磨盘应当是研磨彩锭的用具。石研磨盘的研磨格内尚残存有颜料，但未做化验。第二件是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石研磨盘，与其配套使用的还有一个颜料块。这件石研磨盘系用呈三角形的天然厚石板粗略加

工而成，只是把朝上的一面磨平作为研磨面。颜料块是一个略呈三角锥体的红色小石块。研磨时，手握研磨块在石磨盘的磨面上反复压磨。由于长期研磨，石磨盘的磨面上存留有大量红色痕迹。研磨块未做化验，似是赤铁矿。第三件是甘肃兰州白道沟坪遗址出土的双格调色陶盒。这件调色陶盒外形似碗，略呈椭圆形，口部长径15厘米，宽径13厘米，通高6.5厘米，器壁比钵、碗类的食物容器要厚。其特殊之处是在陶盒内中间做出一个隔板，把陶盒分成两个容物格，这样原始画师可以把研磨好的两种颜料分别放入格内，同时调制两种颜色的颜料。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绘画颜料，我们现在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当时的颜料是从天然矿物质中提取、加工而成的，不管是把天然矿物质颜料加工成小块还是彩锭，都需要在石制的研磨器中研磨，原始画师在绘画前还



双格调色陶盒

马家窑文化

甘肃兰州白道沟坪遗址出土

高6.5厘米

必须把研磨好的颜料放入调色器中加水调制。原始画师是否会把两种以上的颜色放在一起调色，进行配色，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原始画师把颜料调制得均匀一致、浓淡适宜，再行运笔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新石器时代绘画最常见的主题是动物。当时虽然已经出现农业，但采集、狩猎、捕捞仍然是原始人补充食物的重要手段。在狩猎、捕捞的生产过程中，原始人对动物的习性了解得十分清楚，对动物的观察也十分仔细。由于食物经常缺乏，史前盛行丰产巫术，原始氏族部落出于大量获取猎物的强烈愿望，往往请本氏族部落的画师画出某种动物，然后氏族部落成员围绕动物画举行某种仪式，祈求丰产。另外，氏族部落的巫师作法时，往往借助动物通神，这也经常需要原始画师为他们画出可以帮助他们通神的动物。史前时期艺术和原始宗教密不可分，很

可能原始画师具有巫师的职能。不管怎么说，为氏族部落服务是原始画师的职责，原始画师要想尽职尽责，就必须具有艺术天赋和高超的技巧。

原始画师对动物的形体描述得简练而准确，这得益于他们对动物长期而仔细的观察。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一件鹿纹彩陶盆，盆内壁画上有四只鹿，原始画师只画了鹿的轮廓，轮廓内填满黑色，犹如鹿的剪影，画法虽简洁，却准确表现出了鹿奔跑时轻盈的体态。艺术离不开生活，这对原始画师同样适用。鹿是原始人最主要的狩猎对象之一，猎鹿需要极大的耐心，必须长时间地潜伏。作为氏族成员，原始画师也要参与氏族部落的生产活动，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农业和畜牧业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下，狩猎、捕鱼已是一种半生产、半娱乐的事情，参加这种具有吸引力的活动有利于原始画师捕

彩绘盘龙陶盘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
高8.8厘米，口径37厘米，底
径15厘米



捉绘画素材，使原始画师像狩猎者和捕鱼者一样，身临其境地观察他要表现的动物对象，久而久之，原始画师对他们所观察动物的一举一动均了然于胸。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鱼蛙纹彩陶盆和五鱼纹彩陶盆上的绘画均十分生动。鱼蛙纹彩陶盆是在红陶盆内用黑彩画出两组鱼纹和两组蛙纹，鱼纹与鱼纹相对，蛙纹与蛙纹相对，布局对称，疏密合理。鱼纹为两条鱼腹部相对，似乎互以尾部触摸、吻部相亲，表现了两条鱼活泼嬉戏、亲密无间的欢快情景。蛙纹则为写实的蟾蜍，四条用线条表现的细腿艰难地支撑着圆鼓鼓的身体，仿佛刚从水中爬上岸边喘息，背上满是斑点，两只小眼嵌在头顶，颇为可爱。蛙纹把蟾蜍笨拙、肥硕、蹒跚的体态表现得活灵活现。原始画

师用鬼斧神工的妙手在陶盆内画出四组呼之欲出的鱼纹、蛙纹，使本是静态的盆内充满了动感，鱼儿在水中悠游嬉戏，蛙儿正悄悄爬上岸，使人感到盆中即使无水也生气盎然。这正是原始画师的高明之处。

原始画师善于在陶制水器内表现与水有关的动物，这种题材的原始绘画已屡见不鲜。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末期的彩绘蟠龙陶盘，代表了这类题材原始绘画作品的最高水平。该陶盘敞口，斜折沿，高8.8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15厘米，盘内画的蟠龙呈蜷曲状，尾抵于颌下，周身遍饰红鳞纹，如跳跃滚动的火苗，使蛰伏的龙充满了张力和朝气；一对竖起的耳朵，警觉地侦听着周围的动静；圆睁的小眼，机敏有神；利齿微露，口吐长信。这条龙虽蜷曲却不呆

板，似在蛰伏中积蓄着力量，虽静胜动，不怒而威，所谓龙盘虎踞之妙即在于此。如果盘内注上水，则水摇龙摆，那可真成了于冬眠中苏醒、蓄势待发的蛟龙了。此画色彩耀目，线条流畅，造型生动有力，错落的鳞纹和盘曲的龙身，使画面充满了古朴的装饰趣味。

目前所见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一幅陶器绘画，是画在一个大型陶缸外壁上的鹤鱼

石斧图。鹤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临汝阎村，属仰韶文化。陶缸系夹砂红陶，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口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画有一幅高37厘米、宽44厘米的彩色画，画面约占缸体面积的二分之一。按内容可把这幅绘画分为两组：一组为鹤叼鱼，一组为带柄石斧。画中的鹤身躯健美，双腿直撑，坚硬的长嘴叼着一条鱼，鱼



鹤鱼石斧图彩陶缸

仰韶文化

河南临汝阎村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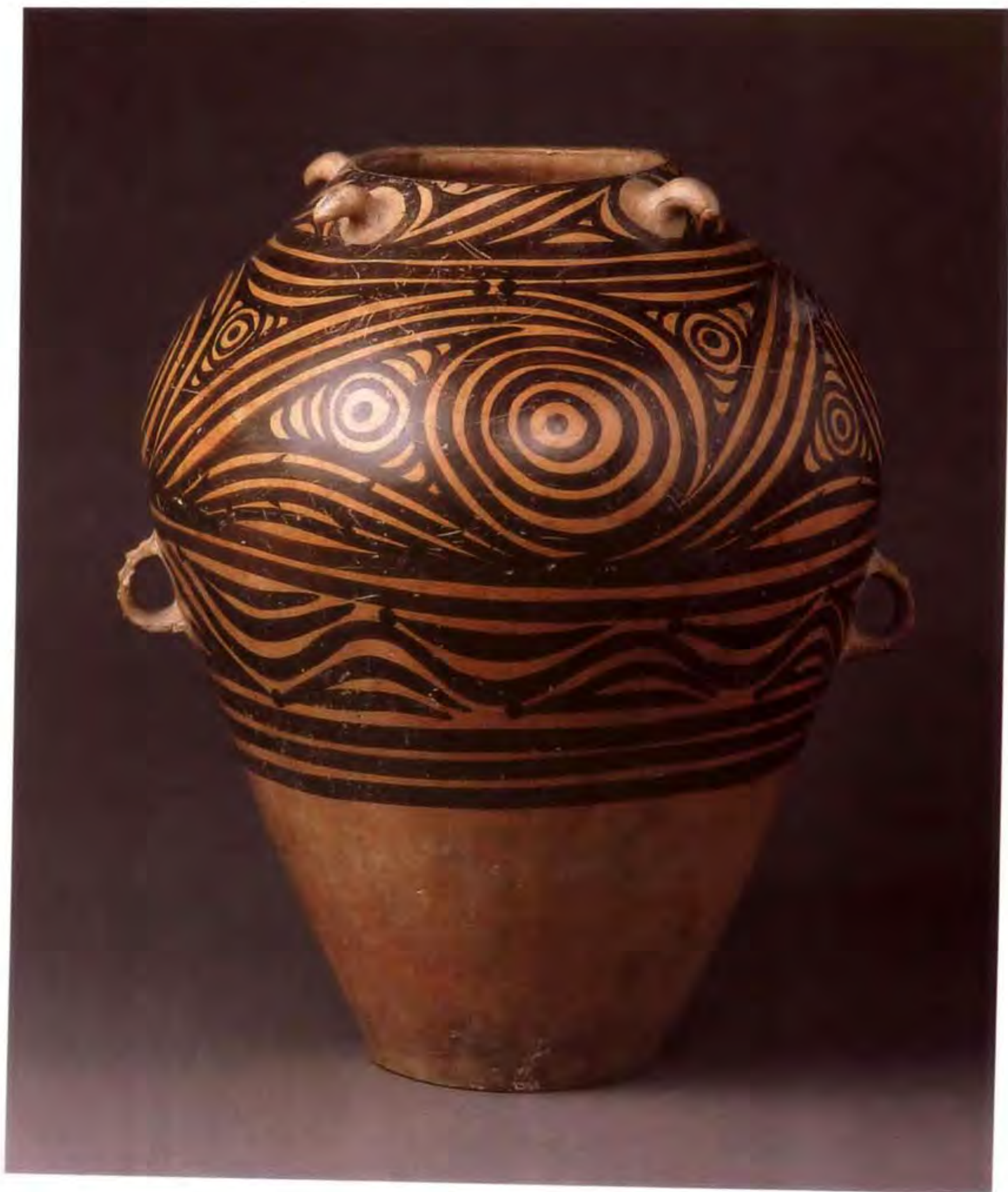
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
底径19.5厘米

涡旋纹彩陶罐

马家窑文化

甘肃永靖三坪遗址出土

高50厘米，口径18.4厘米



绝望地垂下身体，尾部似在无力地晃动，作奄奄一息挣扎状。鹤昂首挺胸，眼睛炯炯有神。鹤旁竖立的石斧古朴雄浑，衬托着鹤的力量。鹤鱼石斧图显示了原始画家于自然朴素中见奇趣的特点。鹤的后倾与鱼的下垂取得了巧妙的平衡。鹤眼大胆夸张，占了整个头部的一半，突出了鹤凝神紧盯猎获物的气势。石斧的画法十分写实，斧上的穿孔、捆绑的绳索、柄上的符号、握柄处的缠绳都被真实地描绘下来。整个画面的动与静、虚与实处理得和谐、自然。原始画家为表现鹤轻

柔的白羽，全用白色涂抹而成，犹如后来中国画的没骨画法；而石斧和鱼则用简练、流畅的粗线勾勒其轮廓，犹如后来中国画的勾线画法；石斧的斧身和柄身以及鱼的身子填上色彩，犹如后来中国画的填色画法。通过这些技法的运用，鹤羽的轻柔、石斧的坚硬、大鱼的僵直，无不表现得恰到好处。距今5000多年前的鹤鱼石斧图已经运用了中国画的基本画法，堪称中国画的鼻祖。

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绘画创作的高峰时期。从考古发掘出土情况看，这

一时期的绘画数量多、种类多、手法多。原始画家不仅用写实的手法创作，也用抽象的手法创作。1981年甘肃秦安王家阴洼遗址出土一件猪面纹细颈彩陶壶。在这件陶壶的身上，用抽象手法绘出猪面纹，扁平宽大的猪鼻子以及眼睛、面颊变化成几何图案，给憨厚、笨拙的猪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1978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号房址出土一件仰韶文化的变体鱼纹圈底彩陶盆。盆的外壁用黑彩绘出的抽象鱼纹尚可看出鱼身的整体轮廓，但用流畅的弧线纹、弧线三角纹、双勾线纹使鱼身富于几何形变化，让环绕盆外壁的鱼纹产生了流动的韵律。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绘有鱼纹的仰韶文化彩陶，其中写实鱼纹和抽象变形鱼纹共存，通过对众多的鱼纹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由写实鱼纹向抽象变形鱼纹演变的规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1956年出土于甘肃永靖三坪的马家窑文化涡旋纹彩陶罐。罐系泥制红陶，高50厘米，口径18.4厘米，平口，口下有四个钩形钮，短颈阔肩，腹

部逐渐下收，平底，腹部饰有两个对称的环形耳。器外壁用黑彩绘出上、中、下三层纹饰，上层的花卉纹和下层的水波纹纹带均窄，中层的涡旋纹纹带最宽，在上下层纹饰的衬托下显得十分突出，显然涡旋纹是这件彩陶罐的主体花纹。大涡旋纹共有四个，绕罐一周，每个大涡旋纹都围绕其中心的一个点旋转。由此可以看出原始画家作画的顺序是，绕罐身一周首先定出四个等距的点，然后再向所定之点引线，使之成为四个很有规律的大涡旋纹，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已有等分的数学概念。四个大涡旋纹首尾相连，成为有机的连续体，在两个大涡旋纹之间还饰有两个小涡旋纹，大涡旋纹套小涡旋纹，配上器物光滑周圆的形体，形象地概括了奔腾的河流中那大大小小的旋涡翻滚波动的情景。纹饰线条极其流畅圆润，当我们绕着陶罐观赏时，会感到无数个涡旋纹在眼前周而复始地旋转，其中跳动着妙不可言的节奏和韵律，那些涡旋纹在有限的空间产生了无限的循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原始画家从奔腾不

变体鱼纹圈底彩陶盆
仰韶文化
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
口径51厘米



息的河水中寻找灵感，其创作内容和形式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抽象变形、高度概括、合理夸张而又极富装饰效果，使其艺术创作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第二节 稚拙的雕塑

从世界范围的考古发现看，人类的雕塑艺术同绘画一样，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其中尤以出土于欧洲的雕塑作品最为突出。在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等地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的小型妇女雕像，这些妇女雕像被欧洲的近代艺术家们尊称为“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在中国境内尚

无确切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雕塑艺术品出土。寻找中国雕塑艺术的起源，仍是一件任重道远的工作。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雕塑艺术品十分丰富，本书限于篇幅，只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雕塑加以阐述。

陶塑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物或动物与器物相结合，塑成人头壶、鹰鼎、猪鬲、狗鬲、水豚壶等等，使艺术性与实用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想象力非常丰富，雕塑技法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1958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了一件仰韶文化的陶鹰鼎。鼎高36厘米，器表微成黑色，有光泽，整个器物的造型为一站立的巨

陶鹰鼎

仰韶文化

陕西华县太平庄遗址出土
高36厘米





陶猪鬻

大汶口文化
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
长21.5厘米，高18.7厘米

鹰。巨鹰体内中空，背上开口为器口，鹰腿作为两个鼎足，鹰尾下垂搭地，巧妙、自然地成为另一个鼎足，尾足与两个腿足形成一个平面，构成三足鼎立之势。鹰头微前倾，长嘴勾喙，犀利坚硬；一双大眼睛从眼眶中凸起，炯炯有神，突出了老鹰凝神紧盯猎物的赳赳气势。鹰腿粗壮有力，身躯丰满结实，浑身肌肉隆起，体现了雄鹰的孔武、威猛、凶悍。老鹰看似笨重的体内似蕴蓄着巨大的力量，圆睁的双眼傲岸不可一世，体现了天之骄子内在的神韵。这件鹰鼎雄浑厚重，是祭祀神灵的祭器。中国上古宗教的一个特点是



水兽陶壶

江苏吴江袁家埭遗址出土
高11.5厘米，长33厘米

借助动物通神，仰韶文化的居民把鼎塑成鹰形，是希望具有上天落地本领的老鹰把鼎中的美食带给他们所祭祀的神灵，从而达到祈求神灵赐福免灾的目的。把祭器制成鹰形的做法在商周时期仍有存在，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就出有铜鸮尊。商周时期的鹰形铜祭器当与仰韶文化时期的鹰形陶祭器一脉相传。有的学者还认为这件仰韶文化鹰鼎的造型，对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三足乌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代帛画、壁画中的三足乌形象，其母型都可追溯到这件仰韶文化的鹰鼎身上。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1973年出土于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的大汶口文化的陶猪鬲。这件陶猪鬲系灰褐色夹砂细陶，长21.5厘米，高18.7厘米，器身塑成猪形，四腿已缺失；鬲口作漏斗状，立于猪的臀上，与提手相联；在猪背上，自猪颈至鬲口底部做出一

提梁，以便提携和倾倒。这件猪鬲在造型上很有特点。猪身肥圆，两耳立起，小眼圆睁，平鼻前伸，似在拱食，身后的小尾巴翘起，烘托出猪吃食时的欢快情绪，猪的舌头伸出口外舔着嘴边，显示出吃食的心满意足。猪鬲把猪笨拙贪吃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猪臀上高耸的漏斗状鬲口，把人的视线引向上层空间，似在表达把鬲中美酒敬献上天的神灵。弧形的提梁弥补了猪背以上的空间，使整个猪鬲取得了巧妙的平衡。

1960年，江苏吴江梅堰袁家埭遗址出土一件水兽陶壶。壶高11.5厘米，长33厘米，腹宽10.2厘米，观其形状，显然模拟的是水豚类动物。这件水豚壶以豚嘴为流，水豚尖嘴前伸，一对圆眼机敏有神，似在水中觅食；豚身肥硕、圆滑，呈流线体，尾摆于一侧，使人感到在水中快速游动的水豚似骤然转向，

陶塑猫头鹰头

仰韶文化
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
直径14厘米



紧追目标；在水的反作用下，水豚头后的颈毛向后飘起，平贴脖颈；为使器物放置稳固，在水豚腹下安有器足，器足前低后高，使水豚胸低、尾翘、头微昂，产生出游进的动感。水豚游动得如此优雅、轻松，就像水已失去阻力一般。有的学者说这件水豚壶表现的是长江白鳍豚，但仔细对照白鳍豚，却发现并不完全相像，可能加入了原始雕塑家的想象、夸张。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一件仰韶文化的人头器口彩陶壶。壶高31.8厘米，红陶黑彩，鼓腹平底，器口做成人头形，头顶开孔，以便倒水。器口的人头像系用圆雕手法雕出，呈瓜子形，前额垂一排剪得平齐的刘海，脑后留着齐耳短发；两眼细长镂空，显得目光深邃；鼻翼鼓起，鼻呈蒜头形；小嘴尖翘，两耳皆穿孔，用以系耳坠。壶身即人身，壶的腹部圆鼓，如怀孕妇女丰满的身躯。自颈以下围绕壶身画出上、中、下三组图案，图案为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纹组成的二方连续花纹，犹如孕妇穿着艳丽、宽敞的花衣裳。

除了与器物相结合的人或动物的陶塑，中国新石器时代也有许多单纯的动物和人物陶塑。

1959年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一件陶塑猫头鹰头。这件陶塑只雕出猫头鹰的前脸，面圆，大小如碗口，圆圆的脸上布满锥刺纹，密密麻麻的锥刺纹表现了猫头鹰面部的毛。在圆圆的脸上有一对起棱的大圆眼眶，一双大眼睛从眼眶中凸起，炯炯有神，似在黑暗中凝神紧盯猎物，使我们在猫头鹰貌似柔和的外表下看到了它内在的强劲。在面部正中，伸出一长嘴勾喙，犀利尖锐。原始雕塑家通过锥刺纹体现了猫头鹰面部柔和羽毛的质感，运用磨光手法体现了猫头鹰长喙的坚硬，这种软硬对比手法的灵活运用，显示了



陶塑裸体孕妇像

红山文化
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
高7.8厘米

高超的雕塑技艺。坚硬的勾喙、瞪圆的眼睛、耸立的毛发，把猫头鹰刚劲凶猛的气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猫头鹰，中国古代称之为鸱鸺或鸱鸢。《博物志》说：“鸱鸺鸟一名鸱鸢，昼目无所见，夜则至明。”泉护村出土的陶塑猫头鹰头，双眼圆睁，显然是表现夜里捕食的猫头鹰。《庄子·秋水》说：“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广雅·释鸟》说：“鸱鸺，怪鸺也。”王念孙疏证云：“怪鸺头似猫而夜飞。”由于猫头鹰具有特殊性和怪异性，被仰韶文化居民视为神鸟，奉为神灵。

1982年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两件小型陶塑裸体孕妇像，其特点是突出



泥塑女神头像

红山文化

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出土
高22.5厘米

隆起的腹部和肥大的臀部，具有明显的孕妇特征。这种类型的小型孕妇像，过去在欧洲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过，中国的考古学家也一直在苦苦地寻找，没想到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东山嘴遗址基本上被一组石头建筑遗迹所占满，陶塑孕妇像出土于其中的石圆圈周围。学者多认为东山嘴遗址是一处宗教祭祀遗址，石圆圈可能是供奉陶塑妇女像的祭坛，人们到此来祈求生育。东山嘴遗址很可能是原始的社坛。社祭在商周时期曾盛行。社坛一般位于荒郊野外或密林之中，并供奉女性祖神高禡，高禡神是掌管生育的女神。每年仲春之月，人们来到社坛祭祀高禡神祈求生育，届时青年男女在林中、水边狂欢。《礼记·月令》记载有天子祭祀高禡的情景：“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禡。天子

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禡之前。”《周礼·地官·媒氏》记载民间此俗则是：“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郑玄给《礼记·月令》作注时说：“玄鸟遗卵，娥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变‘媒’言‘禡’，神之也。”由此可见，商族供奉女始祖简狄为高禡。《诗经·大雅·生民》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周族供奉女始祖姜嫄为高禡。东山嘴的陶塑孕妇像很可能具有高禡神的性质。实际上高禡神不仅主管本族的生育和繁衍，也兼地母的职能，主管庄稼丰产。红山文化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粮食丰产与人口繁衍同样重要，缺少哪一项，都会给氏族部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原始巫术认为人的生育行为会促使大地生育、庄稼丰收，古文献中记载有男女云雨促使庄稼丰产的行为。红山文化居民来到远离居住地、位于荒野的社坛，祭祀陶塑裸体孕妇像所代表的高禡神，既祈求人的生育、氏族部落的繁衍，也祈求大地富饶、庄稼丰收，可见这小小的陶塑孕妇像承载着人口是否兴旺、氏族部落能否繁衍的重任。

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泥塑艺术品是1983年辽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出土的泥塑女神头像。这件泥塑女神头像高22.5厘米，面宽16厘米，通耳宽23.5厘米，面呈方形，目长且眼角上吊，眼窝浅，内嵌淡青色圆玉片为睛，鼻梁扁平，鼻翼宽，高颧骨，嘴大而唇薄，从面部特征看，女神属典型的蒙古人种。泥塑女神头像的雕塑过程大概有如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是搭木骨架，然后在骨架上包扎谷草

一类的植物；第二步是在骨架上堆塑质纯且黏性大的黄泥，采用圆雕手法塑出人形，最后在表面上打磨光滑；第三步进行彩绘与装嵌，面呈鲜红色，唇部涂朱。作为眼睛的圆形玉片经抛光，滑润而有光泽，玉片的背面正中，琢出一短钉，形如图钉，这样可牢牢地嵌进眼眶中。这件女神头像是原始艺术匠师运用精湛的雕塑技法创造出的史前艺术珍品，头像既强调外部轮廓的健美柔和，又追求内部神态的情感流露。略显夸张的眼睛以玉为睛，呈现出炯炯有神的目光，使女神神采飞扬。女神双唇欲启，嘴角上翘，唇缘肌肉似掀动欲语，面颊也似随着嘴部的掀动而起伏，流露出了女神特有的神韵。这尊在地下沉睡了5000多年的女神像，拂去岁月的尘埃，其庄重的表情、深邃的目光，使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她当年的尊贵和威严。

第三节 天籁之音与神秘之舞

音乐和舞蹈的起源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但我们知道，无论处在什么地理位置，也无论社会形态、经济状况、文化面貌如何，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音乐和舞蹈。

《吕氏春秋·古乐篇》载：“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制十二律。”古代把制定音律归于某个人显然是错误的，但反映出音乐起源于史前时期，则是可信的。中国音乐的起源，目前我们最少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以前。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25件距今8000多年的骨笛。骨笛均用丹顶鹤的尺骨制作而成，可分为五孔笛、六孔笛、七孔笛和八孔笛。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专家对贾湖骨笛进行

了多次测音试验。骨笛的演奏方式为竖着斜吹。中央民族乐团的笛子演奏家竟用8000多年前的贾湖骨笛演奏出了乐曲，这穿越时空的天籁之音，令音乐专家和考古学家兴奋不已。

贾湖341号墓出土的五孔骨笛能发出六个音，它的主音为 $^{\sharp}D^6$ ，能构成 $3\ 5\ 6\ \dot{1}\ \dot{3}\ \dot{6}$ 的音序，是四声音阶。341号墓出土的六孔骨笛能发出7个音，它的主音是 $^{\sharp}A^5$ ，可构成 $1\ 2\ 3\ 5\ 6\ \dot{1}\ \dot{3}$ 的音序，是一个完整的五声音阶加上一个大三度音程，若把高音的大三度音程去掉，即成为 $1\ 2\ 3\ 5\ 6\ \dot{1}$ ，则是标准的五声自然音阶。

贾湖遗址出土的七孔骨笛数量最多，其中282号墓出土的两件七孔骨笛制作精良，保存情况较好。编号282:21的七孔骨笛的发音自然音序是 $3\ 5\ ^b6\ ^b7\ \dot{1}\ \dot{2}\ \dot{3}\ ^b6$ ， $1=D$ 。编号282:20的七孔骨笛的发音自然音序是 $3\ 5\ 6\ ^b7\ \dot{1}\ \dot{2}\ \dot{3}\ \dot{5}$ ， $1=D$ 。这两个音阶都是不加任何演奏技术控制的自然方法吹奏出来的音序，若在吹奏时用叉口的方法加以控制，则可以吹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

贾湖253号墓出土了一支八孔骨笛，其发音自然音序是 $^{\sharp}2\ ^{\sharp}4\ 5\ 6\ ^{\sharp}6\ 7\ 1\ 2\ 3$ ， $1=^{\sharp}D$ ，也即 $1\ 2\ 3\ ^{\sharp}4\ 5\ 6\ 7\ \dot{1}$ 。八孔骨笛不仅能吹奏出七声音阶，而且还能吹奏出变化音。用不同的音作主音，并将它的八度关系进行调整，可以排列出三种完整的七声音阶，此外它还可以排列出多种不同调高的六声音阶和五声音阶。八孔骨笛已可以根据演奏者对音乐的需要进行转调。

贾湖骨笛的制作经过精心计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支贾湖78号墓出土的七孔骨笛。此笛长20.4厘米，出土时断为三节，经修复粘合在一起。这件骨笛两端保留部分骨关节，尾端稍微残缺，音孔圆整，孔壁倾斜，



舞蹈纹彩陶盆

马家窑文化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遗址出土

高14厘米



彩陶鼓

马家窑文化

甘肃永登乐山坪遗址出土

长36.9厘米

上大下小,孔径0.3厘米。这件骨笛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保留有当时开音孔时的设计刻痕,并可以明显看出骨笛开音孔的设计修改过程。骨笛的每个音孔旁均有设计刻痕,第一孔两侧和上下方均有横刻痕;第二孔两侧和上方有刻痕,其中上方有两条短横刻痕;第三孔两侧和上方有横刻痕,其上方的刻痕有并列的两条;第四、五、六孔的两侧和上方各有一横刻痕;第七孔仅在两侧有短横刻痕。音孔两侧的短横刻痕位置对应,在钻孔前为一条定位的横线,长度比音孔的孔径稍微长出一点点,音孔即钻在这条定位横线的中间,钻完音孔后,音孔的两侧便各留下很短的一段横刻痕。各音孔的间距,依孔中心计算,一、二孔间为1.6厘米,二、三孔间为1.8厘米,三、四孔间为1.7厘米,四、五孔间为1.68厘米,五、六孔间为1.7厘米,六、七孔间为1.6厘米。从骨笛保留的刻痕观察,第一次设计的孔位刻痕,每个孔位至下一个孔位的刻痕间距为:一至二孔1.6厘米,二至三孔1.4厘米,三至四孔1.9厘米,四至五孔1.85厘米,五至六孔1.8厘米,六至七孔1.8厘米;第二次的修改设计为:一至二孔1.1厘米,二至三孔1.5厘米,三至四孔1.7厘米。最后选定的钻孔位置,即我们看到的音孔,应是第三次设计的结果。

制作精良的贾湖骨笛,深藏地下8000多年,一朝出土声震天下。8000多年前制作的骨笛,时至今日还能演奏出准确而完备的四声音阶、五声音阶、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不

仅是中国音乐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

贾湖骨笛所反映出的音律的完备性,使我们认识到,应该还有一个音律起源、发展、完备的过程,因此中国音律的起源还可以向前追溯,恐怕要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之初甚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期待有新的考古发现来证明。

音律如此进步的贾湖氏族,音乐肯定也非常发达。爱好音乐的贾湖氏族所使用的乐器绝不会仅仅是骨笛,应该还有其他的骨、木、丝、竹、泥、陶、石等乐器,这样才会使音乐丰富多彩,促进音乐水平的提高。由于木、丝、竹质的东西容易腐朽,在考古中很难发现。泥、陶、石质的乐器容易碎裂,难有完整之器,在考古发掘时要想认出并复原,也不是容易的事。贾湖遗址出土骨笛已是奇迹,我们再盼贾湖遗址出土其他的乐器,简直是奢望了。

好在出土乐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不限于贾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山西万荣荆村遗址都出土有陶埙。古文献中也记载了陶埙源于史前时期,如《路史》云:“庖牺灼土为埙。”出土的史前陶埙呈球形或橄榄形,中空。有的陶埙只有吹孔而无音孔,只能吹出一个音;有的陶埙有一个音孔,可以吹出两个音;有的陶埙有两个音孔,可以吹出三个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1986年出土于甘肃兰州永登乐山坪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

带调音孔的骨笛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
长22.7厘米



鼓。这件彩陶鼓长36.9厘米，为一面蒙皮的腰鼓，喇叭形的口下有一圈乳钉，用以固定所蒙的皮子；扩音筒为一个直筒；鼓身两头各有一个穿孔，用以系绳背在身上。《世本》说：“夷作鼓。”陶鼓在上古时期被称作土鼓，《周礼·春官·鼗章》载：“掌土鼓鼗。”郑玄注：“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之。”西周的土鼓是两面蒙皮，而古老的马家窑文化的陶鼓则是一面蒙皮。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不仅出土陶鼓，还出土了木鼓和石磬。陶鼓通高80多厘米，形状似长颈葫芦，长长的筒口下有一圈12个孔钉，用以蒙皮；陶鼓下端圆鼓，呈球形，底部正中有一小喇叭形扩音孔，其周围又有一圈三个小扩音孔；鼓身有双耳，用于系绳悬挂。这种陶鼓在大型墓中与木鼓和石磬同出，应是“以瓦为匡”的土鼓。土鼓一般用来祭祀。《路史·后纪》载：“（神农氏）埴土鼓以致敬于鬼神，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周礼·春官·鼗章》载：“凡国祈年于田祖，歆幽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歆幽颂，击土鼓，以息老物。”

陶寺遗址出土的木鼓用整个的一段粗树干挖制而成，鼓腔作直筒形，外壁有彩绘，通高可达1米多，上口直径40多厘米，下口直径50多厘米。所蒙的鼓皮虽然已经腐朽，但在鼓腔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由此可知，当时是用鳄鱼皮蒙鼓。用鳄鱼皮蒙的鼓，在上古时期被称作鼉鼓。《诗经·大雅·灵台》云：“鼉鼓逢逢。”上古时期把鳄鱼叫做鼉、蜃、猪婆龙，古人认为鼉有发声似鼓的灵性。《吕氏春秋·古乐篇》载，颛顼命蜃为乐倡，于是蜃仰天躺在地上，用自己的尾巴敲打自己的肚皮，发出“英英”的声音。晋安《海物记》载：“鼉宵鸣如桴鼓。今江淮之间谓鼉鸣为鼉鼓。亦或谓之鼉更，更则以其声逢逢

然如鼓，而又善夜鸣，其数应更故也。”正因鳄鱼有这种特性，古人才喜欢用鳄鱼皮蒙鼓，以期鼓具有鳄鱼的灵性。

陶寺鼉鼓在大墓中均成对与一件大型石磬同出。石磬是用青灰色的石灰岩打制而成，通长可达80多厘米，上面钻有一孔，用于系绳悬挂敲击。陶寺石磬与鼉鼓同出于大型墓中，每个大墓只出一件，看来当时只是单独使用的特磬，尚未组成编磬，但为商周时期编磬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1973年出土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盆敛口，卷唇，鼓腹，平底，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盆内壁画有三组内容相同的舞蹈纹，每组五人，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甩出发辫，臀后飘拂一根尾饰，轻踏碎步，欢快起舞；每组外侧两人朝外的那条手臂，被画为两道，似表示手臂快速、频频摆动时的重叠视觉效果。这由十五人组成的集体环舞，舞蹈者动作协调、步调一致，宛然是在乐器的伴奏下按照一定的节奏翩翩起舞。《尚书·皋陶谟》说：“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新石器时代先民跳舞已不仅仅是击石伴奏，最起码马家窑文化居民已击鼓伴奏。近十几年来，在青海、甘肃发现了多件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鼓，因此舞蹈纹所表现的集体环舞，极有可能是踏着陶鼓的节拍而翩翩起舞，当然也不排除使用考古尚未发现的其他乐器参加伴奏的可能。《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现在对照舞蹈纹彩陶盆可知，所谓操牛尾，实际上就是在舞者臀后系一根牛尾巴。操兽尾而舞的习俗在许多原始民族中都有，西北民族尤甚。《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有人戴



陶号角

大汶口文化
山东莒县大米村遗址出土
长39厘米

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这并不是真有什么人面虎身长尾巴的怪东西，而是《山海经》对于在原始宗教仪式中披着兽皮、系着兽尾跳舞的原始舞蹈家形象的描述。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印证了古文献的某些记载，并为我们再现了古代称为昆仑之丘的青海高原上原始居民系兽尾跳舞的情景。

1995年，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也出土了一件舞蹈纹彩陶盆。该盆内壁的舞蹈纹有两组，一组为十三人，一组为十一人，两组舞蹈纹反映的都是舞者手拉手跳舞的情景。1991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遗址采集到一件舞蹈纹彩陶盆，盆内壁绘两组舞蹈纹，每组九人，手拉手在跳舞。上述的几件舞蹈纹彩陶盆，都是在盆内壁的上部画出众人手拉手跳

舞的情景，如果以盆的圆心为中点，众人就是手拉手跳集体圆圈舞。集体圆圈舞在现今中国少数民族中还广泛流行。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流行一种安昭舞。安昭意为转圈，即绕圆场转而舞之，一人领舞，众人随其后，边歌边舞，歌舞协调。其动作是先弯腰，双臂随步态前移而向右摆动，迈第二步时双臂又向左摆动，迈第三步时左脚高跳随之向右转一周，即为一组舞蹈动作。土族民间往往在逢年过节等喜庆活动中才跳安昭舞，表示祝福。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也流行圆圈舞。这种圆圈舞通常在祭祀活动中进行，跳舞时，佤族男女老少围成一个圆圈，手拉手或互相将胳膊搭在肩上，双脚向右移动，边歌边舞，舞者伴随歌声，先缓慢地移动七八步，然后用后脚一顿，再双脚齐顿三次，同时放声高唱，身段、双臂均随歌声高低快慢而上下起伏，自由挥舞，依次反复循环，动作简单，舞步整齐，节奏强烈。贵州苗族地区流行踩鼓舞，由许多舞者围成圆圈，中间置一大鼓，鼓手双手执槌击鼓，舞者面向圈内，随着鼓点节奏的缓急，变换不同的舞步，双手自然摆动，绕鼓而舞，表现节日或丰收后的喜悦心情。湖南苗族地区也有类似踩鼓舞的舞蹈，叫团圆鼓舞，先由四男四女围绕堂屋中央放置的一面大鼓起舞，随后众人踏着鼓乐节奏，一个挨一个地围鼓而舞。集体圆圈舞既在祭祀活动中跳，也在喜庆活动中跳，既娱神又娱人，其欢快的情绪不仅感染神灵，更重要的是感染整个部族，使部族成员精神饱满，团结一致。

有关上古时期乐舞的神话传说很多，并且往往与上古时期的领袖人物密切联系。

传说黄帝喜欢音乐。《世本·作篇》载，黄帝使伶伦造律吕，夷作鼓，伶伦作磬。《韩非子·十过》记载，有一次黄帝合鬼神于西

泰山之上，作了一首惊天地动鬼神的乐曲，叫《清角》，后来晋平公强令乐师师旷演奏，“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瘥病”。黄帝创制的礼乐，岂是晋平公之流的凡夫俗子所能受用的！

身经百战的黄帝已知使用军乐鼓舞军队士气。杜佑《通典》记载：“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命吹角作龙吟以御之。”1979年山东莒县大米村出土一件大汶口文化的陶号角，长39厘米，作牛角状，可知史前时期吹角御敌并非虚传。《绎史》卷五引《归藏》说：黄帝诛杀蚩尤后，“作《桐鼓之曲》十章”，用于胜利的庆典。

颛顼也让人创制了一首祭祀上帝的乐曲，叫《承云》。《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

尧帝有一个乐官叫夔，《说苑·君道》载：“当尧之时，……夔为乐正。”夔为尧帝创作过一首叫《大章》的乐曲，《帝王世纪集校》载：“夔放山川溪谷之音，作乐《大章》，天下大和。”夔仿效山川溪谷所作的乐曲——《大章》，居然能让人们和平共处、辅助尧帝统治天下，看来上古音乐具有熏陶人民、敦化民俗的作用。

舜帝也非常喜欢音乐。《吕氏春秋·古乐篇》载：“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舜让人创制的乐曲中最重要的是《九招》，禹又把《九招》发扬光大。《史记·五帝本纪》载：

“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索隐曰：“即舜乐箫韶。”《九招》又称《箫韶》、《九韶》、《韶》，被用作庙祭之乐。孔子曾在庙堂听说过这首乐曲，《论语·八佾》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尚书·益稷》云：“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传：“《韶》，舜乐名，言箫，见细器之备。”《韶》是用箫类的细管乐器演奏的，美妙动听，宛转清扬，吸引得凤凰都飞来倾听，难怪孔子说《韶》尽善尽美。

神话传说当然不免夸张，但从考古发现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贾湖骨笛已具备七声音阶，经过近4000年的发展，到夏禹之时，形成《九韶》这样美妙的音乐是完全可能的。

上古时期，一些强大的部落联盟统治者可能已把乐舞和文字、宗教一起融入其政治统治，出现了礼乐的萌芽。古史传说提到黄帝让夷作鼓、伶伦作磬。作为上古礼乐之器的鼓和磬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陶寺遗址的木鼗鼓均成对与大型石磬同出于大型墓中，陶寺遗址的大型墓只占全部1000余座墓的百分之一弱，由此可见礼乐之器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享用礼乐之器是少数人才拥有的特权。

夏商周三代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治与礼乐紧密结合在一起。礼乐是祭祀祖先、上帝等神祇和宴飨的制度和仪式，统治者通过礼乐制度确定贵族阶级的等级尊卑，使之井然有序，严禁僭越。王享用最高等的礼器和最隆重的仪式，高高在上，令百官仰之如山，从而维护自己不可逾越的权威。《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祭祀活动展现的是隆重的礼乐制度和仪式，这与军事活动一起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纵观考古发现与有关上古传说，礼乐制度的起源应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第十二章

天地人神的沟通



第一节 把世界分成三界

中国史前宗教的特点是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不同的层次，并由巫师往来其间，充当沟通天、地、人、神的使者。中国史前宗教有一个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

中国史前宗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由于材料缺乏，我们很难作出十分确切的回答，但山顶洞遗址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居住的洞穴，这个洞穴遗址分上室和下室。上室地面的中间有一堆灰烬，底部的石钟乳层面和洞壁的一部分被烧炙，说明上室是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上室文化层中还发现有骨针、装饰品、石器等人類活动留下的遗物。下室位于上室的西边，

位置稍低，深约8米。在下室发现3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人骨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末并有一些随葬品，显然下室是埋葬死人的专用葬地。山顶洞人把死者葬在下室，说明他们已经有了活人世界和死人世界的明确观念，具有了把世界分成若干层次的原始宗教观。在尸体上及周围撒赤铁矿粉，是山顶洞人具有灵魂观念的一种表现。赤铁矿粉象征血液，人死血枯，撒上鲜红的赤铁矿粉是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中复活。由此可知，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原始宗教观。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保留了许多有关中国上古时期宗教观的珍贵资料，我们可以从中窥视中国上古时期宗教之一斑。

《淮南子·精神训》提到：在没有天地的时候，世界混沌无形，在混沌之中慢慢生出两位大神。两位大神一个经天，一个营地，天

地经过他们的苦心经营，终于分离出了阴和阳，产生了八方的位置。为《淮南子》作注的高诱认为，这两位大神就是阴阳之神。

天地初分的景况在《太平御览》卷二引《三五历记》中有更精彩的记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这就是著名的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传说。以上两则神话传说大体反映出了中国上古时期对世界从混沌一片到天地分开的最初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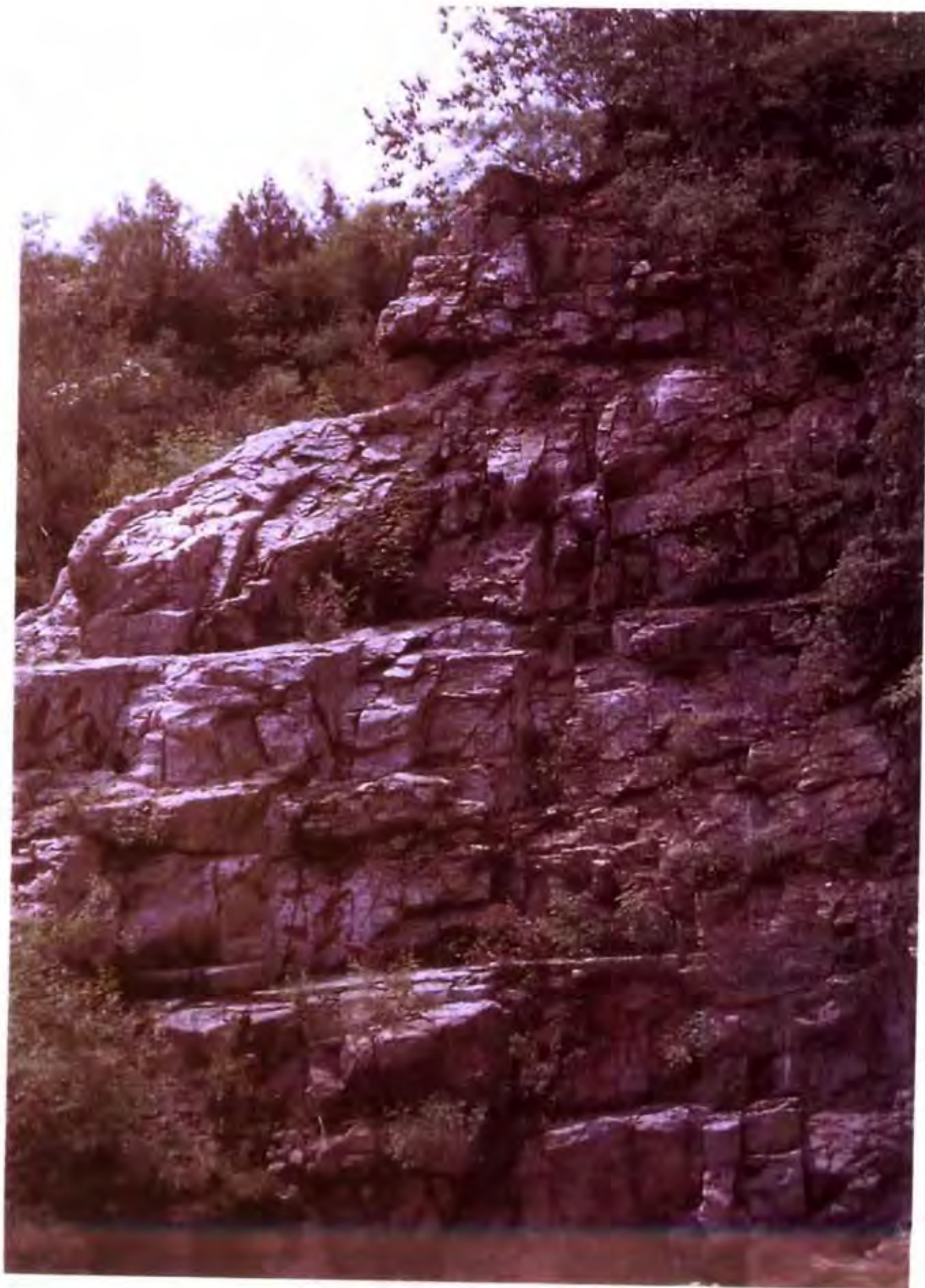
天地分开了，世界分出了层次，人位于天地之间，如何沟通天地呢？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提到，上古时期，人们把天梯作为通天的工具。天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山，一种是树。作为天梯通天的山，最著名的是昆仑山。《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昆仑山是天帝的下都。《淮南子·坠形训》说：“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这段记载反映了从昆仑山登天的详细过程。作为天梯通天的树，最著名的是建木。《淮南子·坠形训》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山海经·海内经》载：“建木，百仞无枝。……太昊爰过，黄帝所为。”太昊等上古之帝显然可以顺着建木来往于天地之间。

鲁迅先生说过，《山海经》是古之巫书。《山海经》及许多文献转载的已失传的巫书片段，反映的是上古时期巫师的思想，因此上古时期作为天梯的山或树，可能是具象的，也可能是意象的，只是巫师作法时所体

验的意念。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必要纠缠于在自然界中是否真的存在天梯。

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了几件大汶口文化作为祭器使用的大陶尊，这些大陶尊往往在上腹部刻有符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符号主要有表示日的“☉”、表示日和山的“𠄎”、表示树的“𣎵”等。这些大陶尊是装酒的祭器，用装酒的大陶尊祭祀神灵，自然是希望神灵享用美酒，赐福于人。大陶尊上刻有“☉”，表示太阳正在冉冉升起，有的古文字学家将之释为“旦”。日是天上最有代表性的标志，显然大汶口文化居民是用装酒的大陶尊祭祀天上的神。大陶尊上刻的“𠄎”符号很有意

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外景



刻符陶尊

大汶口文化

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



思，表示山峰托起太阳，山高齐天。主持祭祀仪式的自然是巫师，巫师一方面要把大陶尊中的酒献给天上的神灵，一方面巫师作法时也用酒作为致幻剂，进入与神沟通的境界。巫师用这件大陶尊致幻通神时，经行的通神线路应该就是这件大陶尊上所表现的高山。利用高山作为天梯通神，是上古巫师常用的手法。《山海经·海内经》载：“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

高上下于此，至于天。”《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巫咸国……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既然群巫能够上下登葆山，柏高能够上下肇山，大汶口原始氏族部落的巫师自然也能够上下于他心目中的山。


中国上古时期的巫师除用山作为通天地的天梯外，也用树作为天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大陶尊，上腹刻有“𣎵”纹，表示树。以太昊为主的上



树符陶尊

大汶口文化
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
高 60 厘米

古之帝可以顺着建木来往于天地之间。同样，大汶口原始氏族部落的巫师也可以通过他心目中的树沟通天地。在上古巫师的心目中，作为天梯沟通天地的树高耸入天。《山海经·海外北经》载：“三桑无枝。……其木长百仞，无枝。”又载：“寻木长千里。”《十洲记》载：“扶桑长数千丈。”自然界中不存在像以上古文献所记载的那么高的树。巫师在致幻通神的过程中，进入迷醉、癫病状态，通

神手法更多的是靠意念，古代巫书所记载的不过是巫师作法时的感受而已。上述大陶尊上所刻的“”，应该是像建木那样供具有法力的巫师上下于天地之间沟通神灵的天梯。

总的来说，中国上古时期是把世界分成天上、地下和人间三界，由巫师往来于三界，沟通天地，充当人神之间的使者。鉴于此，有些学者把中国上古时期的宗教观念称为三界的世界观，因这种三界的世界观是萨满教的

核心内容，故又称其为萨满式的世界观。

第二节 人神之间的使者

上古时期三界世界观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离不开沟通天地、充当人神之间使者的巫师。

需要说明的是，早期的巫师具有朴素的性质，虽然是人神之间的使者，但他们是不脱产的兼职宗教人员，没有什么特权，也不

是支配信仰的权威。早期巫师只是利用自己通神作法的能力为氏族服务，主要表现为为氏族沟通天地，联系天上地下的鬼神；为氏族消灾祈福，趋利避害；祈求生产丰收，人丁兴旺；为患者治疗疾病，承担巫医的职能；为死者招魂等等。

虽然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上古巫师的记载颇多，但由于考古发现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局限性，目前我们很难说出中国史前何时出现巫师。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仰韶文化时期，巫师已经十分活跃。

陕西西安半坡出土有仰韶文化的人面鱼

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

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



纹彩陶盆，盆内壁所画人面的两侧各有一条小鱼，鱼以头抵在人的耳部，似对着人喁喁私语。《山海经》中经常提到巫师“珥两青蛇”，郭璞注曰“以蛇贯耳”。半坡彩陶盆内的人面双耳各抵一条鱼，则可以说是以鱼贯耳。与《山海经》中“珥两青蛇”的巫师一样，半坡彩陶盆内人面所属的身分显然是“珥两游鱼”的巫师。中国古代巫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借助动物通神，无论蛇还是鱼，都是巫师通大地的助手。巫师作法时，可以随时召唤他的动物助手协助自己上传下达。人面鱼纹盆实际上是儿童瓮棺的盖子，盆底有一小孔，是供儿童灵魂出入的通道。当陶盆盖在瓮棺上埋入地下时，盆内的巫师便在幽冥世界与夭折的儿童共处一隅，显然是在为早逝的儿童招魂。鱼翔水底，水底为下界，即冥界，鱼具有通达冥界的神性，盆内的巫师召唤游鱼贯耳，是借助鱼的神性协助自己到冥界安执儿童弱小的灵魂。

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411号房屋地面有一幅炭黑画，画中有两个人并排，都是右手执法器，左手举到头部，双腿交叉呈舞蹈状；两位舞者前方有一长方形木棺，棺内一前一后葬两名死者。手执法器的两位舞者是针对棺内死者作法的巫师，其寓意是为死者招魂，以使死者的灵魂安宁，不行凶作祟，从而保佑生者平安无事。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地层中，发现三组用蚌壳摆塑出的具有宗教含义的图案。第一组蚌塑图案位于45号墓中，墓主人的左右两侧分别用蚌壳摆塑出一虎一龙。虎头微低，环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如疾走状。龙昂身，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第二组图案位于第一组南面20米处，用蚌壳摆塑出 龙 虎 鹿。龙头朝南，背朝北；虎

头朝北，面朝西，背朝东；鹿卧于老虎背上，与龙虎和睦相处。第三组图案位于第二组南面25米处，用蚌壳摆塑出一龙一虎一人。龙昂首，长颈，高足，舒身。龙背上骑有一人，两足跨在龙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面部微侧，似回首观望。虎位于龙的北面，昂首翘尾，四足微张，呈奔跑腾飞状。西水坡蚌塑图案中的龙、虎、鹿是巫师通天地的坐骑，即趺，有的考古学家称它们为“濮阳三趺”。虎、鹿是实有的动物，原始巫师可驯化其为自己的通神助手。龙是虚幻的动物，刚被幻想出来便被巫师用来为自己服务。《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的这种神异特性，最适合巫师通天地的需要。被称为古之巫书的《山海经》，有多处巫师乘龙的记载。《山海经·海外东经》云：“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西经》云：“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山海经·海外南经》云：“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西水坡第三组蚌塑图案表现的就是巫师乘龙升天。西水坡45号墓的主人，显然是驾驭龙虎的巫师。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仰韶文化时期的巫师尚未成为超越一般氏族成员的显贵人物。西水坡发现的龙、虎、鹿蚌塑虽然令考古学家惊奇不已，但只是反映了巫师召唤动物的作法能力，并没有反映出巫师的尊贵地位。西水坡遗址位于古河道旁，当时有丰富的蚌类资源，遗址地层中有成堆成堆的蚌壳，摆塑图案时，只需俯身拾取即可，不会花费太大的劳动量。蚌塑图案与花费专门工匠大量劳动力的玉制巫师法器，如良渚文化大玉琮、玉璧等，在经济价值上有天壤之别。半坡彩陶盆内的巫师是对夭折的儿童招魂，大地湾地画中的巫师是为死去的氏族成员招



蚌塑龙虎墓（西水坡 45 号墓）

仰韶文化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

魂，均是巫师为氏族服务的表现。

在氏族社会中，巫师以自己的作法能力为氏族服务而受人尊重，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巫师，成为巫师必须具备特殊的条件。

民国时期，瑞典学者安特生在西北地区采集到一件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骨骼式人像彩陶盆。盆内所画的人像整个就是一副骨架，肋骨根根可见，脊椎骨耸立，四肢无肉只有骨，头无五官空有壳，好像是 X 光照出来的，神奇、怪异，别具一格。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称其为“一种典型的与萨满巫师有关的艺术传统”。如果骨骼式人像彩陶盆内画的是一具死人骨架倒也不稀奇，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骨架呈现活动状态。盆内的人像分明以骑马蹲裆式立于人的眼前，两臂舞动，双手似在抖动，屁股后还有

一根小尾巴似在摇晃，使人感到这副骨架是在跳舞。也许好奇心会驱使读者发问：“骨架应该是死人，怎么还会跳舞？跳舞的应该是活人，怎么会是骨架？”这正是萨满教的一个秘密。

萨满巫师对骨骼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特殊感受。老萨满选择新萨满时，往往要观察新萨满的骨骼是不是有别于一般人，即骨骼是否有异样。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里，萨满意念所体现的举动是神圣的，是不可怀疑的。老萨满对候选人骨骼的怪异检查方式和对骨骼的独特感受，正体现了萨满教的神秘性。

信仰萨满教的民族认为人可以从其骨骼中再生复活。人的骨骼所以有再生的功能，是因为骨骼里藏着灵魂，而灵魂是不会死

的。中国古代有“不化骨”的说法，清袁枚《续子不语》卷五说：“不化骨乃其人生前精神贯注之处，其骨入地，虽棺朽衣烂，身躯他骨皆化为土，独此一处之骨不化，色黑如髹，久得日月精气，亦能为祟。”不化骨能作祟，正是骨骼中有灵魂的反映。

萨满基于灵魂驻居在骨头里的信仰，用骨骼体验死亡与再生的演出仪式有两种：一种是用自身形体表现，颇似现在的哑剧表演，以形体让神灵感知；一种是借助法器象征性地表现，这在鄂温克人的萨满中可以找出例证。鄂温克人的萨满把萨满神衣看成是人本身的再现，因此在萨满神衣上出现了人体各关节的造型，有骨骼、关节、脊椎骨及骨髓等。当萨满穿着这种神衣作法时，神衣上披挂的象征性骨骼就有了宗教上的神圣性，在信仰萨满教民族的意念中，萨满就是以骨骼化的方式来进行他的仪式。

无论萨满是以自身形体还是借助法器用骨骼化的仪式来演出，在萨满的意念中肉身和服饰都是次要的，只有骨骼才真正体现着仪式的真正意义。因此当萨满把这种仪式用自己的意念和感觉采取艺术形式画出来时，只是把灵魂的所在——骨骼画出来就行了。

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半山彩陶盆内的骨骼式人像，就不难理解其为什么会有活动感，因为这幅画表现的就是萨满用骨骼化的方式表演死亡与再生仪式。陶盆内的骨骼式画像，就是萨满用骨骼化的方式表演死亡与再生仪式的记录。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阴阳人彩陶壶。该壶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通高34厘米，小口短颈，圆腹平底，泥制红陶，从口到器腹中部涂敷一层红色陶衣。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器表捏塑出的裸体浮雕人像。人头在壶的颈部，五官俱全，小



骨骼式人像彩陶盆

马家窑文化
安特生采集

眼、高鼻、硕耳、大嘴，人头背面的壶后颈绘有一圈交叉斜线条纹，表示其人披发；人像双手捧腹，两腿直立，乳房微微突出，并用黑彩点绘乳头。乳房对女性来说似乎小了点，对男性来说则大了点，可谓不男不女；最奇特的是被夸大处理的外生殖器，既有阴唇，又有阴茎，可知裸体人像表现的是合男女为一身的阴阳人。人像背后绘有一只简化的大蛙，从壶后颈所饰的交叉斜线条纹表示人的头发看，壶后腹所绘的大蛙表示的应是人的后背。这样，我们就了解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像的正面是阴阳人，人像的背面是一只蛙，人蛙相融，合为一体。在人像和大蛙的脚下，围壶饰有一圈水波纹。

这件独特的阴阳人彩陶壶究竟有什么文化寓意呢？首先让我们看看原始民族是如何看待阴阳人的。阴阳人是一种罕见的性器官畸形人，他们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性，很容易被原始民族认为是天生具有神性。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天地人神的中介——萨满。由于阴阳人在现实生活中十分罕见，阴阳人死后，他所在的氏族部落未必再有阴阳人出生，一些性别正常的萨满为获取阴阳人萨满的神性，就采用了扮装阴阳人的做法。雅库特人的男萨满跳神时，胸前必须挂上象征妇女乳房的东西，并

且还要戴上女人的头发，平日一定要穿妇女的衣物。另外东北亚的楚克奇、弗雅喀、堪察加尔等族的男萨满也必须戴上女人的头发，穿女装，学针线活，声音也要变成女人的声音。从上面提到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骨骼式彩陶盆可知，当时萨满教观念已经流行。因此我们说，晚于半山类型的马厂类型的这件彩陶壶上的阴阳人，表现的应是当时氏族部落崇敬的、先天具有神性的特殊萨

满。

陶壶上的阴阳人萨满和大蛙共有一个头，前看为阴阳人，后看为蛙，人蛙合体。这种人和蛙相互拥有对方形态的表现方式，实际上体现的是人和蛙相互转形。萨满向动物转形，除身上饰以动物的皮、面具外，更注重心理变幻，即整个身心已经转成动物，这就是萨满教中的请神附体。阴阳人陶壶背后的蛙，与人像等高，不可能披挂真正的蛙皮，

阴阳人彩陶壶

马家窑文化
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出土
高33.4厘米



从外观上看，很像阴阳人背后绘有蛙形，从意念上看，则可能表示萨满请蛙附体，寓意为萨满向蛙转形，借助蛙通神。人蛙合体是马厂类型彩陶器上常见的题材，除阴阳人彩陶壶外，还有很多具有人头蛙身合体纹饰的陶器，其纹饰的含义是一致的。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流传着许多萨满变成蛙的传说。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认为，只有拥有非凡权力的萨满才有变成青蛙的能力。

为什么法力大的萨满要变成青蛙呢？这是因为青蛙在萨满观念中是有很大神力的动物。法国学者里斯·希洛克认为，青蛙比任何动物都更好地体现了地狱居民拥有的超自然的能力。萨满认为变形为具有潜水能力的青蛙，便能潜游下界，到地狱为病人和死者招魂。青蛙不但是下界神灵，还是天界神灵。

萨满教信仰万物有灵，相信动物的灵魂和人的灵魂可以互转，当萨满请某种动物灵魂附体时，信仰萨满教的人们认为萨满就是这个动物的化身。陶壶上的阴阳人萨满请蛙附体，显然具有蛙的化身特性。萨满请动物灵魂附体，必须模仿所请动物之态，狂跳不已，进而癫狂、昏迷，进入恍惚的境界，这时萨满的灵魂便会游离出自己的肉体去与神交往。为达到昏迷、癫狂、恍惚的状态，萨满一方面利用心理作用自我诱发，一方面则利用药物刺激。有趣的是，蟾蜍本身就是致幻剂。蟾蜍分泌的浆液可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狂躁、精神异常等症状，并能产生明显的彩色幻觉和麻醉作用。南美印第安人就有在宗教仪式上剥下大量的蟾蜍皮，烧灰吸食，以期致幻通神的习俗。

蛙的变形再生也具有萨满教的含义。蛙蟾幼体与成年体态完全不同，从有尾无腿的蝌蚪，长到无尾有腿的蛙蟾，需经多次变化，再生出不少新的器官。蛙冬天钻入地下冬

眠，春天重新“生”出。蛙的生物特征和习性，使信仰萨满教的人们认定蛙有一种变换无穷、死而复生的特殊巫术功能，萨满教尤为重视蛙蟾变形再生的巫术能力。

阴阳人彩陶壶在人蛙的脚下绘有一圈水波纹，是喻示蛙与水有密切的关系。在萨满教中，蛙还是水的掌管者。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蛙与月难舍难分。《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云：“（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太平御览》卷四引《抱朴子》云：“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涛大。”阴阳人陶壶后的大蛙很可能也带有保护该壶不致破裂和祭酒不致溢出的寓意。结合民族学材料分析，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阴阳人彩陶壶，应该是萨满使用的祭器。

出现、形成于史前时期的萨满教，对北方民族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都信奉过萨满教。现在，萨满教在中国北方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蒙古族、锡伯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中还有保留。

第三节 通天地手段的独占

据《国语·楚语》记载，远古的时候，“民之精爽不携贰者”的巫觋具有通天地的能力，到九黎乱德之时，“民神杂糅”，人人都可以通神。通神曾经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通神的人也是平常之人，没有什么特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始宗教开始与政治结合在一起，于是通天地的权力被少数人所垄断。据文献记载，对通天地权力的垄断始于

颛顼时期。《国语·楚语》说，颛顼帝命令重和黎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让重“司天以属神”，让黎“司地以属民”。

从考古材料看，对通天地宗教权力的垄断出现于龙山文化时代。

在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

文化中都有—种重要的玉礼器——玉琮。张光直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说：“琮的方、圆表示地和天，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在许多琮上有动物图像，表示巫师通过天地柱在动物的协助下沟通天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山东龙山文化的十九节大玉琮，琮高49.7厘米，是目前国内所见最高的玉琮，该琮近顶端刻有“☉”纹，这种刻纹在大汶口文化的祭器陶尊上也有，表示日。琮的上端刻“☉”纹，正反映出巫师可以借助玉琮这种起天地柱作用的法器通天。在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出土的一些良渚文化玉琮上，刻有较完整的巫师形象，巫师头戴羽冠，双手叉腰，穿繁纹衣物，骑在一怪兽身上，怪兽巨眼、大鼻、阔嘴，颇似老虎。玉琮上刻画的巫师骑兽图案，正是巫师呼唤动物助手，利用玉琮这一可以起天地柱作用的法器沟通天地人神。

我们都知道，玉的硬度远高于石。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史前时期，制玉必须以水掺解玉砂为介质缓慢地加工，从切割玉料，琢磨成形，到穿孔、雕刻，制作一件精美的大玉琮，不知道要花费一个熟练玉工多少时间。正因为如此，玉器才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成为贵重之物。巫师拥有玉琮，表明他已成为氏族部落中的显贵，因为一般成员绝不会有这种精美贵重的玉器，而巫师用常人不可能有的玉琮作为法器通天地，实际上也就垄断了通天地的权力。

考古学家在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发掘出了两处良渚文化的祭坛。反山祭坛为人工堆砌，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总面积约2700平方米，高出地面4米左右，土方达2万立方米。瑶山祭坛位于一座小山顶上，平面呈方形，面积约400平方米，中心是一座

十九节大玉琮

大汶口文化
高49.7厘米





大玉琮和玉琮上的刻纹

良渚文化
浙江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
直径17.6厘米，高8.8厘米

方形红土台，红土台外围挖一围沟，沟内填灰土，围沟外围是用黄土筑成的土台，台面上散见较多的砾石，估计土台原铺砾石石面。祭坛中心红土台的红土、围沟外的灰土是特意从山外搬运来的。瑶山祭坛，特别是反山祭坛，筑造工程浩大，只有高度的集权才能调集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建造，这样的祭坛自然也就归集权者所掌握和控制。

反山和瑶山祭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祭坛上都有专门埋葬巫师的墓葬。反山祭坛上有11座巫师墓。瑶山祭坛上有12座

巫师墓，分南北两行排列。两处祭坛上的巫师墓都随葬有大量的精美玉器，少者几十件，多者上百件，除装饰品外，主要是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和玉冠状器、玉三叉形器等表示身分的佩器。其中以玉琮、玉璧最为突出，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十分精细。反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大玉琮直径17.6厘米，高8.8厘米，重6.5公斤，是目前所见良渚文化最大的玉琮，堪称琮王。这件大玉琮上刻有完整的戴羽冠巫师双手叉腰骑怪兽的形象。反山、瑶山巫师墓所出土的玉琮上，几

玉钺

良渚文化

浙江余杭瑶山7号墓出土
长16.3厘米，宽13厘米

乎都在每节的转角上刻出这种巫师形象的简化图案。反山23号墓随葬54件玉璧。《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璧、琮是祭祀天地的礼器，祭坛上的巫师掌握着祭祀天地的权力。在大型祭坛上负责祭祀的巫师，其地位远远高于祈福禳灾、招魂祛病的一般巫师，是参与甚至决定氏族部落重大事务的祭司。他们留恋由于掌管祭坛而给他们带来的地位、荣誉和财富，就是死了也要埋葬在他们一手垄断的祭坛上，在阴间继续拥有他们的地位和财富。

在反山12号墓、瑶山7号墓等墓中，精

美的玉钺与玉琮共存。玉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物，玉琮是通天地的法器，二者共存于一墓中，说明墓主人不仅掌握着通天地的祭祀权力，同时也掌握着氏族部落的军事权力。从甲骨文我们可以得知，商王朝的重大军事行动都要由巫师占卜，看看是否符合天意，因此巫师对军事行动有很大的决策权。实际上在上古时期，有的王或氏族、部落军事联盟的首领本身就是巫师或者可以行使巫师的职能。

《春秋繁露·求雨篇》载：“春旱求雨，暴巫聚炷。”《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夏大旱，公欲焚巫、炷。”上古时期，为保庄稼丰

收，遇旱灾时，由巫师负责祈雨。如果旱情严重而巫师用一般的作法手段祈雨不果，便采取极端的方法——焚巫，感动天神下雨。《文选·思玄赋》注引《淮南子》云：“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由此可见，商汤时这种自焚祭天祈雨的行为是行使巫师的职能。

《荀子·非相》载“禹跳汤偏”，是说大禹和商汤时都有与常人不一样的走路姿势。大禹的走路姿势很怪，《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说，禹“形体长，……疾行，手左随以右，劳左佚右也”。后世巫师一直把作法时所跳的步伐称为禹步。《法言·重黎》云：“昔者禹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巫书《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第四》云：“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步。……因禹制作，故曰禹步。”大禹治水之时，确实采取过一些巫术手段。《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

引《淮南子》云：“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请动物附体，化身为动物，获取动物的神性，是古代巫师惯用的作法手段。《路史·后纪十》载，禹“乘龙降之”。《绎史》卷十一引《抱朴子》云：“禹乘二龙。”禹可以乘龙升降于天地之间，则大禹有巫师之能已明。

太昊伏羲氏和黄帝都曾沿天梯——建木上下于天。《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黄帝均为其所在之时天下最大的首领人物，虽权倾天下，可也不忘承担宗教职能。

以上所举之例，可以明证上古时期的政治、军事领袖具有巫师的职能，他们亲自从事宗教活动，实际上是对宗教权力的控制和垄断，从而达到政教合一、使权力高度集中、一统天下的目的。



第十三章

文明的曙光

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组织不断完善，文明的因素因之越发明显。

关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长期以来学者们有过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总体来说，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有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也就是以“国家”的形式进行管理。作为借以复原这种社会组织的物质遗存，考古学证据可以比较直接显示的，有城市——包括城垣和宫殿、王陵，大型祭祀中心，作为身分等级象征的礼器系统，金属冶炼和加工制作，文字的使用等等。考古证据所间接显示的，是历史学家最关心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等。所谓间接，是对古代遗存进行归纳、分析，推测人们生前的相互关系，进而判断当时社会组织所能达到的复杂程度。出土的极少量珍贵文字资料固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文明的程度，但是可以连续阅

读的文字记载，无论是出现在甲骨上，还是青铜器上，实际已经是文献学的范畴。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理论定义的概念，而使用案例判断，商代进入了文明是中外学者毫无异议的。至于夏代，目前尚缺乏文字证据，还处于通过考古学的方法与手段进行夏文化探索的阶段。另外，从前3500年到前2000年左右的漫长时期，可以称为单项文明因素的考古发现比比皆是，但在某一地点能够集中所有因素的综合体始终没有出现。即使是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也缺乏文明重要因素城垣和文字的资料。

第一节 关于文明社会的标准

关于中国文明社会的开始，是中国古代

史研究中最重大的课题之一，从标准到举证，一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热点。

从社会发展科学研究的角度提出“文明社会”的标准，以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 H. Morgan)的《古代社会》为代表。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大阶段，并认为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准是：发明和应用文字；使用铁器；出现了国家和城市。

其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是形成文明的要素，作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并形象地比喻“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英国学者柴尔德(V. G. Childe)1950年发表的《都市革命》认为文明开始的标准就是城市的诞生，化解为具体的衡量指标有十项：一座城市的居民人口达到一定规模(7000人至20000人)；出现了靠农民剩余粮食养活的手工业者、商人、官员和僧侣等；制订了税收制度；城市中心拥有宗教建筑；由僧侣、军官、贵族组成的统治阶级；文字与记数系统；实用科学技术的发明：数学、天文学、历法等；专业艺术创作；远距离贸易；基于地域而不是亲属构成的国家组织。

美国学者克拉克洪(C. Kluckhohn)在1960年也提出了自己制订的文明标准：具有高墙围绕的城市，城内居民超过5000人；已经使用文字；拥有复杂的礼仪中心和礼仪活动。据克拉克洪讲，上述三条只要具备其中两条即可。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1983年在日本就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作学术讲演时，在列举了学术界公认的一些文明标准之后，特别强调文字对于文明产生的意义。他以中国

河南安阳的商代殷墟文化为例，指出文明最关键的要素是：都市、文字、青铜器。据此可以说，商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同时他又指出，殷墟文化还有独具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如玉石雕刻、驾马的车子、刻纹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所以，商代创造的又是一个灿烂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文明。

另外，在史学界，有人根据古代埃及等实例，着重指出掌握人工灌溉技术对于创建文明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在许多大河流域，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灌溉，才最终建立了国家。

我们所讨论的文明，是指文明的萌芽阶段，即人类社会和物质生产达到的一定阶段，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向国家过渡。在考古遗迹的辨识上，我们将看到：相关的聚落群的中心聚落走向城邑，壕沟、城垣等构筑了防御设施，环卫着大型公共行政建筑；宗教和礼制的权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特殊墓葬的形制和丰厚随葬品凸显了极少数人至高无上的地位，非实用的、奢侈的身分等级象征物礼器系统形成；在继续使用石质生产工具的同时，青铜冶炼与铸造技术的掌握为未来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大量陶器上发现的刻画符号，逐步具有抽象的字符功能，对文字的起源有启发意义。保守一些说，文字的萌芽和先驱已经形成。

第二节 在中国不同地区出现的文明因素

一、从聚落到城市

(一) 古城垣

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城市。关于考古

学辨认城市的标准,一般认为,一处城市遗址,起码应该包括城垣、公共行政建筑(宫殿、衙署等)、相当数量聚集的居民住宅、手工业和商业设施等。

作为城市的管理边界和防卫设施,城垣是公认的重要识别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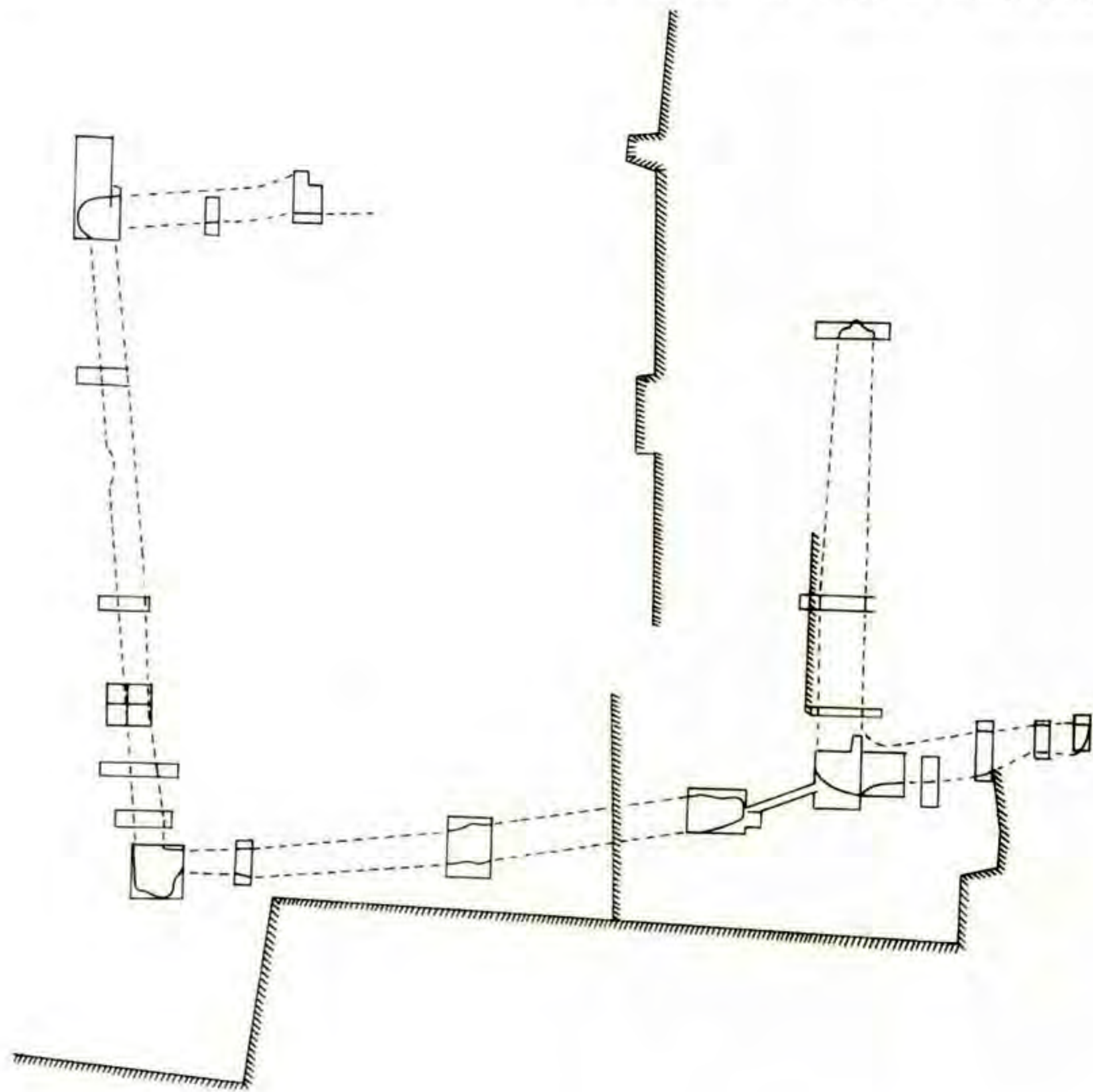
在农业聚落时代,例如仰韶文化早期的防御措施主要是在聚落周围挖一圈壕沟,或栽些木栅栏,如陕西省的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等等。

中国最早的城垣出现应该与逐步掌握大规模的夯土技术有关。而壕沟取出的土正好是筑城的材料来源。所以,一直到明代,全面包砌城砖的城墙(里面还是夯土)、夯土城垣和外围的城壕始终是城市外壳的基本结构。

虽然考古学家20世纪30年代就在山东龙山文化的命名地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了城墙基址,在河南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也发现有70米长的龙山文化夯土城基,但由于发现较少,加之当时对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发展水平缺少足够认识,故多年来一直处于将信将疑的状态。突破性的发现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已经有数十座新石器时代古城被标注在地图上。

时代最早的古城可能在长江流域。1991年,湖南考古学家在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一处屈家岭文化城址,年代在前2600年前后,时间还略早于黄河流域的那些龙山文化城址。这里的城同黄河流域一律方形不同,平面是圆形的,直径310米,四面开门。城门有卵石铺筑的道路,直通城中心的大型建筑

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图



夯土基址。与此大体同时的古城，还有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石首走马岭古城等四五座。

1994年，在郑州郊区、黄河之滨的西山遗址，考古学家确认了由国家考古领队培训班发掘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这座平面形状不规则的土城，年代应早于前3000年。

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在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等地都有重要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期，河南考古学家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这里是一处龙山文化古城址。城平面呈“日”字形，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小城，由于河水冲刷等原因，已残缺不全，估计面积1万多平方米。随后，又在豫东的淮阳平粮台发现了另一座龙山文化城址。该城址呈正方形，边长210米，现存城墙高5米，上部宽8米至10米，底部宽13米。城门两侧有用土坯垒砌的门卫房。城外有一周城壕，城内有成排的房基，有墓葬、陶窑，还发现了一块冶炼后废弃的铜渣。城内敷设有陶管道组成的向城外排水的系统，有些房屋坐落在高高的台基上，表明特殊的地位。对城内所出木炭作碳-14年代测试，结果是前2400年前后。1986年，河南考古学家在鄆城郝家台再

次发掘出时代、规模都和平粮台古城相仿的龙山文化古城，边长约200米，城内也有成排的房基。1992年至1994年，河南省的考古学家在辉县孟庄发现一处龙山文化古城，保存最好的东墙长约375米，城外还有一圈宽约30米的护城河，二里头文化时期和商代都继续修整、加固和沿用这座古城。近年在新密发现的古城寨遗址，不仅地面城垣保存完好，面积达18000平方米，而且年代下限与二里头文化衔接，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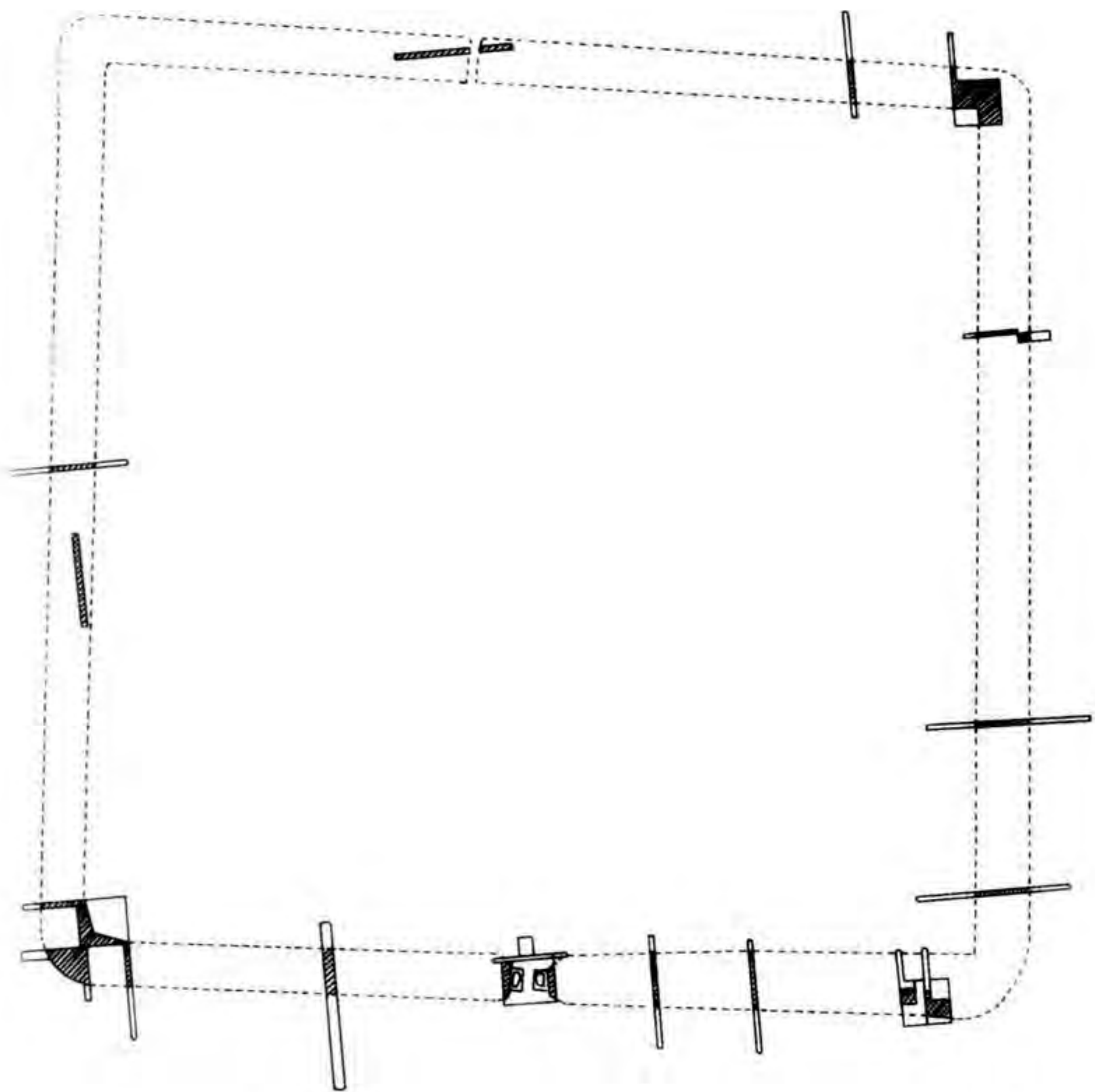
几乎同时，山东考古学家在寿光边线王村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址。这座城有内、外两圈，内圈边长约100米，外圈边长约240米。城墙的基槽最深达7米，推测原来城墙厚约10米，高也是10米。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后来城市分内城和外郭城两圈的祖形。另外，山东省的考古学家通过再度发掘城子崖遗址，证实了此处确实存在龙山文化城墙的基址，并且在后来的岳石文化时期继续加固使用。其后，在邹平丁公、五莲丹土和山东的西北部，又陆续确认了若干座龙山文化城址。

在以发掘高规格墓地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发现了城垣。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外景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图



在陶寺文化早期，建有一座小城，内有12座夯土建筑基址，其中最大者达500平方米，估计是宫殿区。陶寺文化早期后段到中期建筑大城，为正方形，面积约250万平方米。位于大城中部偏东北的早期小城此时废弃，但建筑还在继续使用。大城东南部是窖穴区。西南部发现大量石片，因而判断为手工业区。西北部是普通住宅区。各区之间有大片空白区。南墙东段与向外扩建的城墙也构成一处小城，可能是墓葬区。城垣建筑方法系因地制宜，使用平夯、堆砌或版筑。整座城垣在陶寺文化后期废弃。

在内蒙古自治区，由于当地地形的特点，所发现的龙山文化古城多用自然石块垒砌城垣，凉城老虎山遗址、包头阿善遗址等石城墙不仅轮廓清晰可见，有些地方地面残

存高度仍近2米，远看像处山寨，城垣内的一座座石砌房基也保存完好。

人们还推测，这类夯土小城址在以前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应该也有，但因为发掘面积不够大，分辨早期夯土基址的技术水平不够高等种种原因，终无缘得识。最重要的是，多年来，许多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水平估计不足，缺乏强烈的找城意识。相信今后关于古城的新发现会接踵而来。

但是，城垣的出现只是为后来的城市诞生准备好了必要的技术条件，有城垣的聚落并不一定意味着城市的诞生。

这些城的面积都很小，多在1万至5万平方米之间，甚至小于仰韶文化时期的许多大遗址。城内也缺乏反映城市经济生活的各种遗迹。一些学者认为它们不过是把壕沟换

成围墙的农业聚落，或者认为是一种防止异族侵扰的军事小城堡。有学者提出，城墙并不是城市的必备条件。夏代的都城二里头、商代的都城殷墟（最近发现的洹北商城的时代早于殷墟期）、西周的都城丰镐、秦都咸阳，迄今为止都没有发现城墙的踪迹。从世界文明的范围观察，在一些较发达的文明中心，如迈锡尼文明、早期埃及文明、玛雅文明、高棉文明，以及后来一些骑马民族在草原地带建立的文明，都没有以高耸的城墙为象征的城市。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从聚落，到中心聚落，到古城，到古国，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城垣的出现，正是古城出现的象征，是走向文明的关节点。

（二）公共行政建筑

城市的出现是公共行政权力集中的结果。公共行政系统的物化表现是城市中的宫殿、衙署这类建筑。它们在城市里是政治中心的象征，是为体现、行使和维护政治统治权而修建的特殊建筑。

1983年秋天，在甘肃省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一座编号为F901、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的奇特的大房子。这座建筑选址居高临下，拥有前堂后室、左右厢房，具备中国的古典庭院的格局。大堂一进门的地当中，有一个直径两米半的巨大圆形灶台。大堂前面的庭院有排列整齐的十二个大柱洞，有学者推测可能是提供给十二个氏族或部落树立自己的图腾柱或旗杆的。柱子前面的一排青石板，可能是用于处理敌方俘虏、屠杀各种牺牲品以祭祀祖先神灵的。在室内发现的陶器形状奇特，表面泛着华贵的红光，绝非日常用具，可能与祭典一类的特殊功能有关。大房子地面表层使用的是一种特别配制的混凝土，坚硬光滑。最近，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的铸鼎原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类



似的大型建筑基址。这类大房子无疑是部落或部落联盟议事或举行宗教活动的公共建筑，表明“公共行政权力”已相当强大，可能统一着当时的军权、财权和宗教权，那么“政权”也就有了雏形。

这类前3500年或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奢华殿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坐标点。虽然我们在龙山文化时代发现多处较大的多间房屋，装修讲究的用白灰抹墙甚至绘涂壁画，但绝对称不上是宫殿建筑。有些可能用于公共活动的大房子，一般只是面积比其余房子大一点，看不出规格有多大提高。不过，按照合理的逻辑推测，从仰韶文化晚期的“原始殿堂”走向二里头文化真正宫殿建筑的一千多年的路途上，我们应该有机会在一些大型城垣内发现相称的公共行政建筑，就像后来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格局那么理想。最近在河南新密发现的古城寨遗址，城内有带三面廊庑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

那么，有了大型公共建筑，走向城市化，是否一定就是文明的同义语呢？有的学者指出，耶利哥早有城址，但社会生活发展水平与文明相距甚远。

陶下水管道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出土

红山文化祭坛

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



二、公共祭祀中心

(一) 坛、庙、冢

1979年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发现的规模巨大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十分引人注目。这是一座人工修砌的面积达240平方米的高台，中间的前部是一个石砌的圆形祭坛，直

径2.5米；后部是边长10多米的方形祭坛，坛上有3个石块垒筑的祭堆。祭坛周围出土了不少陶塑裸体女像，约为真人的二分之一大小，出土了一批动物形玉雕，还有大量彩陶器碎片。

在距此不远的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的牛河梁一带，发现了分布面积达几十平方公里

红山文化祭坛

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出土





红山文化积石冢

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出土

的红山文化墓葬群。

一批大型红山文化积石冢，是在地面上用石块垒砌的大冢堆，冢堆里面有大小不等的若干个石棺墓。墓内除尸骨外，都随葬着极为精美的环、镯等佩饰玉器。积石冢的周围排列着专门烧制的数百个彩陶筒，蔚为大观。积石冢的旁边，都有当年举行过祭祀活

动的迹象。

离“陵园”不远的小山上，有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女神庙”。从基址分析，庙宇是多间建筑，分为主室、侧室、前室和后室。发掘出的泥塑彩绘女神头像约真人般大小，脸蛋红润，神态安详，用玉片磨制镶嵌的两眼炯炯有神，乳房丰硕，充分显示女性美的魅

红山文化女神庙

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出土



力。体质据人类学家判断属于蒙古人种。庙中神像均残毁，留下许多断缺的肢体，据统计共属于六具神像的个体，有的基本与真人一般大，有的比真人大三倍。但是，此处极为重要的遗址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完整、彻底地发掘和公布资料，所以我们也只能暂且采用发掘者所推测的“女神庙”的说法，尽

管还缺乏许多必要的证据。

由于在这一片坛、庙、冢区域没有发现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大型聚落遗址，学者们认为这里是更大范围的若干红山文化人群公用的公共祭祀圣地。

（二）礼器与等级制度

1986年，考古学家在余杭县反山墓地发



掘了11座内有棺、外有槨的良渚文化大墓，其中仅随葬玉器就数以千计，很多品类在传世古玉中根本没见过。1987年，又在距反山墓地7.5公里处发现同样规模的瑶山墓地。考古学家在这里不仅发掘了12座大墓，更令人振奋的是，人们发现这片墓地实际建筑在一座祭坛上，即人工堆筑起一个巨大的高土台，在台面上挖筑墓室，形成坛、冢合一的结构。

在良渚文化所出二十多种玉器中，最特殊的是琮、璧、钺三种礼器。

琮都体大质精，内圆外方，或许反映出已有了天圆地方的观念。琮多分为数节，外表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威严而诡秘，一般认为应是神权的代表器。

璧是一种中间开圆孔的扁平圆形玉片，其涵义说法不尽一致，有人认为可能是财富的代表。

钺的意思最清楚，是军事统帅的象征。有学者写过论文，认为汉字中的“王”字，来源于甲骨文中的“钺”字。这种说法颇得学术界首肯，可见“钺”或者说军权在当时的极端重要性。

玉敛葬墓

良渚文化
江苏武进寺墩遗址出土

玉琮

良渚文化
浙江余杭瑶山7号墓出土





玉冠状器

良渚文化

浙江余杭瑶山7号墓出土

除此之外，还发现一种玉质冠状饰，好像是戴在某种偶像上的帽子，与琮外面的戴冠神像很相似，显然佩戴者身份不凡。

学者们认为，这些随葬的高贵玉礼器，加上高台土冢和祭坛，都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存在一个集中掌握神权、财权、军权的显贵阶层。

一些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玉器不仅在红山文化之后又达到一次高峰，在当时诸文化中处于领先地位，在造型、纹饰等方面也开商代殷墟玉器之先河。

浙江良渚文化的突破性新发现不是孤立的。从1979年到1987年，上海考古学家发掘的青浦福泉山遗址，同样是一处良渚文化祭坛式墓地。这里不仅有葬具考究、随葬品丰美的大墓，而且有3座墓用女性或儿童殉葬。

似乎为了再次印证这一发现，江苏的考古学家不仅在武进寺墩遗址发掘了一座随葬

玉琮33件、玉璧24件的“超豪华”大墓，而且1990年至1991年又在昆山张陵山遗址揭露出一处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的良渚文化祭坛，发现一批被集体屠杀的青少年，有的砍掉头，有的砍掉下肢，可能是用于殉葬或祭祀。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祭坛之上的大墓随葬品极为丰富，例如第77号墓随葬精美玉器达125件，其中一件大玉钺挂在墓主人腰部，其余的玉器有刻工精湛的神人、鸟、兽等等，充分显示出墓主人昔日大权在握的独尊地位。

这样，在包括现在浙江、江苏、上海、安徽部分地区的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已经形成强大的统治势力。在这一区域，以玉琮上的一种基本规范化的特殊徽记为象征，显示出领袖权威在各个群体中的存在，同时也显示出各群体间共有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良渚文化尚无使用铜器的发现，却把玉器工艺发挥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有的学



玉钺

良渚文化

浙江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

者认为,这些工于玉器的先民,已进入了“古国时代”。这一区域各处带祭坛的大墓群,其实就是许许多多聚落中心。他们也许已构成文明城邦,而且可能结为更大的紧密联盟,以便同当时的其他强大联盟抗衡。有的学者借鉴脍炙人口的“良渚文化”的命名,暂称之为“良渚方国”,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当时他们自己或别人是怎么称呼的。

在世界文明范围,公共祭祀遗址的出现背景也是复杂多样的。在世界上很多原始社会遗址都发现了相当复杂的公共祭祀遗址,如小亚南部的恰塔尔·休于遗址,有相当规模的神庙建筑和宗教活动中心,但这里的居民仍以狩猎为主要谋生手段。反过来,在发达的早期印度河文明中并没有神庙发现。

三、金属的冶炼与使用

中国学术界对于龙山文化时代是否掌握了冶铜技术,长期以来持怀疑态度。

世界上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是居住在小亚细亚一带的古赫梯人,时间大约是在前2000

年到前1000年,相当于中国的夏商时期。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据此把掌握铁器作为建立文明国家的前提条件。其实此时中国正用青铜铸造着辉煌的夏、商文明国家。中国使用天外掉下的陨铁的证据是商代,而使用铁器的时代有把握地说是春秋早期,即前700年左右,或许还早一些。而且中国的冶铁工艺一开始就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途径,采用的不是锻造法,而是铸造法。

至于铜的使用,世界冶金史专家认为西亚一带可能在前9000年前就会利用自然铜作装饰品,前5600年左右逐渐进入早期铜石并用时代。他们认为中国使用青铜是在前2000年至前1000年间,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殷墟青铜文化时期,接受了从小亚细亚传来的成熟的冶铜工艺。在此之前,中国人完全不懂得冶铜技术。

中国学术界虽然不能接受殷墟青铜文明西来说的观点,但长期以来对于前2000年之前,即龙山文化时代是否掌握了冶铜技术也持怀疑态度。



红铜铃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

关于龙山文化时代发现青铜的例证其实早就有，不过有的是出土层位不够确凿，有的是文化性质或年代说不太准，长期处于存疑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的考古发掘的一再证实，此类发现累计近20处，龙山文化时代已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有意思的是，这些发现冶铜或铜器的遗址基本都在黄河流域，分布在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内蒙、甘肃等省区。但是我们尚未在这一地带找到较早的采掘铜矿遗址。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考古学家找到一批规模很大的商周时期古铜矿遗址，却全部分布在湖北、江西、安徽境内的长江边上，如闻名遐迩的黄石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等。这也是有待将来揭开的中国青铜文明之谜。

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时代冶铜的主要证据是发现了冶炼坩埚、铜液凝块、铜渣和铜矿石等。在河南临汝煤山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一块坩埚碎片，内壁凝固有六层铜液，表明熔炼铜液的次数。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龙山时代的青铜容器，青铜制品只是镜子、小刀、锥子等形状简单的日常用具。造型最复杂的是陶寺龙山文化晚期一座小墓（墓主人骨骼的碳-14测定年代是前2100年）中出土的一

件红铜铃，还有年代相仿的甘肃广河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有銎铜斧。二者因为有空腔部分，需要合范铸造技术。另外，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一件青铜残片，个别学者认为是容器的残片，不过目前为止尚无定论。

已发现的龙山文化时代的铜或铜器有红铜（自然铜）、青铜（铜锡合金）和黄铜（铜锌合金）。其中的青铜由于熔点低、硬度适应性强和翻模铸造变形小，后来成为冶铜的主流。

这样，中国的金属冶炼史无可争议地上推到前2500年甚至到前3000年，为夏商发达的青铜文明找到了直接前身。

那么是否可以因此说，龙山文化时代已脱离了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呢？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这当然也是看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因为不同质地的生产、生活用具的使用显然是先后重叠交错的。例如，新石器时代主要使用磨制石器，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打制石器。同样，在铁器时代青铜也远未绝迹。龙山文化时代的确普遍出现了铜器，但数量很少，还是以石器为主。如果衡量的原则是“就高不就低”，以新兴技术或产业的出现为指标，龙山文化时代未尝不可列入“青铜时代”。如果考虑到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和比重，称龙山文化时代为“铜石并用时代”可能更稳妥，因为夏、商、周才是名副其实的青铜时代。当然照此逻辑，后面的春秋战国时期，大概就得说是“铁铜并用时代”了。

早在1973年，考古学家在发掘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时，曾在第29号房子的居住面上，抠出一片嵌入地面的黄铜片，据测定含铜66%，含锌25%。这座房子的炭化木椽做过碳-14年代测试，经校正后的结果是



青铜小刀

马家窑文化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

前 4675 ± 135 年，在仰韶文化时代年代确实算相当早的。

因为黄铜的冶炼技术要求很高，锌的熔点也高于锡，故通常认为黄铜应该出现于青铜之后。当时对龙山文化有没有铜尚不敢肯定，所以对仰韶文化早期的这一发现颇有争议，很多人持否定态度，怀疑是田野发掘时不小心混入的后世遗物。

一些冶金史专家却从技术角度认为先有黄铜出现并非没有可能，并通过实验确认，只要有铜锌共生矿，就可以在较低熔点下直接冶炼出黄铜，而黄河流域被认为铜锌矿资源相当丰富。

对于这一发现，有人主张“孤证不立”，备案存疑，以待将来重复性的发现予以再证实。有人则提出此发现早已不是“孤证”。除此之外，关于仰韶文化时代发现青铜器的报道起码还可再举出几则：一是早在1942年，在山西省榆次源涡镇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

过一块陶片上附有铜渣。当时做过化验，含铜近48%。不过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几乎被完全遗忘了。二是山东省大汶口遗址1号墓随葬的骨笛上沾染有铜锈，含铜9.9%，有人怀疑是用铜器加工后留下的痕迹。三是1987年在一处红山文化房址中发现了铸铜用的陶范，可能是铸造鱼钩之类的东西。另外还有报道说在牛河梁附近发现有冶铜遗址。

如果上面说的都是间接证据，那么最直接的证据是在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发现有铜渣，并在第20号房基北壁下出土一把小青铜刀。该遗址属马家窑类型，碳-14年代测定约在前3280年至前2740年之间。这把铜刀是目前最有把握的中国开始制造青铜器的确凿实例。

有的学者指出，金属工具的使用也很难作为文明起源划一的标准。两河流域的铁器时代开始最早，但也是文明建立之后的事，多数地方的文明开始于铜石并用时代。而在



仰韶文化契刻符号

欧洲许多地方，虽然已用铁器，社会生活仍相当原始。建造了壮丽辉煌的太阳金字塔的玛雅文明，却不可思议地没有金属工具。

四、文字

前面讲过，夏文明探讨的关键因素是文字问题。追溯更早的文明源头，关键问题仍然是文字问题。不少学者声称，只有从地下挖出新的文字证据，那些关于文明起源的假说才能令人心服口服。

20世纪80年代连续六次发掘的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是一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对这里的出土木炭和泥炭进行碳-14测试，年代可早到前6000年前后，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年代是相当早的。

这里一些墓葬中随葬着成组的龟甲，内装石子，有的龟甲边缘还钻了孔。看来这些随同入葬的龟甲寄托着某种原始的崇拜或信

仰。过去学者们一直在寻找商文化把龟卜看得那么神圣的根源，有人认为东面濒临大海的大汶口文化居民喜欢随葬龟甲，可能是“龟灵”崇拜的发源地。而贾湖的发现年代又早出一大截，看来“灵龟”崇拜的发源地还需要再认识。

最精彩的发现是，在个别龟甲以及骨器、石器上，契刻有极似殷墟卜辞甲骨文的符号。须知文字是破译古文明奥秘的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对此专家们有的将信将疑，认为可能是某种徽记符号；有的则欣喜若狂，认为标志着结绳记事时代从此结束；有的古文字学家明确指出这些符号就是甲骨文的鼻祖。

实际上，在仰韶文化时代，类似于文字的刻画符号经常出现在很多陶器上。如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据学者们分类排列比较，有20多种符号。大体同时的陕西省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则有30多种，青海乐都柳湾墓地有50多种。这些符号不止出自一人一时之手，而且多有重复，我们可以据此判断有了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含义，绝非即兴创作。郭沫若先生断言，他们“无疑是具有文字性的符号”。

再稍晚一些的例子，如山东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上，都有酷似“日”、“山”、“火”象形文字的刻符。这些究竟是不是最早的文字，一直是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争论的焦点。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和唐兰先生不仅肯定它们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而且作出了释读。比方说上面为“日”、下面为“火”的那个符号是一个字，应读作“热”音，另一种说法是解释为“旦”字。像个长柄大斧的那个符号，其实就是后来的“戊”字。

龙山文化时代的这类刻画符号过去发现

不多，仅见零星报道。例如，20世纪80年代报道的陕西长安花园村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骨器上，刻有十余种字符。良渚文化所发现的陶文，也有人认为是原始文字。

据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主持者介绍，在龙山文化（这里的碳-14测定年代大约在前2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晚期居住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发现一个毛笔蘸朱色写的字符，几位古文字学家都认为是文字。旁边还有两个谁也不解其意的符号。

前面介绍二里头文化时说过，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20多种刻画符号。

关于什么算是文字的争论，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问题也出在判断标准上。

中国文字起源于象形字，已经由殷墟甲骨文予以充分证明。而象形字的渊源显然与出于记事表意目的的种种图形符号有关。其发展是从图画到简化图形，到图形符号，再到字符和句子，总之是从具形到抽象。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到哪一步才算是质变。基于此，有的学者认为这类刻符已经具备文字的特征；有的学者谨慎一些，称之为原始文字；有人称为字符，因为它们还不能连贯构筑成文。

有很多学者则对此持审慎态度，认为单凭这些孤零零的刻画符号，尚不足以认定文字的诞生。它们或许是制作工匠的记号，或是某种徽标，或是具有我们尚不确知的别的什么含义。这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即使能表达某种特定含义，离文字的标准还相差很远，不能同文字扯到一起。

而在关于舞阳贾湖发掘成果的报道中，仍然相当稳妥地把它们叫作“刻画符号”，反正文字也是一种符号，无懈可击——中国式



的幽默。不管怎么说，从舞阳贾湖的刻画符号到殷墟比较成熟的文字，中间的发展环节总会逐步填补，专家们更增强了发现夏代文字的信心。郭沫若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的刻画符号往后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往前看则可称为原始文字的孑遗。他主编的《中国史稿》在提到二里头文化陶器上有20多种刻画符号时，颇有肯定为正式文字的意思。

1992年1月，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清洗整理邹平县丁公遗址的出土文物时，意外发现一件灰陶盆底部残片上有5行11个刻画符号，极似文字。这种陶盆是典型的龙山文化晚期遗物，出土于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灰坑里。这个坑内所出土的1400多件陶、石、骨器残片，毫无例外均为龙山文化遗物，绝无晚于此时的。

这块陶片本身的年代经再三确认可靠无疑后，主持发掘者先后邀请了30多位国内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权威对之进行鉴定，比较一致地认为确实是文字。它们的复杂程度、熟练程度、系统程度都不像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上记号般的刻画，倒有点像后世的草书。

但是，专家们对这些文字的释读还有各种意见，因为它们似乎与我们已知的商人或

刻符陶片

龙山文化

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出土

刻符陶片

龙山文化

江苏高邮龙虬庄出土



周人的甲骨文、金文不属于一个系统。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基本都是斩钉截铁般的直笔，绝无这般盘绕曲回的运笔。

有人从理论上分析，认为这或许是东夷人的文字。既然当年秦始皇要把统一六国文字，即“书同文”作为重大举措，可知原来各个文化圈也当拥有自己特色的文字。近年来，一些学者发现，从商周到春秋战国，在四川出土的一些陶器和青铜器上都有许多意义不明的字符，大体统计也有几十种之多，有人认为它们就是与中原文字系统平行诞生演进的巴蜀文字。由此可知，自身文化传统一直强烈而又顽固的东夷人，如果确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也应与甲骨文、金文相映生辉。

最近有学者从另外的视角提出论点认为，丁公陶文是古彝文，而且进一步考证认为，“夷”就是“彝”的祖先，夷人被周人征服后，其各支部族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辗转迁移。目前散居于西南各省的彝族，始祖就与此有密切关系。过去也曾有人写文章，说有彝族老人能释读半坡陶器上的刻画

符号，或许原始民族的原始字符系统存在着可通识之处，但这一命题的范畴已超出文字学，牵涉到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与现代少数民族族源等重大课题，确实有待细细研究。

有些学者提出问题：这11个符号确是文字，陶器也确是龙山文化烧造的，但是，文字是在陶器烧造之前刻上的，还是烧造之后补刻的？如是前者，文字与陶器属于同时代自不待言；如是后者，则可能是同时代人刻的，也不能绝对排除后人补刻的可能性。对应此问题，发掘者认为，通过痕迹研究，应当是烧前刻的。

1994年至1996年，在山东阳谷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的一条灰沟内，发现一泥质磨光黑陶罐的肩部残片，烧前刻有陶文，可辨识出三个字，发掘者认为与甲骨文有渊源关系。

另外，有学者认为，陶器上的刻符也许另有含义或解释系统，例如东周时期的文字公认已很发达，但许多东周陶器上的刻符却不属于当时的文字体系，谁也不认识。

总的看来，在前6000年至前5000年间，也就是前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已使用脱离了图画的抽象符号来表达某种特定含义，虽然我们还不能破译这些含义。

在前5000年至前3000年间，即仰韶文化时期，这些符号种类已相当繁多，也许能表达比较复杂的意思，但尚未发现可能构成句子的成行符号。

在前3000年至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少在其晚期，有能表述较多意思的文句，正在完成从单个字符向遵循一定文法规则的文字转变。

夏代的文字虽然还没有发现，但从晚商相当成熟的甲骨文和金文推测，早商应该有文字。在属于早商的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的

传世青铜器上已有铭文。

另外，早期刻画符号的出现范围相当广，东到海边，西达河西走廊，分属不同的文化圈。因此，文字的诞生也有可能是在相似的社会发展阶段多元出现的。可能其中某一支交融了其他支系的营养，发展为殷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其他支系则仍沿着自己的原有路径或急或缓地前进。而各个支系的交汇合流，当然是秦汉大帝国的业绩。

古书的传统说法是“仓颉造字”。这位仓颉据说是黄帝的史官。所谓黄帝时代究竟指何时，等到我们的祖先会用文字写文章时已经搞不太清楚了，总之要大大早于夏禹时代，一般的估计多在前3000年前后的几百年。这个时代推测得准确不准确，或者黄帝、仓颉是否确有其人，其实关系都不是很大。因为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在夏、商国家建立之前很久，中国独有的文字系统，已经在不同的地方萌生成长了。

在世界范围内，文字虽然大都同文明一起成长，但也有如印加文明那样只有结绳记事而始终未见文字的例证。

第三节 文明在中原地区的突破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尾声，也就是大约前2500年至前2000年间，各地区古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兴衰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一度风光无限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石家河文化在度过高峰期后，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有些学者认为，过度地集中人力、物力投入豪奢的祭祀建筑与活动是其衰落的原因之一。中原地区一直四平八稳发展的河南龙山文化，却在此时最终完成

了走向文明的突破。

由于夏文化在豫西、晋南地区的确认，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遗存已进入了文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令人困惑的是，夏文明国家诞生前，河南龙山文化在与同时代的文化中，绝对没有鹤立鸡群的优越感，充其量与众多文化群雄并峙，各逞风流。

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学者举出很多有分量的证据。例如，山东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几乎已登峰造极，空前绝后，如黑色的“蛋壳陶”等。良渚文化的玉器微雕简直是鬼斧神工，红山文化、薛家岗文化、石家河文化玉器工艺也是各领风骚、独步一时。西北地区青铜制品的出现并不晚于中原，用兽骨占卜的习俗则以内蒙古地区较早。

基于这些事实，一般的解释是，中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有条件从周边文化中汲取营养。文明在不同的土壤里萌生、成长。但是，多元的能量积聚，最终还是导致了不平衡的发生。此起彼伏、动荡不安的文明，还是选择了中原腹地进行了大踏步的突破。

当然，这只是宏观的理论分析，是从历史选择的结果去倒推历史的必然性。对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夏文化的飞跃性变化，还有大量课题需要解决。从时间序列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夏文化早期的界限一直是争论、探讨的问题。从文化因素和文化谱系说，二里头文化确实与河南龙山文化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但是，究竟是一脉相传，同时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还是另有来源，并较多吸收了河南龙山文化因素，也是争议颇多的学术课题。总之，我们一般以中原地区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国历史上新石器时代大体结束的标志，虽然此时在边疆地区依然保持着新石器时代的一切最重要的社会特征。

参考书目

旧石器时代

- 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
- 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
- 贾兰坡：《古人类学研究病理学研究相结合》，《考古》1998年第7期。
- 吴茂霖：《1981年发现的安徽和县猿人化石》，《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期。
- 吴汝康、董兴仁：《安徽和县人化石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
- 许钦琦：《和县猿人时代的气候》，《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期。
- 李天元等：《郧县人头骨形态特征再讨论》，《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 群力：《湖北郧西白龙洞又发现猿人牙齿化石》，《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期。
- 辽宁省博物馆等：《庙后山》，文物出版社，1986年。
- 穆西南等：《南京汤山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及意义》，《古生物学报》1993年第4期。
- 陈琪等：《南京汤山猿人洞穴石笋的铀系年龄》，《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3期。
- 吴汝康等主编，吴新智等编著：《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
- 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 王玉仓：《科学技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 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
-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技出版社，1987年。
- 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区域性类型及其地位》，《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
- 安志敏：《中国原手斧及其传统》，《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4期。
- 房迎三：《皖南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调查简报》，《文物研究》总第3期。
- 黄慰文等：《盘县大洞的石器工业》，《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3期。
- 沈冠军等：《贵州盘县大洞遗址年代位置初探》，《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3期。
- 贾兰坡：《中国古人类大发现》，商务印书馆，1994年。
- 贾兰坡主编，陈淳编著：《中国猿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
- 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局出版，1953年。
- 吴新智：《陕西大荔县发现的早期智人古老类型的一个完好头骨》，《中国科学》1981年第2期。
- 吕遵谔：《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 吴汝康：《辽宁营口金牛山化石头骨的复原及其主要性状》，《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期。

- 贾兰坡等：《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976 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 年第 4 期。
- 吴汝康：《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 年。
- 吴汝康等：《广东韶关马坝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 年第 2 期。
- 贾兰坡：《长阳人化石及其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7 年第 2 期。
- 吴茂霖：《贵州桐梓新发现的人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4 年第 3 期。
- 吴新智：《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 年第 3 期。
- 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
- 马洪路：《远古之旅——中国原始文化的交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 安志敏：《中国细石器一百周年》，《考古》2000 年第 5 期。
- 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 年第 3 期。
-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 王建、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3 期。
- 盖培、王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 年第 4 期。
- 安志敏、吴汝作：《陕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57 年第 3 期。
- 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 年第 3 期。
- 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临沂县凤凰岭发现细石器》，《考古》1983 年第 5 期。
- 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 年。
- 李超荣：《石球的研究》，《跋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
- 安家瑗：《试论中国史前的弓箭》，《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 年第 1 期。
- 安家瑗：《小孤山发现的骨鱼镖——兼论与新石器时代骨鱼镖的关系》，《人类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
- 安家瑗：《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骨角器》，《人类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
- 安家瑗：《旧石器时代晚期佩戴具的功能及含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 年第 2 期。
- 尤玉柱：《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文物天地》1989 年第 5 期。
-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6 年。
- 安德列·勒鲁瓦-古昂：《史前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年。
- 岑家梧：《图腾艺术史》，学林出版社，1987 年。
- 高星：《人类历史的第一篇章——旧石器时代（2）》，《化石》2001 年第 4 期。

新石器时代

- 《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 年。
- 《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 年。
-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4 年。
- 《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 年。
- 《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 年。
- 《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 年。
- 《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 年。

- 《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4年。
- 《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
-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 《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2年。
- 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
- 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
-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 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
- 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图片索引

人类演化图	4	峙峪出土的细石器	50
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和主要文化遗址分布图	9	下川细石器	51
元谋人上、中门齿	10	萨拉乌苏细石器	52
北京人头盖骨	11	虎头梁出土的细石器	52
郧县人头骨化石	13	海拉尔和昂昂溪细石器	53
汤山人1号头骨	15	许家窑出土的石球	55
北京猿人洞	17	使用石球图	55
周口店龙骨山	17	标枪	56
北京人背鹿像	18	石镞	57
肿骨鹿下颌骨化石	19	弓箭的使用方法	57
剑齿虎头骨、上犬齿化石	19	小孤山骨鱼镖	58
北京人采摘野果图	20	脱柄鱼镖使用示意图	59
葛氏斑鹿角、下颌骨化石	21	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出土的各类打	
北京人烧烤兽肉图	21	制骨器	60
烧骨	22	山顶洞骨针	62
灰烬	22	骨角铲	63
北京人使用的石锤、石砧	24	穿孔兽牙	64
打制石器示意图	27	饰珠和赤铁矿	65
东谷坨的石器	29	山顶洞人埋葬死者图	66
金牛山石器	31	佩戴项链的山顶洞人	68
北京人石器	32	纹饰鹿角1	68
丁村出土的大三棱尖状器	34	纹饰鹿角2	69
百色的石器	36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外景	71
观音洞出土的砍砸器	38	陶罐	72
盘县人洞的石器	39	陶罐	73
金牛山人头骨化石	41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外景	75
丁村人遗址	42	尖底彩陶罐	79
马坝人头骨化石	43	彩陶盘	80
山顶洞人头骨化石	45	交叉三角纹彩陶瓶	81
柳江人头骨化石	46	白陶鬲	82

象牙梳	83	船形彩陶壶	124
锥形玉饰	84	骨鱼镖	125
黑陶高柄杯	85	骨哨	125
苇编	86	螺蛳壳	126
鸟形象牙圆雕	87	泥条盘筑法示意图	127
黑陶壶	88	鱼鸟纹彩陶壶	128
薄胎高柄陶杯	89	黑陶罐	129
黑陶盒、双耳杯、单耳杯	90	涡纹双耳四系彩陶罐	130
瓜棱灰陶杯	91	鱼纹彩陶盆	131
鹿角鹤嘴锄	92	半坡遗址彩陶上的鱼纹演变关系图	133
涡纹双耳彩陶罐	94	陶拍子	134
黑陶尊	95	袋足内模	134
玉璧	96	原始腰机使用示意图	135
石镞	96	布纹陶钵底部印痕（左）	136
山形玉饰	97	席纹陶钵底部印痕（右）	136
彩陶碗	98	玉龙	137
玉猪龙	99	锥形玉饰	138
骨锥、骨针、骨坠	101	山形玉饰	139
红陶罐	102	玉发簪	140
石钺	103	玉铲	140
网纹灰陶釜	104	玉琮	141
石铎	105	各种木制工具	142
夹稻壳和稻谷的陶片	107	蝶形器和圆雕木鱼	143
水稻	108	双格石研磨盘	145
刻有水稻纹饰的陶盆	109	石研磨盘和研磨块	146
陶釜	110	双格调色陶盒	147
骨耜	111	彩绘盘龙陶盘	148
粟	113	鸕鱼石斧图彩陶缸	149
石镰	114	涡旋纹彩陶罐	150
石磨盘、石磨棒	116	变体鱼纹圈底彩陶盆	151
姜寨母系氏族村落复原图	119	陶鹰鼎	152
小口尖底瓶	120	陶猪鬃	153
红陶釜、灶	121	水兽陶壶	153
扁足陶鼎	122	陶塑猫头鹰头	154
陶猪	123	陶塑裸体孕妇像	155
家猪骨	123	泥塑女神头像	156

舞蹈纹彩陶盆	158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图	182
彩陶鼓	159	陶下水管道	183
带调音孔的骨笛	160	红山文化祭坛	184
陶号角	162	红山文化祭坛	184
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外景	165	红山文化积石冢	185
刻符陶尊	166	红山文化女神庙	186
树符陶尊	167	玉敛葬墓	187
人面鱼纹彩陶盆	168	玉琮	187
蚌塑龙虎墓（西水坡 45 号墓）	170	玉冠状器	188
骨骼式人像彩陶盆	171	玉钺	189
阴阳人彩陶壶	172	红铜铃	190
十九节大玉琮	174	青铜小刀	191
人玉琮和玉琮上的刻纹	175	仰韶文化契刻符号	192
玉钺	176	刻符陶片	193
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图	180	刻符陶片	194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外景	181		

后记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瑗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

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〇〇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 中国国家博物馆